

目 录

序言	(1)
第一部分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经历	(1)
第一章 童年阶段	(3)
第二章 从少年到成人	(27)
第三章 向革命家的转变	(47)
第四章 政治犯的经历	(67)
第二部分 逍遥法外的共产党员	(89)
第五章 逍遥法外的地下党员	(91)
第六章 受训于莫斯科共产国际	(110)
第七章 国际经验的获得	(130)
第八章 党的总书记	(153)
第九章 积极备战	(169)
第三部分 通过战争开展革命运动	(193)
第十章 从党的领袖到军队统帅	(195)
第十一章 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	(212)
第十二章 孤军奋战	(235)
第十三章 同盟国家的承认	(253)
第四部分 革命成功	(273)
第十四章 驶向和平	(275)

铁托传

第十五章	国际政治家	(297)
第十六章	国家领袖	(321)
第十七章	有关铁托	(350)

铁 托 传

(英) 菲利浦·奥蒂

× × × 出版社

序 言

为伟人作传，这项艰巨的任务历来使人望而生畏；而当这位主题人物依然在世，身为国家元首、国际上的重要人士时，就更加令人胆怯。就约瑟普·布罗兹——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而言，鉴于他超出常人的丰富而又精彩曲折的经历，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他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当时世界正处于巨变的边缘。他一生的事业便一直与这一巨变，同时也与二十世纪欧洲社会演化过程中的革命发展紧密相联。

他漫长的一生中的不同时期所处的某些地方，使传记作者难以也不可能详加调查。他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军队里的一个军人，沙皇俄国的战俘，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观察者。在斯大林时期他曾数次长时间地访问苏联，曾在莫斯科被共产国际雇佣，并差一点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作为非法的共产党组织者从事政治活动，躲避着警察，使用各种伪名，往来于欧洲各地——从南斯拉夫到意大利、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或瑞士，掩藏着自己的踪迹。年代已久，这时再要清楚调查这样一种生活的真实情况，决不是易事。传记作者于是只能依赖人们的记忆——而人们的记忆中取舍往往经过选择。铁托本人记忆力极佳，描绘形象，对自己种种戏剧性的往事的回忆特别生动。其中许多一直反复流传的轶事，已经固定下来，犹如一幅幅静景照片。所以，关

铁托传

于他早期生活的某些记述也就好像是收藏在家庭相册中的简易照片。对铁托的早年生活的记述，很难跳出某种固定的模式。

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传记作者又遇到另一难题。在这场带来难以描绘的苦难、并终于在敌我力量全然悬殊的条件下带来胜利和成功的战争期间，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南斯拉夫人的全部交往，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便使他成为神话般的英雄人物。在当时情况下英雄崇拜原本非常自然，而为了促进团结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和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从事战后建设，该做法也得到了提倡。常人铁托和神话英雄铁托，有时更加难以区分。直到最近，有关这场游击战争的种种历史资料，仍受这种英雄观的严重影响，迄今为止仍无一部持客观的、批判态度的著作。我没有企图作这样一种再评价，这已超出这部传记的范围。我将军事史的大量细节略去，而集中于考察铁托在战争中的行为及其政治后果。现军事史正在由南斯拉夫、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学者写作，他们的作品当能供日后为铁托立传的其他作者们参考。

为活着的人撰写传记，便有一个问题出现：需要尊重他的沉默与隐私；我认为这是一切健在的人享有的权利，即使是世界闻名的人物也是这样。后来的历史学者可以不受这种约束，然而我应当如此。当铁托总统接见我时，他直率地乐观地回答了全部问题，没有犹豫和回避；我的印象是他并不否认让自己的经历接受任何考验。

铁托总统的正式传记，现正在由南斯拉夫一个专门的组织撰写，有研究人员搜集能发现的有关他一生的一切资料。这样一部全面的传记远非个人所能承担。我这本书的目的仅是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写作的，尤其是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

铁托传

康尼·齐利亚克斯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等人所写的，以及今后定会出版的许多历史性传记之间的补白。我起初构思本书时，曾请教南斯拉夫国内一些有机会接触有关铁托生平材料的人们。他们说：“我们全部以戴迪耶尔的书为出发点。”我发现确实这样。其英译本名为《铁托自叙传》，大半内容以铁托向作者讲述的自传性材料为基础。据说，这本书是今后所有以铁托生平为主题的著作的源泉，尽管自那时以来已发现大量材料对它进行修改和补充。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争夺中的防塞》也属于一部原始资料，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莱恩写的，他曾与铁托在一起共同工作并成为朋友。已逝的康尼·齐利亚克斯所撰写的铁托传记，作为资料来源，它的价值也很特殊，因为它是在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的困难年代里写的。康尼·齐利亚克斯的俄语说得非常流利，懂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当时曾很多次有幸和铁托长时间交谈。我这本书并不奢求实现这种特殊价值，虽然我曾两次受铁托的亲自接见，并在我研究南斯拉夫事务的那些年代里采访过许多在铁托一生中的各个阶段与他有过关系的领袖人物，以及其他一些人士。

我的想法是利用早期出版的传记，增添新材料，并以我个人对南斯拉夫事务所掌握的知识来写这本传记。我还有一项有利条件，那就是被允许查阅南斯拉夫的档案材料，这是最近这段时期才对历史学者们开放的，而其中大量材料迄今还没有发表。我曾得到南斯拉夫、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各国许多人士的慷慨援助，我对他们所有的人感激不尽。书中所作种种判断，他们没有任何责任。在此提到一些人而不提另外的一些人，似有厚此薄彼之嫌，但我还是要对一些曾抽出宝贵时间和我讨论

铁托传

这个主题的各种具体方面，并帮助我搜集材料的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我要提到的有 S·W·贝利、P·达缅诺维奇、斯蒂芬·克利索德、W·F·迪金、克利亚科维奇上校、空军上将威廉·埃利奥特爵士、J·马利亚诺维奇、W·罗伯茨、M·米卢蒂诺维奇、J·托马塞维奇、D·拉亚诺夫、V·温特哈特、V·韦莱比特以及 W·武锡尼奇。我从贝尔格莱德的工人运动研究所负责管理档案的政府当局和法边·特尔戈将军以及战史馆人员那里获得无比珍贵的帮助；我从萨格勒布的工人运动研究所以及南斯拉夫各地方的博物馆主管当局得到特别大的帮助。南斯拉夫驻伦敦的几任大使和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南斯拉夫政府部门和机构帮助我联络需求、搜集材料，有求必应。我也要向已故的萨格勒布大学鲁道夫·比恰尼奇教授致谢，他无数次慷慨地抽出时间，与我讨论铁托一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各种情况。他对该时期的克罗地亚的深刻见解和广博知识可说是独树一帜，他的逝世则留下了一个不可弥补的空白。希拉·基德夫人帮助我整理原稿以便付梓，埃德斯·鲁宾逊夫人乐观、灵活而熟练地协助我处理秘书事务，我对她们两位特别感谢。我还要感谢曼彻斯特大学的吉塔·伊奥内斯库的始终如一的关心，以及使我深深获益的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数次讨论。最后，我必须感谢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若缺少他的鼓励，这本书根本不会开始，更不用说完工。

第一部分
一个共产党员
的成长经历

铁托传

第一章 童年阶段

1928年11月里天气阴沉的一日，铁托向满是同情的支持者的法庭，就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进行了一番自我宣言。他身材并不高大魁梧，戴着眼镜；为了迫使政府开审他的案件，刚刚进行过绝食斗争，因而人显得消瘦。在法庭上他侃侃而谈，同法官争辩，毫不隐讳，既勇敢又坦诚。第二天的一篇新闻报道说，这决不简简单单是一种傲慢表现。他原本想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这怎样引导他走向共产主义，但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说所有这些早都是老生常谈。他为何成为共产党人，铁托解释说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因为他童年时期所遭遇的贫困和压迫，而这一切在不久前成立的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社会中丝毫未变。他承认自己是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中积极的一个，但不承认由此对他起诉的法律有效，因为对于这种法律，他说，“不是人民通过的”。法庭不理睬他的雄辩，判他五年徒刑，将他押了下去；他一路高喊“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差不多可以这样讲，这次判处有期徒刑救了他一条命。

1928年11月14日，他开始服刑时，刚三十六岁，倔强、高傲、目空一切，随时准备向法律和整个政府机构挑战。法官责备他不该这么冥顽不化，断送自己的青春年华，他却回答：“我准备受罪。”他反复声称不畏惧法律。当五年后他刑满出来

铁托传

时，对共产主义的狂热信仰并未减弱，但却不再那么发傻，也不打算那么随意地、公开而激烈地向强大的国家机构挑战了。他已经很有经验，也危险得多了。但即便搞清楚了铁托的出身，关于他在法庭上解释的把他引导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的种种事实——为何约瑟普·布罗兹这个克罗地亚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竟然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之一，可他家里和他同一代人中的其他人却不是，这仍然是个捉摸不透的问题。

1892年5月7日，约瑟普·布罗兹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库姆罗维茨村。父亲弗兰约·布罗兹是地道的克罗地亚人，母亲玛丽亚则是斯洛文尼亚人，她的村子距离库姆罗维茨仅仅十英里，但位于克罗地亚境外。约瑟普是父母婚后前十年中的第七个孩子，除他之外却只有三个存活下来。他的母亲于1918年去世，终年五十一岁。她总共生了十五个子女，这个家庭能把其中的七个养大，与当时克罗地亚的一般农民家庭相比较，就算相当不错了。在那段时期里，大多数孩子甚至都活不到十五岁。

在村子里布罗兹家不算是最穷的。他们有一块面积大约十英亩的田地，属于后来所谓的“中农”——介于极少数有钱户和众多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的穷户之间。弗兰约·布罗兹还养有几匹马并拥有一挂车，帮人拉货物挣些钱贴补口粮。这就表示花销和资产都要比大多数农家多。弗兰约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库姆罗维茨村子中最好的房子之一，这是一所牢固的小农舍，经过了一番彻底的翻修和改善，至今还没超过五十年。他的妻子家里也拥有土地。

有人说，玛丽亚·亚韦尔舍克的婚姻可说是下嫁，门不当，

铁托传

户不对。但她的丈夫为人精干，有时也还勤劳，虽然有时也酗酒和偷懒，而且同那时的许多农民一样，年龄愈大，就愈发如此。至少他是接受了某种现实，虽然起初还很不情愿——孩子们如果想要过得好一点，就必须离开乡下。他是库姆罗维茨那里第一个准许儿子出去做学徒的父亲。人们都说这对夫妻中玛丽亚的性格要更坚强些，她是个细心的当家人。这一家有太多的肚子等着填喂，总是难以收支两抵，有时的确受苦挨饿，几乎总是负债累累。后来铁托回忆说：“每当债务负担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善良却懦弱的弗兰约便自暴自弃，借酒浇愁。这时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到我母亲的双肩上。”尽管这样，布罗兹家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仍处于库姆罗维茨的上流阶层。但这其实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个二百来户人家的小村落里没有当地的贵族，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家产殷裕的农民。

库姆罗维茨位于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的北方地区，属于风景优美但土壤却很贫瘠的扎果烈地区。这片乡野很可爱，有许多峻峭的小山，陡坡地上有一片片葡萄园和果园。山谷里则是苏特拉河和它的支流，有沼泽地和水草地，可作为牧场使用。可耕地则非常的少，这个地区既缺乏象更东边的德拉河与萨瓦河河谷那样肥沃的土地，也没有亚得里亚海与萨格勒布之间的利卡地区那种石多土少的荒凉之地。铁托这一代是头一代大批离开农村的人，因为土地已无法再养活急剧增长的人口。成千上万的人移居国外，另一些则象铁托那样进城去谋求发展，大部分被城市无产阶级所吸收。他们几乎都保持着和留在乡村里的家庭的联系，在许多方面那儿的生活都丝毫不变，旧风旧俗不易消失。扎果烈生活中许多风俗习惯伴随着当地人的

铁托传

特色一直延续到当今社会。直到今天，扎果烈的男人仍然以他们的坚忍、倔强、豪饮、长寿和丈夫气概而闻名。铁托身上就保留着扎果烈的肖子的众多特色。

铁托的童年时期，克罗地亚是奥匈帝国所属的匈牙利的一部分，奥匈帝国则是一个多种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二元君主帝国。自1848年起，弗兰茨·约瑟夫是当朝皇帝，1900年时年龄已七十岁，满脑子的保守主义，不能理解或解决十九世纪下半叶经济变迁和民族主义使他的帝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中突出的是两个统治民族匈牙利的马扎儿人和奥地利的德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少数民族，尤其是与斯拉夫人，包括奥地利的波兰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斯洛伐克人的关系。

到1867年，除外交和国防事务之外，匈牙利都已经能够得到自治。其首都布达佩斯虽然不是帝国政府安置的地方，却和维也纳一样壮丽，也几乎一样重要。皇帝兼任着匈牙利的国王，必须用一顶象征性的古老的铁王冠另外的进行加冕。马扎儿人寸步不让地护卫着自己好不容易争得的自治权，又企图扩大他们在帝国内的势力和特权，但却不愿意把他们作为民族权利争取获得的自治权扩展普及到克罗地亚人。他们以一种很粗暴的鄙夷态度看待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而由于畏惧对匈牙利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间迅速萌生的民族主义作出退让，将会削弱他们在和奥地利的日耳曼人的关系中的影响，他们就更加厉害地这样做。

在匈牙利内部，克罗地亚的地位很特殊：拥有自己的议会，即沙布尔，设在其古都萨格勒布；拥有自己的主席，叫“巴昂”，虽然他是布达佩斯委派，代表马扎儿利益，却不代

铁托传

表克罗地亚利益；对地方行政事务有一定的辖治管理权。可是在铁托童年时期，这种独立其实没什么真正的价值。虽然克罗地亚农民早在 1848 年就已经从农奴制度下解脱出来，但仍贫穷困顿，没有政治势力。克罗地亚仍有许多大庄园归属于土地贵族，大多是马扎儿人。“沙布尔”的议席是受到制约的，办法是规定拥有土地，并多纳税的人才享有公民权，以及光天化日下对选民进行恐吓和收买。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农民，差不多全被剥夺了公民权；大约两百万的居民之中，有权投票的不过三万。在铁托童年时期的库姆罗维茨，二百户人家中有选择权利的人不过三人而已。一般这么说，选举日上午给一公升酒和一盘土豆烧牛肉，或是投票前送一只新靴子，事后再给另外一只，也就足够搞得到农民的一票了。

1883 年至 1903 年期间的克罗地亚“巴昂”是库恩·海代尔沃里伯爵，由于执行高压的马扎儿化政策，而被克罗地亚人强烈憎恨。他为削弱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而不择手段，极擅长于挑拨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互相争斗，那些塞尔维亚人也居住在曾是抵御土耳其人的边屯区的克罗地亚。他担心他们会团结起来反抗马扎儿的统治。

这时克罗地亚人也对匈牙利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所实行的经济歧视很不满意。这个时代铁路交通广泛发展，而克罗地亚却得不到充足的铁路线以促进主要工业的发展，所以也就无法繁荣起来。河流作为主要的贸易渠道，可是却没有人管理。克罗地亚人根据历史上的权利以及商业需求而认为归属于自己的亚得里亚海上的阜姆港，1873 年后也被奥地利人进行接管。匈牙利政府所执行的冷酷单一的政策，就是保持克罗地亚马扎儿化和贫困，故意限制克罗地亚工业的发展即由于这个原因。

铁托传

以上种种问题所引起的矛盾的激化，是由克罗地亚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布达佩斯或萨格勒布引起的，它远离农村。十九世纪晚期，报纸在萨格勒布以及其他各城镇中已经大量发行，而农村中却仍然非常稀少。克罗地亚的老一辈农民几乎全是文盲，虽然附近的斯洛文尼亚农民中识字的人数目要多一点，但不管识字与否，农民是无法负担买报纸的钱的，他们主要在意当地事务。但他们对马扎儿人的统治却有着深深的体会：马扎儿人是异族统治者，是军官，是捐税勒索者，是令人烦恼的或苛刻的规章的渊源。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全是这些人的原因，农村里的不幸和贫穷都应由他们承担责任。

铁托童年的生动回忆中的一次，是1903年当他十一岁时扎果烈农村里发生的一次反抗加捐加税的暴乱。库姆罗维茨附近的农民扯下当地火车站上的匈牙利旗帜，来渲泄自己的感情。当地马扎儿警察对示威群众开枪，打伤了十人，打死了一人。这就使局势更加混乱，许多人被抓了起来。作为对这个地区的惩戒，匈牙利部队被派往各个克罗地亚农民家庭驻扎。铁托的父母被迫长达一个多月地供养四个兵，这对他家本就很稀少的口粮真是一种沉重的额外负担。马扎儿的统治使更多的克罗地亚人成为坚定的、甚至有时是狂热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在农村铁托度过童年的这段时期，可能或多或少地有所熏染，但都不能算他成人后拥有的性格中的一种特色。

铁托的童年还受到别的激进的影响。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讲到多少世纪以来在封建压迫下扎果烈农民的悲惨境遇。那时多数克罗地亚人作为农奴，按匈牙利法律根本就没有任何法权可言。铁托童年时期扎果烈农民很少外出旅行，只有自创的少

许消遣。他们把自己经历中的戏剧性的故事反复讲述。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全是些独立精神非常突出的人物，他们挑战权威，通常死得很壮烈。由于故事中大多数的历史事件以本地区的人与事为基础，其戏剧性也就更加浓烈。

有一个事件给他留下的影响更加深刻而持久，虽然发生在铁托出生之前三百多年，这就是马季雅·古贝茨 1573 年所领导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农民起义。农民不断发动反抗，是中世纪后期的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一个特点。1514 年在匈牙利就发生过一次，规模特别大，却被残酷地镇压了。而五十九年之后，古贝茨和另外三个领袖又成功地领导了另一场暴动，获得了千千万万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次起义以往的契因是十六世纪期间自土耳其在 1526 年莫哈奇战役打败匈牙利后，这一地区生活境况现状的急剧恶化；近来的原因则是本地贵族的肆虐作恶。起义的领袖之一伊利亚·格雷戈里奇不幸被俘，押到维也纳被严刑审讯，他的部份供词中就讲述到一个本地贵族弗兰约·塔希的罪恶的行径及其对农民的敲榨勒索。他说：

“如果不是塔希用一种最违反基督教教义的残暴方式调戏和强奸他们的女人，他们原本可以不反抗这些虐待的。……塔希失去妻子以后，常骑马到地里看劳动的妇女。他看谁漂亮，就命令仆人拖到他的城堡里去，脱光衣服。他要看中哪一个，就给她洗个澡，接着就强奸。……有一次，农奴们让检察官察看的被塔希虐待鞭打和奸污的少女就有十四个。一个农民的女儿被抓到了塔希的苏亚埃德城堡里，她的父亲提出抗议，塔希的儿子就在他的脸上

铁托传

用刀横砍竖划，还剝掉了他的双眼。”

激起农民愤怒的反抗的暴动，这仅是一部分。

追随古贝茨的人们在帽子上插上雄鸡毛，作为造反的标志。每逢铁托讲起这段故事，他总要提到这一点，说在他童年的游戏中，小伙伴们也这样做。1573年1月29日的凌晨，起义者在格雷戈里奇的率领下出发进攻采萨尔城堡。铁托童年时，城堡的废墟仍然残留在库姆罗维茨附近陡峭的高峰上，阻塞着苏特拉河河谷以及通往斯洛文尼亚的大路。他们冲进城堡，放起了熊熊大火，把可恨的大管家的脑袋砍下，从军火库里夺取了毛瑟枪和别的武器。这就点燃了周围以及远达北边的卡林西亚和斯洛文尼亚总起义的信号。贵族们开始时措手不及，但马上从起义没有影响到的地区征集封建部队，对雇佣兵和任何打算支持他们的农民付出大笔钱财。最后，克罗地亚尤拉伊·德拉什科维奇率领一支装备优良的步兵和骑兵部队，在库姆罗维茨附近山谷里的下斯图皮察同起义军进行决一死战。起义者战斗失败，逃到附近。随后几个礼拜内所有人被捕获，或当场杀死，或受酷刑。据说，光是扎果烈一带便有四千至六千农民被杀；当地每个村子都有数百具尸体悬挂在树上。

古贝茨竟敢首倡农奴作乱，这就注定了他会得到一个可怖的下场。德拉什科维奇主教在呈交给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奏章中说：“假如得到陛下恩准，我们就给他加冕——戴上一顶烧红了的铁王冠，让其他的家伙引以为鉴。”当时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了在萨格勒布旧城圣马可教堂附近施刑的经过：“首先用烧得通红的火钳烙他，同时把他的助手安德里亚·帕萨奈茨在他面前活活杀死，然后用一顶烧红的铁王冠给他像加冕

铁托传

似地戴上，最后把他象个罪犯似地砍成四块。”一位克罗地亚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把他处死之前，先游街示众，仿佛集会似的，一大群暴徒对他肆意嘲弄地叫嚷：“农民之王万岁”。

铁托相信他的祖辈也曾加入到这次起义。铁托童年时期，儿童们一直根据这段故事及其与本地有关系的情节和事件来玩游戏，加以扮演。他还记得每遇上孩子半夜里醒来，母亲恐吓他们不许作声时总说，如果再不睡着，采萨尔格勒的黑皇后，因起义后所采取的暴力惩罚而恶名远扬的巴尔巴拉·埃尔多迪男爵夫人就会来抢走他们。这段给人伤痛至深的往事的不公和残酷，长期以来生动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还有其他一些不久前发生，有关农奴制度的缺乏公正的故事，也使铁托从小受到教育。在克罗地亚这个制度直到 1948 年才被废除。农奴制度的具体情况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废除之前，农奴及其家人世代代靠一块土地养活自己，而土地属于领主。农奴必须把大部分收获的庄稼、牲畜和酒交纳给领主，还必须交一笔特殊的房租，必须每年自备工具和车辆服劳役一定的天数。农奴不是奴隶，但属领主管理。领主有权以莫须有的理由施行体罚——常常是不分性别。如果领主还有处死权，则只要当场有法官，便可判决农奴死刑。并不是所有的领主都虐待农奴，但有很多确实虐待。滥施淫威的情况很普遍，使得哈布斯堡的统治阶层从十八世纪以来多次试图从法律上限制领主的过多的权力。这些事情在铁托童年时期，人们还不停地谈论。

1848 年 4 月 28 日，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发布了，铁托的祖父母当时居住于库姆罗维茨。布罗兹家是 1684 年作为埃尔多迪家的农奴在这里定居的。他们与别的农奴一道获得解放，

铁托传

并被允许向领主购买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贫穷的农民可以借到这笔数目相当大的款子，分二十年逐步偿还。铁托回忆说：“名义上利息只是百分之八，但加上额外勒索和佣金，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四。”农奴制的废除，在农民生活中引起了革命性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土地买卖成为一桩大买卖。许多领主把产业悉数卖给了投机商。在此地居住五个多世纪的埃尔多迪家族也把全部产业变卖，搬出了这个地区，再也不回来了。一家奥地利银行买断了埃尔多迪家族的庄园所有权，然后又把地产的钱款贷给那些想买土地的农民。

到此时为止，布罗兹家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农民一样，其实大部分南部斯拉夫人也都如此，生活在一个称为“扎德鲁加”的扩大的家族集团中。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组织，起源于人们集体居住抵抗外敌的需要，可以一直追溯到南部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定居之初。一个“扎德鲁加”里，全部同宗的人们都住在一所房子或一组建筑中，由一个首脑当家。通常是年纪最大的男子，有时也有女的，叫做“斯塔雷欣纳”即老太爷，或“戈斯波达尔”即族长。“扎德鲁加”大小不等，少的时候两三对夫妻和其儿女们，多则可成百对住在一起。原则上是儿子娶回媳妇，另外修建住屋，直到“扎德鲁加”看上去像一个大蜂房。女人结婚，则是嫁到丈夫的“扎德鲁加”去。“戈斯波达尔”之下，每一成员都按社会等级有一定地位，地位高低虽然主要看年龄，但男性的地位普遍都高于女性。“戈斯波达尔”对所有成员拥有族长权威，他的妻则专门管理妇女们的劳作和生活。她们做大锅饭，大家集体吃。关系到田间活计，公共财产和其他事件的重大问题，都由男子商量，然后下一个决定。

“扎德鲁加”制度偏向于形成一种静态的、保守的社会，

铁托传

很适合经济上基本全部自给自足、金钱很少派上用场的封建制度。它一直受到政府鼓励，因为这有益于赋税的征收；而且在男子被征召服兵役时，“扎德鲁加”能够进行劳作分配，农活可少受损失。但是，它无法适应继农奴制度废除而来的自由社会和频繁变化的经济。许多“扎德鲁加”经过各种安排付清土地的价钱之后，无力维持所有人的生活，因此开始解体。但在法律上允许它们解散，则是数年以后的事了。

1853年颁布了一项法律，允许“扎德鲁加”分家。这时有些人家，包括铁托的爷爷马丁·布罗兹就依法行事，分掉了土地财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扎德鲁加”已没有几个了。但许多今天在世的人都记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克罗地亚仍有“扎德鲁加”，而直到今日，南斯拉夫某些地区还保留有这种痕迹。

虽然铁托本人未有过这种生活的经历，但他却在“扎德鲁加”的家族习俗和密切的家庭关系影响深刻的社会中长大。他的爸爸弗兰约·布罗兹虽然“软弱而善良”，却对一家享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儿子们成年后如何发展，他最后说了算，儿子们也都听从。少年时代的约瑟普，看上去是一个温柔听话的孩子。他步入社会之前，生活中的每一阶段都通过家族中的某一成员如外祖父母、舅舅、堂叔获益，有时弟兄之间也彼此关照。这种古老的密切的家族关系使约瑟普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和父权，也成为他的个人特色中一个重要的组织部分。他一挣到工薪就往家里寄钱；从他的父亲年迈乃至1936年逝世，他一直给妹妹寄钱，让她料理父亲；1945年后他成为国家的领袖，也总是以委婉间接方式对有需求的家族成员给予一些照顾。

铁托传

废除农奴制度后的那段年代，对克罗地亚农民来说，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重新调整的艰难时期，持续了数个世纪的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也是一个政局动荡的时期。哈布斯堡皇权趋于衰微，在外侮和内部许多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的高压之下，帝国的领土逐渐缩小。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帮助加富尔和加里波第赢得战争，夺走了奥地利的意大利各个行省，而归于统一的意大利新国家。强大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蓬勃壮大，打破了奥地利几百年来在德意志诸国建立起的势力范围。1866年，装备现代化的普鲁士职业军队致命地击败了奥军，胜利的速度之快，举世震惊。从此奥地利一蹶不振，统一的德意志新国家取代了它的国际影响。

名望、领土和税务均遭损失之后，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及其参谋们企图强化对其余的非奥地利各行省的控制，但遭到了所有非日耳曼民族的更加强有力的对抗，他们既无力绥靖，又无力压服。1867年，他们通过和匈牙利签订的一项“协约”，把哈布斯堡帝国一分为二，给予匈牙利程度很大的自治权，并答应匈牙利事实上控制克罗地亚。这样的结果只能使克罗地亚人与马扎儿人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还导致人们更坚定地帝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不光是克罗地亚人，而且还有在奥地利境内居住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谋求自由。这些要求得到邻国塞尔维亚的政治家们的支持。1829年塞尔维亚从土耳其取得自治，并在1878年后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政治首领们带着扩张主义的打算，向往有一天能把全体南部斯拉夫人拉进自己的怀抱，其中不仅包括归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还包括在土耳其统治

铁托传

下的其他南部斯拉夫人，以及门的内哥罗这个面积虽小但却独立的国家的南部斯拉夫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国际政治中一个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即随着土耳其在政治上的衰败和经济上的颓废，俄国和奥地利都想承袭土耳其在巴尔干仍然占有的领土和势力。俄国为了逼迫土耳其答应自己的要求，于1877—1878年对土耳其发动了进攻。然而，通过结束这场战争的柏林条约而取得了前土耳其行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管辖权的获益者却是奥地利。这是一个完全由克罗地亚人、斯拉夫族和塞尔维亚伊斯兰教徒落户定居的斯拉夫省份。1908年奥地利将其兼并，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恶化了；后者根据种族的原因以及历史上的权利要求拥有它。此举激怒了俄国，因为这就违背了俄国的企图，它打算把巴尔干设作战略基地，进而对守卫着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的君士坦丁堡施以管理。而且奥地利还能够利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一天时地利向前推进，越过土耳其在马其顿的防守薄弱的领土，直接到达爱琴海上的萨洛尼卡港口。1914年战争爆发时，这些争端直接导致俄罗斯与奥地利各执一词，互相敌对。它对克罗地亚农民似乎没什么关系，但对于象约瑟普·布罗兹那样出生在十九世纪末期，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人的克罗地亚人的一生，却有着可说是生死攸关的影响。

国际事件的反响肯定也曾影响到扎果烈的农村。铁托的父亲弗兰约·布罗兹出生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约签订的那一年。战争临近，奥地利在萨多瓦被普鲁士人打败时他才十岁；俾斯麦征服法国时他十四岁；1878年俄国军队在巴尔干和土耳其打仗，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时他约二十二岁，还没有结

铁托传

婚。这是一个生活没有任何保障的时代。物价飞涨，大部分农户仍在偿还因购买土地欠下的债款。此种情形下，为了支付奥匈帝国的军费开支而增加的赋税变本加利，使农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1870—1890年间，克罗地亚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遭到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歉收。奥匈帝国便从农业正发达兴旺的美洲进口粮食，供应国内市场。等到当地重新获得丰收，农民却发现自己的农产品必须削价出售，因为还在继续进口更便宜的外国粮食。好的年份时农民无法以满意的价格卖出自己的收获物；坏的年份时则过了元月便所剩无几，只得以借贷来渡过春耕，直到夏收。

马丁·布罗兹爷爷娶的一位农村少女，名叫安娜·布拉日契科。她家不是农奴，而是已自由了两百多年的农民，她以此而自豪。马丁爷爷在“扎德鲁加”分家时分到了一份财产，加上用马车帮别人拉货物，来回往返于距离库姆罗维茨还不算很远的卡尔洛瓦茨、萨格勒布、锡萨克等城市间，刚好勉强度日。他主要考虑的就是挣得足够的钱来养活妻子和七个儿女，防止卖地还债，维持一家人渡过种种难关——疾病、荒年、生育以及丧葬，这是每家每户都得应付的。1853年时，奥地利的法律禁止长子独自继承财产，规定遗产必须由所有的孩子平均获得。这给农民带来了另外特别的困难，因为产业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任何一份也不足以养家活口。

布罗兹家受到这条法律的影响很严重。1878年冬季，马丁爷爷拉一车重重的盐时，车松脱了一只轮子，马丁爷爷翻车受伤致死。他的独子弗兰约继承了他的遗产，但必须用钱买下六个姊妹的继承权。因此只能借贷，最后他还是不得不通过卖地还账。他结婚时，剩下十五英亩土地；而到了约瑟普童年

时，只剩十英亩。

弗兰约·布罗兹在 1881 年 1 月结婚，当时他二十四岁。新娘玛丽亚·亚韦尔舍克十六岁，是她家的十四个孩子中最长的一个。弗兰约渡过苏特拉河到斯洛文尼亚山林打柴时结识了这一人家。木柴是农民生活中的重要的必需品之一。烹调、烤面包以及住房角落里冬天用来取暖的平顶瓷砖炉子等等，都需要用它做燃料。1848 年之前，到领主的林地或公有地打柴曾经是农民们在持续了若干世纪的农奴制度下享有的很少的几项权利之一。而当他们自由时，领主把森林和公有地全留下作为私产，免费的燃料从此断绝。库姆罗维茨的农民剩下可怜的一丁点林地，往往只得花钱买柴。弗兰约的部分营生，就靠去斯洛文尼亚打柴运到村里出售。他多半和亚韦尔舍克家有过某种联系，在距库姆罗维茨十英里的波斯雷达村旁的高坡上这一人家约有六十五英亩树林和耕地。

元月份的某个雪日，亚韦尔舍克家为其大女儿举办出嫁婚宴。五辆大雪橇从库姆罗维茨接来了新郎及其亲戚朋友。婚礼在村教堂举行，接着在斯洛文尼亚村子里他们的家中举行舞会以示庆祝，一连数天。新郎新娘真是天生一对，珠联璧合——弗兰约中等身材，体格健壮，一头黑色卷发，鹰钩鼻子，就像铁托描写的一样，属于“真正的迪纳拉型”。玛丽亚身材修长，金发碧眼，娇丽动人，穿着一身古典的斯洛文尼亚农家服饰。他们动身返回弗兰约在库姆罗维茨的屋子时，玛丽亚带去了农家普遍可见的嫁妆：卧具、衣服、地毯、家庭用品，其中还有宗教图画——龙、圣乔治、亚当和夏娃、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直至今日，库姆罗维茨那座房子里还能见到这些图画。玛

铁托传

利亚的画像尤其宝贵，因为它是画在一只能奏出一段赞美诗的音乐盒上。玛丽亚与只需半日路程便到的娘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等到她自己有孩子之时，上外公外婆家去玩玩便成为他们的乐事。约瑟普是外公最喜爱心疼的外孙，他回想起去外公家里长期串门的经历，至今还感觉那是他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日子。

玛丽亚和弗兰约在库姆罗维茨的那座房子，是根据克罗地亚扎果烈农家住宅的旧有风格修建的。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全部生活，生男育女——包括约瑟普。1860年，即布罗兹“扎德鲁加”解散后不久的某个时间，他们又曾把房子彻底地翻修了一遍，这显示了这一家人那时家境还算殷实。瓦屋顶代替了原来的苫草盖，抹得挺不错挺光滑的墙壁取代了粗糙的灰泥板条，而且改装得可以供两家人各自居住。还铺上了结实的木质地板，而并非质量较差的那种泥土地面。在约瑟普的童年时期，它是全村装修最好的住宅之一。这房子现在成了一所纪念馆，拥有这一类全国性文物那种焕然一新而没有任何特色的外观和气势，与约瑟普童年的故居相比，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但房子内部的布置变化不太显著。根据旧照片和一些原先的以及复制的室内物品，今天还能大概的再现铁托所述自己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生活的情景。有一间穿堂，用来保存在屋外穿的靴子，以及在田间干活、大部分光阴在户外度过的一大家人的各种工具材料。穿堂两边是两间起居室，左边一间是他的堂兄弟家，右边一间是约瑟普家。这种起居室兼卧室叫做“希沙”，家庭生活一般都以它为中心。两室各在屋角修有一只平顶炉，铁托家的那一只还带有神圣的十字架的凹花纹的装饰。

铁托传

靠墙放着一张大单人床。其实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双人床，尽管有时也用一条长凳把它拼宽一些。屋小人多，很多事情难以回避。婴儿用的木摇篮也在此处，至今还能看到。孩子大后摇篮放不下时，便放到炉顶上去睡。大孩子们睡在房顶下阁楼地板上。与主屋分开的还有一个长十二英尺、宽九英尺的小间，叫做“小内间”或“科乌里察”。这里摆着一张单人床，可以当作客房用，偶尔也用来躲开旁人。

还有个出口在穿堂另一头，通向一间很宽敞的公用厨房，两家合用，一家使用一边。屋顶由横梁支撑得很牢固，上面安装着钩子，钩上可挂肉，下面用两堆柴火烟熏；另外还有供挂铁锅的钩子。火堆后边是各家一个的大面包炉，这也许是什么农家最重要的设备之一。

面包是主食，每顿饭都吃，材料从小麦面包到发酸的玉米和黑裸麦面包，随每年收成好坏而异。肉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脂肪算好菜，糖可是奢侈品，水果蔬菜则随季节的变化食用。农民没有加工食品的设备，没有足够的钱买糖渍食品，而多余的蔬菜水果经常被浪费，随后便又缺少吃的。

铁托回忆起自己在库姆罗维茨的童年时，缺少食物是个常谈的话题——被锁上的食品室，孩子们怎样当着亲戚的面向妈妈索求面包，因为知道爱面子的妈妈不会当时拒绝，尽管过后可能打他们一顿；一位常送给小约瑟普一片面包的牧师；有一次他如何偷了外祖父一块特别的糖，却不小心把它掉进河里去了；还有一次，父母外出，约瑟普领着弟弟妹妹把妈妈留着准备过年吃的一个猪头煮了吃。他们吃得太多了，结果都恶心起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铁托的回忆录中常常描写童年时期饥饿的情景，仅有一次讲到收获季节、丰年、传统节日和婚嫁

铁托传

的很多宴会，虽然他必定曾多次参加过。

生产粮食是全家大小的基本任务。孩子们从小就得干一些有用的农活。小孩子可以照料被拴住在田野吃草的牛和山谷里放养的鹅。他们上井边打水，还得推动沉重的石磨磨玉米面。这种工具是一块大圆石头，在石头边缘的一个洞孔里安装着一根长棍。铁托记得曾一连数个小时推着它转。至今这石磨仍陈列在厨房里。妈妈用的纺车也还摆在那里，这是用来纺羊毛和麻给一家人织布织衣的。织布的手织机在外边的棚子里，现在这棚子已和牛棚以及其他的下屋一起被拆除了。

其实，约瑟普童年时期很大一部分光阴不是在库姆罗维茨的家中，而是在斯洛文尼亚的波斯雷达村外公家度过的。马丁外公最疼爱约瑟普，他的父母便送他去那儿，以减轻自己家里的负担。久居在斯洛文尼亚的这一段时期，为他的童年提供了一个有人关怀的、有保障的、幸福的环境。外公矮小健壮，铁托长得有些像他。他叫这个小家伙“约塞克”——小约伊。在铁托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乐观、诙谐而亲切的人，喜欢开玩笑；铁托说自己的这种爱好就是受他的影响。

约瑟普喜欢该处的户外生活，不愁吃穿；院里院外总有活干：放牛、汲水、学骑马、陪着烧炭的外公到山林里去。在这里他学会了一系列乡村生活知识。后来在二战期间，当他领导着一支游击大军穿山过林时，这便成了难能可贵的经验。他在这时也养成了对钓鱼、打猎和各种农活的爱好，终身不渝。

与外公相伴度过的这段成长时期里，他逐步掌握了斯洛文尼亚语，这种语言同他的家乡话有差异。虽然它也属于斯拉夫语，但重音和语言结构都与扎果烈的克罗地亚语不一样。约瑟普回家后，说出的话就带斯洛文尼亚口音。直到今天，专家们

铁托传

甚至还能从铁托的克罗地亚语中发觉到斯洛文尼亚语影响的余痕，他讲话有些南腔北调。发现他语言风格特别的人们，常说他的口音带着一股俄语腔调。虽然在二十年代初期他刚从俄国回来时也许是如此，但对他的口音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斯洛文尼亚语。

最近几年的生活，也许还有他独特气质中的斯洛文尼亚成份，使他了解斯洛文尼亚人民包括他们向往西方的心理。在三十年代，当他从监牢里出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过着一种逃难的不安全的生活，从南斯拉夫越境去奥地利和意大利时，他四处找寻安全的藏身之所，不是去他的克罗地亚故乡，而是去自幼熟稔的斯洛文尼亚农村。

1900年，约瑟普将近八岁时回到家里。回忆起来，他总觉得自己童年最欢乐的时光是和十九世纪一起结束的。他与别的农家男孩一样，刚满八岁就被认为已经长大，可以作为一个劳力了，于是被打发到菜园除草，在地里锄玉米，赶牲畜。铁托后来所讲的少年时代的经历，是当时扎果烈普通的农家少年的共同经验——同村里的男孩子们在一起游戏；与边界对面的斯洛文尼亚小孩打架，这时约瑟普就不能承认他和斯洛文尼亚人有什么关系，坚决表示拥护克罗地亚的库姆罗维茨；从隔壁人家的树上偷核桃、偷苹果；在小溪中钓鱼；把姐姐结婚的花冠藏起来开玩笑。但他较少说起亲密的家庭生活——妈妈每年的一次怀孕，这段时期他和兄弟姐妹以及爸爸的关系，都很少提及。关于他所受教育中的宗教方面也很少提及。

克罗地亚农民全部是天主教徒，教会对他们的生活起着重大作用。铁托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他从小就和伙伴们一起上教堂，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育和教义问答，领受了第一次圣

铁托传

餐。而他后来留下的记忆却全是反对教会的：克拉涅茨的修士怎样在农民最拿不出粮食的元月份前来强抢捐献的粮食；他如何不愿意再给神父当跟班，因为在一次弥撒后他给神父脱祭袍时很笨拙，神父打了他一耳光；他怎样把妈妈给的让他送交教领受圣餐的神父的钱悄悄留下了一点，尽管他的朋友们告诉他，作下这宗罪孽上帝将会把他砸死；教会对农民的贫困没有帮助，反而横加勒索，并迷惑人们把现状作为上帝的法律来接受；较高级的神职人员与统治阶级狼狈为奸，教会还拥有世俗产业和庄园。以上这些情况，就是铁托成为共产党员，并把天主教会训斥为与压迫剥削相关联的资本主义组织之后，在他记忆中残余的东西。

1899年，库姆罗维茨特别罕见地第一次开办了一所初级小学。校舍刚开始是在一间小屋里，1902年换修了一座新房，与布罗兹家对面。克罗地亚从1890年起推行强迫式教育，但不受农民欢迎，他们认为它耽误孩子们干正经活。后来铁托回忆说：“我家是农民，对这件事是典型的农民的看法，即受教育不过是走走过场装装样，还不如干地里的活重要。叫我常常在家中干活，那就等于让我放弃学习。因此，我有时就从家里偷偷溜出去上学。”但在1902—1904年的学生档案里表明约瑟普·布罗兹仍然经常缺席，这不仅是由于家里的劳动，还在于他十岁时得了白喉，这是农村中的常见病，经常引起死亡。库姆罗维茨附近的村子里没有医生，但有许多土药方和本乡本土的“民间”行医者，直到今天还有。其实真正的治疗是依赖本身的体力，尽管铁托后来说当时自己身体还很单薄，从根本上说他还是很强壮的。

库姆罗维茨大概有二百户人家，但这所学校也接受四周小

铁托传

村庄的孩子。据铁托回忆说，他上学时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却只有一位老师。第一位老师尤拉伊·马尔科维奇是布罗兹家的房客，睡在阁楼上。他患有肺结核，常把血咯在仅有的一块手帕里。小约瑟普便把手帕拿到小河里去洗，然后在学校的火炉上烤干。肺结核让那么多克罗地亚农民的生命丧失，而约瑟普很可能就是这样获得了对它的免疫力。马尔科维奇的母亲在他快死的前不久把他接走了，告别时他挥着这条手帕，孩子们不禁都哭了。接着一位女教师教他们不长的一段时间，她很严格，因此人们仍记得她。她因结婚而离开了。后来的一位性情温和的叫斯捷潘·文普尔舍克的人，“总是对学生关怀备至，尽管他自己有一大家人，负担很重”。他在一封关于布罗兹的信中说：“约瑟普的父亲在他们兄弟辈中最聪明，想让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变得好一点。他问过我，约瑟普长大了该做什么。我看约瑟普相当有才能，就建议他做一个机师。”

约瑟普上学时，看来没有惹是生非；而且他从几位老师那里学到的只是读写的技能，对书籍的渴望，以及要他迈入社会去的谆谆教导，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引导他成为一个政治革命家的影响。铁托自己说过，他学习上碰到了难题，考虑到当时他上学的环境，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在1904年，即毕业那年的成绩单上他的各科成绩却都很好：品行——超；阅读——优；教义问答、宗教训育、数学和劳作也是优；唱圣诗和普通歌曲以及体育的成绩是良好。因为没有条件上中学，他马上就被派去干活，养活自己，帮助维持家庭。这样一来，他就开始很少有机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他给马丁·亚韦尔舍克舅舅干了几个月的体力活，舅舅除了供他食宿，还答应到年底给他一双新皮靴。约瑟普觉得在这

铁托传

方面他受骗了，因为后来得到的那双靴子还不如他自己脚上那双旧的好。他和舅舅吵了一架，就打道回府。不久，他受到一个休假期间来他家拜访的亲戚朱里察·布罗兹的影响。朱里察是一名老兵，在奥匈帝国军队里做军曹长，他向铁托大讲外面的精彩世界，以及如何离开农村去寻找发迹之路。朱里察在他驻扎的一个附近城市里有一些交际。他说在那儿能给自己的亲戚找到一份工作，但首先必须使布罗兹相信这是个不可错过的机会。朱里察劝他做跑堂，能吃饱穿暖，能接触体面的人士，还不用做多少累活。

他的父亲并不那么热心于这个主张。约瑟普在地里是个有用的劳动力，眼看着不久就能挣钱。父亲却情愿送他去美国。在那些年代，克罗地亚许多农民家庭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移居国外。这是一种可以谋取实利的家庭投资方式，如果他们能在每天工钱稍多于一个福林的当时凑足二百福林的路费。布罗兹家可无法凑足这笔钱。

弗兰约·布罗兹迫于无奈，终于答应让约瑟普踏着他的哥哥马丁十年前的脚印，离开村子去城市找工作。年轻的一代农民向城市发展，是封建家族社会解体过程的特征，这是从他的父亲那一辈人开始的。当约瑟普小学毕业时，农村经济困难的状况正迫使这一变化的步伐加速了。十九世纪后期的年代中，克罗地亚人口迅速增长——光是 1881—1890 年，自然增长率即达百分之十五，吃饭的嘴多了，就迫使农民必须生产更多的粮食。在扎果烈，库姆罗维茨四周的土地贫瘠，不提高经济投资和技术，便不可能提高生产率，而这两样都是农民所缺乏的。

克罗地亚农村中，这时有一股新的、激进的政治势力出现

了，这就是安顿·拉迪奇和斯捷潘·拉迪奇兄弟领导的农民运动。他们在1905年建立了克罗地亚农民党，它的宗旨在于动员消极的但却对现实不满的农民，使他们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普通力量的第一个政党。它含有十九世纪在俄国活跃的民粹主义的成份，目标是要使农民认清自己的权利和需要。斯捷潘·拉迪奇农民出身，一身普通的农民装束，走东串西，用人民懂得的语言同他们交流，与一般政治领袖那种造作的城里人派头迥然不同。他们在扎果烈举行过很多次的集会，库姆罗维茨的农民肯定听说过；但没有什么现象可显示他们对布罗兹家产生过什么直接的影响。他们的缓慢增长的影响是该时期的象征，是农村生活中无法避免的演变的象征。

1907年，约瑟普·布罗兹十五岁时，与堂哥朱里察军曹长一同离开库姆罗维茨，到萨格勒布东南大概五十英里处的守备部队驻防城市锡萨克寻找工作，从此结束农民生活，尽管他后来曾多次回家，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因为他仍旧和家庭保持着密切联系。没有什么证据能使人相信约瑟普离家时已有了革命思想的苗头。传说他少年时代就曾在阁楼上独自挑灯夜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种说法完全不着边际。他离开家庭是为自己谋求出路，最大的理想很可能不过是挣足够的钱，吃好穿好，一身城里人的新服装，而不是衣衫褴褛的农民装束，让村里和家里人瞧瞧：他在城里混得很好。

他童年发育时期所继承的种种影响，当时自己并未发现。他出生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下层，出生在一个政局紧张、社会动荡日见其甚的时代。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民间历史让他对社会上的黑暗怀着一种强烈的激愤，为以后播在他心田里的政治种子制备出肥沃的土壤。他经受过贫寒，但生活中真正的

铁托传

艰辛却浅尝辄止；因为他的童年虽然经济上无保障，却有着幸福的感情。他习惯于期盼并得到关系密切的家族，包括远亲的帮助。他建立了许多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些影响在他身上始终未曾消失。他的父亲软弱无能，可是母亲慈爱而刚强，这一事实可能对他影响很深。总之，他是一个身材匀称、体魄强壮的农家少年，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他是成熟的，关于世故却很不熟悉。他从未进过城，从未乘过火车。他好奇、兴奋，急于自立，渴望学习。同时他也拥有庄稼人所特有的谨慎的性格和朴素的机敏。他进入了一种新生活，很快地将为自己提供各种机会。但在这个阶段，很难说他选择哪条道路进行发展。

第二章 从少年到成人

与约瑟普所离开的村子比较，小小的城市锡萨克简直成了大都会。那儿驻扎着一支守备部队，有几家商店，一座用作监狱的中世纪城堡，几处小工厂和饭馆。城市位于三条河——库帕河、奥得河和水流潺潺的萨瓦河汇合之处。三条河上有驳船和小船从事商业运输；加之一条新建成的与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干线相联的铁路支线，给这个小小的城市带来了买卖和顾客。这就足以使小约瑟普眼界大开了。他在堂兄的一个朋友经营的一家饭馆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饭馆内有一个吉卜赛乐队，栗树荫下有一片花园，兼作柱球场，受到驻军部队的士官和军官的光临。本来干二侍者、跑堂，再加之打杂，活儿是很累的。总是有事，不是洗碟洗盘，便是在九柱球场或餐桌侍候客人，直到最后一个顾客离去之时才算结束。小费是约瑟普第一次得到的归自己拥有的钱，但等他稍有经验，懂得它的价值时，就有些微不足道了。他冷静地接受了这种状况；这也就是他一生中对待机遇的典型态度：尽量利用一切现有条件，静待时机向更好的环境逐步发展。

时机不久就来临了。他很快结识了一伙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正在一位锁匠那里学艺的青年们。他相信了他们的大话：受训练的锁匠就是万能机师，机师也就是工程师，工程师会造铁路、造船、造桥梁。他们是工业化新世界中的领导人物。这些

铁托传

想法正好和他的小学老师讲的话相合拍：未来是属于机师的。有一天，当时他还只有十五岁，他鼓起勇气去见那伙青年学徒的雇主卡拉斯师傅，一个本城的有权有势的捷克人。这是他给自己定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于是他开始了一种新生活，从而把自己置身于种种政治影响之下，如果他当了裁缝或侍者，踏上那条那时看来可能由此而发达的道路的话，这是完全有可能错过或拒绝的。

铁托和卡拉斯的这次见面，后来一直生动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他常常谈起这件事。“好啊！小伙子，有何贵干？”当他这个身材矮小，衣衫褴褛，带着倔强神情的小伙子被领到师傅面前时，师傅这样问他。“我请求您收我当学徒。我要当个工匠，我家世代都有人当工匠……”铁托反复叙述这段经历。措词也许有些出入，但要点大概不变。他向师傅解释，他不喜欢做侍者为别人服务，想学成一个匠人，他觉得根据自己的家族传统风格，这还是很能接受的。卡拉斯说，如果他的父亲愿意来签订学徒合同，就答应收下他。当晚，他给爸爸写了封信寄去。父亲很快来了，首先为他，然后为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斯捷潘和这同一位师傅分别签订了一份合同。这样，两个少年就共同做学徒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根据学徒契约，三年内卡拉斯管教手艺，提供食宿，穿衣方面则由父亲供应。由于父亲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买学徒工们的锅炉工人装即制服，约瑟普就自己用由小费积攒的少许钱买了一套。

以后的三年，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约瑟普就在锡萨克的卡拉斯工场干活。从晨六点至晚六点，徒工必须每周两次在傍晚五点至七点到本城的技术学校学习。卡拉斯工场共有四、五个学徒，三、四个已经满师的流动工匠——当时还那样叫他们，

铁托传

是因为他们只为每个雇主做上很短的一段时间，随即另换他处工作，以便取得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个家长制的、几乎是中世纪式的集体，卡拉斯发挥着权威，在这个等级组织中每个人各自安排了固定的位置。徒工们干活睡觉都在工场——这就是这座房子的地下室，冬天睡在铁匠炉附近的一张桌子上，夏天睡在院子中顶楼的干草堆上。吃的虽不美味，但起码还算丰富，是由卡拉斯家的厨房做的；至于玩耍游戏，那就全靠孩子们自得其乐。他们喂养小动物玩，在礼拜天的交换场所和集市拿去同其他职业和别的工场的学徒们进行交换。他们聊天，唱歌，挨流动工匠的打，互相打架，白天里互相读惊险小说听，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男性集体。

这就使约瑟普在青年阶段过上了一种有保障的、愉悦而相当疲劳的生活。这段时间他对性问题和姑娘们所开始感到的兴趣和也许有过的经验，他从未提及。出去参加舞会，则是后来的事情。看来他和所有的同事，无论年长年幼，都相处得不错；他干活即使不算太出色也算很棒。时光流逝，事事顺利，只是在他参加合格测验的前不久出了差错。他快十八岁时，有一天，卡拉斯不在场。他本应照看一台新钻，却在读一本翻译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案》，别的学徒都在听着。卡拉斯回来了，大家没有发现，正好当场抓住他。更糟糕的是，在这时新钻头断了。卡拉斯大发其火，打了他一嘴巴。约瑟普自知理亏，又怒又羞，就逃跑了，躲在附近的一家砖厂里。卡拉斯向警察报了案，警察就轻易把出逃的学徒逮住，送进了那座堡垒式的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牢狱滋味。如果卡拉斯有心告状的话，约瑟普的学徒生活就会彻底断送。但这个老头子心肠仁慈，他给坐牢的徒弟送食物，还设法使他得到保释，得以继续学完自

铁托传

己的技术。1910年9月，他终于满师了。

1907—1910年约瑟普是在锡萨克度过的，这三年是南部斯拉夫人历史上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紧张时期。在奥匈帝国，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主义不断激情高涨；巴尔干半岛上，奥俄之间和奥匈之间的矛盾日益升级。对克罗地亚人来说，这是他们在匈牙利内部对自己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不满的年代，也是他们商量能够采取何种措施迫使马扎儿人采取改革以改善现状的年代。许多政治上觉悟了的克罗地亚人，开始认为他们得到自治的仅存的希望，在于奥匈帝国内部成立某种形式的南斯拉夫联盟——由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合施加管理。少数克罗地亚人，尤其是一个叫做“弗兰科夫齐”的政党分子，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在匈牙利内部加强克罗地亚的宪法权利的建议。另一些人则考虑以所谓的“三国联邦”来解决奥匈帝国内部的主要的三个民族，即日耳曼、斯拉夫和马托儿民族之间的关系。约瑟普青年时期对这种种政治讨论所引起的反响早就有所耳闻，但哪一种也没有激励起他的想象或让他信仰。他早在学徒满师之前便已投身产业工人的队伍，这引导他抛弃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以及国际主义。

在他这个可塑性很强的年纪受到了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的影响，有了献身于团结的国际工人阶级的理想。这对他早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使他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思想狭隘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

锡萨克与奥西耶克和萨格勒布有差异，不是工人政治运动的强有力的中心。那里没有任何工会，尽管在1907年，当工

会在奥匈君主国其他地方合法化多年后，克罗地亚的工会也取得了合法地位。卡拉斯雇佣的流动工匠中只有仅有的一个、二个是政治积极分子，其中一个在1909年的五一节组织学徒用花朵和绿枝装饰工场，另一位则经常参加当地啤酒店里的工人举行的集会，他曾成功劝说约瑟普阅读社会主义报纸《自由言论》以及为报纸募捐。约瑟普学徒期满时，对于工人组织有何重要作用，以及若要谋求发展必须加入工会等等已有了一些了解。作为学徒满师的见证，他给锡萨克的地方法院锻造了几排铁栏杆，之后立即去了萨格勒布，通过一位以前在卡拉斯工场工作过的流动工匠找到了一份工作。1910年10月，此时他十九岁，参加了五金工人工会，从而使他在二十岁时自动成为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党员。

他把领到工会证章和会员证描述为自己一生中感到最光荣的时刻之一。后来他讲，这使他觉得更加有依靠。他回忆说，在萨格勒布找到第一个职业后的前两个月期间，第一次参加了工人游行。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政治活动还只占次要的地位。他主要的心愿还是回库姆罗维茨的老家，让故乡人看看，约瑟普在广大的社会中已出了头。在某些方面他失望了：他用第一次领到的工钱为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买后不到几小时，就在住房被人偷走，不得不另外买一身便宜的旧衣服穿着回家，所以不能那么得意了。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他一直住在家中。后来积蓄花完了，便第一次不依赖亲友的资助，独身一人投入社会。

他刚开始时的境况真是令人失望：当时奥匈帝国内劳动人民的现实状况，使他当个熟练机师便能出人头地的梦想破灭。作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公民，他可以去君主国内所有的地方，如

铁托传

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的里雅斯特、捷克各地、维也纳以及奥地利全部范围内寻找工作。可是在1910年，整个地区的失业率都高。全部中欧地区中，特别是离他最近的西部通用的语言是德语，而这时他对德语还知之甚少。

他于1911年1月离家，乘父亲的马车到距离最近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了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他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尽管他此时已打算做任何事，只要能挣钱养活自己，但却仍然找不到工作。他决定到的里雅斯特去碰碰运气，这是一个拥有造船厂的繁华港口。他翻山越岭，冰天雪地中遇到什么地方就睡在那儿，徒步六十英里，经过三天才到达海岸。这件事显示了他拼死谋生的决心，但在那里他依然很不走运。后来他说：“的里雅斯特的港湾以及那些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使我非常吃惊。”但是，至少他还可以到自己工会的分会办事处领取只有会员才会分发的失业救济金。这使他免于饥饿，也加强了他对加入工会的重要性的坚定信仰。他打算回家，先搭乘一个农民的大车，余下的路步行。2月末，他又重新回到库姆罗维茨。

“我不能也不愿在家长期呆着，”后来他告诉为自己作传的作者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我只稍停几日，因为家中太穷，我想还是尽早离开为妙。”3月初，他到萨格勒布，在一家修理汽车、自行车和别的机器的小工场找到了工作，干了四个月的时间。这虽然不比他学艺的那个工场强，但至少能给他一笔固定的收入，每天二克朗六十赫莱尔。他认真地交齐了失业期间拖欠的工会会费。他的经济虽然很紧，还是很快给自己购买了一套新衣服。农民若是在社会上混得马马虎虎，就会这么做。况且在他前一段时间的失意——第一套新衣服被偷窃，以

铁托传

及这一年前几个月失业很丢脸之后，他决心要挽回自己的名声。在许多方面，他依然是个典型的在城市里寻求发迹的农村孩子的代表。

不久，他离开萨格勒布到维也纳去谋求机遇——想见识外面，学习德语；也想抛开父亲的纠缠不清，他父亲对他的收入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其实他是愿承担家庭义务的，有时也寄钱给家里——但只寄给母亲，免得父亲拿去买酒喝。离家远些，就自由多了，也能多攒一点钱。这一次他为了投入社会所作的准备就比较小心了。虽然他购好到维也纳去的火车票，但因害怕可能重演在的里雅斯特的经历，在卢布尔雅那他就下了火车。这毕竟是他旧日来过的地方，免得独自一头扎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在卡姆尼克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五金厂找到了工作，工作了将近一年，直到1912年5月才离开。他对自己在卡姆尼克的生活情况的简略的阐述表明，当时他仍旧是个很普通的青年，还不太有政治眼光。他对自己加入的体育组织所作的反哈布斯堡宣传，还不如对体育组织的带羽毛的制帽和制服以及跟随军乐队一道迈步前进和每周三次的体育活动更感兴趣。后来他离开斯洛文尼亚的时机降临了：这家工厂破了产，被解雇的工人另外补发一个月工资，到波希米亚一家更大的工厂去，那里正需要更多的工人。这样，他就迈上了这段中途经过维也纳的旅程，身上揣着钱，还和五十来个工人愉快结成了同伴。

这些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到达波希米亚后才明白，原来他们是被当作罢工破坏者招来的；这家工厂的捷克工人正在进行罢工，不让他们上工。等到工厂方面屈服，答应提高工资之后，这些新工人们也就以改善的工资标准接受雇佣了。终于

铁托传

约瑟普在中欧一个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站稳了脚跟。这时他已拥有了足够的自信来独自行事。两个月后，他再次出发去参观中欧一些大型的工厂。他有工会会员证，即使在奥匈境内找不到工作，也能确保不陷入困境。他已掌握了一点德语，在各种金属加工过程方面增长了经验；他已经不再那么傻傻的，也不再是农村孩子进城，总想自我表现一次。他没有给家里联系，告诉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从而摆脱了父亲对钱的索要。

1912年下半年，他从一个工业中心转到另一个工业中心，找个工作干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流浪似地生活。他参观了比尔森的斯科达军火厂，小住在慕尼黑，访问了鲁尔和曼海姆。最后，1912年10月，落脚在维也纳。终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母亲回信告诉他比他大八岁的长兄马丁的住址。约瑟普还在读书时马丁便离开了家，此时正在维也纳城附近的新城车站做一名铁路工人。哥哥已结婚，有一个小孩。约瑟普和他们共同生活，在温馨的家庭气氛中安心度日。在附近的代姆莱尔工厂他也找到了一份职业。他曾幻想自己所受的训练将会给他带来一种精彩的生活，在这儿也终于找到了一点感觉。他对那些“马力强大、带有笨重的黄铜铸件、外刹车和橡皮球喇叭的大汽车”非常入迷，“甚至想成为试车司机”。但看来他很可能还不是该厂的正式工人，因为他叙述起这段往事时曾说自己没有很多的钱进维也纳的咖啡馆。但他还是了解了这个他日后在不同的条件下多次访问的城市。他又加入了另一个体育协会，每周训练几次。他开始学习击剑，并进了一个舞蹈班学习时髦的交际舞——这是一种将使他和家乡那些只跳科洛舞的农民区别很大的上流社会的事物。他正在沿着社会阶梯逐步地上进。他仍然遵从现状，努力在现实社会中寻求改善自己的环境。1913

年，他年满二十一岁。这时，他必须回家乡去服两年兵役。

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使约瑟普·布罗兹从一个现状的遵从者变成了一个内在的叛逆，一个与社会相抵触的人。这一变化，看起来在许多方面都和他到目前为止所表现的性格特征不相吻合；但他在此后四年间耳闻目睹或亲自感受的种种事件却是远远不只具有戏剧性的。在俄国革命中布罗兹看到一种社会制度被推翻，看见同他相同的、原居于社会最低层的人们突然翻身，掌握大权。这是一种使人倾心的经历。他自己之所以要当一位政治上的叛逆，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变化一旦完成，一生便不会改变。它在他的个性之中深深扎根，而且和他童年的经历紧紧联系到一起。它的原因很复杂，个人的失意、雄心壮志、理想主义以及对人类的献身精神都起了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燃烧时，他在军队中已服了一年多兵役。恼人的军队纪律，艰苦的条件，他所属部队一个粗鲁的伍长的古怪作风，这些他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在军队中处得很好，又顺利又快乐。他已经学会自我照料。大部分新兵都是一些直接从农村来的青年，许多人没有任何文化，比起他们来他就世故、机灵多了。加上他的职业和参加过体育俱乐部，所以他体格健壮。1913年末至1914年初的那个冬天，他接受了滑雪兵的训练。在维也纳学会的击剑术大大派上用场，他在全团获得击剑冠军。显然他是个可深造的人才，于是又被送到布达佩斯接受训练，在全军击剑比赛中他又获得亚军。他在二十一岁时就被提升，成为第二十五莫多兰团中最年轻的士官。他已拥有了一个合格的军人的条件。

1914年6月28日，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使用

铁托传

塞尔维亚秘密的民族主义的组织“黑手党”成员提供的武器，在奥地利1908年吞并的行省波斯尼亚的省会萨拉热窝刺杀了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一系列事件连锁反应，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奥地利的军队领导人认为，既然塞尔维亚与这一凶杀阴谋有关系，这就提供了一个不允许失去的良机，给这个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的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也是对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的严重警告，叫他们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要求收起。

奥地利陆军部长孔拉德伯爵早已打算进攻塞尔维亚的军事计划“巴尔干行动”，已准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原来的想法是打一场短期的局部战争。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一项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虽然其中的要点都被塞尔维亚接受，但奥地利仍于7月28日对它宣战。此时奥地利自己的动员完成还不到一半。俄国塞尔维亚的同盟国担忧自己在还未着手准备时就被卷入战火，也于7月30日下令部分动员。德国因为与奥地利结盟而被牵涉进入。如果战争发展为普遍范围的大战，奥地利必须就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计划进攻法国一事作出关键性的抉择。奥地利在8月1日对俄宣战，两天后，对法宣战，同一天进攻比利时。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这样一来，奥地利就面对着一一种与自己原先的计划截然不同的局面。奥派部队进攻塞尔维亚的同时，不得不对付俄军对奥军喀尔巴阡山东线的进攻。孔拉德原打算用他的第五、六军两支部队横扫塞尔维亚，其余各军预备后用。约瑟普·布罗兹所在的团编属于第二军，这个军本来已作为部分后备部队转入贝尔格莱德以北的阵地，这时只得抽回用于对俄战线。1914年9月，当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闪电战”出人意料地节节败

退之际，第二十五多莫布兰团正开往加利西亚抵挡俄国人的进攻。

克罗地亚士兵对战争没有任何热情。后来铁托回忆说：“我们都盼望奥地利再打一场大败仗，就象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那样，我们祈盼这个可恨的帝国早日灭亡。”他还有一次说：“我从一开始就痛恨这场战争。”在团内普遍存在这种破坏性的言论，一个“忠于皇上”的同僚却向上司汇报了他的话，他被控告为发表反动言论，押进彼得罗瓦拉丁堡。因为他的案件不属军事法庭审理，他又被释放，被送往加利西亚前线。

在喀尔巴阡山前线团队进入阵地后，局面便非常不一样。当兵打仗，事关生死存亡，就必须尽可能有效地完成任务。秋天转入了严冬，堑壕战陷于僵持阶段。克罗地亚部队装备非常差劲，被服质量低劣。而他们的对手俄国兵就更加困难。铁托回忆说：“冻坏了双腿倒下的人比被子弹打倒的还要多。”他想方设法照料手下的士兵。他后来讲的有关这一时期的故事说明，他那时仍然具有设法利用现有所有的条件，利用那年整个冬季的严酷条件的才能，甚至率领侦察部队深入敌营后，使之得到某种满足。他逐渐发现自己具有领导者的某种天赋才能。

1915年3月25日，同时也是复活节礼拜日，他的军人生涯中的这一阶段突然结束。凌晨四时左右，俄国将军布鲁西洛夫在奥克诺附近发起攻势。铁托回忆说：“我们自己处于一种特别愚蠢的地位。若是司令官懂得一点如何指挥，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的部队被赶进一个死角，敌人居高临下进行攻击，用火炮轰击，突破了我军的左翼，包围了我们。开始我们竭力反击……”。后来，奥军防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塞尔卡西骑兵冲了进来，他们跳下马背，在壕沟里展开肉搏。约瑟

铁托传

普被一支两码长的矛枪猛刺进左肋，差点儿伤了心脏。他晕死过去。幸好野蛮性略差的俄国步兵来到，他才在塞尔卡西人刀下幸免送命。

当了俘虏之后，他被送进斯维亚希斯克的一所由修道院改建的医院，这个地方远在俄国内地的喀山城附近的伏尔加河畔。他在那里呆了十三个月，初期伤势严重，伤口恢复很慢，他又得了并发症，包括反复发作的斑疹伤寒和肺炎。医院既拥挤又肮脏不堪，病人垫着干草就地躺卧，到处是虱子，伤寒就是这样被传染上的。病情最严重时，甚至人们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给他系上一条红带作为记号，应送到太平间去。但他的强壮的体质终于起作用了。他幸运地又得到一定的护理和照料，最后在 1916 年夏天，按照恢复的情况他被送到如今的古比雪夫省的阿达托夫附近一个规模小些的战俘营，那里条件艰苦，饮食极差。所以，当有些农民来为他们的磨坊找个机师时，布罗兹就毛遂自荐到营外去干活。“在磨坊活儿不是很多很重，我有足够的时间看书。……我也结交了几个反对沙皇的俄国人。”但这种舒服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月。1916 年年底，他被送到更东边的另一所在乌拉尔山麓彼尔姆城附近的孔古尔战俘营。布罗兹是士官，又处于伤病恢复期，可以不干重活。他被分派管理来自奥匈帝国各地的战俘——主要是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匈牙利人，因为这时他已经和大部分克罗地亚人以及其他的南斯拉夫人分开了。

1916 年末至 1917 年初的那个冬天，战俘们做的活是修理圣彼得堡——西伯利亚铁路。吃的食物全靠他们微薄的工资购买，份量不足，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布罗兹作为士官，负责分配。战俘们很意外地接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红十字

铁托传

会的一位瑞典籍官员甚至还前来看望他们。约瑟普·布罗兹曾给他写了一封信，控告一个俄国铁路职员经常偷盗战俘们的包裹。不久这个俄国人就伺机进行报复。为了照顾战俘，布罗兹曾改动过出勤记录，由此他被送进了一间地窖，三个哥萨克进去揍他。铁托回忆说：“他们抽出鞭子朝我背上打来，我被打的这三十鞭子，让我一生难以忘怀。”但就在那天夜里，另一个俄国人帮助了他，给他喝茶，还带来了一条防寒的毛毯。不久以后，1917年3月初，传来了沙皇退位的消息。随着一片“打倒沙皇”的欢呼声，战俘们全被释放。在随后的混乱情况中，铁托在附近的一位波兰籍工程师家里暂住了一段时间，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和铁托的第一次密切接触。

1917年开始的几个月中孔古尔小战俘营的情形，反映出当时俄国的混乱状况。圣彼得堡的临时政府正忙于应付中央权威在国内和军队中的崩溃所引发的难题，苏维埃作为“人民议会”在全国城乡建立起来。弄不清谁说话算数，也弄不清国家是否还处于交战状态。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掌握政权，而且因为该不该从临时政府取得支持一事发生了严重分歧。流亡瑞士的列宁于4月3日乘坐那列著名的密封火车穿越德国到达了圣彼得堡。直到列宁评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对圣彼得堡不断混乱状态的反应的《四月提纲》正式发布之后，布尔什维克所鼓吹的革命运动才开始在俄国首都获得广泛的支持。全俄境内许多战俘营里的战俘，对俄首都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当地由谁掌握政权，甚至也搞不清他们到底依然是战俘，还是已经获得了自由。

“我已经同战俘们在一起聊过，我们预料会出问题。那位工程师也告诉我革命即将发生。但有人把我举报了，我被送进

铁托传

监牢，关押三天，然后送回原处。”布罗兹不久又在4月间被逮捕，在狱中过了十四天，直到他那位波兰籍的布尔什维克朋友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转去彼尔姆铁路线上工作。工人不断被抓走和失踪，生活毫无保障。4月末，布罗兹下定决心准备逃离。他的朋友给了他儿子的地址，这个人坚决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一家工厂当工人。他在集市上卖掉了自己的质量很好的军装，买了一套破旧的便衣。上衣太大，他就自己修改了一下。然后，通过这位工程师的帮助，他逃向彼得堡。在彼尔姆附近，他扒上一辆火车，藏身在一袋袋小麦中间，直接到了俄国首都。6月末他到达以后设法和这个年轻的波兰人取得了联系，被带到了他的寓所。

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已控制圣彼得堡的工人区，正赢得工人们和士兵更加广泛的支持。大街上反对临时政府的游行示威越来越多，布尔什维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公然出现，虽然列宁本人认为用革命的方式武装夺取政权为时尚早。但由于君主主义者、退役军人、军官以及士官生的支持者这些反革命势力开始武装和组织起来，局势变得很严峻。7月3日，矛盾终于到了爆发阶段，工人和士兵上街游行，高唱马赛曲，要求临时政府解散，权力收归于苏维埃。在缺少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示威游行持续了相当长的几日。喀琅施塔得水兵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占领了彼得-保罗城堡，一个沙皇制度的野蛮专制的象征。但临时政府仍然能调到足够的军队和支持者对付游行示威的人民。在这些日子里约瑟普·布罗兹上了街。这是他和俄国革命的中心事件所产生的惟一密切的接触。他躲过了从铁路建筑物房顶上向下扫射的机枪子弹，幸运地没有被打死。当临时政府占了优势，开始搜捕积极分子和布尔什

铁托传

维克党人时，他的朋友，那个波兰籍工人被捕了。布罗兹则四处藏匿，在涅瓦河的桥梁附近藏身了几日后，决定逃往芬兰。他不知道在略早一些的时候，列宁也曾这样做过。

布罗兹孤身一人，又没有什么关系，难以取得成功。他希望凭借自己的“白卡片”，即受伤未曾痊愈的证明书，能获准进入芬兰。这个地方当时还归属于俄国。他在乌连堡被认作布尔什维克的嫌疑而遭受逮捕，送回圣彼得堡。8月，被关在涅瓦河一个小岛上的彼得-保罗城堡中一个老鼠到处窜的地牢。

〔他回忆说：〕我在这座城堡里住了一段时期，好几次被问及职业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担任何种职务。我回答说，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在那里没干什么。我屡次告诉他们，我有一张白卡片，是从维亚茨卡-古贝尔尼亚到彼得格勒来寻求出路的。这听起来象真的，因为我满口纯粹的维亚茨卡方言。我就这样被关在那个地牢有三周时间。这时我受够了。涅瓦河就从城堡旁边即在铁窗底下流淌而过。那个地方湿气特重、冷得要命。我暗想，这把骨头就得扔在那儿了。

有一天，他们又来审问我。刚进监牢时，我不敢坦承自己是战俘，我想那样处境会更糟，尤其我还是逃出来的。这一次提审我时，我承认我是战俘。他们问：“从哪里逃出的？”我回答：“从彼尔姆斯卡-古贝尔尼亚的厄尔加奇。”他们说：“傻子，你为什么不早讲呢？在这里关了三个星期，其实你早就可以出去了。”

他被遣返原战俘营，由卫兵押解上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列

铁托传

车。火车每站必停，一次靠站时，他借口赶去取水煮茶，从卫兵手中溜掉了。然后，他时而步行，时而乘火车，慢慢取道前往叶卡特林堡。在那里他被战俘营的一个看守辨认出来，只得急忙躲闪。后来到了鄂木斯克。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胜利夺取政权，第二天的黄昏，他到达鄂木斯克时被一支巡逻队拦住。他们喝问：“你是什么人？”布罗兹回答：“战俘。”“不，同志！你已经自由了。这里是革命。”他们告诉他马上到当地的集贸市场去，那里正在组建赤卫队。“我没怎么犹豫就去了。”他和营里其他的一些战俘共同参加了国际赤卫队的一个分支队。1917年末至1918年初那个冬季的几个月，在鄂木斯克附近的铁路线上他为布尔什维克站岗。

这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中非常重要的几个月。1918年3月3日，德国和托洛茨基签订了立托夫斯克-布列斯特和约，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西部大部分土地被分割给德国。结果给在俄国的奥地利战俘造成了一种局面非常混乱的情形。很多斯拉夫人一直不想参加对俄作战，而其中许多人，特别是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这时急迫地希望到西方去和德国及其盟国作战。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战俘却没有这种感受，他们更关心自己家乡的局势，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可以放心参加。他们不愿意被编入塞尔维亚部队。塞尔维亚政府则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又着重于将来建立某种南斯拉夫国家的成功性，不同意他们组织一支南斯拉夫部队。

由于布尔什维克和西方协约国关系闹僵了，这种混乱局面越来越严重。协约国军队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攻击。英国军队1918年8月3日占领了俄国南部的巴库和北部的阿尔汉格爾。美国军队开始在西伯利亚登陆。更早前，在夏天，布尔什

铁托传

维克曾答应让捷克军队全副武装并建制的军队形式经由西伯利亚撤出，这一行动已经展开。但由于协约国的干涉的逐步升级，布尔什维克担心捷克部队会被协约国利用来攻击自己，于是试图解除捷克人的武装，由此引起了斗争。1918年5月捷军起来反抗，并开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势力联合起来共同作战，想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将西伯利亚铁路的控制权夺取过来。1918年6月7日，捷克一白俄部队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抢占了鄂木斯克。某段时间，鄂木斯克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西伯利亚政府中心所在地。11月，这里由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手下的一支白俄军队接管，接着在1919年春季对布尔什维克发动了进攻，却以失败结束。这一年11月11日至14日之间鄂木斯克被布尔什维克重新收复。

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活动，铁托没有说清。回顾三十年甚至三十几年前的往事，什么时期他在什么地点，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捷克兵搜查加入赤卫队的战俘时，他被迫逃离该地区；一个叫佩拉吉娅·贝露索娃的俄国姑娘把他藏了一段时间。后来这姑娘成为他的妻子。接着，他更加远离铁路线，到了大草原。这段时期有一个日期是个谜：按照正式公布发表的材料，他是1919年1月19日在鄂木斯克党组织登记入党，但这时候鄂木斯克却仍在高尔察克手里。

有一阶段，他在离鄂木斯克约四十英里远的草原地区的吉尔吉斯牧民中间藏了数月。叙述起这段往事时，他既提到冬天也提到夏天的经历，看来这段精彩奇妙的异国情调的经历很可能占去了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后来，当鄂木斯克地区在这一年11月被布尔什维克收复时，他又一次赶了回去。

当一伙又一伙白军部队在大草原上四处奔跑，各地搜捕布

铁托传

尔什维克时，保护他、帮助他藏身的那位吉尔吉斯酋长名叫哈季·伊赛·贾克森巴叶夫。他那个骑马游牧的部落，财产用马匹的数目计算，酋长本人就拥有二、三千匹。他们漫游在辽阔的草原上，夏季住帐篷，冬天住地窖。布罗兹赢得了伊赛的好感，因为他会修理这个部落磨面的机器，也由于他有一身很好的马上功夫。他擅长于适应环境，既幽默又刚强，牧民们不把他当外人，他也成了伊赛喜爱的侍卫之一。他在草原上驰骋，围猎灰狼，驯马，夜间则听故事或讲故事——游牧民族爱好的那些捉弄人的有着曲折情节的故事。他和吉尔吉斯人相同的打扮，还学会了一些他们的语言，但一直没有被同化到能接受他们所有风俗习惯的程度。

伊赛信奉伊斯兰教。有一次，他讲起基督教徒吃猪肉的肮脏习俗，布罗兹就以酋长的女人们令人恶心的习惯来回敬，说她们侍候男人吃饭，蹲在一边等待新的吩咐时，竟从身上摸出大个儿虱子来，放进嘴里咬，弄得唇上斑斑血迹。他说：“常常使我想来就想吐——吃不下饭。”酋长要许配一个女儿给他，给他在部落永久留下的机会，布罗兹婉言拒绝了。但他的确曾帮助部落里的一个人和邻近部落的一个女人私奔。

接近 1919 年年终时，布罗兹得知这个地区的白军已经基本被肃清，布尔什维克重新掌握统治权，就回到鄂木斯克和布尔什维克还有留在那里的战俘们恢复联络。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又找到了那个俄国姑娘佩拉吉娅，当初她也是逃跑了。有一天，布罗兹在一个村子里的街上偶然遇到她。1920 年 1 月，他们在鄂木斯克附近的博哥柳博伊斯克正教礼拜堂举行了结婚仪式。

关于布罗兹是否加入当时在俄国活动的某一个南斯拉夫的

政治团体，我们不清楚。假如加入过，即在该期间。1918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过一次前战俘会议，到会的南斯拉夫人都加入了一个附属于俄国共产党的同盟。11月12日，同情共产党的南斯拉夫人也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其中大部分人于该月底回国，一些人留下来在即将回国的士兵中进行政治工作。布罗兹远离莫斯科，不可能参与这些活动，但可以判断，他离开之前曾与一些在俄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会过面。虽然他显然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但没有什么充分的证据来说明他此时已是一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而作为前赤卫队员之一，他的名字一定被记录下来，一旦在南斯拉夫组建共产党，他便是潜在势力的支持者。

布罗兹决心回自己的国家，不在俄国呆下去。婚后不久，他便与妻子一道动身去圣彼得堡。他奉命率领一支由前战俘组成的队伍返回克罗地亚。他们先到纳尔瓦，然后乘船到什切青。3月，他们开始了乘火车穿过欧洲大陆归国的漫长的旅行。1920年9月20日，他们到达领域已大为缩小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个时候，一个也是从俄国回来的行动积极的共产党员马扎儿人贝拉·库恩，打算在如今已成为独立国的匈牙利发动一场革命，但还没有成功。一个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也在1918年建立，它包容了布罗兹的家乡克罗地亚，以及主要由南方斯拉夫人共同居住的原奥匈帝国的其他领土，后来它改名叫南斯拉夫。它的政府已在采取某些做法，防止从俄国归来的战俘的影响，他们可能具有推翻旧统治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布罗兹取下了皮帽子上的原赤卫队员的标志红星，但他的朋友们都向他说明，帽子上还是留着一个泄露秘密的线索。他说：“我不想自我表现。”但这其实是出于小心。

铁托传

他们夫妻直奔故乡，在 10 月上旬到达库姆罗维茨，却发现母亲早已在 1918 年离开了人世，父亲也已经移居到附近一个小村庄。如果说他的人生还没有改变他的话，至少他也由于所获得的进取精神而与那些留在本乡的人截然不同了。

第三章 向革命家的转变

布罗兹在国外的時候，他的故乡因为革命而风云变幻。克罗地亚已脱离奥匈帝国，加入刚成立的南斯拉夫国家，此时奥匈帝国已经不存在。1914年铁托离开故乡随奥地利军队去与帝俄作战的时候，许多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已和那些塞尔维亚人一样，都希望建立南斯拉夫联邦，只是没人想到哈布斯堡帝国会在这场战争中覆亡，因此没有人想过要建立一个新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在战争期间，1915年5月在罗马组建了一个代表南部斯拉夫人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后来与塞尔维亚人签订了科孚公约，这种想法才得到实施。

南部斯拉夫人应该如何摆脱君主国，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1917年与塞尔维亚流亡政府的外交大臣尼古拉·帕西奇磋商之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假设成立某种形式的南部斯拉夫联邦，他们能够和塞尔维亚人具有相同的地位；而帕西奇和大多数塞尔维亚领导人的想法是扩大塞尔维亚国家，让所有的南部斯拉夫土地包含在其中。他强烈反对建立南斯拉夫联邦这种想法，反对南斯拉夫委员会的许多宗旨，而且不能由俄国的南部斯拉夫战俘建立南斯拉夫军团。他曾经说过，“塞尔维亚的一贯想法就是要把他们从奥地利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声称只有他才有权决定政策是否正确，塞尔维亚官员必须完全顺从他的意志，否则就自动离开。他这番

铁托传

话是针对伦敦泰晤士报编辑威克海姆·斯提德说的。斯提德回答道：“你以为你是苏丹，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盟国人民非常不喜欢苏丹。”但是帕西奇还是如愿以偿。1917年5月30日，斯洛文尼亚领导人柯罗塞克在奥地利议会当众宣读了这一宣言，并声称要把其帝国内所有的南部斯拉夫土地合并为一个整体。直到1918年9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领导人才对众说明他们的想法，奥匈帝国政府没有权利代表他们讲话，皇帝在10月19日许诺承认民族权利的公告已经太晚，没有效力。1918年10月29日，在萨格勒布召开的一次克罗地亚所有地区代表参加的克罗地亚议会，宣布解除与匈牙利的盟友关系，并颠覆了哈布斯堡王朝。

一个月之后，作出了与塞尔维亚统一的决定。由于时间很仓促，连统一的条件都没有经正式达成协议，因为正面临意大利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大片领土提出占有要求的压力。这是西方盟国为收买意大利参加协约国而于1915年伦敦条约的秘密条约中许给意大利的。当时他们没有预见到奥地利帝国的灭亡，没有预料到会建立起一个不愿意割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土地的南部斯拉夫王国。克罗地亚人担心，如果南部斯拉夫人在国家政权的形式上不停争执从而推迟国家的建立，意大利讨价还价的气势便会加强，只得同意摄政王亚历山大的要求，接受塞尔维亚卡拉乔治王朝，并同意统一的南部斯拉夫国家由一个中央集权政府领导。

新国家包括原奥匈君主国的所有南部斯拉夫土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前的门的内哥罗王国以及到1914年尚留在土耳其手中的马其顿几个地区。边界问题将在和会上协商决定。1918

铁托传

年12月1日，新国家的摄政王，就是以后成为国王的塞尔维亚人亚历山大·卡拉乔治维奇，接见了克罗地亚代表团每位成员，却把他们当作下臣，而不是平等相待。克罗地亚在新王国中的地位还没有具体规定，塞尔维亚的意图已经明白无误。

1920年秋季，参加巴黎和会的南斯拉夫代表们陷于孤立的政治局。他们还在苦苦争论应优先满足谁的边界要求，还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法国和英国催促南斯拉夫对意大利的要求让步，而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深感不满1915年的伦敦条约，并一直支持一项有利于斯拉夫人的种族问题的解决方案，此时却已在美国国内遭遇挫败，因而无计可施。1920年11月10日，南斯拉夫代表团终于对意大利屈服，两天后与意大利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南斯拉夫只得放弃它对伊斯的利亚和的里雅斯特的要求，丢掉了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些岛屿和达尔马提亚沿海的扎达尔；除此之外，还有阜姆“自由邦”，实际上它早就是意大利手中之物。通过1919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以及1920年签订的纳伊条约，和南斯拉夫的别的邻国的边界问题也取得统一。没有哪一项条约能充分满足南斯拉夫人的要求，而它的民族统一主义的邻国也依旧不满意。作为这些条约的结果，有七十二万南斯拉夫人被划分出新国界，其中有四十八万人，亦即过了半数，是在意大利。

1920年布罗兹回到克罗地亚时，克罗地亚人与被塞尔维亚人控制的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加深。克罗地亚人由于自治的梦想破灭，非常愤怒，而塞尔维亚领导人则对克罗地亚人充满怀疑，害怕他们不满，有心尽量把他们排斥于实权之外。各族人民尚未选出他们的首届议会，甚至连一部宪法还没有通过，这个新国家就已经让人民人心相离了。

铁托传

上层政治谈判的详细情形，克罗地亚乡村的农民很可能一点都不清楚，但他们已经充分感觉到他们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所遇到的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战争结束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时机。克罗地亚战时食物很稀少，农民得以在自由市场上得到利润。物价高涨，奥地利又随着战争的发展而一日比一日陷入灾难之中，当局的影响从而削弱，这就使农民逐渐大胆起来。乡村驻军中上千的士兵开了小差跑掉了。1918年的萨格勒布军事法庭所处理的逃兵案竟多达十万余种。四至五万农民逃入山林，号称“绿林军”，来逃避劳役或征兵。农民开始拒绝向地主继续交租。他们攻打大庄园，争抢土地或财物，尽情欢呼，让他们数世纪来对土地的渴望和对于外国地主贵族统治的仇恨发泄出来。扎果烈地区原为埃尔多迪家族旧产的班亚堡被一群农民和矿工攻占，被洗劫一空，然后全部炸毁。1918年，萨格勒布的临时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在与塞尔维亚谈判期间于11月14日向农民发布通知，许诺进行土地改革，分割大庄园归私人拥有。这在新国家其他许多地区也是一个紧张的问题。所以，新政府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在1919年2月25日颁布一项临时土地改革法令。因此，在布罗兹回来之前，克罗地亚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许多农民已获得土地所有权。但这并不能自然地带来繁荣，农村仍处于极端混乱的局势之中。

混乱不仅限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罢工一阵紧随一阵；门的内哥罗则频繁出现严重骚乱：那里的很多的高地部族虽属塞尔维亚血统，却痴迷地忠于门的内哥罗，他们对于独立的世袭政府的消失和其后并入新国家而来的民族特性和自治地位的丧失均很是反对。马其顿情况尤其糟糕，马其顿内部革命

组织的保加利亚特务在那里大搞白色恐怖，以阻止这一地区并入南斯拉夫。全国这些混乱均被塞尔维亚部队一一平定，他们当时还是萨洛尼卡战线的同盟国军队的一支，由法国将军弗朗歇·戴斯珀利统一率领，此人直到和约签订后才离任。

对新政府权威最厉害的威胁是 1919 年 7 月爆发的一次总罢工，适逢一连串的兵变，而这些兵变恰是由与匈牙利的共产党起义分子有关联的、从俄国回来的前战俘所领导。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不让这种革命性质的行动在本国得到发展，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防止给外国干涉造成理由，因为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当时都正在对南斯拉夫的边境地区提出领土要求。

新国家资源短缺，难以承担为解决各族人民的衣、食、住、行及就业问题而势在必行的改革，以及建成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完整经济体系的国家这一艰巨任务。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一直处于落后贫困状态，而与南部斯拉夫其他地区相比较，工业上还是比较发达的。但其贸易与资源以及一切主要交通设施，都属于哈布斯堡君主。工厂、银行则基本上为马扎儿人或德国人所有，他们的资助已无法乞求。在这一转变时期，局面混乱动荡，大批人失业。1948 年铁托在一篇演说中描述这一时期的情形时曾说：“工人几乎百分之九十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无法营生。”他随即提到即使有工作的人所得到的也仅是一份让人濒于饿死的工资——不熟练工人每天只能挣两个半到三个第纳尔，技术工人能挣五到六个第纳尔，而此时作为主食的面包，两磅半一个的要价一个半第纳尔。没有大量的外国救济，政府花大量时间借外债，但多数用于国防事务。战后流感和通货膨胀共同折磨着这个国家。

铁托传

这就是约瑟普·布罗兹与妻子回国后看到的情况。他急切需要找到工作，自尊心不容许他再次向亲属乞讨，接受家庭接济而忍受冷嘲热讽。关于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资料。他后来谈到该段时期，说起旧日的艰苦情形，提到曾参加过一次成功的侍者罢工，还说起曾经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在萨格勒布工会大厦做过的一次演讲，其中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工人们只有依赖武器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这是那个时期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中的极端分子的口号。但我们很难判断他这句话是号召工人们拿起武器呢，还是对一个显然的事实陈述。

有人判定他是作为苏联情报员回到南斯拉夫来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当时他真是共产党情报员，他后来很可能就会很自豪的这样说。他也会在经济上很轻松，因为苏联情报人员都有一份月薪。而且大家都知道，某些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当时已经通过布达佩斯或维也纳领取俄国的金钱。那时，返回的战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方面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而约瑟普·布罗兹不在其列。现有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当时非常贫困，正在寻找工作，政治方面充其量不过是个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还没有使社会生活高于个人生活。他那时还总认为自己是一个熟练的机械工，政治活动应进行于工会中，并只限于一个旨在提高劳动条件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正常的积极活动。他还没有完全将精力献给新的共产党，还没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在布罗兹回到南斯拉夫之前，发生了两件使他一生发生转折的大事，虽然他本人当时与它们没有什么关系。一件是在莫

斯科成立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第三国际；另外的一件是在刚刚建立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组织成立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三国际后来改称共产国际，有了它，就有了一个向其他国家共产党提供金钱援助和指导组织的组织。但是那时尚未壮大发展为十四年后约瑟普·布罗兹首次与它打交道时那样一个对外国共产党具有绝对权威和集中控制的国际机构。

以南斯拉夫王国各地区的各种社会民主党派以及左翼团体为基础而建立一个统一工人党的决策，最初是于 1919 年 4 月 20 日至 23 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一次寻求统一协作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并通过的。新党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 年 6 月在武科伐尔会议后又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

南斯拉夫各地区左翼运动中政治上活跃的人，对刚成立的共产党在支持方面远没有达到一致。对于是否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战术和革命主张，以及在改善社会状况方面是否采取较为合法的方法，争执十分激烈。甚至共产党内部也有着大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全国所面临的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这就是新国家到底是应该在塞尔维亚领导下贯彻中央集权呢，还是应当保留某种形式的联邦？在战术上，党内也分为费边派和革命派两大派别。那些支持方法较为温和的路线的人也渐渐地为革命左翼所代替。

经济状况也激发了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以及离匈牙利数英里远的伏伊伏丁那，情况更甚；此时匈牙利人贝拉·库恩的共产党起义看来成功率非常大。左翼的激进政策在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也得到强大的支持。意大利特务在达尔马提亚四处伺机而动，企图煽起内乱，

铁托传

破坏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在塞尔维亚，西马·马科维奇和日夫科·托帕洛维奇两人积极倡导共产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共产国际，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前一位后来脱离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约瑟普·布罗兹针锋相对；后一位原是一个数学教员，后来由于对共产主义持一种独特见解而被共产党开除出去，最终在俄国丧生。

从俄国回来的战俘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叙述了沙皇被推翻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精彩，而且经常被赋以浪漫色彩，有助于鼓动群众支持共产党。所有这些造成的影响也在1920年的市政选举和普选中起到了效果。

3月和8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中，共产党在国内多处获胜。在萨格勒布市，他们获得的选票率为百分之三十九。在贝尔格莱德是百分之三十四，因此取得对国内仅有的两个大城市的控制权。1920年11月28日的普选中，除共产党外所有的党派都倚赖于地区性的支持。只有共产党尽管内部矛盾不断，其支持者却遍及全国各地。他们出版数百种传单和十三种报纸，在全国散发。他们获得选票的比率在民主党19.9%、激进党17.7%和克罗地亚农民党14.3%之后位居第四，达到12.4%；在席次分配方面，在1920年12月召开的立宪议会中他们成为第三大党。这次的成功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就是对共产党的最坚强的支持并不来自比较先进的、工业化的省份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而是来自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那里的党组织建设正处于最薄弱阶段，然而农民的情绪却都是很革命和很激进的。

即使党的某些领导靠接受俄国金钱来进行竞选，也只能产生并不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在1920年大选中取得的胜利，反

应出那个时期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和地区民族主义者中间革命、激进和愤懑情绪的存在。这不能归功于俄国的经济援助或布尔什维克的影响。

共产党人胜利踏进新议会不满三十天，就被沉重打击了一次，从此丧失了在新国家中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取得政权的全部手段。1920年12月29日至30日之间的夜晚，民主党-激进党联合政府颁发了一项法令，命令在通过宪法前解散所有的共产主义组织，工会也在其列；禁止一切宣扬革命、专政或任何暴力的宣传活动。共产党正沉浸于胜利之中，这一举措真是出乎意料。他们对于争权夺势的现实毫无认识和准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也一直未能恢复自己的合法地位。

政府决定采取这种独裁性的，就连非共产党议员也认为属于非法的措施，原因有多种。主要的一个是塞尔维亚的政客们为了得以在议会通过他们的集权主义宪法，决心不惜任何手段。在这个时候拿共产党来恐吓人，便会鲜明地表示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即使共产党代表留在国会内也将变得被孤立起来。共产党在普选中和市政选举中的胜利也使塞尔维亚人非常害怕，他们看清了共产党有可能充分利用地区感情和全国各地的经济上的不满的态度。这个党与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分子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联系也使这些人非常畏惧。

共产党的语言和所公布的政策一点未减弱这种恐惧心理。在议会开幕式上，“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同“国王万岁”的呼声尖锐对立。即使态度较和缓的共产党竞选传单所主张建立的国家，也与摄政王、帕西奇和别的政府官员所意图建立的国家截然不同。共产党传单对选民们说，他们只能选择：

铁托传

或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或一个有钱人的国家。一边是共和资本家和君主主义分子，另一边则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共产党。给富人的党派投上赞成的一票就是给银行家、资本家和发战争横财的人们投了一票，也就是为那种国家和专政投了一票，同时也是为现行体制投了一票。给共产党投一票就是为结束资本主义，为消灭地主阶级、商人和为富不仁的统治者投了一票，也就是为废除对农民和工人的压迫、为他们的解放投了一票。

政府的官员们不难看出，所谓富有的、统治的资产阶级实际指他们自己，但这并不冤枉他们。

整个 1920 年南斯拉夫各地都一片混乱。远在“诏书”发布前，政府即已加紧采取军事措施，以暴力镇压反抗的情况一日比一日严重。一方使用暴力，另一方肯定以暴力回敬，直到搞得因果难辨。3 月份萨格勒布市选举结束后，警察曾将当选的共产党市长杰里奇赶出市政厅以阻止他就任。1919 年 7 月的波斯尼亚罢工引起一片惊慌。还调动了塞尔维亚部队镇压非塞尔维亚省份的罢工，甚至连非共产党人都认为合法的会议也不许召开。1920 年 12 月，共产党人摆出了再次举行总罢工的样子，情形宛如俄国革命的前夕。

回想起来，很难对“诏书”发布时南斯拉夫实际上的形势作出准确估计。在那之后的各种说法掩盖了真情：支持“诏书”的人们力图夸大共产党的暴乱行动来为这一法令提供证据，而共产党人也对当时的混乱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大肆渲染，以表明共产党当时是何等活跃，何等强盛。

铁托传

南斯拉夫的许多非共产党人士也反对“诏书”，因为它让新国家的政治自由消失殆尽，并开了一种危险的先例，可以转而用以对所有反对集权政府的政治集团进行武力镇压——后来确实如此。议会批准了这一法律，并动用国家的所有暴力机关强行实施，从而把暴力引进了政治生活，使情形空前的恶劣。

被剥夺了自身权利的共产党代表继续留在议会里。直到1921年6月11日，他们才为抗议对共产党人的全国范围内的虐待和大逮捕而退出。一般都称做维多夫丹宪法的这一部集权主义宪法于6月28日通过时，他们所有人都缺席。这部宪法不承认区域自治或任何形式的地区自治政府，而赋予塞尔维亚人领导地位，使最狂热的塞尔维亚集权主义分子达到了目的。其中赞成票二百二十三，反对票三十五，一百六十五票弃权。后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认为假如没有那项“诏书”，如果所有反对的人都留下来投票，维多夫丹宪法是肯定不能通过的。结果维多夫丹宪法和“诏书”却都没有什么效果：它使对新政府的强烈反对不仅限于共产党人。维多夫丹宪法所造成的形势使两次大战之间的政府完全不可能稳定。

共产党存在还不到一年即遭查禁。它既没有完善的组织，又没有统一的领导，无法管制住激怒的党员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的报复活动。他们的强烈反应引起了警察更多的暴行。6月29日摄政王刚走出议会，就有人向他投掷炸弹。他侥幸未死，但颁发“诏书”的前内务大臣米洛腊德·德拉斯科维奇却在1921年7月21日被一个共产党人枪杀。刺客后来被抓住处决了。这次暗杀导致更残酷的立法。1921年8月2日又公布了一项国家保护法，取缔了共产党代表在议会以及地方政府中的一切职位。对传播共产主义学说规定了种种严刑——包括死刑。南斯

铁托传

拉夫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沉重打击，许多党员被捕，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或逃亡国外。他们成为“非法分子”，在以后的岁月中，许多人因为继续投身这一运动而惨遭监禁、鞭笞与死刑。

到1921年，战后政治和经济上最混乱的时期告终了。国内情况逐渐稳定，经济生活略有转机。其后数年中，目睹过1918—1920年期间的灾难与混乱的许多共产党分子，包括约瑟普·布罗兹在内，都认为当时失去了一次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好机会；而之所以坐失良机，则是因为领导人未能充分利用俄国革命、匈牙利共产党人起义、南部斯拉夫战俘从俄国遣返和奥匈帝国解体等事件，以及克罗地亚的农民暴乱和新王国别的地区的民族主义者的起义所造成的形势；这些领导人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时共产党已拥有六万党员，工会会员有三十多万，完全可以全部动员起来。1948年铁托说过，“当时这种种条件在我国形成了一种革命氛围，但领导人却未加以利用。”

但这种估计并没有包括表明革命时机并不成熟的一些因素。尽管共产党和工会吸收了非常庞大的成员数目，新王国的产业工人却非常少，而其中许多人，象约瑟普·布罗兹一样，对有组织的政治生活其实缺乏经验，也缺乏保证革命胜利的本领。几乎没有人有真正将自己奉献给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理想，更多的人只求在现行社会制度下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明确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的社会。农民们对土地有一种要求，但一旦被满足，便不再那么积极。在克罗地亚，他们对斯捷潘·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的支持胜于对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尽管农民们反对政府和城里人，而且对物价、

土地和税收的态度很激烈，另一方面却仍非常保守，抵触社会的变革，1921——1942年期间，共产主义宣传对他们来说，一般是无法接受。

这个时期的罢工运动和示威游行表面上看来很强大，但反对起义的力量却更强大。政府强权的领导，一心要推行塞尔维亚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并拥有一支庞大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塞尔维亚军队，用来对付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门的内哥罗的反对者，它绝不会与他们相妥协或联合。而且，如果共产党人闹革命，南斯拉夫政府肯定指望得到俄国革命时发生的那种反革命干涉。在这个战后成立的国家里共产主义没有对政权获得控制权，原因在于力量薄弱。然而，所谓的丧失了大好时机这话却在整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里继续影响着共产党人的思想，某些领导人继续号召起义的方式，既越来越脱离现实，也更加浪费物力人力，这也是原因之一。

举行普选和共产党被禁的时候，约瑟普·布罗兹回到南斯拉夫才几周。1920年10月，即社会民主党合并进南斯拉夫共产党数月之后，他在社会民主党的萨格勒布支部恢复党籍，也就自然成了共产党员。他在普选运动中多次出席示威游行和集会，但并没有对党的活动给予领导。他说过，“我是在萨格勒布参加这一运动的。”“诏书”发布后，警方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领导，他没有受到特别的注意，人身方面也很安全。很久以后编写的有关他在警察局内的档案材料，说明他当时不过是一个从俄国返回的战俘。除了这些，他们对他在1920年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少，甚至没有记载。

他重操旧业。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短暂的数年中他度过了一生中惟一的一个普通生活时期。他并不急于参加非法的政治

铁托传

活动，一段时期内与党没有深层次的联络，“诏书”发布后，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他在萨格勒布短期内做过锁匠，那地方物价高、工资低，不久他又被炒了鱿鱼。他曾说过，“萨格勒布的工会已被解散，工人继续一批批地被捕，留在那里已没有意义。”应广告招聘他又找到一份工作——这是他三度从事这种工作了，也许他认为在这局势动荡的年头，这种职业非常有作用，这就是帮大特洛伊斯特沃“一个好心肠而家口多的犹太人”老板看管磨坊。大特洛伊斯特沃是别洛瓦尔小镇不远的较大的村庄，在萨格勒布以东约六十英里的地方。他的工作并不艰苦，与在俄国时干的是相同的活：看管蒸汽机。只要机器正常运转，他就非常清闲。他的农民出身使他轻松适应当地的习惯风俗，与带了谷物到磨坊来磨粉的农民处得很熟。他身为机师，又有文化，还是从大动荡时期的俄国返回的老兵，会讲许多精彩离奇的故事，自然会在该处的居民中占据特殊地位。他说当地人和他的雇主都喜欢他，后来必须分手时，他们还设宴为他饯行。

三年内他的妻子波尔卡生过三个孩子——另外还有一个在他们回国后不久生下来就夭折了。一个男孩生下才八天即患痢疾死去；一个女儿兹拉蒂察只存活几天；另一个女儿赫林卡两岁时又因为患白喉夭折；但1924年出生的一个叫扎尔科的儿子活了下来。这是当时克罗地亚农民生活中很普通的情况，但夫妇俩失去孩子的悲痛并没有因为这稍减。他们按基督教仪式埋葬了子女，布罗兹还自己动手为两个女儿刻了一块墓碑。他夫妇俩只有一间屋子，日子不比他的父母舒适充裕。但两代人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因为约瑟普有着他父亲从未有过的雄心壮志。他曾亲眼见过一场社会革命，从此深信它可以重演。

铁托传

他在平静的犹如一潭死水的大特洛伊斯特沃生活了四年半。

1923年发生的一件事，是他整个一生的转折点：另一个前战俘，共产党员斯提沃·萨比奇来磨坊联系布罗兹。当时萨比奇很可能已经是一个领取共产国际工资的组织者，他与布罗兹的会见，很可能是特意与前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或支持者和失散的党员们取得联系的政策的一部分安排。在经历方面他与布罗兹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在喀尔巴阡山前线打过仗，都在1915年被俘，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很同情。萨比奇是个使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奥匈帝国军队里当过军官，还在红军里任职，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他后来是共产国际下设的一个组织“红色援助会”的官员，也是布罗兹日后长期牢狱生活的主要监外联系人。“开始，我们与附近城镇克里泽沃齐和别洛瓦尔组织成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地下支部缺乏联系”，铁托后来这样叙述该时期。但1923年选举后，布罗兹和萨比奇遇到了一些曾因打算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而在别洛瓦尔被抓起来的共产党人，并与他们共同建立了党组织。他们让布罗兹散发传单，从此，他成为党的一个积极分子。

这是共产党接受新党员一直采用的经典方式。布罗兹经受了各个阶段照例的“考验”。有一个时期他的活动是在独立工会联合会任职，这是国家承认的一个合法组织，共产党利用其作掩护。工会不允许干涉政治——虽然这并不能严密地实行，但有关劳动条件、社会状况和工资的一些活动还是可以的。布罗兹把合法和非法二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在他所属各个小组中很快成为杰出人物。1924年初他入选共产党克里泽沃齐地方委员会。雄心壮志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艰苦卓绝的、不

铁托传

怕疲劳的革命者，而性格和经历又使他比其他许多连家乡都不曾离开的工作人员更为勇敢。他在文化程度与智力上也超过平常的工人。正象在军队时，他既有领导的才能，又有领导的风范。

不久，他当选为一个地方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并以此身份在为一个委员举办的天主教仪式的葬礼上进行演讲。同志们出于对死者父母的尊重，没有按习俗在灵堂致悼词，布罗兹却在墓场作了一个简短而措辞非常小心的演说。“同志们，”他站在棺材旁说，“我们发誓要为你所献身的事业而奋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接着他们展开红旗，覆盖在这位同志的棺材上。牧师和许多旁观者对此评论不断。

由于这次公开表示同情共产主义，他与几个工人一起被捕了。他们被送往别洛瓦尔关押八天，但在案件审理后就被放了出来。这件事标志着约瑟普·布罗兹政治生涯的新阶段。当1924年独立工会的工作被禁止之后，他次数更多地参加了党的秘密工作，常常到萨格勒布去与共产党和工会的省委员会成员会面。克罗地亚的极端分子还在思考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共产党人和当时还没有承认中央政府权威的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党员之间还进行着联系。他们已经在收集武器，秘密地藏到一个地方。布罗兹建议说可以让这些武器发挥作用时，比较谨慎的克罗地亚共产党党委书记非常吃惊。1925年磨坊主人逝世了，由他侄子接手，这时布罗兹已被警察盯上了。他后来说，每周六警察都要来检查他的房间，翻一翻他的家底。

随后的两年中，他选择职业完全靠是否能提供在产业工人中进行政治活动的条件，而不考虑经济上或个人的原因。1925年9月21日，他去亚得里亚海岸的克拉列维察的一家造船厂

工作，在那里工作了一年，修理奥地利海军移交南斯拉夫政府前就已被毁坏了的鱼雷艇，还为政客斯托亚季诺维奇修建了一艘豪华的游艇。他的妻子波尔卡带着当时还在吃奶的男孩扎尔科来到这里，一家人住在一间房子里。他所属的党支部总共大概有十二个人，常在私人住宅里秘密地举行政治集会。他的工作此时已接受党领导，在工人中组织罢工活动。

他自己说，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最具体有效的办法就是协助筹办音乐和体育活动——数年来那地方始终没有有组织的工会活动。他去萨格勒布购了一把吉他，鼓励工人们到他家做客借书——高尔基的《母亲》、杰克伦敦的作品以及讲述社会主义的著作。这个时期与布罗兹见过面的另一个共产党员，职业是医生，名叫巴维尔·格里戈里奇，也在俄国呆过。他说布罗兹当时很年轻，五官端正，蓝眼睛，浅头发，举止庄重，仪表不俗，习惯于用简练的语言提出明确的问题。他被选为车间工会代表后，因为厂方拖欠工资已达七周之久，他毫不费力地鼓动起工人来。他给贝尔格莱德海军部和五金业工会写信，要他们支持工人的要求。罢工持续到第十天时，厂方终于妥协。不久，1926年10月3日，布罗兹被宣布任命为亢员。

党给他的下一个任务是离开他的故乡克罗地亚，去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梅德雷沃帕兰卡一家有七百多人的车辆配件铸造厂工作。这里的条件更加恶劣，厂方更难应付，更加难缠。这一次他就不那么顺利了。他依然是个小支部的成员，任务是建立一个工会支部，作为吸收新党员的基本组织，改善劳动条件的杠杆和扰乱工业的武器。布罗兹仍旧与贝尔格莱德的独立工会总部不断保持着联系，经常去总部的工人图书馆。他就是在那里首次会见了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一些党员，其中有朱腊

铁托传

伊·萨拉伊、久罗·贾科维奇。后者曾在俄国进行过培训，不久被共产国际提名为党的书记。当时布罗兹还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党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那时在贝尔格莱德有什么光华闪烁。

既然在工厂的工会活动中无法取得进展，他便在 1927 年 3 月 27 日为一家地方工会报纸《有组织的工人》写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在该文中，他抨击了厂方保留着一支数目庞大的劳动大军，以便随心所欲解雇不中意的人。他还攻击它付的薪水太低，却强制推行十六小时工作日，随意恫吓工人，肆意罚款，结果使三百工人中只有九十四人敢投票选举车间工会代表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志们，”他写道，“除依靠我们自身外别无出路。没有谁关心我们，一切社会立法全部是些废纸和空话。同志们，我们必须一齐参加工会组织去战斗，为反对贪婪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而积极行动起来。”文章发表十天后，他又一次被解雇。

在萨格勒布他还干过另外一个时间更短的工作，接着就成了萨格勒布共产党委员会委员和萨格勒布五金工会书记。从此，他再未重操过机械师这一老行当，在以后的生涯中一直是一个政治家，先后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布罗兹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决定性的转折点，虽然早在两年前已经将第一步迈出，可对他来说，造成势在必行的关键很可能还是此时。不久后他再次被捕。当他质问警察他犯什么罪时，警察答道：“布罗兹，许多乱子都有你的份，你的罪名能有一打。我们随时可以凭任何一条将你抓起来。”警方决定按著名共产党人处决他，这次逮捕就是按照所收到的关于一年前他在克拉列维察造船厂传播散发共产主义宣传品的情报而采取的行动。他在萨格勒布被

铁托传

捕，押往克拉列维察附近的巴卡尔，同其他六名被捕的造船厂工人关到一起。关了九天后，犯人们被转送到设在奥古林一座古堡里的县牢。他们被用铁链锁成一排，穿过街市押向火车站，最后一名是一个跛腿的同志，他一跌跤，其余的全被拽倒。铁托回忆道：“那种情景，真是耻辱，直到被塞进开往奥古林的火车，我们才松了口气。”在这期间，萨格勒布警局搜查了布罗兹的房间，查获一些书刊，如《失业》、《工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道义与阶级规范》——这些书书店里都公开销售，但警局却认为对工人来说这些都是可疑的证据。

布罗兹是在6月份被警局抓走的，但直到8月14日才在奥古林被登记为犯人，而且到10月中旬还没有开庭审理的迹象，于是他进行绝食。他说：“对现行的监狱制度我要强烈抗议。我被他们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从一个监狱扔进另一个监狱。吃的根本不是饭，而是完完全全的猪食。最主要的是法庭不审讯我，……通过绝食我要表明我们共产党员是怎样的人，我们正在进行什么性质的斗争。”

他绝食五天，一天天虚弱下去，但他还能小心地保持安静以保存体力。他后来说：“绝食的难关在第二天，你会感到饥饿难忍；但如果你能挺过这个关键时刻，你就会陷入一种轻度的恍惚状态，不再有那么难受的饥饿感。”第五天，一个地方法官来看他时，他还能言语。这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克罗地亚人，人称斯捷潘·巴卡里奇，后来他的儿子加入共产党，成了囚犯的终生益友。法官答应开审他的案件，并从自家厨房给极度虚弱的犯人送来了汤，并有感于他的聪明才智与坚强意志，在审讯后将他带回自己家中给他看自己所收集珍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还极力劝导布罗兹只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从事活动，但

铁托传

这一点毫无成效。

案件于 1927 年 10 月 28 日审理，布罗兹被宣布判处七个月徒刑，在上诉萨格勒高级法院期间暂时释放。后来减刑为五个月，但那时犯人已毫无踪影了。布罗兹离开奥古林时已成为一个比以前更加激昂并且更加有信心的共产党人。他这次以身试法而竟这样轻易脱身，使他对他所挑战的对手产生了一种不符合他本性的满不在乎、目中无人的心理。他重新负责工会组织工作，干劲倍增，决心益坚，一心一意要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

第四章 政治犯的经历

1928年在南斯拉夫国家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上，在约瑟普·布罗兹个人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斯捷潘·拉迪奇遭遇刺杀而身亡，这使得国王亚历山大的努力——使其集权主义宪法生效的种种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1920年强制通过维多夫丹宪法后，亚历山大国王紧接着费了数年工夫极力在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客之间策划一种变化不断的不稳固的联合以期稳定政府，但一切努力付诸流水。南斯拉夫国际关系的缓慢改观给了他帮助。小协约国于1921年成立，这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联合以对付匈牙利民族统一主义的保护性联邦。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和邻国的意大利，在二十年代陷入孤立状态；法国则极力表示愿意站出来做南斯拉夫的保护国，在1927年与它签订了一项友好协约。由于政府想方设法把贸易和工业搞了起来，尤其是在北部前奥匈帝国所在的地区，这就使经济状况也得以改善。

但就全国穷人来说，生活依旧举步维艰。失业率高，工资少得可怜，国家保护法的施行限制了工会的活动和一切政治活动，使原已糟糕不堪的工作条件日趋不容乐观。在工业界进行鼓动虽大有余地，但警察戒备森严，使之处在危险境地。

共产党是这个时期遭到严禁的惟一政党，但并非只有他们才在政治上反抗亲塞尔维亚的国王及其集权政府。国王与各反

铁托传

对党和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改善。在孚有众望的领袖斯捷潘·拉迪奇带领下的克罗地亚共和农民党，对这一政权一直痛恨之极，但茫然不知怎样与之抗衡才能有效。拉迪奇不断改变战略战术，试图削弱这一集权国家，但均以失败告终。1924年以前，克罗地亚农民党反对议会，也反对与极端反政府的种种集团进行没有任何作用的联系，其中包括被禁止的共产党，主张武力暴动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分子，号称“弗兰科夫齐”的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也含有一些较为温和的王权反对派。

1924年，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拉迪奇来到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加入共产主义农民国际的协约，指望为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自治宗旨赢得国际支持。他虽然对公众表示，“我们要与俄国并肩奋斗”，暗地里却表示感到失望。他对他的朋友马切克谈到：“共产党人不要朋友，只要奴仆。”

1928年6月20日，拉迪奇遇刺被杀时，他的亲布尔什维克政策主张已逐渐在失效。这种政策在克罗地亚难得人心，俄国援助又是迟迟不见踪影。他已放弃抵制政府，转而采纳在议会中进行反对的战术，并与前奥匈领土的塞尔维亚人结成联盟。他被刺杀的消息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地区那些反对政府的人们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8月8日，共农党议员离开议会，并在新领袖弗拉吉米尔·马切克带领下采取对政府不合作态度，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克罗地亚全境爆发了游行示威，以示对这次暗杀的抗议，其中多次以发生暴力冲突告终。人们因这次暗杀而怪罪政府，激烈地指责它任凭凶手逍遥法外。凶手于当日晚些时候自首，才被拘捕，但一年多没有审理。后来判处二十年徒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使总的形

势愈加严峻。这即是当时世界性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全欧总危机的局部。南斯拉夫政府在这种甚为严重的情况下仍旧丝毫没有对克罗地亚人或民主反对派作任何政治让步的意思，而又无力去完全控制住或消除普遍的不满。

这就是约瑟普·布罗兹在克罗地亚开始积极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时的背景。到了1928年，非法的共产党党员分别编进各地支部之中，已经初步建立起地下组织网。党员是一种危险的身份，这表现在党员人数的大幅度下降——从1920年拥有六万五千人到了1924年只剩下一千人。1925年又回增至二千三百人。这些党员绝非都是积极分子，他们主要在国内有限的工业发展地贝尔莱格德，萨格勒布附近地区内分布，以及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一些地区的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中。

共产党以两个前沿组织作掩护进行活动。一个是独立工人党，这是个寿命不长的组织，1923年成立，1924年即解体，因为它吸引了共产党员；另一个是政府不加禁止的独立工会。这个工会还得与其他工会，尤其是与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竞争。这些工会的政策方针与共产党的不相同，而且由于继承了“诏书”公布前的工会运动的资金，因而比较有实力。约瑟普·布罗兹的主张是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

这一阶段，不合法的共产党的费用来自共产国际。布罗兹后来发觉，依赖外国津贴度日是种种困难与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除工作人员的工资之外，还得提供出版传单和报纸所需经费；在警察迫害最残酷的时期，其中许多被迫拿到国外出版，常常是在维也纳。这被认为是最关键的政治工作，而且在非法情况下这种办法比开会更方便向秘密党员传播党的信息。布罗兹散发党的材料，非常活跃；传说有一次他甚至去了库姆罗维

铁托传

茨，从一辆轿车上散发传单。后来他使用许多笔名极其热心地为党的报纸撰写文稿。

最著名的被法律禁止的报纸之一《共产主义者》，首刊始创于1925年1月，仅仅出版了三期，其编辑、才华横溢的贝尔格莱德记者莫沙·皮雅杰便被逮捕并被粗野蛮横地判了二十年的刑，以儆效尤。他只坐牢十四年。但并没有怎么被这种威懾所征服，《锤子与镰刀》在维也纳印刷发行，1929年创办《青年共产党人》，其他全国性或地方性报纸刊物在不同时期相继大量涌现，其中以《工人战斗》最为有名，后来简称《战斗报》。它和《共产主义者》一样，如今又接着发行。

在缺乏经验、形形色色而又互不相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中组织秘密工作是极其困难的。警察睁大双眼，四处活动，导致全国的联系方式经常由于有人被捕而暴露和被切断。很难找到可以信赖的通讯联络员。口信有出错的可能，书信又充满危险，这就不断带来各式各样的问题。党既脆弱，只得日趋一日依赖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这时正在一心想把俄国以外的各个共产党集中控制起来，得以获取对它们的绝对权威。南斯拉夫党是最难集中控制的党之一，这就使它处于在共产国际俄国官员心目中最不受欢迎的位置。

关键的问题是缺乏统一，可是，那一时期的哪一个共产党是统一的呢？思考一下党的起源——各种各样的领土并入南斯拉夫，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它在“诏书”以前的短促的合法地位，以及非法存在的千辛万苦，南斯拉夫党的缺乏统一就毫不为怪了。拉德克这个俄国共产党员对于南斯拉夫党说过这样一句话：“和能够合法活动的党相比，非法的党更容易产生分歧，而更难以解决分歧。”党的领导人几乎在党

的政策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上都毫无办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苦苦争论：党在“诏书”发布后倒了台，应由谁来负责？党当时究竟应如何解决？特别是对民族问题，对组建南斯拉夫的各地区和各民族集团这个根本性的南斯拉夫所特有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党的路线方针？在所有这些争执中，都有两个主要的对立集团，于是形成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共产党一分为两派的格局。

要对这个时期中繁杂而混乱的争执作出令人满意的简明扼要的解释，完全不可能。大部分说法几乎都出自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而且几乎全都心怀私欲，势必将争执不已的领导人划分为右派和“左”派。早期的右派领导人是一个叫西马·马科维奇的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他们赞同南斯拉夫国家由一个中央政府领导的政治主张，认为民族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治理不妥；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政府，这些问题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或可以通过一部允许某种自治形式的令人满意的宪法加以解决。右派们对秘密工作持较谨慎态度，对武装暴动的效果表示怀疑，而热衷于遵循一条将导致取缔禁止共产党活动的立法的路线干下去。

“左”派分子则较偏激。他们接纳了地区分离及非法活动要求使用暴力等主张。双方在各地区都有跟随者。争论发展为私人仇恨，并被带进了党的议会和各种事务之中。他们竟向共产国际互相揭短，而当共产国际出面干涉时又拒绝接受它的裁决。约瑟普·布罗兹丝毫没有牵涉进这些早期的争论，算他幸运之极。那时，卷进去的人们能够幸存或在以后的岁月里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绝无仅有。当时推行由俄国定调的一条共产党法律：党务必是铁板一块，意见一致，在任何至关重要问题上

铁托传

的分歧意见，都不仅是对本国党的叛变，而且是对整个工人运动和这一运动的领袖俄罗斯的大逆不道。根据这条法规，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清理掉了。当时从未有任何人对这种专横武断近似蛮横的说法表示怀疑，它一直支配着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党的议会、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人们仍然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辩，常常情绪高涨、不怀善意。1928年以前，南斯拉夫共产党总共召开过三次主要的代表大会：第一次于1922年7月3日至17日在维也纳召开；第二次于1923年5月9日至12日，也是在维也纳召开；第三次于1924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三次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成员到场，他们看清了两个对立集团间争权夺势的情况。西马·马科维奇控制了第一次会议，想方设法使大会承认接受了他的“右派”观点。左派离开会场。那一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争论双方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在这里右派以退离会议为威胁，其领导人对肯认左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表示抗议。对此，共产国际的代表忽视布尔什维克历史上的先例而评价道：“这种宣布表明我们的同志与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的实质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还是我首次听到有代表声明如果会议作出有悖自己意见的决议，他便要退席。”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南斯拉夫党代表大会上，势力逐渐转入左派手中。当年，左派领导人之一塞尔维亚人特里察·卡茨莱罗维奇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入选执行委员会，并于1922年成为执行委员会书记。从这时起马科维奇开始失去优势，但他并不容易认输，更不会由此缄口不言。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在独立工会的官员中拥有为数可观的支持者。他在以共产党罪名入狱

的短时间内写了一本书，书名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民族问题》。在这本书里，斯大林的话作为一般性的理论被引用，同时论述了他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看法观点。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在俄国获得后来那种无比凶残的权力并滥加使用，可是西马·马科维奇勇于在 1925 年 3 月 30 日的一场公开论辩中，当着共产国际派遣前来调查南斯拉夫党分裂状况的委员会的面发言，对斯大林表示不满，这倒表现了一种很大的魅力。

斯大林已经是俄国至关重要的一位领导人，而马科维奇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个替补委员。勿需多言，斯大林的观点被采纳了。那就是必须允许各民族有权或退出或行使自治权而自愿在南斯拉夫留下来。这个南斯拉夫，斯大林断言，将是一个经历过一场“苏维埃”革命，而以后的问题是多数人口均属农民的南斯拉夫。“马科维奇的见解，”斯大林未卜先知地说，“意味着对于一些内在力量的低估。比方说，克罗地亚民族解放运动。”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争论却不会轻易得以解决。马科维奇一直未被说服，不承认自己有错，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他终于被开除党籍，回到了数学教员的本行，在俄国侨居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但却被斯大林清洗掉。他是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得到恢复身后名誉的南斯拉夫人之一。

南斯拉夫党的机器既被主要支持左派的人物所控制，而他们大多是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科维奇又已败落，党的主要活动便转向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这里距离贝尔格莱德的中央政府较远，非法活动的组织变得较为容易。这里也更接近国内的工业区，仍然被视为共产党吸取新党员的最佳地方。这

铁托传

就使约瑟普·布罗兹靠近党的工作的中心，使他无法避免地卷入争论，特别是有关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共产主义工会工作者对待罢工的策略的一些争吵之中。

作为经济衰败的结果，工人们变成多余的人。物价暴涨，工资冻结或减少，引发了许多工业部门中一系列自发的和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其中包括五金和皮革工业，它的工会组织者即是布罗兹。他自信这是共产党人对工人的“战斗激情”加以引导的时机。这是共产国际的主张，但党内有人加以否定，理由是警察力量正处强势，这样做会削弱党的力量。布罗兹则认为党内双方相互争斗，纯属浪费时间和精力，大家早就应该齐心协力组织罢工运动，充分利用“这些对工作，对加强工会组织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有利的条件了”。

1928年2月25日晚九时至26日早晨五时这个夜晚，在萨格勒布郊区一幢小私宅里召开的萨格勒布党代表会议上，终于激化了矛盾。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二人，此外，还有一名共产国际的代表。会前与人们进行积极联系的布罗兹是皮革和五金工会的代表。当党的书记作了一个态度暧昧的报告，对党的失败和党内分歧一笔带过时，布罗兹代表一部分人站起来发言，强烈要求将该报告撤销。“这个报告并非事实。”他说，并进一步对“派别活动”，不做实事，追求地位和阻碍党内工作的现象展开尖锐的批评。他要求萨格勒布党组织“立场一定要坚定”，要求致书共产国际批评“左”的和右的党派活动。他在这个时期为什么要向共产国际投诉？其动机让人寻味良久：完全是出于大公无私呢，还是希望引起莫斯科对他自己的注意？是否他已经有心要象许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到莫斯科去深造受训？对于有远大抱负的人们来说，在当时这是平步青云的惟一

捷径。

他的演讲和在代表中间的广泛接触发挥了作用。书记的报告被撤销，他参与起草的一封信被发往共产国际要求干涉。约瑟普·布罗兹被选举为萨格勒布共产党书记。如今，他成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官员。他的名字，即使只作为一个积极分子而没有其他的事，也已经在莫斯科留下了印象。4月份，共产国际发来一封严厉的“公开信”，责令各支部开展讨论，严厉驳斥了南斯拉夫党的“分裂主义”，表扬了布罗兹的极含战斗性的小组的做法。它还解散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提议任命一个新的领导小组，由当时正在莫斯科列宁主义学校受训的波斯尼亚籍克罗地亚人久罗·贾科维奇任组长。

布罗兹小组的方案符合当时共产国际正向各国共产党组织下达的新政策。新政策提倡激进行动，因为它认为资本主义正处在一个新阶段，它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认为敌人随时都可能重新对苏联发起战争，因此催促各国党尽一切力量削弱本国政府。

这时在克罗地亚散发的传单清晰地反映出党接到的新指示：转而对塞尔维亚专制独裁和资产阶级采取“公开战斗”。传单号召建立一个“工农苏维埃国家”，号召开展反对“残杀一切进步的革命人民的政府”的斗争。它们尽可能争取农民的支持，对不满现状而又不是共产党人的克罗地亚农民强调他们数千年在外国统治下的苦难，提起马季雅·古贝茨的境遇，提起在1920年他们所失去的能得到自由的机会，和他们目前在“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手中、在“沾满血腥的、罪恶的、非人道的政权”下所过的生活。

铁托传

作为当地党组织的书记，布罗兹必须寻找新的可靠的帮手，分担紧急进行的工作。“在培养新干部方面我们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他说，“这是一种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你的耐心一定要极大，深刻了解一个人，帮助他，多在意他的长处，而不是看他的不足之处。要鼓励他积极的方面，帮助他改正错误。要原谅他的教育和背景上的欠缺及他的私生活，不应只是苛求。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干部来。”

在传统的工人节日“五·一”，布罗兹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目的是显示工人运动的力量。他出席了在阿波罗影院举行的大会，大会的结局是工人与警察的一场混战。根据警方报告说，这原是一次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但因为布罗兹不断叫嚷，打乱会议进程，引起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一个当时在场的共产党员则说布罗兹是在试图帮助一个同志甩掉警察时而受到抓捕的。布罗兹被判处两星期的监禁。这次的警局记录是这样描述他的：深褐色头发，没有蓄须，直眉毛，蓝眼睛，脸型椭圆而瘦削，黑黑的皮肤；手长而窄，左手中指有伤痕；鼻无特征；口型无特征，已失落了数枚牙齿；胸围八十四厘米——就他当时的年纪来说还不算很宽，足以说明在这段生涯中他过度操劳，生活条件艰苦。记录还说他可以讲克罗地亚语、俄语、德语，并附有他写的“我是在阿波罗电影院被警察逮捕的”。他两周后获释，这可真幸运，因为他尚未服在奥古林被判处的徒刑。此后，他只得采取措施避免再一次被捕。他戴上了墨镜，蓄起了小胡子，随时改换装束，从不在一个地方接连几日过夜。后来他说过：“我经常带着一支左轮手枪。”他的家庭生活从此结束。

那年夏季，萨格勒布的气氛异常紧张，不但对于布罗兹，

铁托传

对别人也是如此。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抑已久的强烈的不满，造成了一种千钧一发的形势，看上去除共产党人之外，许多人都都处于采取暴力行动的边缘位置。6月28日拉迪奇被刺的消息已经传来，立即象一根导火索一样诱发了形势的爆炸，萨格勒布开始爆发骚乱。

警察开始加紧搜捕知名的煽动分子和共产党人。布罗兹有两次差一点被捕。一次是在工会总部，闯进来一个警察问道：“约瑟普·布罗兹在这儿吗？”布罗兹回答：“难道你没有看见他不在？”于是警察敬礼离去。另一次，他从办公室的窗户爬上屋顶，跳到庭院里的一张桌子上，当时一楼的饭馆老板正在桌上切肉，肉沫横飞，布罗兹却侥幸得以脱逃。第三次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28年8月4日将近午夜，一个认识他的警局密探在街上招呼他，说有些同志在他临时休息的屋子里等他。谁知道等在那里的是警察，这一次实实在在地抓住了他。

布罗兹想办法从监狱里传出一张纸条来，向党报告发生的事情，上面写道：

8月4日星期六半夜十二点，我正要上床休息，就被捕了。警察挥舞着武器，从后面来牢牢抓住我，使我无法动弹。星期六中午，他们已经在该处逮捕了一个人，搜出二十六本书包括《卡尔·马克思》、《萨格勒布共产党公报》、《共产党宣言》；九本《列宁主义》以及一支军用左轮、四颗手榴弹和若干弹药。他们说这些都是我的东西。我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还不允许医生给我治疗。我从8月4日起进行绝食，身体十分虚弱。其他人也惨遭毒打，没有人敢从外边给我们送食物。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一些纸

铁托传

条，威胁要枪毙我，还说要把我送到骇人听闻的贝尔格莱德的格拉沃尼亚察。我宁死也不……望另外筹划。M. 说他尽力去做。再见吧，同志们！我虚弱至极，即将无法支撑下去……

这张纸条终于被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通过一个南斯拉夫官员朱兰·高尔吉奇审核批准，略作改动后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刊登出来，文章题目是《地狱般的南斯拉夫监狱里传出的呼声》。

数年后，布罗兹说他在萨格勒布监狱里并没受残酷的刑法。但却被放在强光之下，不许睡觉，强迫招供。他拒绝开口，头部、臂膀、胸部经常挨揍。有一次，他说道：“在那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吐血。”他又在另外一次补充说：“其实这也没啥——谈不上什么拷打。”

作为萨格勒布共产党的书记，布罗兹一直按共产国际督促共产党人采取武装行动反对本国政府的指示精神行事。尽管当时他不承认在他屋子里搜出的手榴弹属于他，但后来还是承认，“它们的确就是我的。”

警察认真地准备了起诉材料，他们深信目前所对付的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人。那些记录至今还保留着：在布罗兹住所搜得的物品清单所列的除书籍外，还有付款单、工会图章、小数额款项收据，都是付书款和各种人物报销路费的单据，其中有一张是一个被捕者的妻子收到的二百第纳尔，还有一张条子是用奇怪的数字写的，布罗兹拒绝解释。另有一个笔记本，里面有布罗兹一次政治演讲的亲笔提纲。小标题都分别标上序号，说明他所要谈到的内容很广博，既包括国内问题又有国际事

务。

在关于铁托一生的正式记载中，约瑟普·布罗兹被捕后的审讯过程写得有几分很像模式化的英雄传。这一案件并没有轰动一时，也未被当作国际新闻，但其戏剧性却足够地方报纸大加报道宣传。这在共产党人中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并引起了共产国际高层当权人物对布罗兹的注意力。毫无疑问正合他的本意。

根据国家保护法提起诉讼的犯人一共六名。1928年11月6日他们被带到萨格勒布地方法院，由五名法官开审。约瑟普·布罗兹案在审讯的第二天上午十一时开庭。一家地方报纸《消息报》报道，法庭上人多的水泄不通。

学生和青年工人对这次审讯特别关心，他们挤进法庭，搞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些留着弯曲长头发的小伙子和头发剪得很短的年轻姑娘，可能是新福音的信徒，也可能是被告的朋友。……这一伙奇怪的听众很认真，耐心地听着，一字不漏；被告每说一句幽默的话，他们就哄堂大笑……

《消息报》记者写道：“无疑被告约瑟普·布罗兹是该次审讯中最引人注意的对象；他的脸使人联想到钢铁。”报上还附了一幅犯人在法庭上的素描当作插图。

他眼镜片后边冷冷地闪烁着两只淡灰色眼睛，机警而沉着。对他来说，他在法庭上的态度可能并不只是装腔作势，因为在这以前他已因政治信仰而被起诉过并曾多次坐

铁托传

牛。在场的很多人都有感于他维护自己观点时的顽强态度，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的辩白，非常地安静。

两年以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有一项决定，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没有利用审讯所提供的机会将党的主张宣传出来，看来约瑟普·布罗兹深深记住了这一教训，充分利用了本次公开审讯进行宣传。这是他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下登上讲台，他抓住这次机会，表现出锋芒毕露的口才，在他后期的生涯中这种才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项庄严的政治声明。当问他是否服罪时，他答道：

虽然我承认检察官起诉书中所起诉的罪名，但我并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因为这个资产阶级法庭的权力我并不承认。我认为我只对自己忠诚的党尽责任。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我承认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过共产主义理论，承认在公开的会议上和在私人交谈时我都说过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些会议是在何地召开的。自从1921年党被禁止、被认为非法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他更进一步抨击了警察对他个人和其他被告的野蛮行为并极力为其他被告开脱罪名。他说他对臭名远扬的国家保护法不感兴趣，虽然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与它相抵触。“这只是一项暂时的法律，”他坚决地说，“这是一个阶级用来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删除的法律。”检察官指控他无事生非诬告警察是为了把自己扮演成殉道者，从而“从莫斯科

领取赏钱”。对此布罗兹回答道，他个人并不因为畏惧而不敢发言，因为他知道，说与不说都将被处以长期徒刑；其他被告不敢坦露真情，是希望由此获得宽恕性的处理。

9月9日进入最后的辩论发言，布罗兹谢绝了辩护律师的帮画，亲自辩解。他从自己的身世说起，说明他如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法官阻止他讲下去，演讲没有完成，也没有记录下来，但其要旨肯定收集在他对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和别的人所写的他早期生活的文字资料中。当法官打断他的演说时，布罗兹转向审判庭，高呼：“这就确实表明这是一个警察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苏维埃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11月14日法庭对被告进行宣判：两名释放，两名判两年徒刑，一名判三年，约瑟普·布罗兹被判五年徒刑。他戴着手铐被带走时，仍一路不停地高呼共产主义的口号。

显而易见，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加重了对他的判决，但他为何那样蛮干，那样公开挑衅呢？这个问题倒是耐人寻味。答案很复杂，包含着有意识的和下意识的动机，也包含着本能的反应，很难说有多少是由于野心。他刚刚在党内获得要职，长期坐牢后能不能再回到主要的职位上来就难以预计了。这个时期他在政治上还很幼稚，对于国家怎样行使权力没有经验，可能还具有自我表现心理，接受了共产主义宣传，相信这个世界除了光明就是黑暗，非善即恶。象两年前对巴卡里奇法官那样，他照样又在法庭上对法官讲：“我准备接受磨难，还有人得准备为之牺牲。”很可能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全部想法；在后来的年月里他对这段故事所作的非常英勇的解释只是想法的一面——也许是真实的一面。“我们应向党表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足以骄傲和光荣的，党值得党员对它忠诚和献身，为它

铁托传

坐牢我觉得值。我们决不向资产阶级屈膝或假装尊重法庭和警察以求解脱。”他以后关于自己在这时期的态度，又做过另一番解释，看来也一样地真实——这段话说明他已受到一种强烈的愿望的驱使。“我是以一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对待整个问题的。我打算推翻他们的政府。他们抓到我就要关押，这是很自然的事。我要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做。说真的，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时，也真有心这样干。”

当时布罗兹不可能知道这一长期徒刑将产生怎样的结果。但事实上，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徒刑挽救了他一命，使他免遭 1929 - 1932 年期间南斯拉夫国内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残酷的，某些情况下是致命的政策之苦，也免除了三十年代斯大林对在俄国的包括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员所施行的更加歹毒的大清洗。

他的五年牢狱生活是在两个监狱里度过的——首先是 1929 年 1 月至 1931 年 6 月在扎果烈边境的莱波格拉瓦监狱；然后直到 1933 年 11 月被关在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监狱。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受教育的时期，从“教育”这个词的每一种含义上来讲都非常恰当。“监狱对许多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真是一所大学，……我最大限度地珍惜坐牢的时间，……在这里我受益匪浅。”“这真如同上大学一样”，后来他在讲到他在这两所监狱里所参加的共产主义学习班时曾经这样说过。这种说法也可能稍微有一点想入非非，但这一定是他一生中有充分的空闲进行阅读的最长一段时间，而且，尽管有各种限制，他还是能够找得到许多要看的书。

从在莱波格拉瓦拍的一张相片来看，他的同狱犯人鱼龙混杂。但他是政治犯，多数时间与刑事犯分开，所以在两年监狱

里都能找到在政治方面既受过教育又有爱好的人们，扩大他那时到那时为止一直处于急剧需求的知识生活。但他那时正与各种人物相处，缺乏人性的监狱生活，使最多变的人类情绪与性格更加复杂尖锐地彼此作用。在这方面，这对他后期的生活是一种比任何学术性大学价值更珍贵的教育。这也属于一种政治教育，因为狱中的犯人之间仍继续存在矛盾，虽然他日后关于狱中生活的浪漫回忆中不常提到这些事。他有两个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那就是在这两处囚牢里刚开始的几周：极差的伙食令人作呕，萝卜甜菜汤又稀又酸，面包粗劣，豆汤里“根本没有一两粒豆子”，一周供应两次牛肉，一次一小片；几乎没有体育活动，二十四小时中差不多有二十三个小时蹲在一间小房子里。他在莱波格拉瓦的第一件令人烦恼的强迫劳动就是洗零乱的鹅毛；而在马里博尔单独监狱的头几周中甚至没有这点消遣。在这种时期人需要特别的自我抑制才能避免精神上 and 心灵上的堕落。布罗兹很坚强，得以安全地度过。他在两所监狱里都因为拥有机械师的技术而被安排负责监狱里的电气系统，得以摆脱这种劳累的折磨。

在布罗兹之后一年，党内出色的知识分子莫沙·皮雅杰转到了莱波格拉瓦监狱。他自1926年起一直被囚禁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米特罗维察政治犯监狱，二十年徒刑已服满了四分之一。他和布罗兹一见如故，成了永远的好朋友。在许多方面两人有差异，但对共产主义的献身却一样的狂热。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关系更加牢固。皮雅杰是西班牙犹太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曾经在巴黎和维也纳接受教育。他的文化知识丰富渊博，布罗兹对此很羡慕，并感到在一个划分阶级的社会里，由于自己出身低微而无缘涉及是很不公平的。布罗兹则

铁托传

具有对皮雅杰来说是难以攀附的工农出身。在党内，知识分子并不受重视，虽然为党的最高层提供了很多人才。理论上讲，工人阶级是精华，但在南斯拉夫，他们之中却没有多少人能够接收。1928年11月在德累斯顿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陶里亚蒂曾提出警告说：“知识分子很容易被他们所出身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这就是他们在关键时刻为什么总是犹疑不定的原因。他们必须有自知之明。他们必须改造自我，来适应工人阶级，必须服从工人阶级。他们不能领导工人阶级而把其他阶级的影响带进它的队伍。”皮雅杰的确有自知之明，他变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幕后参谋”。“我能遇见一个数年来难得一遇的一流的工人革命家，感到非常兴奋，”日后他谈到第一次与布罗兹相识时这样说过，并补充说布罗兹“很乐于和其他人交换交换意见”。

皮雅杰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布罗兹永远无法比及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两个人都富有强烈的幽默感，皮雅杰同样思维敏锐，言辞锋利。他仰慕布罗兹的实际工作和广泛交际的本领，这都是在党内进行领导和在狱中不可缺少的本事。皮雅杰比布罗兹大两岁，朋友俩站在一起，皮雅杰身高五英尺，而布罗兹高他约八英寸，真是很不相称。莫沙·皮雅杰也许是对布罗兹的政治生涯影响最大的人物，尽管他在以后的岁月里从来没有谈到他对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性格的形成起过这种作用。而布罗兹本人说到一切密切的私人交情时习惯沉默寡言，对此只表示过这是一种深厚的亲密的关系，只是这些而已。

布罗兹选择了皮雅杰做管理监狱电站的助手。这个阶段，政治犯已通过威胁要绝食和绝食从当局争得相当大的让步。监

铁托传

狱里旧有的那部分犯人相对来说已经自由一些。他们住一间大宿舍，有一个委员会负责解决全部事务，皮雅杰和布罗兹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布罗兹负责管理供电，可以在监狱里四处走动，甚至有时可到狱外去。后来他说过如果他有心逃跑，完全可以逃掉。他没有这样做是很明智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对多数共产党员来说，在外边要比在里头更加糟糕。

委员会为监狱里的许多青年党员和党的同情者适时建立了类型各异的学习班，既学习共产主义的实践、理论和历史，也学习阅读和写作。这些学习班都利用下午和黄昏犯人们的闲余时间进行。参加者要求遵守纪律；每周他们都有教课、学习和观察其他犯人的任务，并要随时向委员会报告。他们与狱外的朋友们和党组织联络上，以便取得图书和其他生活用品。布罗兹作出安排，在监狱外一家餐馆的楼上与联系人接头，以前他结识的那位医生巴维尔·格里戈里奇就是其中的一个联系人。后来这位医生回忆说有一次他去与布罗兹相会，在楼上等了五六十分钟。接着，通过窗户，他看到布罗兹被四个看守押着跨过大街走了过来。当布罗兹锁上房门办理事务时，看守就在楼下等。通过这种方式同布罗兹接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女校长在当交通员。

有个逃跑的犯人被抓了回来，检举了共产党人的活动，这种舒舒服服的安排就忽然间结束。在1931年6月布罗兹和其他四个犯人被送往管制更加严酷的马里博尔监狱。后来，皮雅杰又被送回斯雷姆—米特罗维察，在那里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直到1939年才被释放。

在马里博尔监狱里，布罗兹认识了另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名叫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他蹲监狱是因为参加

铁托传

了一个恐怖组织的缘故，1921年前内务大臣德拉斯科维奇被刺杀，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所为。前几个星期情况很艰难，但这之后他们还是把这里的政治犯有条理地组织了起来，尽管生活条件依旧艰苦——伙食糟糕，没有灯，没有取暖设备，臭虫遍地。乔拉科维奇谈起这个时期的布罗兹时，说他面无血色，形容消瘦，穿着一身囚衣，活象个苦行僧。还说他不定期笑出声，但一笑就很豪放。有一张布罗兹在马里博尔拍的不是很正规的囚照，没有戴以前那些照片上戴的那副破旧不堪的铁框眼镜，而是戴着夹鼻眼镜，显露出他的苦行与超脱。看来他还是非常完美地扮演着命运在他所选择的领域内为他选定的角色。但他一定也时而放松一下。乔拉科维奇讲述了一些愉快的夜晚：他们围坐在一只费尽心思弄到的旧铁火炉四周，四个人共同吸一支香烟，自称为“资产阶级”；还有些礼拜天，布罗兹大谈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犯人们引以为荣的话题；还有些夜晚他们举办音乐会，先唱国际歌，然后唱革命歌曲，最后就唱起小调来，开始声音还比较柔和委婉，后来就大声合唱，直到警察赶来干涉他们。

在这里他们也继续办政治学习班。犯人的劳动是做纸袋。他们进行流水作业，省下的材料和时间用来裱糊、改装和装订马克思、恩格斯、希法亭、罗莎·卢森堡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共产主义作家的书籍。此外，布罗兹还有他自己的阅读书目，包括心理学、哲学以及历史书籍，继续着他的学习经历。

1933年11月他刑满时被通知，他还得补服1927年被判徒刑的剩下的时间。狱外联系人——他的老友大特洛伊斯特沃人斯提沃·萨比奇这期间在一个专门援助救济在押共产党员的组

铁托传

织“红色援助会”工作，给他提供了一笔钱。他离开马里博尔前定做了一套新衣，买了一双好鞋，被带往奥古林去坐剩余的最后三个半月牢。

铁托传

第二部分
逍遥法外的
共产党员

铁托传

第五章 逍遥法外的地下党员

1934年3月12日，约瑟普在他的四十二岁生日前夕出狱。他更成熟，斗争经验更丰富了，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比以往更坚定了。后来他说，他的信念的力量压倒了一切，甚至使他无法抗拒。现在的他已远不像1928年时那么莽撞，对他所反抗的国家政权已经更加熟悉。他不再相信革命的迅速降临，可是却准备为实现革命贡献一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他走出阴森的、有圆顶塔楼的奥古林城堡监牢时，仍然不是特别的自由。有一个看守监视他到当地警察所报到，警察所警告他，不得在萨格勒布或其他任何城镇居住，只能回故乡去，并且每天要向警察当局报告，并汇报自己的情况。关于被释放了后如何行动，他事先已做了安排。他通过用写暗语便条的方法和奥古林监狱中对共产主义同情的其他囚犯保持着联系，曾把在萨格勒布他的姨母的家庭地址告诉其中一个名叫尼古拉·齐卡拉的人，便于日后联系。他那儿没有家眷，党已在1929年将他的妻儿安全护送往莫斯科。但他更想看看自己的老家，于是动身前往库姆罗维茨。

他在莱波格拉瓦定做了一套新装——衣服、鞋子、相配的领带，这使他在村里出现时相当体面。这次回乡并未给他带来多少欢乐，因为哥哥德腊古廷刚离开人世，嫂子还在服丧。村里的朋友们见到他尽管很高兴，并且颇为佩服他胆敢反抗官

铁托传

府，但却不愿和一个政治反叛者有什么瓜葛。他向乡主席进行报到，这是一位他在上学期间的学友，与附近镇上的那些警察相比当然好对付了。铁托后来叙述的情况，与这位名叫约瑟普·朱拉克的主席所讲的虽然不太一样，但两人都说到，关起门来后，朱拉克便对他受审时的精彩表现表示祝贺，同时“用眨眼睛的办法”向他表明用不着每月都去报到。

他在库姆罗维茨只滞留了几天——这段时间已足够使他习惯于新鲜、自由的空气、正常的饮食和正常的社交，但也使他受够了村里牧师的斥责：“反基督分子”。他到苏特拉河对岸的斯洛文尼亚看望亲戚，童年时期他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在监狱里时他曾偷偷藏了一箱书刊，三月底前，他把它运到萨格勒布的姨母家，藏在天花板上了。这些书刊里有好几本1933年的《文化》，1932年的《文学》，几期《作家》和《信号报》，以及几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些书全在第二年被警察当局根据一个第二次被捕的囚犯的口供发现了。4月份，他去萨莫博尔看望了妹妹，接着便去了萨格勒布。

他从村里消失后，警方马上发出了拘捕令。但这时约瑟普·布罗兹已经消声匿迹了。他决心转入“地下”，为了改变自己的模样，他已染发蓄须，戴上一付金丝边眼镜。用眼镜来化妆，对他来说并不是个新办法。除了1928年警察当局给他拍的一张照片外，在现有的全部的约瑟普·布罗兹作为犯人受审时拍下的照片以及他在狱里服刑时拍下的几张快照上，他都戴着不同样式的制作粗劣的眼镜。有一张照片上他戴着一副一般只有中产阶级人士才戴的夹鼻眼镜，这彻底改变了他的外表。对这个正受警方通缉的人来说，戴眼镜是否有某种心理作用呢？他视力很好，而且他不戴眼镜的外貌也乔扮得不错，这从

他那些假护照上的某些照片不难看出。眼镜尽管在提高视力方面没有多大用处，但在实际上是有用处的；因为有了眼镜，他就可以避免直勾勾地看人——对于怕被人认出的人来说，这是最具有危险性的。此外，他还剃光胡须，穿上比较讲究的服饰，改变了头发的颜色，同时由于饮食水平的提高，他那苍白的脸上逐渐显出了红润之色，这一切使得他的整个外貌变化更显著了。

假如说，1934年铁托与萨格勒布党组织重新联系上时已是一个变化了的人，那么，他的周围，包括共产党在内，也已不同以前了。1929年1月6日起，亚历山大国王实行个人独裁，不仅严禁全国各地有组织的反抗活动，而且取缔了独立工会、一切政党，以及许多会社和期刊。国家安全法为警察部门赋予广泛的法律权力去拘捕政治嫌疑犯，并允许他们自由行动，可以消灭对国王政策有反对嫌疑的人。拉迪奇死后接任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的马切克以及他的众多的拥护者都坐过大牢，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也有这样的经历。反对国王的塞尔维亚著名政治家斯维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以及其他的一些民主主义者则被迫四处流亡。

警察对共产党采取的镇压手段特别凶残。共产党有异于克罗地亚农民党，并不具备民众运动所享有的那种广泛性的群众支持。但它仍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那样的情形，是在全国上下都有人拥护的惟一政党。它不仅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有自己的党员，在塞尔维亚也有党员分布。

亚历山大实行独裁统治的时期正碰上全世界经济大滑波。

铁托传

南斯拉夫本来已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这次萧条的经济对它更是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当布罗兹在牢里，每天最起码肯定能得到最少量的免费食物的时候，南斯拉夫人民正遭遇着一次最严重的困难经济。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十七，薪资却下降了。有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四十的工人失业，其中大约只有一半能拿到失业保险金。罢工和失业大军的存在就是搞政治阴谋的说法，使工业部门的雇佣条件更加恶劣。农村里，农民向国内市场卖粮食获极低，而又不能出售谷物以供出口。他们只得以不近情理的高价购买需要的一切工业品——肥料、农具、家用器皿、燃油和食盐。借款很难，而且利息太高。在情况最糟的几年里，在那些生活艰难、土地贫瘠的地区，如克罗地亚利卡的不毛之地的水蚀石灰岩地区，以及门的内哥罗寸草不生的山区，据说农民欠下的利息竟有每年收入的四倍。情况无法忍受，然而却必须忍受。城镇遍地是行乞的，大小村庄里住着的妇孺老幼，疾病缠身，骨瘦如柴，饿得半死不活。由于政治经济局势太糟糕，从1929—1932年人们意志消沉，无心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这几年里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也情形不妙。除国内困难外，国王亚历山大还必须面对敌对邻国难以化解的仇恨。南斯拉夫国家成立时曾被迫割地的国家仍想报仇雪恨，收回割让的土地。墨索里尼这时已在意大利立足，并在欧洲得到承认；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也已在德国控制政权。墨索里尼的扩张政策，以及希特勒篡改凡尔赛条约的企图使得南斯拉夫的地位比二十年代更加形势危急。如果奥地利在斯洛文尼亚和卡林西亚的领土要求，意大利在达尔马提亚的领土要求，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梅托希亚的领土要求，匈牙利在克罗地亚的领土要求，加

上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领土要求全都被满足，南斯拉夫国家就将消失了。

亚历山大打算制定一项既能使他获得强大的朋友和盟国，又能抵制敌国联合的政策。但到 1930 年时很难以在列强中找到这样的盟国。经济危机已逼得英国像美国那样采取退而不插手欧洲事务的政策。俄国本来是南部斯拉夫人的传统支持者。现在已成为苏联，成为一个反对亚历山大的统治、而且肯定也得不到他的承认的国家，因为他仍然热烈赞成沙皇制度。国际联盟还未发展成为一个有足够力量保护弱小国家的国际组织。只有二十年代结交的盟国法国是仅有的可能有用的强国。从 1930 年到 1934 年，亚历山大国王试图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但这点却无法成功，因为法国需要一个反对德国的盟国，为此正在和意大利拉近乎；而南斯拉夫却需要一个首先反对意大利的盟国，这两种立场水火不容。因此到 1934 年，亚历山大国王只和法国签订一个友好亲善条约——并非军事同盟；又和同样受到提出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匈牙利威胁的罗马尼亚及捷克斯洛伐克结成了小协约同盟。

在 1929—1934 年间南斯拉夫共产党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布罗兹坐牢以前共产国际所要求执行的却害得他蹲监狱的部分原因——武装起义政策还是持续了一段时期。这种政策使共产党在与警察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丧失了一些党员，并使人们害怕加入共产党，虽然这时大的趋势本来可能使人们寄希望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上。

1928 年 11 月初，在德累斯顿召开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南共党员有三十二名。共产国际

铁托传

一直希望结束南共党内的矛盾，这次派来了一个阵容齐整的代表团。西马·马科维奇再一次倔强地辩护自己的观点。但现在共产国际的大队人马都反对他了。他受到多数代表的谴责，尤其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团中的意大利共产党人陶里亚蒂在一篇长篇发言中的批评。马科维奇象征性地表示同意服从，但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因而次年被开除党籍。在共产国际官员们强大的施压下，选出了一个新的组织书记，这就是不久前曾在莫斯科一个训练班受训过的久罗·贾科维奇。

仅在几个月后，由于警察开始加强了搜捕活动，贾科维奇于1929年4月在克罗地亚落入了魔爪，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国际红色援助会的一个官员。他们两人先后遇难了，据说是因为试图劫狱。接着还抓进了另一些人。据铁托说，“有一千多名党员被警方秘密抓捕，其中有数十名被杀死了。”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秘密跑到外国，在其他地方和维也纳与流亡国外的中央委员会碰头会面。党已经土崩瓦解了，只有个人和少数小组还设法互相保持着联系。有些传单仍在流传，其中大部份纸张高级，字体漂亮，显然是在国外印刷的。但它们的内在主要含义和以前一样虚幻缥缈，仍然主张武装起义和极端政策，极力反对南斯拉夫，鼓吹分裂这个国家。有一张传单这样写道：

不要还债，不要纳税；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的、斯洛文尼亚的、马其顿的和门的内哥罗的工农自治共和国万岁；苏维埃巴尔干各国万岁；巴尔干工农共和国联邦万岁；打倒法西斯专政；打倒君主制度；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共产国际万岁。

铁托传

许多年后，铁托责备过这些领导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做出不负责任的愚蠢决定，使得本已屈指可数的青年团员和党员遭到大屠杀。他们昂首入狱、英勇就义，为了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荣誉称号，还不是想服从党的纪律而洒热血、抛头颅。”

到1932年，警察当局的恐怖行为略微减少，已经能够做出努力重新开展党的活动，许多逃到外国的领导人仍害怕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命令，1932年任命了米兰·高尔吉奇，即铁托后来的政治领导人，其原名叫约瑟普·齐任斯基，出生于一个以前属奥地利帝国波兰部分的乌克兰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的父亲曾经在波斯尼亚任奥地利政府官员，他就在这里茁壮成长。还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激进政治组织“姆拉达波斯纳”中的活跃人物、先进成员。战后他成为共产党员，1923年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那里他受到共产国际官员的赏识，被邀请到莫斯科的共产青年国际组织工作。他精通塞尔维亚语和德语，后来又学会了俄语、英语和法语。他和一个名叫贝蒂·格兰的俄国姑娘喜结良缘，她是莫斯科文化休息公园主任。

他在共产国际中飞黄腾达，逐渐被认为是南斯拉夫事务专家。他在1924年—1926年间的一段时间曾被任命为英国共产党顾问。他被派到南威尔士，在失业工人群体中开展党的活动；旅途中他用一张假护照，又用高贵亮丽的衣服作伪装。他被安排在一个矿工家中，看到这家极穷，他一直没有胆量取出丝质睡衣。1927年他回到莫斯科，被调任为南共中央委员。

铁托传

第二年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政治局。四年后他有幸成为总书记时，年龄不过二十八岁。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对他很好，其中布哈林和马努伊尔斯基两人是他的朋友。但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却有点讨厌他，部分原因是他不是南斯拉夫人，还有部分原因是他几乎不去南斯拉夫，因而给人一种印象：他对南斯拉夫一概不知。一个在维也纳认识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他是个大胖子，已经长胖了许多，长着一头淡茶色漂亮的头发，眼睛淡黄，脸上有少许的雀斑。他穿着花呢料服，棕色靴子，看起来象个大富翁，也就是中欧人眼中的“典型英国绅士”。他在有些地方是一个讨人喜欢、通情达理、容易相处的人，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党出了许多毛病，以致他的同事们开始不信任他。人们认为他不过表面聪明，并不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有搞阴谋诡计和玩弄花招的本领，这就使他能在共产国际的阶级斗争中一路顺风。

然而在1932年，他希望倍至。他得到大量事业经费，共产国际又给他指示，要求采取更加有用的措施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重新站立起来。据那时的消息，一些分散的党小组已在南斯拉夫某些地区开始恢复以前的行动。高尔吉奇必须想尽一切方法同这些小组取得联系，把它们重新组织成一个党。他被命令在各地建立党委会，召开党代表大会。虽然这时还继续保留着武装起义政策，但新的计划是通过合法组织和那些允许合法存在的团体展开党的活动，前者有像独立工会那样未曾受到取缔的民主工会，后者如体育、音乐和戏剧俱乐部。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人民阵线的政策的最早形态。

国内党员人数不是很多——克罗地亚有四百人，斯洛文尼亚有三百人，门的内哥罗有一百五十人。塞尔维亚党员人数现

铁托传

在还不十分清楚，因为那里还有很多人支持西马·马科维奇，正进行反对新的组织体系的活动。1932年，上述党员数目更加少了，主要是由于在此时南斯拉夫警察当局截获了很多情报，又抓获了許多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不过在一些早先被捕的较为杰出的共产党员服刑期满出狱后重新工作，情况有所转机。

这就是1934年初约瑟普·布罗兹从监狱释放时的大致情形。通过一个供应共产党人明令禁止出售书刊的小书商斯提凡·加罗加扎，党的干部和他重新有了联系。有关他刚出狱时的政治地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铁托曾对戴迪耶尔说：“当年我在萨格勒布开始工作时，同志们推举我当克罗地亚党的省委员会的委员。”另一种说法是，这只是旧职新任，因为他在1928年被捕时就已经入选了。他和铁托的早期传记作者提及他出狱初期的活动时很少讲话，但从一个1935年被捕的共产党员给警察当局的长篇供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更为真实的情况和布罗兹开始进行工作的方法。此人原来的名字为弗朗约·克拉里，他讲了布罗兹如何于1934年7月与他取得联系，要求他为党工作，给他报酬。虽然他当时失业，全家挨饿，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拒绝了。八天后布罗兹再次会见他，答应每月补助他六百第纳尔。克拉里因此同意了，开始和布罗兹以及勃列佐维奇共同工作。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勃列佐维奇与各地方党委会联络，克拉里则在各工会团体工作，而布罗兹则是书记兼“技术部”的联络员。“技术部”是党组织联络站的一个外在幌子，为非法活动提供金钱、官方证件和护照。克拉里说，从1934年7月至10月他

铁托传

曾和布罗兹碰过几次头，后来给他换了一个联系人。这是一个妇女，他不知道其姓名，“约二十八岁，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皮肤欺霜赛雪，金发碧眼，很美丽。”她继续给他钱，11月份多付了四百第纳尔，作为一笔特殊的花费。1935年2月，在把克拉里介绍给另外一个姓名不知的联系人后，她也不知去向。这是一个男人，“个子很高，苍白的长长的脸，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这个人给了他一个用密码写的地址，用它可以和卡尔洛瓦茨联络，但克拉里说他搞丢了密码索引。他于这年12月入狱，不过布罗兹管理的是一个只有三人的小组，这就表示他能给警方提供的情况非常的少。

现有一些从别的地方获取的消息，说明布罗兹出狱后不久就成了一个党的积极的组织工作者，并获得了开展工作的经济援助，克拉里的供词证明了这一点。各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1934年萨格勒布党组织境况很差，不容易和维也纳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因为“警察抓住了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使者，……有人甚至建议应该马上切断与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渴望工作、满怀信心的布罗兹必然被当作上帝赐予他们的救星。萨格勒布党组织决定派他去维也纳，“看一看形势如何，是否能够同中央委员会一起开展工作。”行前他给萨格勒布大学的一个党小组写了一篇关于评论法西斯主义的檄文，又在斯洛文尼亚暂停了一小段时间。6月初他在卢布尔雅那因为有事又停了下来，住在共产党员鲍利斯·齐赫尔利的私人住宅里。现在人们提到这时的布罗兹，都称他为党派来的“指导员”。这期间大家都叫他“鲁迪同志”。他行动非常的小心，但偶尔也和当地的共产党员接触、碰头，其中一次他见面的就是后来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中变为核心人物的谢尔盖·克赖格尔。布罗

铁托传

兹在这次会见中穿戴很整齐，戴着金边眼镜。他一面进行安排好的活动，一面等待维也纳的指示。他收到的指示是用密码写成的，必须借助于几份党报——《无产者》报才能看懂。

他决定假扮为一名斯洛文尼亚登山运动协会会员来跨越南奥边境，他们被批准允许登阿尔卑斯山探险，并可进入奥地利境内有限的地方。由于他会说斯洛文尼亚语，这个办法当然比过去经常容易被警察认出来的假证件安全。布罗兹虽然体格健壮，但不熟悉山路，不知从哪里进入奥地利才能躲过边防人员，因而他雇佣了当地一个靠偷带人员货物过境为生的人当向导。此次行动花费了他一个晚上，结果显示不但艰苦，而且一点儿也不安全，因为向导喝醉了酒，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不仅硬索走比原定的三百第纳尔多一倍的钱，而且未到达边界就独自先行离开了。他只好独自寻路。当他蹒跚地走完石坡时，裤子也撕破了。比较幸运的是，他一下来就到了边界上奥地利旁边的一个小村，村里住着斯洛文尼亚人。

即使如此，他于1934年7月25日到达时也并非风平浪静。他躲在一所干草棚里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向村里走去，准备坐火车去维也纳，却被身佩“卍”字徽章的亲纳粹的奥地利武装青年拦住了。就在同一天，陶尔斐斯在维也纳遭到暗杀不治身亡。布罗兹那一身度假游客的装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使他得以顺利地逃跑，在克拉根福坐上火车去维也纳。

在维也纳接头的党的秘密联络员是一个芭蕾舞学员，是萨格勒布一位医生的女儿。她给他安排了住处，又帮他和中央委员会联系。中央委员们很高兴见到他，因为他们非常想知道有关南斯拉夫局势，以便向莫斯科报告。他们“像蜜蜂见到蜜一样”向他直奔而来。他能言善辩，熟悉情况，工作努力，足智

铁托传

多谋，勇敢、驯顺，出身工农，又经历过牢狱锻炼，看来正是为革命组织工作的理想人物。这一时期在维也纳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显示，他参加了8月10日、11日、13日、16日和18日的会议，记录上他的名字是他的化名铁托。他还有许多其他的化名和名字，包括斯皮里顿·梅卡斯、鲁迪、约翰·亚历山大·卡尔逊、维克托、奥托、提莫、格奥尔盖维奇·吉里切克、斯拉沃科·巴比奇、伊凡·柯斯塔因谢克和托马涅克；他去莫斯科时用的是瓦尔特，他和共产国际的所有联络和接触都用这个名字，斯大林也总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铁托是他在南斯拉夫用的名字，这个名字终于在全世界都名声大振。他本人说过，铁托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在他的故乡这个名字与文学有些联系而已。

他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受到了米兰·高尔吉奇和一些南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些人和他一样在南斯拉夫坐过牢，然后到了维也纳。他们叫他先写几份关于南共国内的形势汇报。这些报告就是高尔吉奇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的基础。当时本来想要在斯洛文尼亚举行一次党代表会议，铁托奉命指导会议的准备工作。他给萨格勒布自己所属的党委会写了封信，大概地介绍了他在维也纳见到的情况，并说他已被增选入中央委员会，这就使他顺理成章地在克罗地亚党组织内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信上签的就是他的新名字。

8月下旬，铁托用相同的方法成功地回到南斯拉夫。8月30日他从萨格勒布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报告。9月上半月，他多数时间都在斯洛文尼亚安排代表会议。9月13日，他又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个报告，说他没有能参加在萨格勒布举行的一次会议。因为当地情况太危险，他停留不敢超过三天。他又

铁托传

说他已经给斯洛文尼亚党的领导机构委任了几个新成员：两个知识分子和三个工人。9月中旬，他再一次回到萨格勒布，写报告说，在会见的大约五十个人中，他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够担任当地党委委员。高尔吉奇和他的同事们显然认为这未免太挑剔。他们告诉他：“不要担心工人们是否非常忠实和有经验，是否绝对正直。根据目前党员现状，党组织不能对拥护自己的人们有过高的要求。”但从警察当局保存的共产党员供词记录来看，铁托寻找对象持谨慎态度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很少的狂热分子被捕后能拒绝坦白招供。

除了这种从实际因素出发的考虑外，铁托还理解了一种正统观念，认为作为党员材料，“工人”要好于“知识分子”，所以党必须以工人为基础成立领导机构。正如铁托本人感觉，在南斯拉夫实行这个主张非常的困难。南斯拉夫工业不发达，与其他社会集团相比，工人数目非常少。后来他自己也从那些被七拐八转地说成并非“知识分子”的人中挑选了相对较多的领导人。农民这一最大的社会集团中并没有诞生多少领导人，而且直到二战为止，也没有产生几个共产党员。

铁托一手筹划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党代表会议在9月15日至17日召开。这次会议参加的代表约有三十名，是旨在表明党又开始活跃的一系列地方性党代会中的首先一个，在组织上也是最大胆最隆重的一个。这次会议有个特别之处，它是在卢布尔雅那西边约七英里处天主教主教罗兹曼的乡间的一所别墅里举行。能在这里开会的原因，是由于主教的异母兄弟是个共产党员。兄弟俩发生争执，罗兹曼赶他弟弟到乡村。铁托写道：“大概有三十名代表，包括我自己，参加了会议。会议开了两个日夜。所有代表食宿都在这所邸宅里。在宽敞的餐厅

铁托传

里，主教的弟弟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玻璃杯晶亮，桌布雪白，盘上印有主教的纹章。他亲自在桌旁接待，一面不停骂他那个主教兄长。”

这次代表会议的目的是在斯洛文尼亚使党重新活跃。博里斯·基德里奇、爱德华·卡德尔以及后来成为南斯拉夫驻英大使的青年党员约瑟普·布里莱伊在发言中阐述了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分析了过去的失误处，探讨了以后的工作。铁托本人发表了一篇关于总的思想理论问题的演讲，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光凭自身取胜，必须同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由于采取人民阵线政策而得到了强化。选举斯洛文尼亚党委委员时，基德里奇和卡德尔都因太被警察当局熟悉而未当选。其实他们已得到去莫斯科受训的命令。

在这次会议上，铁托第一次认识了爱德华·卡德尔。几天前克赖格尔曾向卡德尔简单介绍了铁托的情况。卡德尔差不多比铁托小二十岁，但两人非常投机。此后三十年内，两人在党的各种活动中，都将合作。铁托此时正在物色他能够信任和与之共同工作的人。前几次的会晤后，铁托便断定这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好学而稳重的卡德尔是一个“忠实的革命者”，“没有受到宗派主义的腐蚀”——这就是说，他能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和铁托相同，卡德尔也坐过牢，在狱中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带着几分教师的气质，当因为是共产党员被捕时，正在师资班受训。很多年之后，他成为南斯拉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解释的权威，从而使他对哲学和教学的喜爱得到满足。但在1934年时，比他受过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被捕后虽曾备受折磨，却始终没有向警方屈服。

铁托传

代表大会刚结束不久，铁托就回到维也纳，并参加了9月23日、25日、10月1日和4日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随后又到南斯拉夫。他在维也纳期间写了一些论文，文中论述了共产党员在服刑期间的义务，以及党报需要刊登的材料。他和高尔吉奇就特尔博夫列煤矿罢工事件起草了一封信件，寄给斯洛文尼亚党委会；他还被要求写文章讨论在共产党员中开展反对暴力化的工作以及开展工会工作的问题。除了写报告的专长外，铁托还成了“秘密活动”的专业人员。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战以及其中包含的危险似乎使他觉得异常澎湃意气风发。责任和权威已顺其自然地落在他的身上，而顶着掩护非法政治活动的虚名，假装发迹的工程师和商人以实现青年时代的理想，对他似乎是一种新的挑战。

他的新环境给了他很大的个人空间，服从上级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代价。看了他这一时期写的东西，了解到他已经掌握了共产党行文的老一套。他已经学会了写党内文件以及党内通讯所必须使用的公式化语言。写这些文稿需要使用苏联当时习用的某些词语，其中有许多直到今天仍为共产党人所沿用。由于不断反复使用，这些词语渐渐变成了陈词滥调，对于圈外人几乎毫无用处。但共产党内部所有的人都明白它们的真正内涵。它们形同教义，具有宗教般的力量。这样一来，就使写作容易得多。社会一般划分为“资产阶级压迫者”和“劳动群众”。南斯拉夫政府是“战争的法西斯专政”，苏联是“保卫世界和平和弱小民族的国家”，被人们称为米尔诺耶·麦斯托——和平之乡。服从组织而积极的党员是“党的最好干部”，其余党的支持者是“进步分子”。党内工作包括两种路线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遵从“错误”路线的人，即为党内闹独立的、不

铁托传

顺从的、好争论的人，这种人以南斯拉夫最多，形容他们的表现也有许多专用语，例如说他们是“异端分子”、“冒险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改良主义者”，抑或是“反对党的领导妨碍分子”。虽说这种语言夸张且做作，表达的意义却是很真实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政府任何时候都是具备压迫性、反民主和腐败性的，共产党员都清楚他们为的是什么，知道如果没有外援，斗争目标便无法实现，而外援只能来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几乎无法生存。

1934年10月4日，铁托在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立刻就从小维也纳回到了南斯拉夫。他在萨格勒布停留了很短时间，之后又于10月9日回到卢布尔雅那。这天晚上，他给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近期举办的党代会成果的报告，重点提到特尔博夫列矿工中的一些大概情况，他还谈了一些非法越过斯洛文尼亚—奥地利边界的路线和方法，这方面他现在已有特别丰富的亲身体验。报告起草未毕便有人给他带来消息：亚历山大国王于1934年10月9日在马赛被暗杀。南斯拉夫警察立刻在所有国防边界上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并疯狂搜捕政治嫌疑犯，包括所有共产党人，尽管很快就证实：暗杀者是一个马其顿籍的职业杀手，受雇于乌斯塔沙的克罗地亚极端主义组织，原属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他现在所属组织得到墨索里尼和匈牙利政府的同意，分别在两个国家设有专门的恐怖分子训练营。

中央委员会意识到铁托留在南斯拉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命令他返回维也纳，他于10月末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他这次旅行代名为捷克，是一个工程师，看起来他举止阔绰，

衣冠楚楚。但由于证件制备不充分，他担心仔细检查不过关，这一次全靠运气和他的自卫能力救了他。在检查护照的主要时刻，他把同车厢的一个婴儿抱在膝上。孩子正好在这里撒尿，弄脏了他的新裤子，他的狼狈相引起车厢内一阵狂笑，分散了检查员的注意力，最后他们没有仔细检查就在护照上盖了章，铁托随即安全到达维也纳，在中央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35年12月中旬。这期间他又于1934年11月19日出席了一次讨论会，这次会议由于维也纳警方的攻势而只得在捷克布尔诺进行。他去捷克时使用了一张假奥地利护照，所填姓名为理发师吉里切克。

年少的国王彼得二世尚未成年，保罗亲王作为摄政代为管理政权，独裁制度比先前有所放松。共产党人开始在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和门的内哥罗举行小型紧密议事。铁托也卖力地筹备着一次全国性党代会议。当时以为萨格勒布情况极其危险，因此安排了这次会议于1934年12月在卢布尔雅那进行。

铁托很早以前就知道，他将和他在维也纳一起共事的大部分南共党员一样，需要到莫斯科接受更为严峻的共产主义训练。这是对以前工作的报酬，也是今后升迁的预示。最初是提出把他派往莫斯科共产主义国际工会组织（PROFINTERN），但这将决定他这一生只可以从事工会工作，而他自己或高尔吉奇对他的前程都报以不同的想法，后来得到俄国人同意，变成让他到共产国际巴尔干部，1935年1月18日南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也予以批准。在莫斯科通知到来之前，铁托还继续为卢布尔雅那会议作准备工作。这次会议将于1934年12月24日和25日在齐赫尔利的母亲的公寓住所举行，那也是铁托早先藏身过的地方。由于怕被警方发现，所以只有十一名代表出席，其中

铁托传

有卡米罗·霍尔凡丁（哈根）、卡洛·赫多梅尔（奥斯卡尔）、布拉哥耶·帕罗维奇（斯密特）、博里斯·基德里奇和阿道夫·穆克（策纳）；卡德尔没有出席，因为他先去了莫斯科。铁托和高尔吉奇也只出席了第二天的大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特征是快速且秘密。与会代表是指定产生的，而非自由选举，没有机会或时间进行辩论，决定一般都是通过。最近的六年是党的历史上最惨的六年，有两年党几乎彻底消失了。这本来应该归罪于亚历山大国王独裁制度的严峻压力，但如不作一番公式化的自我批评，那就非共产党的性格了。铁托于十四年后想到这个问题时说：“领导必须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例如，在工会选举中采用了错误的立场和在地方选举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和不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他们否认了选举。此外，还有乡村和军队工作薄弱，忽略了反法西斯反战阵线的任务。”

代表们还听到了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性的有关若干发言以及一些对外政策总结报告。其中很详细谈论了资产阶级各国可能发动反苏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关于党的南斯拉夫国内的法则，则指示继续全力阻击“大塞尔维亚”政权。会议以一串鼓舞性口号完毕，但不能大肆宣扬，不能高声呼喊。口号如下：

努力争取温饱、自由和土地；坚决反对大塞尔维亚帝国主义，努力争取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战争；努力争取无偿释放全部军事犯和政治犯；努力争取无偿与苏联建立联系，争取快速与苏联缔结联盟；反对君主政治体系，争取在南斯拉夫的每个角落建立工农苏维埃国家；共产党万岁；打倒法西斯专政，也打

铁托传

倒君主政体。克罗地亚国家万岁，达尔马提亚的、门的内哥罗的、塞尔维亚的、斯洛文尼亚的、波斯尼亚的以及伏伊伏丁那的工农国家统统万岁。

然后代表们渐渐分散离开，踏上有着厚厚积雪的道路，各自防备在回家的路上被捕。

铁托于12月29日和1935年1月10日在维也纳出席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会议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关于在青年中开展党的组织工作。直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还比较薄弱。离开维也纳之前他还经历了一件使他备感狼狈的事：他的女房东的女儿偷了钱被雇主发觉，打开煤气想去自杀。警察来到后铁托说明他不过是个房客，然后就收拾起自己的行李溜走了。几天之后，他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出狱十一个月后取得的成绩充满得意感觉的心情，于1935年2月中旬出发去了莫斯科。

第六章 受训于莫斯科共产国际

在铁托的生命中，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确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与上次他到俄国一样，这件事对他的政治发展和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同时也在他心中撒下了幻灭的种子，倒不是对共产主义，而是对苏联领导的某些政策和做法感到幻灭，就好像是在他以前到来的那些政治流亡者一样。

铁托刚到达莫斯科时，正是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开始的时候。大清洗的原因，首先是除去苏联共产党人中斯大林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内在反对派，后来扩展到清除外国共产党人中所有与反对派有任何关系的。幸运的是，铁托在这以前从未与苏联或共产国际的政治斗争有过直接瓜葛。这次清洗是依据斯大林的命令，在1934年12月1日谋杀谢尔盖·基洛夫以后开始的。铁托1935年初到俄国时，一些主要的苏联共产党人已经被抓；但这些事件的含意仍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可以表明将会影响到共产国际的迹象。

他已离开俄国十五年了，那时候俄国正处于成立革命化国家的令人高兴而模糊不清的时期。1935年2月，他到达俄国边境时，可真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他既留恋往昔，又为到达了现在仅有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兴奋。他对俄国共产党、苏联和斯大林还抱着一种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信念。

他坐着火车越过波兰，在边境停留了很久，最后到达涅戈

铁托传

列洛伊车站。站上堆满积雪，感觉阴森，大门上的红字向旅客们宣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看到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的巨幅肖像，他心情愉快；再看到乌拉尔的工业大发展和梦幻乌克兰集体农庄的欢乐派宣传画，他又一次极其兴奋。这正是他将要实现的目标，他希望某天能在自己的国家见到同样的情景。

莫斯科对他来说完全陌生。他虽然以前到过这个国家的许多城市，但新都他从未到过。他在高尔基大街卢克斯旅馆五楼租到一个小房间，这是国外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官员的住所。但如果铁托曾盼望与他那漂亮的妻子波尔卡再度相聚，那就非失望不可了。虽然有些共产党人是在莫斯科和妻子一起住，但家庭生活并非共产国际下那一些非俄罗斯学生和工作人员的社会特征。铁托后来发现，他回国后波尔卡在1929年已跟苏联的新统治阶级中另外的某个人结合。她否认铁托是自己的丈夫，任凭儿子无人管教，后来为另一个妇女所收养。他们的婚姻关系一直到大战前夕才解除。直到这一时期的文献还认为铁托有个妻子。铁托虽然始终不时去看看儿子，若干年中他一直没有再建立新家庭，因而他有更多时间立志革命，从事党的工作。

他到克里姆林宫和红场的马合大街附近共产国际机关报到，听候上级分配工作。他在这里配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秘书，然后就在巴尔干地区书记处部门开始工作。这个部门是由德国共产党人威廉·皮克领导的，他的前任是匈共党员贝拉·库恩，他自从1919年匈牙利起义失败后就一直住在莫斯科。

铁托抽出他的业余时间参观了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和许多展览馆这些莫斯科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文化休息公园；后来

铁托传

又观看了一些学校、工厂和集体农庄。他在莫斯科居住的很长时间内仅欣赏过两次芭蕾舞表演，因为这样的娱乐不属于一个严肃工作的共产党员。后来他说，他在莫斯科时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自己的房间和图书馆里，监狱里长期的生活已使他习惯了孤立人群。但当他需要和人相处时，尽可以在卢克斯旅馆的游客和在莫斯科的同胞中建立一种广泛的社交圈。一般都会有大约三十个南斯拉夫人在共产国际工作，此外就是来自列宁主义学校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住校生，一般人数都在七十以上，另外还有些人穿插着来往。莫斯科还有一些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居住在这里的南斯拉夫人有上百人。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和共产党组织，而且经常开会。铁托到达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南斯拉夫局势的报告，介绍说他是“国内来的同志”。

这段时期侨居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中有很多后来都成为南共的有名人物。除了铁托，还有罗多柳布·乔拉科、卡德尔·爱德华、维奇、朱罗·萨拉伊、沃拉依科·贝戈维奇和后来成为铁托参谋长的伊凡·哥什尼亚克。卡德尔现在正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同时又给一位外国学员办的马列主义学校讲《共产国际史》。该校坐落于沃罗夫斯科加大街，在这里参加培训的还有乔拉科维奇、哥什尼亚克等其他一些学员。这个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国家，约七百来人。这里的生活条件很差，和俄国学生普通的生活标准没什么两样，食物粗糙，质量低下，这引起学校里英国学生和南斯拉夫学生的不满。

从事共产国际政治工作的人还有弗拉吉米尔·乔皮奇、斯提凡·兹维吉奇和德尤卡·兹维吉奇兄弟、菲力普·腓力波维奇、格爾加·武若维奇和拉多米尔·武若维奇兄弟、伊凡·里舍特、

铁托传

科斯塔·诺瓦科维奇、波吉达尔·马斯拉里奇、布拉哥耶·帕罗维奇、西马·马科维奇以及时隐时现的神秘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慕斯塔法·哥鲁比奇，这个神秘人物后来受雇于一个在情报机关工作的俄国籍人，纳粹侵入后时间不长便被盖世太保逮捕，由于不肯供出实情而被用刑至死。在那里的南斯拉夫女共产党员有安卡·布托莱茨、若万卡·霍瓦丁、安卡·格尔泽提奇、卡娜·巴波维奇和兹顿卡·基德里奇等人。所有给共产国际做事的外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期间就不能用真名，铁托老是被人称为瓦尔特。据说这可以使他们受到关于秘密工作的严峻训练，这对消除他们还保有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有很大帮助。在这方面对南斯拉夫人没什么效果。

铁托在共产国际机关和卢克斯旅馆结识的一些在国际上有显赫地位的共产党人也不用真实名字。其中最关键的是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人们称他为“老爷子”，就是说爷爷。他一年前在国会纵火案审判中被诬陷，但他还是无所畏惧地为自己辩说，后来被释放，但也从此在世界上臭名远扬。德国人除了铁托的领导人威廉·皮克外，另外还有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沃尔特·乌布利希、芬兰的奥托·库恩西宁和贝拉·库恩、法国的莫里斯·多列士，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来自西班牙的何塞·迪亚士，来自希腊的扎哈里阿迪斯，等等，有一些日子里还有英国的亨利·波立特和帕姆—杜德，以及来自美国的埃尔·白劳德和达西。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俄国关键人物占据重要职位，他们高不可及，不可能和来自不重要的国都的一般工作人员熟识。共产国际中与南斯拉夫人关系最亲密的是俄国乌克兰人季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人们抱怨他给斯大林当信使，但他爱戴南斯拉夫人——也许他更为爱

铁托传

戴共产国际中别国的人。他某些时候确实还曾想方设法保护某些南斯拉夫人。1935年共产国际中另外两个俄国籍的重要人物分别是奥西普·皮阿特尼茨基和格·克诺林，他们两个均是苏共中央委员，前者负责组织部，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部门，负责管理外国籍情报员和外国共产党，并给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

维也纳南共中央同意派铁托到巴尔干书记处服务以后，高尔吉奇给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高级人物乔皮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同意由铁托负责这个工作，还请你做最后一次决定。如果有事需要他的参与，希望大家对他持非常友好的态度。请告诉瓦里亚，他曾在监狱里生活了六年，是一个工人。他也许在工作方面不如有些有经验的同志那么熟练，但他热爱我们党，是工人积极分子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大概六七个月之后，我们将把他调回来担任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此，任何人都不许把他当作普通的官员；相反，要把他看作是一个党的优秀的实际领导人。

高尔吉奇事先打这么个招呼是完全正确的，这一事实多少说明了一些那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中南斯拉夫人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铁托现在已经开始成为小塘里的南斯拉夫大鱼了。在莫斯科，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个地方正进行着黑暗而且残酷的政治竞争，一个人的未来和命运在这里都显得危若累卵。但铁托是很会照料自己的人，他很快就认清了现在的局势，抛开了一切幻想，去适应冷酷的现实。同时，在剔除了

“富裕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一不合法身份之后，他能很容易地在个性和外表上都变成一个沉默而勤劳的党的干事；况且，据他所说，他明显是极其小心地开始他的新生活的。无论他以哪种身份出现，他都能很巧妙地把自已溶入新的环境——在独裁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这固然重要，在此时的苏联也一样重要。

卢克斯旅馆拥有五层楼，有五百个房间，为旅客提供了有限的最基本的设备。进门须持通行证，不然不管与门卫怎么熟，也不管事情多么急切，都不准进入。楼里有个旧电梯，每层楼都有长长的走廊，走廊两旁是房间。许多房间是相通的，这样，像马努伊尔斯基这样的贵客就可以分配到好几个房间，就像一个套房。像铁托这样的普通住客只能分配到一个狭长房间，刚好够放杂物柜和盥洗盆，上面可以放水，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另外，房间内还摆放着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

别的盥洗用品就不太够那么多住客使用了。比如男女淋浴室热水供应的次数极少，为了洗个好澡，必须几个人挤在一个莲蓬头底下。铁托同美国共产党员埃尔·白劳德就是在莲蓬头下结识的。餐厅在一楼，但住客一般都自己做饭，每层楼都设有一个大厨房，里面估计有二十个炉灶。每次做饭的时候，这批从语言或国籍上都不相同的欧洲共产党人的精英就可以聚在这里聊天。

条件并不是很好，但要比铁托曾在的监狱好得多，而且各种待遇也要比许多俄国人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得到的要好。最糟糕的莫过于隔墙有耳，旅店工作人员，经理古列维奇也包括在内，都是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人人恐惧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汉奸。说话必须时时机警，这到后来愈发是生命攸关。铁托与一些南斯拉夫人及别国的共产党人不一样，他的自卫能力使他

铁托传

说话十分小心。

因为斯大林的清洗越来越激烈，而且随便冲击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在俄国生活一般都有其特殊的危险。铁托是很幸运的，他首次前来正值从 1935 年 7 月至 1936 年 8 月的清洗停止时期，所以他可以在坐了几年监牢和非法环境下熬过几个月之后，享受到一点与先前不同的生活乐趣。现在他可以放松一下了，这对一个特工人员也许是非常必要的。在最初的半年中他坚信，在苏联，任何一个具备坚强信念的共产党人凭着忠诚和勤奋工作，肯定会受到公正的判决与处置。这种信念激励着他，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了。

第三国际在铁托以后七年的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国际社会主义活动。第一国际是在威斯敏斯特圣马丁教堂 1864 年 9 月 28 日进行的一次大会上宣告成立的。卡尔·马克思和一些英国的、欧洲的共产主义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开场白中所说，“是为了成立一个追求对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完全解放的联系和合作的核心”。成立于 1889 年 7 月 14 日的第二国际遮盖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成立了一个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领导和帮助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活动。第二国际的支持者们观点很不一样，只是整体上都持社会主义观念。其中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主要右派代表；以著名的卡尔·考茨基为中派代表；还有一个左派，后来慢慢地被列宁和托洛茨基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逼迫每个会员党表明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他们的立场加剧了一直暗中存在的无可避免的分裂。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 年使左派有机会另组织一次自己的运

动。

列宁由于要尽全力去制止俄国国内大事的发展趋势，直到1918年1月才有机会召开一次国际性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是在俄国革命形势正处于极度危险且模糊的阶段，可见列宁对它多么重视。大会在彼得格勒进行，有来自巴尔干、英国、美国、波兰和瑞典的代表团在会场出现，制约大会的则是列宁和俄国代表队中的别的布尔什维克头目。会议的结果是建立起一个由外国党小组结成的组织，归属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选举通过建立共产国际，尽管德国代表埃伯莱因持反对态度。这就是第三国际，也是第一个全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国际，后来称之为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港湾。它一直保存到1943年5月才消失，后来为斯大林正式解散。它在莫斯科成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机关，对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行使权力。这个机构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正式撤销之后还保留着，只是不再由外国人当任重要职务。它的内部机构曾两度改革，因为斯大林的清洗，使很大一部分外国工作人员离开组织。但它直到最后仍维持着原来的机构和部分老员工。虽然共产国际消除了，但这同样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一次坐落在马合大街上，现在的它实际上是苏联外事部门的组成部分。这个机构很可能就是为战后共产党人继承东欧几个国家做好充分准备，并建立和领导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构的基础。

铁托在1934年作为共产国际官员开始领薪水。虽然他从1937年起不再领工资，但他一直到1942年还一直是共产国际一个服从领导的成员，只不过在最后阶段他越来越表现出孤立性。他彻底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子是1948年他与斯大林完全决

铁托传

裂后。铁托原是共产国际培养出的表面上看来最出色的人员之一，后来竟独立发展，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突出的、最使人惊异的一步。

建立并领导着那些欧洲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到底是个怎样的组织？它的原则是在二十年代费了很大周折才决定好的。这些宗旨最后编入了组织的章程和提要，并为参加 1928 年在莫斯科进行的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的四百名党员代表所认可。纲领列出了六个有关任务的标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的兴盛和不可避免的凋零；资本主义大危机和世界革命的初步时期；共产国际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接下来有三个部分谈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以及革命胜利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按照纲领的意思，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威胁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敌对势力。所以说共产国际是俄国危险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也是它帮助刚具备战争条件的其他国家进行共产主义斗争的有利工具。1926 年的南斯拉夫好像已经拥有足够的这种“客观条件”，这就是那时候号召武装起义的原因，而铁托和一些南共党员则曾依据这一号召尽力采取行动。

1935 年铁托到达俄国时，已经有了全新的世界局势。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思想已在意大利取得成功，得到美满的成就；更直接具备威胁的是，纳粹分子在德国已经取得胜利，德共被摧残得已体无完肤。这一切促使俄国领导人重新审核他们利用外国共产党办事的方针。1935 年前几个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价，最后采取了人民阵线方针作为苏联对外关系的新战略。而一当苏联头头们下决心采取某种行动策略，共产国际就马上接受，并通过它的大多数员工和工作部门付诸行动。

铁托传

共产国际的基本组织结构一点都不复杂。与此相反，在它下面分设的许多部门却一点也不简单。根据 1928 年的总则，它的最高权力机关应该是世界代表大会。规定代表大会两年举行一次，但实际上自 1928 年后，也就是说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只在 1935 年举办了最后一次。两次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是由选举产生的，每年两次会议。决定的权力归主席团和拥有更大权力的政治书记处。主席团举行会议的时间更为稠密，平均每两周举行一次，1935 年有十九名成员，外加十二名候补成员；同一期间政治书记处一共有七名书记和三个候补书记。实际上真正的权力是由苏联领导人掌握，通过以上三个组织中的成员执行。

直接负责政治书记处的是七个下级书记处，它们称他为地区书记处。他们把世界划为七个区域，每部分都由书记处来负责。各书记处都有一个主席团成员主持。铁托在巴尔干书记处，即第二书记处工作，该书记处负责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一些区域。1928 年前，外国共产党内外部虽然都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物资和财富，但还给自己留下一点管理本党事务的权利以及就法律问题独立的权利发表意见。1928 年后，这种状况就完全消失了，共产国际变得比以前集中，越来越被斯大林的专横残酷的权威所管辖。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和南共党员，依据各会员党加入共产国际时需要接受的二十一条中的某一款项，铁托曾答应过全盘接受这套政策。这二十一项条件十分明确地规定了会员党的权利及义务：接受共产国际的基本建议，服从上级指示。有一条说，任何会员党的制度都可以根据本国状况制定，但制度必须适合共产国际的决议，并须得到共产国际同意；实际上就是

铁托传

得到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那些成员批准，斯大林在铁托为共产国际服务的整个时期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到最后，各国共产党必须将所有不听从共产国际和藐视这些制度的党员开除出党。

1935年的时候，南斯拉夫共产党已声誉不佳。因党员中存在一些倾斜，这些人无视这些义务，对共产国际的命令和“公开信”闹独立，意见不统一。共产国际已给在高尔吉奇前任党的书记马丁诺维奇和马里奇这两个党员，以及担任这个重要位置的前任西马·马科维奇以处分，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这样的事情外加南共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党的高级官员薪水太高等事实，使得南斯拉夫人明争暗斗的情况在共产国际中愈演愈烈。俄国人则利用归属不同民族的南斯拉夫人互相捣乱和竞争的情况为自己的策略服务。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事时，是不可能责怪共产国际的，于是就得找个替罪羊。1935年铁托初到莫斯科，南斯拉夫国内的共产党员又遇到一次大逮捕。高尔吉奇作为总书记受到了批评，大家都认为他应对此负责，但他有俄国人的大力支持，党内权力竞争的一个新时期很早就开始了。铁托必须运用他的所有机智来熟悉这种复杂的明争暗斗；搞这种阴谋诡计的中心点是莫斯科，但流毒广泛，不仅危害到维也纳或南共中央曾驻留过的任何别的地点，而且影响了南斯拉夫国内的党组织。

铁托已经有够多的经历，知道在这种政治黑暗中斗争的人的生命随时都会有危险，所以他变得越发小心翼翼了。他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中资格甚浅，又是刚刚加入，现实生活中他就总是以他的假身份办事。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没有一句怨言，而且努力工作。他在西部少数民族共和大学和列宁

铁托传

主义学校授课，内容是工会工作问题和干部在党的工作中起怎样的重要性。讲一次课报酬是二十卢布，这在当时是相对较高的报酬，有人提议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但他还是决定按照个人的计划自学，说是自学效果会更好。不想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机构超越任何关系，这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后来他说，他学习了经济学和哲学，学习了军事著作，特别是包括伏龙芝和克劳斯维茨在内的俄国人和德国人的军事书籍。他与某些新来莫斯科的人完全不一样，没有语言障碍。例如陶里亚蒂就必须跟共产国际聘请的一个女教师学习俄语。铁托本来就会俄语，现在又很快重新温习了这门语言，他还会说流利的德语。总的来说，他在共产国际接触到了各种籍别的欧洲人和具有多种语言的文件，获得了与之打交道的能力。

铁托在莫斯科的前几个月中，共产国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准备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大会。这次会议初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进行，出席的人有来自全世界的六十五个代表团。这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盛事，为了使代表们产生这种印象，在组织上做了最大的努力。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政策，即人民阵线方针。和以前的做法不一样的是，这次要求共产党员们与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另外一些类似的资产阶级组织团体共同工作，以便组建一个统一战线，与法西斯主义斗争到底。在实行过去的一切战略时，共产党人总是听从告诫，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跟别的政党门派合作；所有这些党派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危险对手。现在共产党人可以去和资产阶

铁托传

级政党领导人达成共识，结成强大的力量，反对法西斯和反动政府。取得政权的永久目标并没有放弃，但是同意在推倒法西斯政府以前，共产党人在战斗的过渡期内寻找合作伙伴。此外，在提出人民阵线策略时还承认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和英国是不具备侵略性的。1934年这一政策开始形成时，利特维诺夫曾说过：“并不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什么时期都有相同的发动战争的欲望。”必须把这些国家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几个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分开，后者才是真正对世界和平和苏联安全具有威胁的力量。

这种策略上的改变与俄国领袖对当时国际形势及其对苏联的威胁的进一步估计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以为对俄国的主要威胁来自纳粹德国，因此在1934年转变对外政策，力图将德国的侵略从苏联转移到别处。在采用人民阵线方针的同时，苏联还企图以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和一系列双边联盟来削弱德国的力量。1934年5月俄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军事联盟条约，当年9月加入国际联盟。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策略上的改变反映着斯大林关于俄国比德国落后的估计，反映着他需要延缓与纳粹的任何军事冲突，直到俄国变得更加强大。十月革命后工业发展虽已跨越出了巨大一步，但三十年的生产力相对来说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而更落后的农业集体化又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礼仪大堂举行，这个大厦本来是沙皇贵族的娱乐中心。现在在大厅里就坐的大约有四百名大会代表，铁托也是其成员。大厅里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大型画像、彩旗和一些与会议相关的标语。除了这些，墙上还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这表明他的个人

权力有所提高。1928年举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他还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他在第一次会议上国际歌和威廉·皮克致开幕词响起时出现，这时会场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主席台上，他和国际上重要的共产党人并排坐着，沉默寡言，冷漠高傲。他身边坐着他的保镖，大清洗中他的不讨人喜欢的随从，“残酷暴力的矮子”耶兹霍夫。斯大林一直以来都非常轻视共产国际，说它是个“垃圾场”。他在会上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当会议正常进入状况时就离开了。会议的正式记录写道，每提到他的名字会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掌声猛烈如暴风雨，经久不衰，这是专门用于他的有组织的致敬形式，这是铁托在莫斯科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记得他第一次与斯大林单独见面是在1944年红军进入南斯拉夫的前夕，当时他以胜利的南斯拉夫游击部队总司令身份来莫斯科的。

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铁托有幸参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性的共产党会议，这是他十分难以忘怀的。如果说，他这时是处于最容易受影响的阶段，季米特洛夫和陶里亚蒂的演讲中提到的人民阵线方针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这在后来一直影响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指引，这种说法不是凭空想象。

要是说，斯大林在这次大会上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和推崇，季米特洛夫也成为这次大会的有名人物。国会纵火案的判决刚过去一年，他在审判法庭上，向全世界宣布：“对于我，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国际的纲领就是最高权威。”有关德国新闻评论：“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纲领的化身”，他说：“我认为这是对我的描述。”所以，第七次代表大会给他分配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位的做法是正确的，也意味着斯大林对他感到满

铁托传

意。他就任这个职务直到 1943 年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时，后来一直做类似的工作，直到 1947 年俄国把他派回保加利亚，去接任苏联保护的共产党政府。

参加这次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队相当壮观，莫斯科的南共党员，凡在党内担任过正式职务的，大部分都以一种身份加入了代表队。这些名字都是众所周知的假名，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高尔吉奇和帕罗维奇，向大会作了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上次大会以来南斯拉夫的形势。国内党组织最后选出来的代表是以下人选：达尔马提亚的伊沃·马里奇和萨格勒布地区的印刷工人德拉戈·彼得罗维奇、斯洛文尼亚的罗沃洛·库哈尔、塞尔维亚的是五金工人米兰·拉多瓦诺维奇。弗拉吉米尔·乔皮奇以及约瑟普·布罗兹是首选代表。另外，菲力普·腓力波维奇是特殊代表，他是这里的老成员了，曾参加 1924 年和 1928 年的共产国际代表会议。斯捷潘·茨维吉奇和他的弟兄德尤卡都是这次会议的代表，卡德尔拉德·武若维奇和波吉达尔·马斯拉里奇也以一种特殊的地位出席了大会；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和鲁道夫·赫西贡亚负责代表团秘书处的的工作，奥古斯特·塞萨列茨和伊凡·里金特则是他的得力助手。除乔拉科维奇、里金特、铁托、彼得罗维奇、卡德尔和帕罗维奇外，上述绝大多数成员都被斯大林在其后两三年中处以死刑。

在南共代表团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高尔吉奇当选为团长，铁托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当选为代表团秘书。这样的身份使他得以出席大会各次会议和各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从而既熟悉了代表，也熟悉了会议的任务。他做得不错，因为当选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南斯拉夫委员时，他的名字被提出很多次，而没有提出高尔吉奇。进行这一提名的大会召

铁托传

开时间为 1935 年 8 月 13 日和 14 日，候选人一共有三个：共产国际会议上被提名的高尔吉奇、和卡米罗·霍瓦丁以及弗拉吉米尔·乔皮奇。他们三人旗鼓相当，南共代表团好像很难做出决定。作为一种折衷方法，于是铁托的名字很快就通过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否决了瓦尔特，而把差事给了乔皮奇。高尔吉奇的亲朋好友和保镖努伊尔斯基告诉铁托：“既然你们不选择高尔吉奇，我们就不会给你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而只给高尔吉奇一个候补委员。这是对你们的处罚。”高尔吉奇的候补委员资格已经得到大会一致通过。作为一个候补委员，他可以出席执委会大会，但没有足够的选举权，这是南共的又一缺点。

大会完毕后，南共政治局借机在委员们分散前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会议上铁托再次被选入政治局，并决定富有才干、政治局委员的塞尔维亚人帕罗维奇返回南斯拉夫，继续留在国内做自己份内的事。铁托将根据组织决定，随同南共代表团里一些党员和别的大会代表，到苏联各地作参观旅行，为期三周。

旅行者中只有四个南斯拉夫人：即彼得罗维奇·拉多塞列茨和瓦诺维奇。他们在 8 月的最后一周离开了莫斯科，又于 9 月中回到莫斯科。他们看了铁托很早以前就熟悉的伏尔加河东岸地区和西伯利亚西部。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重工业工厂，也看到了煤矿和金矿，以及古比雪夫的机械工厂。他们还看了拖拉机站，走访了一些新的集体农庄。组织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要给外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铁托表现令人满意，他因材施教对各种不同的听众作不同的解释和发表不同的演讲，告诉他们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有关情

铁托传

况。他能用俄国工人和农民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他们讨论。如果他有什么保留——用残酷的手段强制实行的集体化刚过去，肯定仍然存在着残余的缺陷，他保留意见。很久以后，他才发表意见说：“我和集体农庄庄员聊天时，发现每当他们有人想说什么时，总会有人阻止他。”

铁托回到莫斯科时，刚好赶上9月15日和17日的南共代表队的最后几次大会。他回来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参加党中央委员会在委员们离散前举办的最后一次大会。本来组织要他在年末回到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但世事难料，12月前南斯拉夫传来了两条非常不幸的消息：一是在采取新方针的问题上始终意见不一致，二是警察正大批逮捕共产党人。这些消息令人不寒而栗，同时铁托也接到了在莫斯科再呆一段时间的命令，因此他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是预期的两倍。

亚历山大国王被杀害，保罗亲王继承王位后，南斯拉夫于1935年5月进行低层选举。反对摄政王继续实行个人独裁的各政党组成反对党集团，获得了多数选票，然而却未能改变政府的性质。还在非法状态行事的共产党不能在竞选活动中公开活动，而且在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高尔吉奇一开始指示，共产党应通过它的符合政策的机构领导劳动人民党选出自己的候选人。选举前他收回了这项指示，要求南共党员与反对党集团候选人一起选举，并且投他们的票。这可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共产国际这时已采取人民阵线方针，会在代表大会上公布。结果，马切克领导的各反对党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合作，因为它提出一些办不到的要求。共产党的许多支持者投了反对党集团的票，而党既没有得到好处，也未有所

损失。反对党集团的人本身也没有从选举胜利中得到好处，因为保罗亲王任用亲纳粹的右派政客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担任下一届首相。许多南共党员感到失去了一个机会，所以必须在背后找出原因，而谴责的矛头则一开始就指向高尔吉奇，此外，选举后南共快要被王室警察消灭干净了，人们认为他应对此负责。

搜捕是在锡萨克的一次工人集合后开始的，集会没有了方向，共产党人进行亲苏示威游行，提出与共产国际的新方针正相反的要求——成立苏维埃克罗地亚。过了不久，携带党内文件的当地党组织书记吉奥吉耶·米特洛维奇被警方逮捕。于是警方很快就有了全国各地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的名单，这样就更有利逮捕南斯拉夫各地大约三千名党员中的九百五十名。审讯工作结束后，他们得到了有关党的各个领导人的很多资料，其中包括关于铁托的新动态。处于非法状态的党几乎再一次被消灭了，只剩下很少人继续顽抗到底，其中有一些是贝尔格莱德的学生，最近出狱的青年共产党员密洛凡·德热拉斯也是其中的一员。

有关这种局势的信息是慢慢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专门负责南斯拉夫事务的巴尔干书记处的，因为通过通信员传信不但很危险，而且一般不会这样做。维也纳的高尔吉奇领导班子不仅在南斯拉夫，在莫斯科，还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内部都受到了批评。1936年4月高尔吉奇还留在莫斯科的时候，乔皮奇召集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了一次会议，事先不但没有向高尔吉奇，也没向共产国际发出请求批准。这在后来肯定被发现了，所以共产国际决定再次对南共党内缺乏纪律和不团结的现象进行整顿。

铁托传

它按一贯的那种独裁专制方式行事。南共中央委员会宣告解体，1936年9月9日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国际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它后又选出高尔吉奇当总书记，铁托当组织书记。根据铁托后来的描述，显然那时候的他本人至少也在私下是不赞成高尔吉奇的，他正在公开宣扬党需要书记在国内工作，而不是在维也纳。他说他曾找季米特洛夫提出过这个提议。“对我的建议展开了激烈的表述，”他说，“高尔吉奇特别不支持。最后同意将中央委员会分成两个部分：一半回国任职由我负责；高尔吉奇则留在国外作为政治书记。他有权不赞成在南斯拉夫作出的任何政治决定和建议，……我赞成了这个决定。”他又说：“此外，我还想就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的问题规定一个原则，我认为这一津贴大大阻碍了党的工作。”另一次他评论说：“这是一个软弱的决议。虽然如此，它还是使我可以国内独立完成工作。”

铁托现已积极参与南共党内全部的争夺权势活动，他似乎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坚决支持。铁托后来想起来说：“我和季米特洛夫的个人关系其实一直很好。我们相互信赖相互鼓励。”另一次他评论说：“他态度非常友好，对在当时情况下执行党的非法工作的困难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共产国际中重要的苏联代表马努伊尔斯基则是高尔吉奇的朋友和拥护者，因此铁托必须谨慎行事。他后来说：“至于马努伊尔斯基，他偶尔站在我们一边，偶尔又站在另一边。起初他赞同另一边，但最后他做出总结，应得到他的支持的是我们这一方。”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时正在开展内部整理，这种整顿是在莫斯科的恐怖气氛趋于严重的背景下展开的，因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刚一闭幕，斯大林清洗的暂停阶段就已经完成了。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遇

铁托传

到失败的那些人以及第一批被捕的南斯拉夫人，大都被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部人民委员会私下处理了。但高尔吉奇本人还是自由的。他已战胜了他的批评者，中央委员会中他的主要对手已被开除，其中有乔皮奇、赫多梅尔、霍瓦丁和斯捷潘·茨维吉奇。

1936年10月中，铁托终于可以离开莫斯科，回到亲切的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他取得的工作是协助高尔吉奇管理党组织，不久他就可以回南斯拉夫工作。他的职责是执行纲领，强迫接受共产国际的方针，把有意见的党员开除。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工作，因为以前还没有人能把南共严密地团结起来。除此外他还有一项份内的任务，就是招兵协同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军作战，并且作出具体安排把他们非常安全地从南斯拉夫送回西班牙。这两项任务都危险而艰巨，可能共产国际里任何人都不认为他会成功，更不用说是活着回来了。而最坚信这点的就是高尔吉奇，他这时已把铁托当做工作对手了。

第七章 国际经验的获得

1936年夏，铁托还没从莫斯科离开的时候，斯大林的大清洗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涉及到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另外一些将在这年夏季的十六人判决中被定罪人，在1934年12月被投入监狱，还有许多其他俄国人被抓起来。与他们或者任何自由主义思想有关系的外国共产党人已经有嫌疑，这时离开莫斯科成为最好的时机。

又一次在南共掌权的高尔吉奇把铁托传回维也纳，并给他准备了旅行所需的证件，旅行路线是路过南斯拉夫到维也纳。但铁托很早就知道，共产国际和南共内部的宗派集团曾经故意给他伪造不太逼真的证件，以便让边境警察发现的方法来消灭自己的对手。他甚至怀疑有些南共官员就是这样死于非命的。他不能相信将和他一起旅行的拉脱维亚女医生。他后来说：“我搞到另一张护照，走了与上次完全不同的路线，因为利用高尔吉奇取得护照的同志都在南斯拉夫边境被抓了。”他照自己的路线从莫斯科到布拉格，于1936年10月中的时候到达维也纳。

他的一个比较特殊任务是招志愿兵，把他们运到西班牙协助西班牙共和军抵制佛朗哥将军的叛乱。到达维也纳后，他觉得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奥地利警方依照许士尼格首相的新规定加强了对付共产党人的安全措施。博里斯·基德

里奇和其他南斯拉夫人已于 1936 年 6 月在维也纳被捕，奥地利警方已完全掌握了南共档案。中央委员会只得采取分散隐蔽的措施，并于 1936 年最后几个月里把总部迁移到巴黎。巴黎的档案对共产党人方便了许多，因为从 1935 年起，利奥·布卢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就开始执政，它坚决表明应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不干预政策，但由于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正在给佛朗哥救济品，它允许各种各样的援助西班牙的国际委员会的存在。

所以，铁托就在巴黎的办事处与还留在南斯拉夫进行活动的党员进行了秘密联络，同时成立了“地下铁路”网，将志愿者从南斯拉夫经奥地利和瑞士两个地方调到法国，最后又运回到西班牙。开展这项工作确实远没有在维也纳冒险，但为了形成一个有纪律的组织，他需要频繁去南斯拉夫。这是他做的第一件真正为国际服务的伟大的任务，这使得他有机会充分发挥他成立秘密活动和组织任务的才干。

南斯拉夫志愿去西班牙协助共和军作战的人很多。他们来自不同层次和各个地区，他们都是左派同情者、共产党人、理想主义者，他们来自对南斯拉夫没有自由痛恨在心，对在国内历来落后的地方就业始终困难特别不满的那些人——当然也来自那些把西班牙内战看成是与欧洲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最后一场决战的人。

第一，铁托须与在办理招兵工作的党员建立联系；第二，他还必须妥善安排好完全的护身地，使志愿兵在到达各段旅程之前都有避难所；第三，必须在南斯拉夫、瑞士和奥地利联系到一连串联络员，还必须定一个通过法国和非法通过比利牛斯山脉的计划。这项行动必须花费大量金钱，金钱有共产国际提供，还有全世界人民给共和西班牙的许多义务捐款。交通员来

铁托传

来往往，男女不一，其中有很多青年学生。他们传递口信或书信，有的书信写着暗语，有的则是用隐显墨水写在表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信封上的。之所以需要谨慎行事，不单是因为警方正在逮捕共产党员，还因为南斯拉夫已禁止帮助西班牙共和国，他们以为所有志愿兵都是共产党人。

铁托现在住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个小旅店里，经常在郊外工人居民区的联络员中和拉丁区的学生中走动，这样，他就拥有了许多左派国际联络员，并渐渐熟悉了这里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必须学法语，因此天天钻研法国共产党的报纸《人道报》。他的总办事处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艾绍谿大街“地平线”书店里，但他却总是在街上和咖啡馆里与许多联络员联络。前一段时间在巴黎是很容易这样干的，不过到西班牙内战后期，因为人民阵线垮台后右翼政客在法国执政，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到了国际局势愈演愈烈，拉瓦尔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谈判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便认定法国的第二局和南斯拉夫警方已经开始共同对付他们了。

在西班牙的志愿人员看来，在南斯拉夫的一段旅程是最缺乏安全的。一个南共党员在西班牙生活了两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中被抓。警方看了他给妻子写的每一封信，然后就把他的住宅监控起来。在接受审讯时他叙述的情况是具有特点的：他装扮成一个游客，先从奥西耶克出发，乘火车到萨格勒布。然后他换乘另一辆火车到萨莫博尔，又从这里徒步走到斯洛文尼亚，在普图伊一个旅客招待所里住了几天。从这里出发，他在阿尔卑斯山走了很长的路，后来非法穿过南奥边境，到克拉根福。不久后，他从当地联络员那里得到一张假身份证，坐火车去瑞士巴塞尔，几天后又继续坐火车往

巴黎去。在巴黎他住的是第二十区的现代旅社，这时有人替他做了去西班牙的安排。然后他前往卡尔卡松，又在那里坐公共汽车到西班牙边界，这里有导游专门带领志愿人员穿过比利牛斯山。整个旅程大概用了三周。在出国途中他是最幸运的，一路顺风，另一些在国外的特别是在南奥边境线上的党员却被捕了。但也有很多人独立行动，或搭伙，得以非法通过。有的装扮成缝纫机推销员，三、四个人一伙，自称“胜家员工”。那时候，这些人在巴尔干各国和欧洲别国经常可以看见。

当然，也有另一些志愿兵，警方还不清楚他们就是受通缉的共产党员。于是，这些人就可以合法地离开南斯拉夫，用自己的真实身份旅行。像科察·波波维奇这样出身于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的人到法国去根本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 1937 年就曾经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西班牙。1938 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也有协助，因为可以组织成伙的人作为普通游览团体前往。

然而野心最大的一个计划却没得逞。这项计划简单而又大胆，就是把大概五百名志愿兵从海路由南斯拉夫运往西班牙。1937 年 3 月初花七十万法郎请了法国海船“科西嘉”号，这艘船从马赛发出，开到门的内哥罗的亚得里亚海岸布德瓦附近的地区接人。按照铁托的意思，这项活动由高尔吉奇负责，他又让铅管工出身的中央委员阿道夫·穆克去进行张罗，最后这项计划执行得一塌糊涂。当时那种行动以规模而论无论怎样都是难以瞒过南斯拉夫警方的，因为几百人从达尔马提亚和门的内哥罗各地聚集在离摄政王在米洛策尔的夏宫很近的一个地方来。这天许多小船聚集起来，只欠和海岸后方山上的一个站台交换灯光信号，然后就可以把这些人渡到去往法国的海船

铁托传

上。黑夜里，强劲的季风激起了海浪，这时那艘法国海船正在想方设法向海岸渐渐靠近。但3月2日这天没有可能登船。第二天晚上，对一切情况已掌握得非常详细的警方调来增援人员，把这个地区完全封锁起来。几乎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都被捕了，阿道夫·穆克也是其中的一员。当一只南斯拉夫巡逻艇靠近海船时，他正在船上，他扮演的是法国水手。共产国际派来的一名“指导员”当即从船上跳海脱险。在受警方逼供中，穆克供出了整个组织及相关活动，接着警方又在全国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逮捕。

这一毁灭性事件让巴黎的中央委员会陷入绝境，共产国际要求他说明一切，铁托也受到牵连，因为他曾去布列斯特安排租船的事，还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但值得庆幸的一点是，他能证实这些事是由高尔吉奇管理，从而消除了这一罪名。这段时间他正在南斯拉夫，遇难的第二天晚上他就写了一份报告说了这一“轰动消息”。十天后，高尔吉奇给共产国际写信报告同一件事，这时他还没有听说穆克已经被抓。他说这次彻底失败的惟一原因是“布拉”，也就是大风。同时他向共产国际申请，是否在一个月后进行第二次这项计划。铁托也写信给巴维尔·格里戈里奇医生，征求意见问再次从海路运送志愿兵可行与否。格里戈里奇在回信中写道，因为整个海岸的有关部门都已处于警戒之中，这样做实在是不再可能。所以，尽管陆路愈来愈缺乏安全性，仍不得不继续走。

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南斯拉夫组成的志愿军到达西班牙，加盟了共和军。他们是在第一二九国际旅的个别营中战斗，这些营都拥有非常合适的名称——如久罗·贾科维奇营、季米特洛夫营和马萨利克营。他们大多数不是战死，就是在战后不久死

铁托传

在集中营，还有三百多人受伤。有很多南斯拉夫人最后成了共和军军官——共计是二百七十四人，其中两名中校，八名少校，三十五名上尉，一百零五名中尉以及八十五名士官。还有三十九名是政治委员，包括七名属营级。曾在共产国际受过训练的前中央委员、在莫斯科渐渐失去欢迎的布拉哥耶、帕罗维奇是旅政委，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看来，这一切的意义不仅在于自己扮演了光荣而伟大角色，今后还将有更重要的象征，因为回到南斯拉夫的三百人中，几乎全都在大战时期参加了铁托的游击队。他们的作战经验，以及他们在国际旅中受到的政治教育，在铁托成立军队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战斗的工作中都是十分珍贵的。他们被人们称作“西班牙人”，其中四人是在战争结束阶段的几场主要战斗中追击败退的德军的铁托四个重要集团军的领袖。铁托本人说过，他本来也想去当志愿兵，但共产国际坚决不同意他去西班牙。他的不去倒是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有很多去西班牙的人后来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残害了。

这个时期铁托的别的工作，就是准备执行下列任务：使共产党在南斯拉夫重生，将那些搞帮派的、叛乱的人从国内外领导层中消灭干净。这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事。几年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每次刚把党再次建立起来，就会马上来一次大搜索。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弄得除了最大胆或最莽撞的人以外，谁都吓得不敢进行党内活动了。南斯拉夫警方弄到维也纳的党内密件后进行了一场场逮捕，了解到许多情况。他们的政策一直是打进共产党内部，随着到手的情报愈来愈详细，他们能把这种事干得很顺利，有时打进了最高机关，可能还进入了共产国际的南斯拉夫人中间。过去这些年的情况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

铁托传

人在表现最成功的时候也是争论不休和缺乏纪律的；他们对领导党的形式公开表示不满，并且从来不与中央委员会齐心，因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们只管领导，冒险的事却从来不管。由于互不信任而引起了争吵，导致党员们互相猜疑对方是内部密探。

铁托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管理这个残留的结局。即使想到后来对他这段时间工作的一切记录，由于英雄崇拜而有溢美的嫌疑，我们也得认可他似乎确实是竭尽全力、有条有理地开展了工作。1937年头七个月的大多时间他都留在南斯拉夫，偶尔为了处理志愿兵去西班牙的问题和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而到巴黎走一趟。他还需要对必需用品、印刷宣传单和供应宣传材料给出安排。从铁托的总结以及高尔吉奇给共产国际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铁托这几个月的的大概情况：他到过南斯拉夫的很多地方，或者是同知名的共产党员接头，或者是去会见推荐给他的共产党的可能的具有同情心的人。他的一些约会与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相关，他联系的人中还有别的政党，其中包括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党员以及若干合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的代表。

工作非常危险，尤其越过国境去巴黎是很危险的。他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化名，并不时易容、改装。一般情况下他捏造的总是那么一种与他的装扮相符合的谎话：他是一个有钱且功成名就的工程师，由于业务上的要求，经常在外面跑业务。他把这个角色演得完美无缺，但决不会太深入这个角色，以致不能恢复他认为自己的真正身份而同样使人信任。1937年头几个月，他在斯普利特、斯洛文尼亚、萨格勒布和门的内哥罗活动。从现今了解到的材料可知，当时他做的是一些联络分析

铁托传

工作，他明显是在设法建立由新人，主要是青年人组成的最新的党组织，这些人可以在合法活动中用到，而不需要进行地下活动。大多数在警察当局记录的共产党员暂时是不能利用了，尽管他还是破例使用了几个，老党员中有许多人独立性极强，而且同本地有牢固的联络，许多党小组又被怀疑已有警方的人打入。在斯洛文尼亚依然留下来的人包括鲍利斯·齐赫尔利及谢尔盖·克赖格尔。单独的斯洛文尼亚党组织 1937 年 4 月 17 日成立了，后来就把更深一步开展工作的职责交给这个常委会和刚从莫斯科任职回来的爱德华·卡德尔。他在克罗地亚联系的两个人分别是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和利奥·梅提斯，前者是几年前曾经在奥古林对待铁托很好的那个法官的儿子。

由于警方监视密切，铁托在塞尔维亚开展工作多少有些困难，于是他决定通过大学生开展他的运动。被派到克罗地亚去与铁托商量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中进行政治煽动问题的情报员是密洛凡·德热拉斯。他是坐火车到萨格勒布去的，后来他想起来说：“一路上小心着是否有便衣警方特务盯梢。”这次会面时铁托告诉德热拉斯，党中央委员会将设在国内，像上次一样设在南斯拉夫。他还对他说，将要建立青年共产主义者的集团，请他建议协助组织这一组织的人选。德热拉斯回到贝尔格莱德后与自己的党小组的成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形成决议。两人准备将伊沃·洛拉·李巴尔推荐给铁托，由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卡德尔和洛拉·李巴尔组成的这个小集体在 1938 年已作为铁托开展党的工作的主要助手，许多年来一直陪着铁托一起工作。弗兰克·莱斯科塞克、麦科·马林克和伊凡·米鲁丁诺维奇等另几个政治局成员也和他们组合在一起。他们是南共负责策划的中心人物，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又得到快速的锻炼成

铁托传

长，因而在后来四年中，也就是直到南斯拉夫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当铁托在国外做长期的停留，他们都能把党的领导任务担当起来，而在战争期间他们更变成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关键人物。

克罗地亚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但铁托既具有克罗地亚人的身份，又具有萨格勒布党组织成员的身份，对这个问题是相当有研究的。克罗地亚人的最关键问题依然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以及到底是支持克罗地亚自治，还是同意联合组成南斯拉夫国家。前者是共产国际从前所认定的，后者则自从转而采取人民阵线战略以来已成了共产党的作战纲领，并不是所有克罗地亚共产党人都承认赞成联合成南斯拉夫国家的主张，这个问题直到大战来临还留着。这意味着至少铁托在一段时间里在克罗地亚没有一定的威信来强迫那些闹个体的小集团和自以为资格比他老的党员依规定行事，在他们眼里，铁托是共产国际的权威人物，而许多本地党员对共产国际本身从心里厌恶至极。为了协调这种个体化，铁托在克罗地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党组织，这是共产国际早在1934年就已定好了的。1937年8月1日至2日的三更，十九名代表聚集在萨莫博尔郊外一个树林里召开成立会议，会上十二人被选为克罗地亚中央委员会。然而这并未使铁托在克罗地亚的为难得到去除，在一段时间里他必须依靠很少几个他认为可以相信的人处处谨慎行事。

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是这些朋友中的其中一个。铁托同他在一起时，才能无所顾忌，随便自然，既不用扮假相，又不用谨慎说话，对他来说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他俩已交往多年，并有大多相同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俩呆在同一个兵营，只不过克尔莱扎未像铁托那样被抓到俄国。战后铁托

铁托传

返回克罗地亚，他俩又在政治集会上发现对方，一起研究“做什么和怎么做”这种“陈腐的政治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克尔莱扎就已觉得铁托“总是拥有一种对事物完全相信和执着的态度，而他又固执得离奇——甚至可说他总是偏见的表现”。铁托后来在监狱的一段时期中，在进行地下工作的岁月里和在共产国际培训期间，由于生存的需要而必须给自己蒙上一层保护网，这使他那爽朗的性格变得冷酷而沉默了，但他却在很早的时候让善于观察的克尔莱扎注意到他性格中隐藏的最不易发现的东西。这成了联系他俩一生的线索，尽管在后来的岁月中克尔莱扎经常坚持一些党的领导者们不认可的观点。

1937年上半年，铁托有一天去萨格勒布时去探望克尔莱扎。他先前没有预约，而他俩已有九年没有对方的消息了。克尔莱扎刚开始以为站在门口的是个自己不认识的人，但当他听见那磁性、热情而亲切的说话声和那开朗的笑时，他就明白是谁来了。克尔莱扎说：“猛一看，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改变；但他是完全、彻底地变了。他稳重、自信而清纯，正像那种已经消除了思想中的所有疑虑，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人。”他俩聊到天亮。当时克尔莱扎刚从意大利回来，他给铁托讲了他在哪里见到的法西斯主义的很多事情。铁托对克尔莱扎说，他在某个风高气爽的夜晚到达克罗地亚时，是怎样为一种难以拒绝的思乡之情所驱使，回到养育他的库姆罗维茨村，虽然他的家已经搬走了，虽然在这一地区被人发现对他来说是很危险。黑夜里他站在老家附近的几棵栗树下，听着狗吠和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嗅着村子里散发出的熟悉的味道，包括隔壁的粪堆和马厩的气味。他觉得一切都像从前——甚至溪中的死猫和一扇破

铁托传

门的嘎吱声都是那么熟悉。一面是对以前的浪漫的美好的回忆，另一面他又觉得他应该想到的是现实主义和实现革命变革的需求，这两种感情明显曾在他心灵中矛盾。在铁托的生涯中，与一个年龄相等，品格高尚、才智过人的朋友这样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情况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以后还会更加困难，因为现在他正站在另一次改变的边缘上，这种改变将把他与同时代人更进一步隔离。

铁托这时不过是南斯拉夫国内的组织书记。他仍然对高尔吉奇负责，后者在设在巴黎的中央委员会担任总书记，而且还对共产国际负最后的责任。1937年的头七个月中，他曾两次去法国报告工作。他于3月25日在巴黎参加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大会，5月中又去呆了一小段时间。然而到夏季还没过去时，消息开始被巴黎的人知道，说是斯大林的清洗矛头已指向共产国际的外国成员。高尔吉奇于7月初被传到莫斯科，从此毫无踪迹、神秘失踪，这意味着他是凶多吉少了。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终止了给南斯拉夫人的资金支持。中央委员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和斯雷滕·茹约维奇给铁托寄了一封信函，叫他去巴黎。他在8月17日就来到了。有人说，高尔吉奇去莫斯科时并不是很紧张，他说他认为此去不过是受批评——俄国话就说成“洗头”。

从高尔吉奇前几个月中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件看来，他确实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这些信件几乎直接到了天真的地步，竟批评共产国际的俄国领袖。从这些信件中，还不知道他已明显地感觉到，他所埋怨的庞大的行政事务工作方面的艰难，可能正意味着政策上的改变，而这对他自己和他的同事都隐藏着危险性。在他给共产国际南斯拉夫有关部门的联系人“弗雷斯契

尔”的信中充满着对他自己的工作与国内党的整理任务的乐观叙述。他一再强调，由于共产国际不支持他的行为，他如何遭受困难。话外音显然就是，这是由于缺乏效率或有人出于敌意而在暗中故意搞破坏。他说他的信没有得到答复；他曾要十份逼真的身份证，但只收到六个；他对要求他不断呈送详细的财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感到厌烦：“我已经在五六封信中向你们谈我们的财政情况，现在你们让我再次谈，……你们说我们仅可以得到5月份必须的钱，但今天已是5月22日了，我们还没有拿到。”他埋怨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像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生活条件比这里好许多，而他手下的员工的个人生活必需品却没有受到照管；他曾要求答应卡德尔的妻子到丈夫那里去，立刻把铁托的妻子送来，但都没有反应。他写道，铁托已经去那边两次了——指南斯拉夫，又来了两次巴黎等待他的妻子，但没有等到，只得又离开。他还曾经这样写着：“当你们看到这段话时，请不要怪我们，也不要把这些话留着，今后向我们的人算账。如果情况使你们自己不得当浪者，请不要勉强别人也披上同样的衣装，也受到你们必须受的那种引诱。”然而在别的信件中他不太明显的表示他已知道莫斯科并非万事顺遂。他写道：“戴别尔克的妻子认为那里依然存在着‘什么东西在同我们做对’，因为她得不到允许回家。”他这样写时明显还没有感觉到，一些人的配偶被人留在莫斯科当人质，目的在于要她们的丈夫受他们的控制。同时，他正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有关清洗中被卷入的俄国人挨审讯问题的资料，他安排印刷了与此有关的传单，但这些传单却没有使他警惕。虽然高尔吉奇对共产国际的官僚作风和你争我斗曾有过很多经验，但他明显是由于太自信或太窝囊了，所以既没有能预

铁托传

见到，也未能很好地应付。1937年夏，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去莫斯科，一点也没有猜想到死亡正一步步逼近，他的消失正是铁托的好时机。

不管当时还是以后，铁托都认为高尔吉奇应对一些南斯拉夫人的死亡和入狱负责，这也许是他故意造成的，也许是由于他严重缺乏工作的才干。他还觉得高尔吉奇故意不让许多有才能的、可能和他争夺领导权的党员胜任负责的工作。直到1948年，铁托对高尔吉奇的评价仍然是十分严厉的。但二十年后，他经过很认真的考虑作出了如下的判定：

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领导，一生都献给了共产国际，所以在我国人民中没有什么声望。虽然他没有把组织工作执行到最优。但是他并不傻，更不是间谍。因为他使我们党损失很严重，但这并不能成为除掉他的借口。他可以算是一个小仲裁者。我不能说我们党内出的那些问题是他故意捏造出来的。有时我觉得是他故意搞出来的，有时又不这样认为。但他确实没有为保护我们的干部所需要的关于国内情况的了解。

高尔吉奇和共产国际中一些别的南斯拉夫人已经被抓的消息，在南共党内各小独立集团之间引发了一场争夺权势的争论。作为共产国际任命的组织书记，铁托有权要求他来继续完成总书记的职责，直到任命了高尔吉奇的接替人为止。但是另外还有些人也在共产国际争取到某种特殊的任务，一个是弗拉吉米尔·乔皮奇，另一个是杨科·约瓦诺维奇，后者以前在沙巴茨当过教师，以前有一段时间长期在西班牙和莫斯科为共产国

铁托传

际执行任务。后来铁托说：“高尔吉奇入狱后，门派主义争论更加扩展，因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现在谁将成为党的领袖？’带头搞这一争议的人希望我不执行这一使命，他们成队地阻止我，给我造成不少不利。”

铁托提出巴黎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两个人是他的永远的敌人，这就是伊沃·马里奇和拉布德·库索瓦茨。库索瓦茨曾执行过安排志愿兵去西班牙的任务，他就从这些人以及巴黎的学生中寻找支持者。铁托不得不依赖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对抗。他后来说“曾给过我很大支持的人，在巴黎是博里斯·基德里奇，和曾经在西班牙而战的战士马斯拉里奇。”基德里奇那时候在巴黎当记者，直到1953年去世，他一直是铁托的支持者和很好的同事。库索瓦茨和马里奇一面参加铁托在巴黎进行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一面却和铁托最有竞争力的对手——一个年青的门名叫彼得科·米莱蒂奇的内哥罗人秘密联络，这个人当时正是一个政治犯，被关在南斯拉夫的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里。

铁托如今决定要争当高尔吉奇的接班人。他很明白地看到，如果说南共还有前途，那么肯定是在南斯拉夫国内，而不是在巴黎，尤其不是莫斯科。他也明白，他须要取得共产国际上层人士的认可。8月28日，他到达巴黎时间不长，就给巴尔干部负责人威廉·皮克写了一封信，信中明明白白地、详细地说明了他离开莫斯科后在南斯拉夫的任务。他重点提到他一贯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执行任务，并已着手成立由“有合法身份的党员”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这封信与其他几封信和其后几个月里他发给皮克的若干电报后果一样，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关于莫斯科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新闻却渐渐传到了巴黎。

铁托传

在莫斯科，斯大林的清洗很快严重地影响到了共产国际的外国成员。卢克斯旅店“每当党内人民委员会来人抓走可怜的人们时，就象遭受到盗匪夜袭的村庄一样。”铁托本人也在1937年10月中得到去莫斯科接受一些南共局势的审讯的指示。他没有按指示行事；这是他这人生中做出的关于生死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最后这项指示被取消了，什么人撤销的我们不甚清楚，但铁托后来说，曾帮助过他的两个共产国际领导是威廉·皮克和季米特洛夫。

铁托后来几月中夺取权力和击败对手的策略，与他在战斗初期利用的方法几乎一样。他以过人的精力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活动。他在巴黎召开中央委员会大会，给所有在南斯拉夫各地为他完成任务的人们发出指令，要求他们进行讨论，筹集款项，与合法的工会一起进行工作，与日夫科·托帕洛维奇指挥下的社会主义团体一起展开工作。他把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和斯雷滕·茹约维奇分配到塞尔维亚去执行这些人民阵线任务，这就使他们可以依据已经接到的指令到莫斯科去送死。他在党报上发表大量文章解释他的人民阵线方针，因为他明白共产国际一向特别看重印刷出来的文字。他写了很多信件，其中包括一封给尼古拉·科瓦索维奇和斯尔迪安·普里察这两个党员的信件。前者曾被分配到加拿大和美国筹集款项，因为莫斯科已终止提供任何款项。为了同一目标，他还在南斯拉夫国内和人套近乎。除了1938年1月初他因为和共产国际的“技术部”联络，曾经到布拉格和维也纳去了十二天以外，整个冬季他都等待在巴黎的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7—1938年冬天，因为彼得科·米莱蒂奇在南斯拉夫的任务，铁托遭到了最坚决的，对他个人来说极其严峻的反对形

势。米莱蒂奇是门的内哥罗人，比铁托年纪小，他已在共产国际上过好几年班，在那里他和几个保加利亚人成了朋友。他一心想被接受为党的领袖，首先取得狱中人的肯定，然后得到南斯拉夫其他党内集团认可，最后再通过他在莫斯科的关系取得共产国际的赞成。监狱中铁托的拥护者是由他过去在狱中认识的朋友莫沙·皮雅杰组织。米莱蒂奇拿起内务人民委员会这个武器用来打败它的敌人：他控告皮雅杰是托洛茨基分子，并力图将他清除出狱中的党组织。皮雅杰把以下这封密电发到了巴黎的铁托手中：

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半月。仅仅是在莫沙同志得到中委委以重任之后，才得以将米莱蒂奇和他的支持者在党组织内孤立起来，……莫沙担负了重任。他好几个月没有收拾自己。白天要进行研讨和辩论，夜里他又要用专用语给中委写报告。

甚至在铁托和皮雅杰在米特罗维察的这场战争中赢了之后，米莱蒂奇还没有被除掉，他准备把总书记职务搞到手，一出狱就在莫斯科继续搞反对铁托的组织活动。

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的军队进入奥地利，两天后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这一事件对整个欧洲都有不祥的预感，对南斯拉夫更是如此，因为这使纳粹分子达到了南斯拉夫边界，而且显然不过是德国进一步侵略的一个阶段。铁托马上写了一个告示谴责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并印了一些传单送回南斯拉夫秘密散发。他如今总结出，不能再呆在巴黎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了。他必须再返南斯拉夫，留下来清理南斯拉夫形

铁托传

势，建立自己的权威，委派一些人管理各国地区的党组织；这些人要能在他一旦被召回莫斯科时继续展开工作，并肯定能写报告来向他请示。他知道他已经有了一个由这种人物组成的中心。

1938年3月12日，萨格勒布警察机构取得密告，密告上说南共中央委员约瑟普·布罗兹马上就要到萨格勒布整理萨格勒布共产党组织。他请别人为他弄了一张假护照，护照上面写的名字是工程师约瑟夫·托马尼克，生日是1893年3月15日，名为克拉托维。信息来源没有泄露出去，但看来很可能就是那种情况，铁托的仇家给警方提供消息使他入狱的。在克罗地亚与奥地利及意大利交界的边界线上，在杜布罗夫尼克港和斯普利特港，南斯拉夫边境警察在所有有可能进入的区域都加强了防卫。可是在3月底前，铁托已经使用别的名字，带着一头染得十分不正统的红头发安抵贝尔格莱德了。谁知他用了另一张护照，走了与先前不一样的路线。他在一家招待所呆了两天，其间遭到一个便衣警察跟踪，但他装扮成一个游人，后来甩掉了这个人。他随随便便、若无其事地进了一家商店，购买了一套土耳其制的咖啡用具——显然是一个有钱人旅游归去带给妻子的礼物。但他认为最好还是换一个地方住。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这时仅仅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不是党员，经他的党员朋友德热拉斯和洛拉·李巴尔的劝告，让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他家的阁楼上休息。铁托在戴迪耶尔家住了两夜，只有在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体直接上床休息时才露一次面。但就像戴迪耶尔的母亲所说，他是个危险分子；他的牙膏是法国产的，他所使用的肥皂是在捷克买的。

两天后，铁托就已离开贝尔格莱德，而警察为了逮捕他，

铁托传

这时还在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线上期待着他的出现。他是坐飞机到萨格勒布的，机票是洛拉·李巴尔从一个亲戚那里弄来的，那个亲戚在航空公司工作。他穿着一套看上去很特别的服装，看上去像个商人，而不像他本人。铁托在南斯拉夫从1938年3月中至6月中逗留了三个月。他仍然保持南共代理总书记的身份，但他觉得共产国际是站在他这边的，因为2月26日他终于收到了威廉·皮克发给对他的许多信函和电报的回复。在收到季米特洛夫叫他准备去莫斯科的命令后，他再一次来到巴黎。7月中他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封信：

我来到巴黎已经一个多月。我之所以到这里，是由于你命令我来见你。虽然我来这里后已立刻报‘上’一切我所知的重要的情况，以便能得到我这趟来这里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但我还是在等待入境签证。我们家中的情况非常要求尽快解决咱们的问题。这就是我请求你最好使我的入境签证能够发出的最好的理由。

为了我们家庭，目前我必须留在那边的作战现场，因为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活动有待进行，这些方法不仅与国内一般政治形式有关，也与我们家庭当前的情况有关。两个半月来，我坚持在作战现场工作，工作范围涉及一切很重要的活动范围，但我必须按你的要求离开，因而不能完全将最重要的目标得以实现。

接着他举出了他曾经做过的工作，其中包括组织一个“临时领导队伍处理突发情况。”他在信中还说：

铁托传

季米特洛夫同志，截止到现在，我们不只是在严重的动荡中完美地救了党，而且在最后取得了良好成效。我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在斗争中表现出了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执着和忠诚。但让现在的形式保持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接下来他指责出马里奇和库索瓦茨的诡计，说他辞去了他们的工作。随后他说，马里奇一直在南斯拉夫侃侃而谈，说共产国际信任支持他，铁托怀疑是一些共产国际官员逼着他这样做，他们曾背着他与马里奇进行了会谈。铁托很生气：

既然我留在这里，他为什么不请我参与？如果局面确是没有回旋的余地，至少不应造成混乱……

季米特洛夫同志，亲自设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你愿意吗？如果我到你那里去与你见面没有必要，你愿意允许我回国，以便我能发挥尽可能多地作用吗？如果不信任我，那就不得不任命另一个人，并在道义上支持他。但决不能任命流亡国外的腐败集团中的任何人。对国内的党我感到我负有巨大的责任，我再不能象现在这样无聊地在这里呆下去了。就此而言，我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并须由党来控制国内的领导。致以同志的敬礼。

瓦尔特

铁托于1938年8月底前不久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他飞经斯德哥尔摩前往，于24日抵达。他发现那里布满了恐怖的紧张气氛；在前几个月的恐怖中暂得幸免的人们吓得终日恐

惶。许多人认为自己难逃劫难，自己很快就会轮到，晚上睡觉时总是在身边放一包衣服，准备清晨三点内务人民委员会前来敲门时逃跑。卢克斯旅馆的住客已被害了大部分。共产国际被斥为“间谍窝”，在波兰部和匈牙利部这两个部里仅剩一人，其余的人无人逃脱。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已经分解，列宁主义学校已关闭部分，在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机关已从马合大街迁到郊外列宁山的一座楼里。铁托被指示到外文出版社帮助另外两个南斯拉夫人——约瓦诺维奇和乔皮奇，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也被他俩开始译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尽管清洗在即，一些行政规定并没失效，因此他的工作报酬优厚，而他就把钱攒起来，以防万一。

铁托心怀畏惧也是必然的。但他来到莫斯科，就是来捍卫自己的地位，以及自己的生命。他不打算轻易认输。他问心无愧于自己的忠诚，他又怀着一种炽烈的天职感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已奉献出他的整个生命，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他可以牺牲掉它。他有非凡的勇气和敏锐的常理判断力。他的生活宁静、谦和，“昼夜不分地”搞翻译，同时准备强有力地剖白自己。讯问已被逮捕的一些南斯拉夫人时，他也曾被叫去，要他写下他所知道的有关这些人的情况。据他自述，他说他做不到，因为除霍尔瓦丁外，他极少知道共产国际的任何人。他说他不带主观地写下了霍尔瓦丁的情况，说他理论修养很深，人又聪明，家庭出身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又说有些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也有，但是很得众望。第二天，问他霍尔瓦丁是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自那以后总是十分小心，说自己对其他南斯拉夫人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从没有一起工作过。是否曾问过他有关高尔吉奇的情况我

铁托传

们不知道，但不管怎样，几乎不可否认，在这之前他就已被处决了。

有一百多个南斯拉夫人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其中在1938年11月有大部分。有些人遭长期监禁，但有至少六十个人被杀害了，其中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员有许多。比如卡米罗·霍尔瓦丁和高尔吉奇，还有菲力普·腓力波维奇、沃亚·武若维奇和拉多米尔·武若维奇兄弟、格尔加·武若维奇、阿吉夫·塞列梅特、维列姆·霍瓦特、科斯塔·诺瓦科维奇、德尤卡·兹维吉奇兄弟和斯捷潘·茨维吉奇以及卡洛·赫多梅尔。弗拉吉米尔·乔皮奇、姆拉顿·乔尼奇和安顿·马沃拉克也被杀害了。差不多这些人全是曾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共产党员，而像铁托这样新到共产国际的人几乎没有。可能这段恐怖历史中与南斯拉夫有关的全部事实永远被冤屈了，因为大多数目击者已逝去，而那些现在还能说说的人又只了解整个情况的小部分。我们现在知道，不仅仅是1937年至1938年被捕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回到莫斯科的另外一些人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有少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释放出来参加红军投入战斗，还有一些人像还健在的高尔吉奇的妻子贝蒂·格兰那样，将狱中的漫长岁月熬过，获得释放，回去过着普通的生活。德热拉斯（他本人没有亲自经历这次清洗）曾在他写的东西中说保加利亚人很幸运，因为有季米特洛夫保护他们。但我们现在知道还有若干次季米特洛夫出面帮助南斯拉夫人，铁托本人就曾多次感激季米特洛夫在这一危险时期给他的帮助。

这一时期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只活下很少，铁托是其一。他何以能活下来，是一个推测不完的问题。他的敌人认为他救了自己是靠出卖朋友和同事，又说他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

特务。这两种说法都纯属虚构，也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铁托的整个人品；况且如果除掉他是俄国人的用意，他要救自己几乎不可能。要求成员们互相告发是共产国际一贯的做法，我们同样不可否认，告发过铁托的也有不少人。但这次清洗的性质是，那些工作多年的人是斯大林要消灭的。在清洗刚开始时到莫斯科的另一些同铁托一样的南斯拉夫人，以及那些工作在南斯拉夫的人，影响都不大。铁托这次得以幸免还有某些幸运和偶然。他幸运在他是刚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幸运在高尔基存心让他工作在南斯拉夫国内危险的斗争现场；还幸运在，在他参加领导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到达危急关头，因此，党内 1935 年前出现的问题他无需承担责任。他精通俄语和德语，这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可以说清自己的意思。也许最幸运的是，他出头之时，恰值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这就使得南斯拉夫共产党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从而有助于他在党的组织工作中成绩良好。

与此同时，对他的幸免起了重要作用的是他的性格与行为。他沉着、坚毅。在莫斯科期间总是十分小心，做到老实听话，努力工作。任何特殊的派系他都没有加入，也没有结交俄国人。不过，像季米特洛夫和威廉·皮克这样的关键人物的嘉许，他却尽最大努力去赢得。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他知道，谈论政治决不在“装有窃听器”的地方。一次他的儿子扎尔科冲进他在卢克斯旅馆的房间，将有关逮人的最新消息告诉他。铁托只好领他到公园去，告诉他千万要沉默。

铁托本人觉得，他能幸免于那次清洗，除了有幸运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在于他自己的努力。确实，1937 年是他自己决定不去莫斯科的，而在那时，可能无论是他自己的本领还是季

铁托传

米特洛夫和皮克的保护都救不了他。他多年后回顾这些往事时说道：“这是我自己的功劳。我看清了一切，除南斯拉夫事务外什么都不过问，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抓住我把柄。这确实是事实。”

第八章 党的总书记

铁托直到 1939 年初才正式任职南共总书记，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晚了一年多。甚至铁托在 1938 年夏到达莫斯科之后，控制共产国际的俄国人究竟是打算批准铁托的领导地位，还是打算把南共彻底解散，仍不清楚。既然铁托是被季米特洛夫召来莫斯科的，可以认为铁托就任总书记职务是他所愿；但要使马努伊尔斯基和另外一些俄国人相信这一任命与他们的利益一致，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劝说。即使在铁托受任之后，马努伊尔斯基还是说南斯拉夫党已被内奸和间谍搞垮。季米特洛夫 1945 年对密洛凡·德热拉斯说：“你清楚，当提出指派南斯拉夫党书记的问题时，人们拿不定主意；可是我赞成瓦尔特，他是个工人，我觉得他既稳健又严肃。我那时没有看错是很值得高兴的。”铁托回忆说：“就马努伊尔斯基而言，有时他站在我们一边，有时他站在另一边。他起初支持另一边，但最后得出结论，他的支持我们应该得到。”

铁托还记得当清洗快结束时，外国共产党人同南斯拉夫人打交道时如何害怕。有一天，铁托和刚从西班牙回来的新任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国际科书记韦利科·弗拉霍维奇在卢克斯旅社餐厅吃饭，弗拉霍维奇说，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同桌。铁托信心满怀地说：“没关系，他们总有一天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和我们同桌的。”这无疑是豪言壮语，因为那时仍正搜捕在莫斯科

铁托传

的南斯拉夫人。甚至当时正和铁托一起为斯大林的《党史》做翻译的两位同事不久也消失了，虽然他们也可算是不致遭到拘捕的人了。乔皮奇曾经是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委员。

要不要让南斯拉夫党存在下去是俄国人面临的真正问题。如果让南共重新活动起来是他们所想，除铁托外剩下南斯拉夫人中已没有合适的、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选。他的忠诚、坚韧、勤勉已得到证明，而他乐于听命是尤为重要的，他乐于接受党的现行方针。另外，他不是受人鄙夷的知识分子，他是工人。在过去一年中，保全了党的人是他，尽管这时共产国际几乎完全忽略了南共。不过，如果俄国人当时认为解散南斯拉夫党与自己的利益相符，也就置一切于不顾了。但俄国人在1938年底必定已经看出欧洲战争免不了，在南斯拉夫他们能有一个听命的领导人指挥下的活跃的共产党，多少比完全没有这个党要好些。

到莫斯科已近两个月，铁托虽然曾会同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与马努伊尔斯基会晤过一次，却仍没见到季米特洛夫。他1938年10月17日又写信急切催促“就我们的问题”作出决定。准许返回南斯拉夫是他的请求，当地计划于12月初举行的大选中的党的工作需要他负责。他询问是否可以会见季米特洛夫，并写道：“长期以来我确信我这次会见你，不仅对于我个人，而且对于我们党的发展都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过了三天，季米特洛夫接见了铁托。季米特洛夫上次会见时，曾对他说：“瓦尔特，告诉我，在南斯拉夫有你们党的组织吗？”由于1937年和1938年他所做的那么多工作，这一次他可以详尽而乐观地汇报关于他仅借南斯拉夫的财力，在没有共产国际援助的情况下亲自建立起党组织的事实了。这次谈话完整的记录

铁托传

没有留下，虽然铁托后来曾对这次谈话的要点几次谈起。很明显，就南斯拉夫党过去的不良行为，季米特洛夫以典型的共产国际的方式申斥了铁托一顿，威胁说如果铁托未能取得共产国际所要求的成果，南斯拉夫共产党便可能被解散，如同在波兰已经发生过的那样。但他最后确认任命铁托为总书记，俄国当局已同意。“季米特洛夫的建议我接受了，并且说：‘我们将把污点洗掉，’”铁托回忆道，并在另一场合进一步说：“接管党的领导权的野心我没有，绝没有过。但是党的领导是强大的、坚定的、革命的，我的确希望是这样。成为领袖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真的希望领袖是一个能够工作的人。我觉得集体应该坚强，领导应该坚强是很重要的；是整个集体，而不是一个人。”这种说法大概有点打折扣，因为铁托肯定曾大力争取过领导权。

党已委任铁托来领导，但这一委任仍必须由共产国际认可，他才准许离开莫斯科。这大概是在1939年1月5日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作出正式批准的。在这之前，铁托对彼特科·米莱蒂奇暗中破坏他的地位的最后尝试不得不想办法对付，自从高尔吉奇在1937年消失后此人就与铁托争夺党的领导地位。快到1938年底时，南斯拉夫狱中的米莱蒂奇服刑期满，小住到在科斯梅特的家乡，随后便失踪了。他有些朋友是共产国际的保加利亚人员，包括卡尔·卢卡诺夫、斯特拉·布拉哥耶娃和势力雄厚的巴尔干书记处人事科书记达米扬诺夫等人。米莱蒂奇已途经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抵达莫斯科，并在共产国际弄到一份工作，这些铁托并不知道。有一天，他与一个面熟的人在莫斯科公共汽车相遇，后来知道他就是米莱蒂奇。关于米莱蒂奇到达的消息竟无人告知他，铁托感到恼火和不安；他

铁托传

去见达米扬诺夫，而对此事达米扬诺夫宣称他一无所知。但是米莱蒂奇已决计尽力毁掉他，这一点铁托已意识到了。他得知米莱蒂奇已将一份报告递交上去，他被指控奉行托洛茨基主义；而许许多多别的南斯拉夫人正是由于这类指控而死于非命。

负责清洗外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调查委员会传唤铁托。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把托洛茨基思想塞进《党史》翻译的控告，而铁托认为是“荒谬绝伦的”。此外，还加之以南斯拉夫的德国少数民族成员，联络有德国托洛茨基分子。这次对他审查的情况他从未详细叙述过，但说他终于将这些指控证明为捏造，说他在此事中共产国际管制委员会主席德国共产党人弗洛林帮助过他。有人常谈起，有一次铁托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搜捕，季米特洛夫曾把他藏在自己的寓所里，很可能这就在这个时期发生。铁托一经宣布无罪，显然反对米莱蒂奇的斗争也就赢得了，米莱蒂奇不再留在莫斯科。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往克里米亚的一处度假者之家，此后便告失踪。人们猜测他已被监禁或处决。但他的最终命运无人确知，虽然1945年谣传有人见到他在莫斯科，并说他参与了后来与共产党情报局在1948年搞的极为猛烈的推翻铁托的运动。与米莱蒂奇的权力斗争是一场殊死之争，其间铁托一直有遭暗杀的危险。无怪他三十年后谈及此事，仍然流露出当年的怨恨。

终于，在1939年3月初铁托离开了莫斯科。他持用一张化名约翰·亚历山大·卡尔松的瑞典护照，标明1897年12月23日生于斯德哥尔摩。他乘船从列宁格勒到勒阿弗尔，然后乘火车经瑞士到南斯拉夫。在威尼斯他偷偷溜下火车，取道海路，向里耶卡附近的小港苏沙克驶去，他认为这地方警察控制得比

铁托传

意南边界差。这已是 1939 年 3 月末，欧洲的局势正趋于战争。纳粹 3 月 15 日开进布拉格；次日，捷克斯洛伐克并入第三帝国；佛朗哥 3 月 28 日攻占马德里，实际上已结束了西班牙内战；墨索里尼的军队 4 月 7 日侵入阿尔巴尼亚，正形成环绕南斯拉夫的包围圈。铁托知道，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于战争爆发之前，时间已所余无几。他很有可能奉召前往莫斯科，他知道此行一是为了汇报工作；二是因为他尚未完成的那项枯燥的任务，出版他的《党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译本，而俄国人是如此象征性地重视它。在铁托临时代理南共总书记期间，已从 1937 年秋的一千五百党员增为 1939 年 5 月的三千党员，增加足足一倍。党员人数在其后三年中再次激增：1940 年总计为六千四百五十五人，党员到了德国人 1941 年春季终于入侵南斯拉夫时已达八千。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也一样：1935 年为二千至三千，1938 年增至九千，包括积极的支持者在内到 1939 年 9 月则为一万七千八百人。这显然是根据各地区党的书记提交的报告中的约略数字。这些数字乐观的成分不可避免，但数字所显示的成员增加的趋势却没有理由怀疑，数字反映了铁托的成效卓著的领导，这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数字也反映了在日益恶化的政治状况条件下，在紧张的战争的气氛中推行的人民阵线政策，使吸收新成员的工作得到大大促进。虽然共产党组织的模式是共产国际统一制定的，但在南斯拉夫贯彻执行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协作精神却取决于铁托本人。由俄国制定政策，由俄国下达原则，但是由党的政治局决定对它的解释和实施办法，而政治局都是南斯拉夫人。无论铁托在南斯拉夫或者莫斯科，他都最后说了算。形势使他不得不委派别人做许多工作，但对所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设法保持消

铁托传

息灵通，在他选择的一个班子手里有控制权。

在莫斯科的清洗中，南斯拉夫共产党早年的全部重要领导成员无不或被消灭，或被搞臭，这一事实对铁托的领导地位无疑是很大的加强。除卡德尔和铁托本人外，铁托选择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几乎都不曾在莫斯科受训。包括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在内一些莫斯科培养出来的干部，此时都任职较低，他们只是在战争爆发以后才又再度担任要职。这一使用青年的政策是有意的，因为他们无牵连于昔日的派系斗争，没有由于在大清洗中失去同事和朋友而担忧；他们朝气蓬勃，血肉相连于当代的政治斗争，这一政策影响深远。

于 1937 年至 1940 年铁托通过亲自选择而团结在他周围的这些青年，在战争时期成为游击队中的军官阶层，而且，虽然很惨重的损失，后来又参选了共产党政府的最高级领导层。他们大部分是由铁托审定的，他认识每个人，其中一些成了他的朋友。他们之中所有的人对铁托几乎都怀有一种神秘的依恋之情，多年持续。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共产党仍未合法化，极其浓厚的感情存在于当时紧张的环境以及秘密团体中，另一方面是由于铁托富于魅力的为人，他有才能领导，对人们，特别是善于赢得比他年轻的人的忠诚和爱戴。在他们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同生共死般的男子之间的友情的成分，这里男人地位特殊，掌握特殊权力的父权制社会的成分也有。铁托就是成长在这种社会中，而担任新领导的那些南部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波斯尼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类似。很容易地他们的民族传统便转化成为铁托为自己的党建立的那种极权主义的，然而确有民主的制度。在南部斯拉夫人中英雄的领袖这一概念由来已久，

铁托传

这对铁托在他的追随者心目中几乎完全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形象的解释有帮助。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他的许多亲密伙伴成为孤儿的年轻人，这难道仅是巧合？一些亲近的追随者都称他为“斯塔里”，他既如父亲，又是村中长老、保护人和传奇般的英雄；结合亲昵、超然和权威于一身并将这一角色体现出来，他已尽善尽美。

这时期铁托的同事们说，他虽然独裁专断，但总是和他们共商大事，倾听他们的意见，尽力共同作出结论。他审慎地吸收青年参加革命，但是入党起初并不强迫他们，使人觉得入党很难，而常常酬答那些历经考验的人。例如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的情况：他为党干了一年多工作，才入了党。交通员他担任过，由巴黎把文件夹在乐谱里带回，还到索菲亚去把共产国际的文件取回。他经常安排外地的共产党人留宿在他的贝尔格莱德的家中。铁托第一次住在他家，在他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躺着时，他们曾两度一般性地谈到共产主义的概念。一次是在深夜谈话，铁托在床上躺着，不断地吸着烟。另一次是特地安排在托普契德公园的一次会见中。铁托没有劝他入党，这时戴迪耶尔在党内外都有用。1939年战争爆发后，他曾一天在狱中度过，因他岳父是一位前王室大臣，才释放了他，之后他才被吸收加入党组织。德热拉斯在邀他入党时说：“你通过了我们的考验，这个荣誉你配得上。”入党后，戴迪耶尔先在一个制鞋工人的基层组织工作，让他多少体验一点工人阶级的经历；一个月后他又调到一个律师的基层组织工作。

铁托在那些年代中曾与之亲密合作，很喜爱他并协助他做党的工作的另一位青年，是很有才气、生气勃勃的伊沃·洛拉·李巴尔。从1937年他就担任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书记。

铁托传

身材不高、皮肤黝黑、极为聪明的李巴尔出身于萨格勒布的一个富家。他的父亲李巴尔博士曾是通过 1921 年维多夫丹宪法时的新南斯拉夫国家国民议会议长。因为他对两个儿子极为钟爱，在三十年代李巴尔博士便已越来越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同情，对他们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多方帮助。他本人战争期间也终于和共产党人共处，铁托的第一届战时议会的议长就由他担任。

在战前的南斯拉夫，洛拉·李巴尔处于上等阶层即为贵族。这便意味着与实业界、政府、司法界和高级警察中的权势人物有关联，因此他本人和其伙伴都有强有力的保护。有一次他被捕，他父亲向一个朋友茨维特科维奇首相抱怨两声，首相就立刻下令将他释放。人们传说有一次曾看见洛拉·李巴尔乘坐由身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的自用“凯迪拉克”牌汽车驶到共产党所组织的街头示威游行的地点。他向铁托交付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以支付化装、躲藏、旅行和一个非法分子生活所需要。不致引起警察怀疑的房子也是他帮助寻找的，以用于召开党的秘密会议。

李巴尔兄弟与那些和他家庭出身相同的学生们相互交往，帮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吸收了许多有用的受过教育的青年。这些党的贬抑他们资产阶级出身的方针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非难，年轻人毫不争辩地接受了。一位中央委员曾和戴迪耶尔说：“你们的本份就是每日每时地将你们对工人阶级的忠诚表示出来。”因为属于人数极少的特权阶级而负疚的心理激励着他们。外国学生李巴尔和铁托一样善于联系各阶层的青年，包括一些英国学生，他有些好朋友在英国。他的演说很出色，能够在学生的集会上鼓动他们对各式各样的示威的支持——反对政府政

铁托传

策或争取学生条件的改善和助学金的增加等示威。

洛拉·李巴尔组织得极好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是半自治的，但这是斯大林式的自治，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和南共政治局的政策和指示它必须接受，但它又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等，以通过并研究实施这些政策和指示的策略。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共产党不同，铁托自1937年以后已使共产党大部分自给，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还是依赖莫斯科的国际青年组织供给部分经费，它和国际青年组织另有渠道直接联系。但负责掌握的既是洛拉·李巴尔，便不用担心共青联盟作为南共助手的地位了。

铁托在1937年5月亲自给党的官方报纸《无产者》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项新政策给共青联盟，对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青年国际所颁布的思想文章详细地进行阐述，特别是关于尽力争取各界青年支持的那套人民阵线的思想。铁托写道，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战，为“面包、和平和自由以及较为安全与快乐的生活”而战是共青联盟的新任务。现今而言，这些提法很陈旧，但在当年却不一样。南斯拉夫大学和技术学校里的许多非常贫苦的工农学生，甚至住校和听课都成问题；注册后他们就回家自学，直到回学校参加考试。对他们答应给予更多面包有现实的意义。而当时纳粹分子正在中欧大肆扩张，和平、自由与较为安定便意义重大。铁托说一切青年农民、学生、青年工人和城镇居民都包括于共青联盟——。它必须扎根于基层，对年轻人的真正需要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了解；更多的文化活动以及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它也必须能够提供；亦即当铁托自己还是离开农村不久的青年时觉得最有用处的那些东西。

铁托传

共青团的新成员为党组织的种种辅助工作提供了大量自愿人员。他们在街头和校内示威游行。人民战线政策的极大功绩之一，就是共青团想办法促成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许多学生组织和俱乐部的合作。政治活动在这地方比较容易组织，因为大学拥有自治地位，集会、铅印和油印传单都可以，而警方无法干涉。一个帮助在塞尔维亚组织共青团的共产党领导人伏克曼诺维奇说：“在这所大学里，我们的革命活动几乎可以丝毫不受打扰地进行。”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学生和其他的人的示威游行可以比较自由地举行。如因为追赶学生，警察进入大学区，他们就侵犯了学校的自由。一些大学教授支持学生反对警察。南斯拉夫国内和国际的交通员也由共青团来充当；他们散发报纸和传单。警察逮捕毒打他们之中的大批人，一些人甚至被杀害。在执行许多这类任务时女学生特别有用；她们不用征兵，乔装比较容易，很难被抓住。

同党内相比共青团中女成员的比例要高。在这个不仅在男性中有男尊女卑的观念，而且这观念也同样扎根于女性中的社会里，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努力吸收妇女参加党的活动。各种杂志他们都出版，对男女平权的思想极力宣传，而对此许多共产党人既不相信也不实行。迟至 1940 年，在一次会议上铁托的发言，这方面的错误还被提到。他严肃地说：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妻子乃至殴打她们这样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在党内还有。一再弃妻再娶仍存在。某些女同志对待男人以小资产阶级态度。所有这些既大大使这些同志自己的威信受损，也使党的威信受损。”

不妨以戴谟耶尔的一位朋友为例，也可以说明铁托的批评是具有针对性的：他是共产党员，曾坐过三年牢。出狱后，因

铁托传

善于搞两性关系而被称为“色鬼”或“花花公子”。“我属于信仰自由恋爱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他边说边把一个记号刻在桌腿上，表示最近又有一个女人被他搞到手。“我清楚，当前党的方针变了——清教主义，革命的清教主义。我看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我还得遵奉，我的桌腿要被刻满。”

这样的堕落现象尽管存在，对妇女来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如同对青年一样意义特殊。在一切权力都属于年长的男人并且被认为将全部智慧垄断了的当时社会，妇女和青年都没有自由，不受重视。青年必须等到年长；妇女必须柔顺、服从——心甘情愿地恪守妇道。青年和妇女都不能参选。其他的政党不利用青年和妇女，虽然青年组织存在于克罗地亚农民党、克罗地亚的“弗兰科夫齐”党和斯洛文尼亚教权派中。因此共产党内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就提供了一条步入现代世界、挣脱一个近乎停滞的社会种种束缚的出路。这种情绪被共产党很好地利用。而在战争时期被吸收的妇女和青年所起到的作用巨大。

铁托本人对妇女的态度，好像与正统的共产主义理论及在共产党人中间和他所处的社会中盛行的某些态度相融合。如同他的演说中所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妇女和男子理论上享有同等权利。但是，却没有一个妇女得以跻身最高领导层，尽管有少数妇女得以跻身次一等的要职。铁托在个人生活方面，颇吸引妇女，也喜欢和妇女相处。他一生中亲密的女友有那么几个。但他从不允许他的工作受到私人关系的干扰；他总是使其私生活从属于对党的职责，他也不希望使她们同自己生涯中的种种冒险活动有任何牵连。

铁托传

第一位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财政上独立的总书记是铁托，他以此为荣。这使南共与共产国际以及工作人员之间形成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消除了。这也将共产国际对南斯拉夫党的控制削弱了。为了代替原来从莫斯科得到的收入，必须向党员收取党费和向旅居国外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南共党员募款，获得国内富裕的党员、同情者的服务和捐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增加党员人数，也随之增加党的收入。党员交费金额根据收入而定。有的党员交纳五十第纳尔就可以；有的付不起这么多，只交十个也可以，但鼓励他们去另找四个能交十个第纳尔的党员，也算在他们的帐上。即使这样做，党在铁托掌管财务的最初几年里仍然经受了严重的财政拮据。高尔吉奇 1934 年任总书记时，从莫斯科南共每月接受价值四百金卢布的南币或外币。另外，每月开支二百金卢布给青年组织。另给应共产国际要求执行特殊任务的人额外付报酬。虽然按当时汇率率四百卢布为数可观，但种种开销都得靠此支付——要租赁和经营一个大而忙的办事处，要付邮费、电话费，还有交通员和其他职员要雇用。还有旅费和职员的个人生活费用。许多来访者和若干家属高尔吉奇的办事机构还得养活。理论上讲，在南斯拉夫的政治犯家属的生活费不包括在他的预算内，照应他们的是一个称为“红色援助会”的莫斯科特殊机构。印刷宣传材料的预算是高尔吉奇在维也纳的另一项支出，这是些在共产国际的办公室撰写里的，而丝毫无益于南斯拉夫的东西。几乎完全无法收回印刷的成本，尽管到 1939 年为止曾向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党员出售若干而赢利不少。事实上高尔吉奇总是入不敷出，也经常不能按时得到进项，这就使拮据常困扰着他。

通常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很低，虽然有些人可能

铁托传

从旅费中赚一笔。以 1929 年的月薪为例，包括房租和生活费在内为五百第纳尔；交通员的酬金为一百第纳尔。肩负特殊任务的同志每月可得一千三百至一千八百第纳尔，这相似于当时中小学教师工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币值变化，提高了点薪金，一般月薪津贴增到六百第纳尔。铁托 1934 年为党招聘工作人员时，这是他受权出价的数目。但莫斯科 1937 年停发津贴之后，南斯拉夫党的工作者的月薪又降低为三百第纳尔，仅够维持生计。

铁托就任总书记时便已向季米特洛夫保证，南斯拉夫党将自己筹措资金，但由共产国际出资支付某些国际活动。这包括为共产国际承担的专门任务。比方说铁托往返莫斯科的旅行，共青团的某些活动，以及可能印发的某些出版物。铁托在南斯拉夫时，共产国际不用支付生活费用，虽然一个富有的工程师只是为了乔装的需要，他所必需的房屋、轿车、电话、钢琴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中的其他特别用项，一定很奢侈。许多项目开支——以低价搞到飞机票、自用汽车司机和高价服装等则是通过广大的党内关系网。这种奢华的生活铁托不仅此时乃至整个一生都在享受。包括他的党员在内的人们对此都有看法，但这既然巧妙掩护和很好安着了一个积极从事秘密活动的工作人员，便成为理所当然。如果因为这个短期的资产阶级生活而使他的共产党员的良心自责，则还应考虑他生活的另一面：他得和较穷苦的同志多次在秘密藏身的小屋里一起过夜，在莫斯科执行危险而又屈辱的任务也是长期的，多次的，虽然即使在那里他也有高薪水并有与他身份相称的各种特权享受，但那里的生活却更为艰难。

铁托传

失望恐慌的气氛随战争的逼近而逐渐形成，这就使铁托和他的同事们为共产国际制定的人民阵线政策更易于进行。既然共产党未合法，公开联合那些合法的党派以反对保罗亲王政府就是非法。但是与许多政界领导人共产党人主动谈判协商，想办法达成某种实际上的联合，这些安排都成功不大，因为以地区为基础组织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对党根本不急于获得对共产党的支持。在 1938 年的大选中，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政党愿意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联合起来的反对党将能获得共产党人的选票。人民阵线政策在塞尔维亚，在争取那些主要政党以外的左翼人士的支持方面成功了一些。早已表示同情共产党的许多政策的李巴尔博士于 1938 年 3 月被民主党开除，他组织了一个时间并不长的亲共的民主党左派。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博士，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也组织了自己的人民农民党，它曾在一个时期内联合共产党。但这些党派对人民阵线形成的基础微薄。

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主要的反对党也拒绝与人民阵线交往，但是各种文化教育组织和社交俱乐部共产党员却成功地参加了。一旦加入，他们便都活动积极，为共产党发展新成员。他们在克罗地亚控制了独立民主党，并宣称这个党得以存在全仗他们的支持。他们还紧密团结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青年和学生组织，并将该党的某些委员会控制了。拉迪奇 1928 年遇害后马切克就任该党领袖并在战争爆发前夕参加政府，这时他所处的地位是足以残酷报复当时反战的共产党人的。南斯拉夫即将由德国人接管时，塞尔维亚和其他地区的政治犯全部释放。但克罗地亚狱中的共产党人马切克却拒绝释放。结果他们被交给德国人，大部分遇害。靠着父亲的势力，弗拉吉米尔·

铁托传

巴尔里奇才侥幸得以出狱。他曾率领一个代表团到马切克处恳求将共产党人释放，但失败了。终于，这些共产党人被害，而当时马切克竟拒不援救；德国人失败后他为求生存被迫逃往国外，虽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即在此处。

铁托还加强了党在那些非共产党的工会中的工作，使工人阶级大大增加了对党的支持。与早年一样，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进行工会活动，以及在斯洛文尼亚的某些工会中功绩最明显。但直到1940年，在特尔博夫列和耶塞尼策两地的五千名钢铁工人和矿工中却只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铁托以前就感到很难开展在塞尔维亚工业中工会的工作，类似的抵制共产党活动的情况如今也有。而直到1939年，党的工作者在塞尔维亚许多城填里仍然寥寥无几。

迄爆发战争时，南斯拉夫的绝大多数人求生都靠在农村耕种小片土地，大多数生活极端穷困，许多人连最低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了，濒于饿死。但在农村中共产党人仍难以获得支持，而惟独例外的是门的内哥罗，那里有强烈的战斗的激进传统，而且，当地保留了与沙皇俄国的旧有联系，转而支持苏联。到1941年，共产党宣称自己享有在门的内哥罗四十万居民中一万二千人的支持，其中党员有一千八百名，共青联盟成员三千名，余下的则为同情者。但在别的地区，农民仍然守旧，迷茫犹豫，谨小慎微。

显著的区域独立倾向在全国许多地方仍存在，直到战争爆发前还持续着。这一倾向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等地的主要地区都是显而易见的。建成一个团结的、铁板一块的、同心同德的党的任务甚至把铁托给难倒了。克罗地亚分裂主义者、马其顿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达

铁托传

尔马提亚的独立和对立的倾向，都频频加难于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窒息创作的指示，党内一些作家拒绝接受，对诸如德热拉斯等更为狂热的领导人强加于人的斯大林式的统治表示反对。铁托的朋友克尔莱扎，一个捍卫写作自由的战士，把德热拉斯和其他两个狂热的同伙斥责为“三台压榨机”，对有关他应该写什么和如何写的命令一概拒绝接受。

但是，大体上铁托可以如实地宣称，共产国际相当勉强地授与他的任务他已出色地完成了。人民阵线政策已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性的基础改变了，虽然在当时这一点还很隐蔽，它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人自由联系本国其他的政治团体，允许他们就有关本民族自身利益的问题来鼓动人民。正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号召使党得以发展，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将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控制削弱了。

第九章 积极备战

铁托使南斯拉夫共产党再度活跃地工作，是以德国领土扩张最终导致战争为背景进行的。1936年3月，希特勒开进莱茵兰，一年后又将奥地利吞并。对南斯拉夫来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危在旦夕。在此之前，南斯拉夫政界人士还有可能接受亚历山大国王直到1934年死去时所奉行的政策，这就是，只要意大利有领土要求，便是南斯拉夫的要敌；而在亚得里亚海和东欧毫无直接利益的德国，是潜在的盟国还只是推测。但慕尼黑协定在1938年签订之后，已不可能对纳粹扩张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威胁置之不理。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沦陷于德国，阿尔巴尼亚沦陷于意大利，南斯拉夫岌岌可危。南斯拉夫的首脑们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即找到一个方案，既能保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又能避开德国想变南斯拉夫为某种形式的傀儡国的仍未明确的意向。

1935年，在尚不明确德国的危险之前，米兰·斯托亚季诺维奇被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亲王任命为首相。众所周知，斯托亚季诺维奇甚至此时对先前的理论仍加以支持，认为德国作为敌人没有意大利危险。外交大臣博戈留布·叶弗季奇和内维尔·亨德森爵士说：“如果要选择意大利或德国的话，哪一个我们将选择是肯定的。德国人承认南斯拉夫，还肯同我们合作。”

选择德国为盟国，斯托亚季诺维奇有其个人动机，他希望

铁托传

在南斯拉夫仗着德国的保护获得一个特权的地位。他卑躬曲膝地巴结德国人，安排奢华的宴会欢迎来访的纳粹分子和德国外交使团。这样的一次游猎会奥地利外交官冯·维默尔曾亲眼目睹过，斯托亚季诺维奇为此备办了雪撬，吹拉弹唱的乐队色彩缤纷的陈设，银制的餐具和亚麻餐巾，上面印满腓特烈大公爵的纹章。那天，游猎完后，客人被号角召至巨大的帐篷中一只摆满各色美酒佳肴的宴会桌旁。斯托亚季诺维奇喝足了本地特产梅子白兰地后，便兴高采烈，开始和德国公使夫人跳起科洛舞。他越跳越带劲，也越来越疯狂，竟跳上了堆满食物的桌子。桌子哗啦一声坍掉了，酒、茶、香肠、火腿、糖渍水果和乳酪撒满帐篷地上，斯托亚季诺维奇便和冯·黑伦夫人滚作一团。“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在结束报道时冯·维默尔写道，“一名老仆人向我蹑手蹑脚地走来，吻了我的手。”

德国则较有礼节地回报他的款待。当1938年2月斯托亚季诺维奇访问柏林时，希特勒安排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检阅，声称南斯拉夫应该强大而独立地选择自己的政策。但他既未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领土要求提供任何真正的保护，德国也未阐明自己的意图。12月，南斯拉夫举行大选，尽管恫吓和贿赂并举，大量的反对票仍表明亲德政策违背人心。此后，德拉吉萨·茨维特科维奇所代替斯托亚季诺维奇，并于1940年5月因犯有图谋自立为亲德的南斯拉夫“元首”的嫌疑被捕。1939年9月1日爆发德国和西方同盟国的战争，此时，尚未清楚南斯拉夫在德国战争部署中的作用，还要再挨过极度痛苦的十八个月才能定论。

1939年夏季以前，是由共产国际1934年规定，是根据苏联对威胁它继续生存的危险的估计决定南共对国际形势发展的

总的态度。铁托很熟悉这项政策，就是宣传拥护和平的国家只有苏联。铁托后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部分活动，花掉了我们的大量经费。”直到1993年，这样做还比较简单，因为俄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强烈反对纳粹和法西斯侵略，而那正是南斯拉夫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样，共产党人就可以认为支持俄国和南斯拉夫民族利益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问题所采取的新的态度，也有助于人民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即便在象南斯拉夫这样的不够民主和政治上不稳定的国家里，共产国际也不允许武装暴动。只要俄国集中精力注意应付希特勒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使命而造成的危险，它就既不能帮助，也没有精力注意东欧的共产党暴动。这样，铁托就得以解除党根据共产国际1929年的命令而承担的但是不能解决的任务，而且向共产国际和外界表明：同苏联友好和结盟正是义务和自身利益之所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国领导人经常担心德国可能与西欧国家结盟，担心战争可能发生，西方没有希望获胜，而后被强迫参与反俄战争。俄国领导人认为慕尼黑协定会使英国不可能真正反对希特勒，就连在丘吉尔接替内维尔·张伯伦之后，英国人的存心仍然使他们感到害怕。对于他们来说，丘吉尔的名字总与阿尔汉格尔和1918-1919年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为借口而侵略俄国的恶性事件联系在一起。俄国领导人也感觉到本国存在的弱点。1939年是俄国三五计划的第二年，生产仍然停止不前。此前三年的清洗严重地削弱了红军，根本就没有时间训练新的军官来代替那些被清洗的成千上万的人。苏联领导人和其他政府领导人一样，过高地估计了德国的作战能力和生产武器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1939年8月23日签订德

铁托传

苏条约的复杂背景。

这是一条十年和睦相处的条约，并且附有规定如何处理东欧的秘密议定书，同意苏联武装吞并波兰东部，并放手解决爱沙尼亚、芬兰、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拉脱维亚。后来的修正案还规定：还可以同样处理立陶宛。这引起了 1939 - 1940 年冬季苏联在芬兰进行的战争和那些土地包括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等并入苏联版图。这一条约使俄国重新得到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丢掉的绝大部分的领土，成了俄国战略防御扩张的工具，这与彼得大帝时期长期所承认的外交政策的宗旨完全一样。

我们现在明白，纳粹头目和苏联之间进行长时间的谈判，虽然那时一般外人是不知道的。这一条约彻底颠倒了苏联先前的政策，彻底推翻了自 1934 年以来各国共产党赞同的反纳粹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路线。世界各地的、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铁托后来解释说：“我认为这个条约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所必需，我们作为严守纪律的共产党人同意接受了它。这一条约承认苏联可以干涉别国的权利，特别是干涉一些小国权利的那些秘密条款当时我们一无所知。”

苏联吞并小国，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来说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他们必须接受他们所必须接受的这一政策可能给他们造成的长期后果。在南斯拉夫，问题是如何使党员承受一个观念，就是俄国已和反共、反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种族主义的和野兽般的纳粹分子同盟。这个政策只可以解释为旨在争取更多的时间，尽可能拖延纳粹对俄国进攻的措施。但是又不能向南共党员公开地这样讲；另一方面，人们总怀着一线希

铁托传

望，但愿它能够防止一场全面的灾难性战争降到南斯拉夫头上。不管如何，共产党对战争的宣传是带着矛盾心理的——苏联实在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他们当时根本没有预见到最后胜利的结局。另一方面，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来说，战争为他们提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惟一机会，于是很有可能受到欢迎。但他们的对外政策又决定于俄国领导人，只要俄国提出要求，他们就不得不接受俄国与纳粹的合作并为之百般解说。

1939年夏初，铁托承担了季米特洛夫要他赴莫斯科的重任。负责旅俄的共产国际巴黎接待处于6月10日写信，恳请铁托去俄国入境签证，有效日期截止7月底。季米特洛夫发给铁托本人的命令写在小纸片上，隐匿在一本书背里，由交通员传送到洛拉·李巴尔面交正在贝尔格莱德的铁托。铁托到贝尔格莱德市区外的泽蒙戴迪耶尔家里拿到了这封秘密信件。抵达时，戴迪耶尔的妻子和朋友正在家中，假扮成工程师巴比奇的铁托不得不先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与客人们研讨音乐和文学之后才取得这本书。铁托在书房里当着戴迪耶尔的面开启了这封信，表示这是季米特洛夫写的。这暗含着——铁托又要长途跋涉了。他当晚在戴迪耶尔家里过夜，次日起身。近6月底时，他搭坐意大利船“弗朗切斯科·莫洛西尼”号离开斯普利特前去热那亚，从那里改走陆路到巴黎。然后在勒阿弗尔乘一条苏联船到列宁格勒。同船前往的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的南斯拉夫勤务员，他不了解铁托，竟向船长揭发铁托是间谍，多亏船长肯替铁托作证。8月23日宣布德苏互不进攻条约达成一致时，铁托已经身处莫斯科了。

他又以共产国际的雇员身份在莫斯科停留了四个月。共产

铁托传

国际的办公处仍建立在莫斯科的列宁山地区，但不久后又移出郊区普希金曾留宿过的奥斯坦基诺村。他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外国文学出版部，终于成功完成了将斯大林的《党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出版印刷的任务。俄国人通过秘密渠道，也许是外交邮袋，把书发往南斯拉夫。后来铁托说，在莫斯科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他说：“甚至在第二次大战时期也要比这好的多。因为你在战时至少知道哪里有敌人。”“我去莫斯科时，不知道究竟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我在那里时，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半夜惊醒过来听见令人心惊胆寒的敲门声。”铁托担心的是俄国人可能决定让他留在俄国，就象后来他们对季米特洛夫和其他东欧领导人做的那样。

为什么他们决定让铁托返回南斯拉夫，正象他怎样得以逃脱斯大林的清洗一样，谁也不明白。到1939年底，铁托已经被证实是一名忠心的共产国际雇员，不过总是处在共产国际等级制度中被看做低微的地区等级。他执行了年初分配给他的任务，包括从党内发挥作用的岗位上解决那些曾去过巴黎或西班牙，并被控告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在南斯拉夫他重建党组织的工作由一个名叫施韦尔马的捷克共产党人加以监督审查，此人向莫斯科汇报时，说了不少表扬的话。铁托也可能是故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让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他的工人阶级出身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因为作为一个未来的领袖，这种出身使他不要象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那样令人防备。既然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便也就成了个是否存在都无所谓的人物，可以轻易地由其他惟命是从、才能平庸、严守纪律的工人来代替。很长时期以后，俄国人才明白了这一事实：他们的估计是错到极点了。至

于铁托这方面，显然是正确地看出俄国人愿意使用什么样的人作为他们指定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并始终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让人毫不怀疑地扮演了该角色。

1940年1月，当他终于被允许回国时，他被流感传染了。人们知道，铁托一生很少生病，这就是其中的一次。他依然在敖德萨乘一艘苏联商船去伊斯坦布尔。这次他使用的是一个入了英国籍的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加拿大护照，希望搭乘火车进入南斯拉夫。旅途中碰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在他下苏联商船时，受到新闻记者的纠缠，要他谈谈对苏维埃俄国有什么印象。他拒绝回答，避开了他们的注意力。他在豪华的帕克旅馆订了一个房间住下。他在伊斯坦布尔的逗留比原先计划的长得多，因为他发现由土耳其过境到南斯拉夫在战争期间需要签证。他通知萨格勒布派交通员给他送来带有伪造签证的新护照。在等待的期间他游览了城中名胜，他可能就是在伊斯坦布尔买了那只到现在还戴着钻石戒指。这戒指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兑换成货币，是战争时期一项经济有效的保险。但此后他却始终没有遇到必须变卖它的情况。

首先到的交通员是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他出身于萨格勒布的一个塞尔维亚名门望族，父亲曾任过陆军将军。他带来的假护照质量低劣，铁托不满意。在他一生事业的前进的阶段，他已从莫斯科活着逃了出来，还有那么多事情仍胜败未知，他决不能在进入南斯拉夫时被人发现抓住。对伪造证件他具有丰富经验犹如专家一般，可凭本能发现危险。他谁也不相信。他知道无论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共产国际、在党内，敌人到处都是，而且不能确定这些人都已全部被解决。他带信给萨格勒布要求再弄一份伪造得较为精致的护照。一位斯洛文尼亚

铁托传

姑娘终于送来一份，但他也感觉不能满意，无法使用。这时时间和金钱都差不多快用完了，而且他发觉土耳其警察已经开始对他产生怀疑。他又重新拿起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加拿大护照，在那个学建筑的姑娘的帮助下自己伪造了一份从南斯拉夫过境的签证。后来铁托叙述说：“最后，当土耳其警察在我后边死死地监视时，我就购买了一张乘意大利船‘萨伏亚伯爵’号去美国的船票，那时候这船还停靠在那不勒斯。”他这就有了合适的理由乘“东方”号快车横穿南斯拉夫到意大利。这段行程中的危险时刻是在火车经过南希边境处的杰夫杰利亚站时。边境警察拿起了他的护照，从上面发现他曾到过苏联，就开始不停重复询问他在那里干些什么。铁托回答说，按合同他在那里当工程师，如今正回家到加拿大去。因为护照上他是英国人，警察就相信了，还给了他护照。“真遗憾他是个英国人，”铁托听见其中一个警察说，“否则就可以把他抓起来。”火车在两日后到达萨格勒布，铁托下了车，很快在那里便消失了。这时已是1940年3月底。归国之行总共花了三个月。

铁托外出期间，党内尽全力维持大部份地区的日常工作。现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萨格勒布，管理上极度混乱。这是因为党接受了一桩令人很难为情的宣传任务：把人民阵线年代的成功政策颠倒说法。对大多数党员这都是个痛苦的事件，因此造成的精神上的深深创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至今都不愿再提及它。由莫斯科下达的党的方针路线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它威胁着苏联，而苏联是所有中立国家和进步人士必须在它背后团结起来的共产主义堡垒，是惟一能够保全和平的国家——至于它的和平意图，则已在它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中显现出来；俄国是惟一能够保护巴尔干半岛各弱

小国家的国家。把苏联的政策宣传为既具有高度原则性而同时又是暂时适应之计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但是党的宣传家们竭尽所能把宣传这一观点的传单和各种指示传播了出去。

“希特勒对英法帝国主义者开战，并不表示共产党人就应该对希特勒作战，”党所散发的一本革命小册子说，“相反，它表示英法帝国主义者是帝国主义镇压苏联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先锋部队。”它把俄国对乌克兰、芬兰和白俄罗斯的侵略描绘成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原先执行的和平政策，以及与苏联为保卫小国的权利与和平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精神上是相协调的。苏联签订这项互不侵犯条约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免遭战争狂的暗算，是为了把战火只限于欧洲，使小国避开战祸。共产党的某些宣传员，忙于为苏联找一个承担责任的替罪的人而忘乎所以，把话说得更过火。一张在劣质纸上打字的，显然是本地劣制的传单，指责英国金融寡头为了保护他们统治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性霸权，正在诸如艾德礼、西特林等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进行着战争。另一张传单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两样。英法想强迫德国屈服，以便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帝国主义统治。说法国和英国正在为民主、为小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是完全的谎话，是莫须有的。芬兰战争是被英帝国主义间谍挑起的，其目的是把苏联拖下战争的大海并利用芬兰作为向俄国进攻的基地，干的正象他们二十年前那样。”

铁托外出八个月回来时，发现党内一片混乱，因为《苏德条约》震惊了大部份党员，许多人没有能根据新的宣传方针的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来个突然相反的大转弯。铁托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看待的。他在俄国的经历没有使他为

铁托传

南斯拉夫革命而奋斗的决心动摇。而在这个时期，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仍无法想象。苏联制定的政策既然不能改变，那就只有接受。他所面临的麻烦是，既要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西方盟国，而又不饶恕纳粹主义。南斯拉夫被直接卷入战争，但是他确信这在所难免，他准备利用这场战争作为革命的某种转折。他集中力量作出切实安排以确保党组织在全国基础上有效地建立。他在萨格勒布党总部定期举行政治局会议，他各地走动，与领导干部直接接触，多次在党的基层小组会上发表演讲。铁托十分小心，所有这些活动他都通过秘密电台报告给共产国际。这座电台是在韦莱比特帮助下装设的，安装在萨格勒布的一间房子里，由共产国际雇员伊万·科皮尼奇负责。当驻扎在贝尔格莱德的俄国情报机关招募了一些铁托自己的工作人员为他们工作时，他抱怨了一顿，但也没有闹大这事。自担当南斯拉夫党的书记以来，铁托第一次感到可以比较自由独立地按自己的意志工作了。

在南斯拉夫直接卷入战争之前他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党的会议。希特勒的军队连续地蹂躏了许多国家，卷入战火显然只是早晚的事情。上一次党代表大会在1928年11月在德累斯顿举行，正值铁托长期牢狱生活开始之时。这是由共产国际组织的，年轻的高尔吉奇在会上被任命为新的书记。现在铁托有意让大家看看他比高尔吉奇出色的多。他在夏季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布命令，让他们指定代表或召开会议选举参加地区会议的代表，地区会议再为大会选派出代表。他亲自参加了大部分地方会议：一次在波斯尼亚的主要城市萨拉热窝；一次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所私人住宅内；一次在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野外的一个小村落里。一次是在门的内哥罗的扎勃利亚克的群山

间，他乘飞机到达那里，接着由一辆私人司机开的汽车把他从小小的机场送往开会地点。一次在萨格勒布的一间咖啡馆举行会议，还有一次则在多瑙河以北伏伊伏丁那一所位于葡萄园里的别墅中举行。所有这些工作胜利结束后，他便开始为大会作出安排。

1940年10月17日至19日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萨格勒布郊外一幢小屋内召开。这时，正是墨索里尼发动进攻希腊之前的一星期。负责大会各项准备工作的是一个工作组，包括铁托、克罗地亚党的书记拉德·昆查尔，两个党员和党的专用汽车司机布兰科·马莱希维奇。每件事进行得绝对的秘密。要提供一百零一名代表的食宿，而又不能引起邻居和警方的怀疑。这需要租赁一幢房子，打通两间便成为一间，在它的头端上安置了一座主席台，挂着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党员工人赶着制成的轻而方便的椅子，在伪装下被搬进这所房子。女党员负责操办伙食，但代表们必须自带面包，因为这所房子里没有办法烤面包。最为重要的是旅途安排要做好。向全国各地代表发出指令，要求他们陆续赶到萨格勒布，到达的时间不要在同一时间，以便大会组织人员可以到预定的地点去迎接他们，然后带他们到达只有少数人才清楚的会场。代表们都必须能够证实自己的身份。然而，还是没能避免出了一些小差错。门的内哥罗代表不失民族风采，在接头人还未证实自己身份之前差点儿朝他射击；波斯尼亚代表到达火车站时无人前来接应，他们害怕在站前久久停留引起怀疑，只能在树木丛生的城郊露宿。代表们于10月17日和18日到达，都拥挤在这幢房子里。会议于10月19日星期六上午八时三十分至下午四时召开。

铁托传

每位代表均须填写一张表格，介绍自己的情况，其中包括党员登记表的号码和登记地点、年龄、党内工作职位，是否因为从事政治工作服徒刑，处于何种社会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还是其他成份等。党的工作人员详细地对这些情况加以分析。一百零一名代表中，三十三人是工人，十四人是农民，二十九人是知识分子，五人是雇员身份。代表平均年龄是三十三岁，平均党龄为九年，曾被警察分别逮捕过的有八十名代表，曾在狱中服过刑的有四十名代表，平均刑期为二年。代表们得到通告，在结束会议后离开这幢房子之前，所有会议记录一律必须撕成碎片，然后将碎片交给门口的工作人员。在整个会议期间，都有同志值班，在这个地区巡逻。这些防范措施大为成功。没有人被捕，警察只是事后才得知这次会议。

在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历程中，党的第五届会议终于被视为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党从此成为独立自主的党，并在本民族的领导人的手中掌握，用党内的话来说，也就是在“最优秀、最革命的干部”手中掌握。共产国际没有正式代表出席这次会议。

最近结束了十四年监狱生活又在比累恰的一处臭名远扬的政治犯集中营呆了几个月的莫沙·皮雅杰致欢迎词，宣布会议开始。他是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十二名主席团人员之一。其余十一位中有铁托、洛拉·李巴尔、卡德尔和马其顿人梅托迪耶·沙托罗夫，此人是奉共产国际的命令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会议的，后来和铁托在战时方针上发生严重分歧。按传统的会议程序，领导人要论述自上届大会以来的发展，事隔十二年了，这就意味着有许多痛苦不堪的、充满争论的历史事件必须商讨讨论。

铁托传

铁托亲自就这些最细微奇妙的问题作了报告——党内争权夺势斗争的始末，制订对外政策方面的种种困难以及过去十二年来一直反对南斯拉夫现政权这一多少简单一些的题目。他还花费一些时间谈到他自己重新组建党的工作，其中包括“清除”不值得信赖的分子。他再三强调“干部”的重要性，“干部”就是那些为革命献身、忠心耿耿的男女，尤其是年轻人。他尽力避免回首往事，集中精力展望未来。在他的讲话后接着进行了准备充分的讨论，发言的有二十五名代表，代表全国所有地区。

本届大会与先前的各届党的会议不同之处在于，这次会议铁托要形成一种团结一致的联邦制的观念。在这个联邦中各个领域仍保持着自己各自的特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有了自己的党组织，其他地方，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达尔马提亚、马其顿和伏伊伏丁那成立了地区委员会。科索沃—梅托希亚和其他比较小的地方建立了区委员会。一种与保罗亲王和亚历山大国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中强加给人民的国家中央集权的观念截然不同的新设想正在形成。没有任何别的党派具有这样富于开拓精神的计划。

联邦制问题是南斯拉夫本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所有政治生活的关键问题。它一度是维多夫丹宪法中有争议的关键，也曾是斯大林研讨过的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马·马科维奇曾因为它而大丢其脸。在三十年代，铁托曾为它进行过斗争，而即使到七十年代它仍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1940年萨格勒布大会上，铁托在选举和意见上获得的团结一致，一方面不是最终的结果，也不像它形式上看来的那样绝对。各区域与中央的相互关系，这一区域与那一区域之间的关系仍将是

铁托传

铁托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战争强有力的威胁之下，铁托的坚强而又有力度、充满信心的领导赢得了强烈的支持。可是，这并不象征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敌对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也不代表马其顿的分裂主义和一部分马其顿共产党员的亲保倾向已被摒弃。团结仍只是表明意图，还不是实现了的巨大成就。大会在热情洋溢、欢欣鼓舞的气氛中结束。有一点确定无疑的是，得知大会已圆满结束而未被侦破时所引发的愉悦，更使这种情绪增强了。这是最后一次在不合法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最后，铁托这样鼓舞人们：“我的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决定命运的时日，前进！这已经是最后的斗争。下一次我们的大会应该在一个既没有外国人又没有资本家的国家里召开。”

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铁托在战备政策方面有了转变。德国与西方的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 1939 年夏天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引起的震动的影晌，党所实行的是反对为南斯拉夫军队征募士兵和征集预备役军人的方针：在泽蒙兵克拉古耶瓦茨、瓦列茨工厂和飞机制造厂鼓动工人举行罢工；在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别的城市组织了声势浩大反战示威游行。共产党坚持这一方针，并曾有过一些怪异的同床异梦者：极端的克罗地亚分裂主义者、乌斯塔沙分子和塞尔维亚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切这些共产党的宿敌也都反对战争，并且加入到由共产党组织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的队伍中。

在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由于战争在所难免的形势已越来越加明显，党对服兵役采取了新的措施。为了使共产党人自己得以受到军事训练的机会，也因为认识到这

是在军人中使对共产党的支持得以扩大的惟一途径，必须鼓励共产党人参军，因为军队能够在对暴动进行镇压，或象 1917 年俄国发生的事件那样，在使局势向有利于起义者方面转变起到作用。军队中的工作现在便有了头等重要的特殊意义。铁托的现实主义头脑足以认识到如果不派共产党员参加军队，则将无法对士兵产生影响，无法使军队中种种不满情绪转变为党的资本。这个时候军队中只有几个三、五人的基层党组织，而且它们还不能进行积极活动。

在战争还未开始之前，南斯拉夫军队仍按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塞尔维亚军队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仍由许多当年的旧军人担任指挥官，既没有实现机械化，也没有几件先进现代化武器。它除了有二十个步兵师，还有一个近卫师，外加三个骑兵团，马匹占运输工具的大部分。它接受的是堑壕战的军事训练，完全和纳粹的坦克闪击战术不相适应。军队纪律严酷而影响积极性，也是引起不满情绪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它还是塞尔维亚军官、军曹对异族，特别是对克罗地亚人实行种族歧视的工具。这对共产党的工作有利，也使不融洽现象有所助长，从而导致许多克罗地亚人于 1941 年德国人入侵南斯拉夫时避而不战。

铁托在大会报告中建议的政策，必须在战争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实施。他需要给党建立起一个坚强而有力量的中央司令部，需要挑选值得信任的区域领导人，军警需要建立一个在警察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监视下仍能畅通的强有力交通网，他需要可靠的人员担负各种性质不同的工作。除了党的官员以外，还急需大量的交通员。妇女、男人，甚至孩子都担负了任务。他需要秘密的印刷所，需要许多在秘密室工作的工作人员，包括

铁托传

伪造良民证、通行证及印制党证等的熟练工匠。造一张效果好的假护照至少需要两天，这是由于设备不但少而且简陋。需要有值得信任的特工人员，而搜集来的情报还需要人来核对、分析和加强管理。这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方才组织完毕，而且还引发了相当大的混乱。

局势造成的诸多困难，以及对纳粹和意大利的战争野心如何作出反应或如何加以利用，这种犹豫不定的心情在战争打响之前的几个月中，除共产党以外的南斯拉夫其他政治党派都受到了各种方式的影响。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马切克充当的角色特别暧昧。他的党历来对克罗地亚在南斯拉夫国家中的地位深表不满。他认为德国对中欧的侵犯的目的是为克罗地亚谋求某种形式的自治的机会，其途径是通过与意大利或德国进行秘密交易，或是利用轴心国扩张的巨大威胁迫使保罗亲王政府作出早应作出的让步。

众所周知，马切克曾企图勾结纳粹分子，而后者对他不感兴趣，于是他又通过一个旅居克罗地亚的名叫阿马德奥·卡内尔卢蒂的工程师和意大利政府接触。据齐亚诺日记和卡内尔卢蒂的证实，马切克本人主动达成这一接触。尽管他后来对此矢口否认，现有的证据对他很不利。最初几次谈判于1938年11月进行，那时意大利对支持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兴趣。直到1939年5月，在意大利侵略阿尔巴尼亚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卡内尔卢蒂代表马切克和齐亚诺就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的可能性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这个克罗地亚国在意大利保护下向外扩充，可能成为中欧一个天主教国家联盟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南斯拉夫联邦内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些谈判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因为马切克在同时与中央

政府举行的谈判中让对方作了广泛的让步，并将其写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五天也就是 1939 年 8 月 26 日签订的一项协定中。马切克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以茨维特科维奇为首相的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中的副首相。人们知道马切克还和伦敦、巴黎、柏林、布达佩斯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政界要人就未来的克罗地亚国家问题进行磋商，其中当然也包括他与温斯顿·丘吉尔的会谈。在战争前夕，马切克加入政府。英国的影响曾起过某些作用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已有一些密使在暗中对南斯拉夫施加影响，如能说服南斯拉夫成立盟国，则极力促成在一个长久稳定的政府。

南斯拉夫政府也正在进行紧张的复杂的外交活动力求保持中立，继续与德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并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墨索里尼实现其众所周知的分裂南斯拉夫的野心。甚至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南斯拉夫政府已把它的大多数黄金储备存到美国和英国。驱逐舰“贝尔格莱德”号于 1939 年 5 月 20 日，把七千三百四十四枚金锭卸在朴次茅斯，然后又把价值四千七百万美元的黄金运送到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英国大大增加了它在南斯拉夫的谍报人员的数目。但是这些都被很容易地抵销了，因为德国在经济上已经卡住了南斯拉夫的脖子：它控制了南斯拉夫的出口，垄断了归英法所属矿山所出产的贵重金属铜和铅。德国特务也和牛毛一样多，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北部土生土长的德裔居民中有很多人德国的特务。

因为希特勒在西部频频告捷——1939 年 9 月占领波兰；1940 年 4 月占据挪威；同年 5 月攻占荷兰、比利时；法国于 6 月失陷——英国的覆灭似乎指日可待，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开始实行孤注一掷的外交政策，以使自己的命运有所改变。他们竭

铁托传

力与宿敌保加利亚保持友好，提出在边界上割让土地作为诱饵，但因为德国向保加利亚出价更高而以失败告终。他们于6月25日与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便断绝了外交关系的俄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南斯拉夫政府曾经允许一位“沙皇”俄国的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保留一处使馆；但当1940年苏联宣布赞同维持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现状时，一位名叫米兰·加夫里洛维奇的南斯拉夫公使就被派到莫斯科去。

1940年6月10日，墨索里尼宣布参战支持轴心国家之后，整个夏季他都蠢蠢欲动，急于攻打南斯拉夫，只是因为德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才没有发动一次九月攻势。希特勒指示，在错误的时刻贸然采取行动，可能在巴尔干地区诸国中激起一片烈火，引发俄国干涉，甚至使英国向苏俄靠拢。但是，墨索里尼不听他的总参谋部的意见，改变计划于1940年10月28日开始攻打希腊。意大利军队没有迅速取胜，南斯拉夫南部边境日前似乎没有危险。事实上这却引发了更大得多的危险：德国向南斯拉夫施加更大压力，强求允许战争物资从国家内过境，破坏它的中立，并坚决要求南斯拉夫参加三国公约。希特勒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说：“如果我们对南斯拉夫尚且拿不准的话，就不能在巴尔干地区贸然发动战争。”就在这时，借助英王乔治六世致保罗亲王的信件，丘吉尔写给首相的信件，经由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又通过美国一位特别密使威廉·唐诺文，英国也开始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坚决要求它不要加入轴心国。德军于1941年2月，开始占领罗马尼亚；3月，又占领了保加利亚。环绕南斯拉夫的包围圈正在逐渐缩小。

希特勒这时以为南斯拉夫政府将与轴心国合作。1941年2月14日，他召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去会见他。然后紧接着于3月4日，也就是保加利亚加入1940年9月27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联盟公约以后的三天，保罗亲王对贝尔特斯加登进行了访问。经过五小时的双方会谈，希特勒确信虽然保罗亲王表面上有些不愿意，他仍将对签字表示同意。保罗亲王回国以后，3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内阁会议，参加的八位大臣一致投票同意签署这一条约。

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立即执行。在这个期间保罗亲王及其政府仍然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巨大压力，警告他们不要以为签约而一笔勾销自己的中立立场，而应该参加同盟国并且一起在希腊作战，那里有一支象征性的英国军队正在帮助希腊人对墨索里尼的侵略军进行抵抗。南斯拉夫政府和双方都保持接触的局面，同时继续努力拖延在条约上签字。他们这个时候得知，希特勒攻打苏联的准备已提前完成了，因而绝望之中还有最后的一丝希望：假如德国对苏联的进攻非常及时地发起，他们还可以免去被迫作出选择。

南斯拉夫驻柏林的武官是弗拉迪米尔·瓦乌赫尼克上校，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情报人员。他从许多可靠消息来源得到了关于希特勒计划进行的这一进攻的准确情报。向他提供情报的一位很有见识的德国人对他说：“老兄，这意味着德国将要灭亡。”瓦乌赫尼克获悉德国将于1941年5月下半月以二百个师的兵力对俄国发起攻击。瓦乌赫尼克把情报分别呈报给南斯拉夫军政双方首脑，但始终未告诉他情报已送到，从而也就无法肯定它对南斯拉夫官方政策的决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这肯定说明了希特勒决心巩固他在巴尔干诸国地位的原因。德国驻

铁托传

贝尔格莱德大使 1941 年 3 月 23 日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说，希特勒要求条约必须在 48 小时之内签订。3 月 25 日的午后，茨维特科维奇和外交大臣青察尔—马尔科维奇就南斯拉夫加入希特勒的三国联盟公约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消息一经公开，在贝尔格莱德，反对这个条约的示威游行立即爆发了，有群众自发地，也有有组织有安排的。在塞尔维亚，对这一条约的反对尤其广泛和强烈——人群高呼“宁可战争，不签条约”，反对者有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各个派别的人士以及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至于国内其他的地方，尤其是克罗地亚，舆论则并不像这样完全一致。一旦条约签订则应采取什么行动，包括英国情报人员在内的一小部份人已有周密的布署。丘吉尔电告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时说，不要“忽视我们可能必须得采取的其他任何途径，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已经走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称为特别行动局的英国情报部的首脑休·多尔顿秘密命令他的特务“利用一切手段发动一场革命”。因此，他说：“一切已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

英国广播公司欧洲联播网于 3 月 26 日向南斯拉夫播送了利奥波德·艾默礼的一篇演说。演说热情呼吁南斯拉夫人抛弃那个罪恶的条约。

如果人民明确表明他们认为参加轴心国条约是出卖独立和荣誉，那么政府必定有责任和义务在该条约批准之前同人民商量。不，要这样做还不迟。南斯拉夫的整个前途正处于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其实大部份塞尔维亚人不需要鼓动。在条约签订之前，南

斯拉夫空军司令杜尚·西莫维奇将军于3月23日觐见保罗亲王，重申了他曾经发出的警告——如果条约签订的话，他不能保证部下军官不哗变而推翻摄政王的统治地位。事情恰恰就这样发生了。在1941年3月26日和27日之间的夜里，一部份陆军和空军军官非常成功地发动了推翻摄政王及其统治政府的政变。在这次政变中只有一个人丧生，他是一个军官，他拒绝交出无线电台的权利。保罗亲王也被废黜，并被迫离开了南斯拉夫。新政府以年幼的国王彼得的名义开始了。由一个和国王声音非常相似的人以国王的名义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上午9点，国王本人在收音机中听到了广播，直到几个小时以后他才对这个讲话表示认可。

政变的幕后操纵者是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保罗亲王政府的空军准将博拉·米尔科维奇。为发动这次政变，他曾经找过一些军官企图寻求帮助。他们拒绝支持他的行动，但是出于鼓动他们的目的，西莫维奇将军允诺如果政府被推翻，他就可以出任政治首脑。这次政变得到了塞尔维亚人的广泛支持，他们不支持摄政统治下的缺乏民主和亲德政策，或对这一政权怀有个人的极大怨忿。一些真正具有南斯拉夫先进思想的人们支持了这场政变，不但有塞尔维亚人，还有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另外一部份人，他们认为签订条约将导致德国人瓦解自己的国家，而这也就是南斯拉夫的尽头。英国人经由英国陆军和空军武官以及西莫维奇将军的朋友米尔科·科西奇，与米尔科维奇将军保持密切联系。人们普遍认为他曾促使或帮助许多人参与密谋。

共产党人并没有参与这次政变。但他们于3月27日晨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镇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示威的

铁托传

时候共产党人高举着典型的共产党标语，强烈要求“与俄国缔约”，“宁进坟墓，不作奴隶”，“贝尔格莱德——莫斯科联盟”，“苏联是伙伴”，还有引用铁托的新政策的“我们要保卫祖国”。

还不能说政变成功之后政府就一切恢复，因为德国的反应这一关键性问题仍未获解答。新政府的外交大臣莫姆契洛·宁契奇在他做完手术之后，“两耳全聋，面色惨白”，就在他在卧床休养期间，即被从床上恶毒地拖起，他企图执行新首相西莫维奇、副首相马切克和各党派组成的内阁所同意的政策。这就是以不对前政府签字加入三国联盟公约加以指责为条件，以求使德国人的怒气得以平息。与此同时和英国人的非正式会谈正在举行。英国帝国陆军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于4月1日微服私访贝尔格莱德。除此以外，在希腊与威尔逊将军、安东尼·艾登举行谈判，看看可得到哪些实物援助。这些交涉没有一项能使人完全放心。也为缔结军事政治条约而与俄国进行了磋商，结果只缔结了一项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对南斯拉夫的政变勃然大怒。3月27日下午二点三十分他发布了进攻南斯拉夫第二十五号指令，抓紧时间占领它，并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空袭。与此同时在南斯拉夫的德国人加紧活动并把驻外使馆人员迅速撤走。德国人利用间谍德富勒先生和马切克接头，以克罗地亚独立为价码试探他。4月1日萨格勒布的德国领事馆接到李宾特洛甫的电报：

为回答各部门送到的有关马切克博士希望我方提出建议的要求，请将如下奉告，……我们力劝他和其他克罗地亚的领导者，勿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合作。对我们提出这一建议一事不可泄漏半字。如果他顺从的话，我们将与他们

铁托传

密切的配合。他必须有绝对可靠的联络人，保证通讯联络在他一方的正常运行。

马切克通过另一个中介人告诉德国人，他认为他有理由去参加南斯拉夫政府来应付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可能爆发敌对行动。他抱怨说，他曾要求供应武器用来组建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但是德国人没有答应。两方同马切克都在谈判，这一点德国人不会不知道。

时间是相当紧张的。瓦乌赫尼克上校在柏林与平时一样听取了有关向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命令的准确又可靠的情报。4月1日，他听说进攻的确切时间定于4月6日。他把该消息通过三条不同的途径发往贝尔格莱德，但成功与否无法得知。4月2日凌晨三点钟，他的电话铃跟往常一样响了三次。这是到汽车房旁一堵墙上的裂缝中接收情报的信号。他走过熟睡的两个监管人的身边，找到了这个便条，上面写道：

会议结束。进攻南斯拉夫的时间已确定于4月6日。东面从保加利亚，北面从匈牙利发起总攻围歼战。愿上帝的保佑和我最真诚的祝福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与你们同在。

瓦乌赫尼克发出一些绝密电报并派遣助手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传达这一警报。而贝尔格莱德的官员们不太相信他的警报，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相信瓦乌赫尼克的情报来源。事实上他的情报来源却是最好的了：这不是别人，而正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外事及后间谍处的上级长官卡那里斯海军上将，他通过自己的助

铁托传

手汉斯·奥斯特少将与瓦乌赫尼克联系。西莫维奇对瓦乌赫尼克的警告竟然无动于衷，他竟然决定于4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给女儿举行婚礼。

1941年4月6日，星期日，凌晨五点五十分，德国轰炸机群一批批地涌来，袭击了根本毫无一丝准备的贝尔格莱德。炸死差不多一万人，毁坏了这个城市的大部份地区。同时，德军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部队的配合下快速攻占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军队在极度混乱中完全丧失了还击能力。德军全部伤亡为五百五十八名，其中三百九十二人受伤，一百五十一人阵亡，十五人失踪。4月15日，南斯拉夫政府及其国王逃离本国，先希腊，后中东。当天，南斯拉夫代表根据国王指示在贝尔格莱德接见并屈服了德国冯·韦克兹将军，同意投降，并于4月17日在投降书签字。代表南斯拉夫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扬科维奇将军和青察尔·马尔科维奇。南斯拉夫被打败和占领，总共不过十天。

第三部分
通过战争开展
革命运动

铁托传

第十章 从党的领袖到军队统帅

入侵南斯拉夫不可能是纳粹长期计划的必要环节，倒可能是一个战略失误，只不过为了宣泄希特勒对3月27日政变的心中怒气。德军虽然制订了入侵巴尔干各国的临时计划，代号是“第二十五号行动”却证明南斯拉夫之役属于权宜之计。对所占领的地区只得仓促处理，履行向南斯拉夫的邻国许下的诺言和确保德国自身战略需要之间存在极大冲突。决定是于4月下旬在德国外交部和希特勒的总部召开的一连串会议上作出的。由于被迫拖延执行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希特勒暴怒不已。他把这迁怒于塞尔维亚人，用最能反映其本质的恶毒语言咒骂他们。他借口说政变是由“黑手”党策划的，1903年刺杀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奥布廉诺维奇事件，1914年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甚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这个秘密军事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必须灭亡，塞尔维亚必须严惩，这是希特勒亲自作出的决定，但他也包括了他的专家们的建议：塞尔维亚还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和对历史的含糊理解的影响，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他一直是反塞尔维亚的，而铁托抗击德国占领塞尔维亚的军队取得的早期胜利，更使他忍无可忍。

不仅如此，希特勒一再说过，他对南斯拉夫的总的看法是，德国对南斯拉夫的领土并无兴趣，但是他对它的食品和原

铁托传

料，特别是对塞尔维亚的铜和克罗地亚的铁矾土极感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在军事交通上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其地跨希腊和爱琴海的南北通道，中欧到黑海的东西咽喉。希特勒想用最简单的方法，使用尽可能少的兵员把它控制住。

南斯拉夫不复存在了。它被肢解成十个区域，由八个不同的占领当局临时管辖。德国控制了斯洛文尼亚北部的三分之二地区和塞尔维亚的大部——大致相当于 1912 年前塞尔维亚王国的全部面积。这就使它控制了跨越巴尔干山脉和沿摩拉瓦河及多瑙河河谷的交通要冲。它占有了贝尔格莱德，把它作为“德国的城堡和驻防地”。尽管从 8 月末起，即推出米兰·奈迪奇，一位塞尔维亚将军充当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塞尔维亚一直是德国的统治区。意大利控制斯洛文尼亚南部的三分之一地区，包括里耶卡、卢布尔雅那南面的入海通道，还有克尔克岛、拉布岛和亚得里亚海北部的一些岛屿。它还占领垂涎已久的达尔马提亚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和沿海岛屿，其控制区域北起扎达尔，南到斯普利特，另外还包括科尔立拉岛和维斯岛。意大利还占领波斯尼亚的一小部分，门的内哥罗全部地区及其海岸线，还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科托尔港，以及科索沃——梅托希亚的一部分和新帕扎尔州的桑贾克，该州大部分地区，已归并于意大利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极大的一部分领土中则建成克罗地亚独立国，其疆域一直延伸到扎达尔以北的海岸，又从斯普利特延伸到杜布罗夫尼克以南。按说它是个王国，但无人继任王位，因为这王位属于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侄子斯波累托公爵，但他宁愿留在罗马，而不愿继承王位。“他同一个女人鬼混，”齐亚诺曾轻蔑地写道，“和她一起驱车四处兜风，经常出入酒吧间和夜总会，

喝得酩酊大醉。”保加利亚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领土，它尽快占领并使之保加利亚化。与阿尔巴尼亚接壤的部分，和科索沃一起划归意大利统治下的大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占领了巴奇卡、巴兰尼亚和多瑙河以西的部分地区，而多瑙河以东的巴纳特地区则由当地德裔居民进行管理。这种瓜分方法是为了保证德国得以对整个地区在战略高度上进行控制，并通过分而治之的办法实现政治上的长久统治。这种自私作法使得除德国以外的所有受益者都强烈不满，就边界问题互相争吵不休。克罗地亚独立国的统治者对于把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划归意大利统治只是勉强接受，实际上早已忍无可忍。

各个不同的占领当局，各自不同的占领方式和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使德国对巴尔干丰富的经济财富和战略交通的控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被动挨打。这种情况后来遭到某些德国人的指责和批评，说这样只能便利了抵抗运动。铁托的抵抗运动时常利用这些分歧，而国家的分裂状态极可能助长南斯拉夫民族感情的复苏，铁托的抵抗运动在战争期间得到迅速发展，这种民族感情正是它的力量的一部分。

在德国入侵南斯拉夫期间，铁托依然以巴比奇工程师的身份和赫尔塔·哈斯以及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住在萨格勒布郊区一幢小房子里。3月29日，他乘飞机到贝尔格莱德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商讨对待政变的应策，并亲自去观察那里的形势。他很快又回到萨格勒布，因为必须守候在秘密电台附近，便于和共产国际始终保持联系。他通过从一个经常收听德国广播的邻居那里获得德军轰炸贝尔格莱德的消息，急忙与当地的共产党人联系，给了他们一桩虽然毫无成功希望但至少是应该试一试的具体任务，也就是请求当地驻军司令武装工人保卫国

铁托传

家。萨格勒布局势十分紧急，如事先所预料一样。4月10日晚，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上校控制了广播电台，宣布建立一个由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巴维利奇博士为最高领导人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当时此人仍在意大利，在国内有一大批追随者的马切克，支持关于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的构想。克瓦泰尔尼克和克罗地亚许多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克罗地亚的方济各会教士，德国人对此早已了如指掌）一样，一个时期以来始终与乌斯塔沙保持联系。于是，巴维利奇于4月15日凌晨顺利到达萨格勒布。

事态发展异常迅速，加以对未来的恐惧与难以预料，使人们毫无所措。惨痛的日子更加激励铁托生气勃勃地开展活动。危险当前，反而激发出他全部的战斗意志和领导才能，这就是他的典型特点，他一生中有多次这种情况。为了使他在过去几年中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不至于在战乱中支离破碎，尘飞烟灭，他只有拚命工作。这时党已经建立起一个组织极其隐秘的地下交通网，这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幸亏党的总部及其地下印刷所都设在萨格勒布，没有遭到破坏，因而得以从那里和由于德军入侵而分散各处的党员重新取得联系。在战争和敌人占领的紧张局势下，这是多么艰难啊！

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各国军队正在南斯拉夫各地调动。路上挤满了四处逃窜的逃兵和难民——抛弃军装和武器、在遭到逮捕以前设法回乡或躲藏起来的南斯拉夫士兵，试图在边界封锁之前回到国内地区与家人团聚的难民。还有一些外国人和政治难民，其中包括一些英国人，他们已经由萨拉热窝逃到海边，大部分人却被意大利人逮捕。运输工具被征用，很难搞到汽油。电话、火车和公共汽车不是时断时续就是

完全中断。共产党秘密情报网的交通人员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情况，避开大路，通过偏僻小道来往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尽管如此，铁托仍千方百计和他最重要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德军于4月10日开进萨格勒布时，他和几个人正在家中开会。

由莫斯科制定然后通过无线电联系下发给铁托的党的总路线说得很明白——战争仍然是两个资产阶级法西斯对手之间的较量，王国政府的惨败并不值得惋惜。党号召党员抵抗德军，但是，只要纳粹还被认为是俄国的同盟者，就无法号召人民起义。对共产党与对民族主义的忠诚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是首先问题。因为1941年春天，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气势汹汹，共产党人既无武装，组织又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根本无法进行抵抗。铁托只能听任局势发展。他确信战争已给予他在南斯拉夫领导和发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确信苏联必然需要这一革命，并且会给以援助。果如所料，他没有等待多久。

铁托在4月10日党中央委员会上作出决定：务必告知共产党员搜集并保存武器以备将来使用。还应重建党的地方小组，秘密进行使用武器和急救的训练。他们有必要搜集当地的情报，搞明白谁同占领者合作，谁反抗占领者。党员之间必须建立交通联系并与铁托的总部保持联系。还决定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由铁托担任主席。这一军事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后来一起迁往贝尔格莱德，这里有利于同全国联络。铁托本人在那里鲜为人知，也不会为人出卖。人们不得不承认，既然许多克罗地亚人支持建立一个克罗地亚独立国，克罗地亚便不会成为一个对占领者发动抵抗的理想中心。只是到了后来，当这个国家的残暴的法西斯本质和缺乏真正独立这两点显露无遗，许多人才改变了观念。而在塞尔维亚，铁托由于对抗过德军得到

铁托传

更多的支持，同时搜集到更多的武器，因为那里饱受德军欺凌，而且抗击外来的土耳其军队侵略的斗争传统仍然铭记于心。

迁往贝尔格莱德的另一有利之处是铁托在党内更具有权威地位。由于设在贝尔格莱德一位医生家中的、直通莫斯科的秘密电台被德机炸毁之后，同莫斯科的惟一直接联系便只能靠萨格勒布电台，但其报务员瓦尔戴斯即科皮尼奇受雇于共产国际，并非铁托部属，这种情况使铁托越来越感到无可忍受。虽然他也认为应按共产国际的命令行事，却并不乐意听任科皮尼奇篡夺他的最高权力而直接向萨格勒布党组织发号施令。那年夏天，铁托离开萨格勒布去塞尔维亚后，科皮尼奇就曾趁机那样做，但以失败告终。

铁托暂时留在萨格勒布，准备在门的内哥罗、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召集共产党人开会。在巴被得保加利亚军队4月19日占领的马其顿突然发生的事件使共产党的处境愈来愈艰难：马其顿的党组织书记，亦即铁托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沙托罗夫（沙尔格）拒绝执行铁托的命令，计划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共同合作。两党就共产党对马其顿的控制和重大策略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这场辩论很长时间才得解决。这时从全国各地还传来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和杀害的消息。同月，巴维列奇着手推行他那惨无人道的消灭所有不愿投降天主教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暴力行动，要把克罗地亚变成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纯民族国家。

5月7日，铁托被迫匆匆离开萨格勒布，他险些被捕。城内充满了乌斯塔沙军队、德国兵、警察密探和盖世太保。当时占领军征用车辆，为了不引人注目，铁托没有交出他的福特

铁托传

汽车，而是雇用了工人建造一堵墙把车藏在汽车房里。一个工人发现并报告了警方，不多久就有警察搜查他的住宅。铁托非常幸运，他这时外出到萨格勒布市内去了。他的一位亲戚急忙跑去报信，铁托于是赶紧乘夜车去贝尔格莱德。到达车站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走在他的前面，越过站上的警察检查站，以便确实弄清当晚是否实行特别检查，是否需要更换护照。他把赫尔塔·哈斯和他年幼的儿子留在萨格勒布，托朋友照管。以后他从未在萨格勒布住过，这实质上也就是他与赫尔塔的家庭生活的结束。

5月底，铁托获知德国将入侵苏联。南斯拉夫投降后，留驻塞尔维亚的德，第六十摩托化师、第四山地师、第二十九步兵师，另有第一八三师的一个团，在司令官冯·韦克兹将军指挥下于4月末5月初被调走，而接替驻防的部队由年龄较大的士兵组成的三个师，这些部队只能防守，而不适于执行较大战斗任务。也可看出德军正在从希腊向罗马尼亚进军。这些变动的意图很清楚，而且从一个德国军官对白俄的密谈中得到证实，然后传到铁托那里：俄国就要解放了。他把这一机密情报电告了季米特洛夫。铁托知道这预示着共产国际对武装活动的禁令从此解除，于是充满激情投入工作，使全国各地人民作好准备，一旦时机到来就立即开展武装斗争。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的消息，固然是令人震惊的新闻，毫无疑问却也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极度欢乐和兴奋异常的事件。郁积心头使人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和难以忍受的渴望终于到了尽头：他们已不再是一支孤军。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使南斯拉夫共产党自德苏协定以来，尤其是在纳粹入侵南斯拉夫的几周中，一直压抑的能量爆发了。虽然依旧听命于共

铁托传

产国际，但是如今它下达的命令已与民族感情相一致，不仅允许南共呼吁人民给予爱国主义支持，而且要求南共立即进行抵抗。如今，再不会与苏联的愿望相悖。南斯拉夫共产党感觉到，只要认真贯彻执行苏联的命令，便会得到它的援助和赞扬。7月3日，斯大林全面呼吁，号召在德军后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德军攻打苏联几小时以后，“老爷子”季米特洛夫用“老爷子”的化名通过无线电发出一项十分明确的命令：

德国见利忘义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发动进攻，不只是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同时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攻击。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相当于保卫被德国攻占的各个国家的人民。南斯拉夫各民族现在具有发动广泛的解放斗争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机会。采取一切活动来帮助和便利苏联人民的正义斗争十分必要。……这一努力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胜利的重要的一部分。要知道当前的问题是怎么从法西斯统治下求解放，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天下午，铁托在设于贝尔格莱德莫莱罗瓦大街一座私人寓所一套房子的党的总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当大家就这种新的形势展开讨论的时候，铁托草拟了一份宣言，那份宣言立即送到秘密印刷所并在当晚发出。这份宣言是激动人心而又相当谨慎的：

决定命运的时候来了。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决定性

铁托传

的一战已经开始，……南斯拉夫各地的无产阶级，到你们前线的战斗岗位上去。紧紧地团结在你们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周围，……让你们的血液与英勇的苏维埃人民的宝贵的血液流在一起吧！

花了好些天，这些传单才遍及全国。显然，破坏活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铁路干线于6月23日夜间受到偷袭）需要某种形式的指导与调节一致才能取得最大成效。6月27日，铁托召集中央委员开会，决定成立人民解放游击队司令部。铁托后来曾谈到运用“Partisan”这一名字，是因为想到当年拿破仑进攻西班牙和俄国时也曾用过“Partisan”在敌后作战，在斯大林的告苏联人民书中也使用了这一名字。实际上，早初用的是“guerrilla”一词，几星期以后才改用“Partisan”来称呼铁托的部队。会议还决定派遣十二名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分赴全国各地去指导和组建游击队。还没有发出总起义的命令，南斯拉夫共产党对此还没有作好准备。但是，到7月1日，“老爷子”又发来新的指令：

共产党人一定要对入侵者发动一场公开战斗，这一时刻已经来临，一刻也不要浪费，要在敌后组建起游击队，开展游击战，……希收到上述指令后复电告知执行情况。

铁托执行了指令。7月12日印发了一份新的特别报告，7月25日又重新印发，重复了共产国际的宣言：

南斯拉夫人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铁托传

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其他各族人民，我们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在一起进行战争，打击杀害我们人民的侵略者及其帮凶，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不要在侵略者的恐怖面前动摇。猛烈地打击法西斯侵略者占领的重地，来回答敌人的凶残。

这一起义的号召书尽管有着激昂豪迈的语言，但事实上并未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一段时间之内，也仅仅在条件有利于武装起义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等地举行起义未能得到民众普遍的支持，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还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无组织状态。但各个地区发生了许多次的破坏活动。7月1日，在塞尔维亚的贝拉·茨尔克瓦村，有一个曾参加在西班牙内战的共产党员齐吉察·约克诺维奇，在村中街道上煽动一大批农民参加游击队进行抵抗运动，宪兵企图逮捕他，他打死了两名宪兵，然后逃脱。人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预示着最终给铁托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带来胜利的起义即将开始爆发。

当铁托带领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一部分参谋人员留守在贝尔格莱德的司令部时，其他最能干最信任的副手则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很多一部分是到他们的家乡去。来自克罗地亚的报告分析说，甚至党的领导干部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情绪。报告还说，正确的精神，即共产主义的精神和南斯拉夫高于一切的精神不可能占居统治地位。一个叫安德里亚·赫布朗的人被从这个地区排挤出去，此人后来果然声名狼藉。卡德尔来到斯洛文尼亚去试图消除当地共产党员对在那里发动武装起义是否可行的疑虑。斯洛文尼亚的起义于7月22日爆

发。斯维扎尔·伏克曼诺维奇，一般人们只知道他的化名“泰波”，则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相互协作。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于7月27日爆发起义。整个抵抗运动都从门的内哥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受到极大鼓励。德热拉斯在这里很活跃，7月13日，全境举行了起义。在这个多山且荒凉的国家内除几条难行的交通线两侧之外，意大利人根本无法占领。这些门的内哥罗人如今又在传统的盟友俄国人援助下战斗，头脑冲动，缺乏理智。他们在门的内哥罗全境纵横驰骋，劫掠烧杀，杀意大利人，也杀任何不积极支持起义的本国人。德热拉斯对自己同胞的这种暴行简直无法控制。他们夺取了大批武器，这一年的年末，除了驻兵的波德戈里察和策丁耶两地之外，意大利人全部被从所有的城市赶了出去，经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又打了回去。

铁托也面临一个门的内哥罗难题：德热拉斯和另一些党员不顾“老爷子”关于不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决定，开始经由苏维埃建立极端形式的政府，杀死对手并以暴力方式报复敌人，因而严重破坏了共产主义事业——如铁托所指出的那样。他不得不把泰波派往门的内哥罗去控制局势，解散那些革命的苏维埃。7月底，大批游击队员在塞尔维亚境内破坏铁路线和电讯联络，突袭孤立的敌人据点、军火仓库、地方宪兵队和警察所，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德国人认识到他们也如同意大利人一样，被迫着手对付一场全面的抵抗运动。

为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铁托原计划在城乡组织小游击队从事活动；其中一部份要呆在山里和森林中，尽量避开敌人控制的交通线。正值盛夏，天气、茂密的树林和南斯拉夫的地形都给游击战帮了大忙。这个国家大部份是山区地形，其中大部

铁托传

份又被森林覆盖，道路很少，特别是在高山上。铁托试图从贝尔格莱德的作战司令部搞明白已建立多少游击队，多少人从事战斗以及可以用作协调作战中心的营地地点在哪里。弗拉迪米尔·戴迪耶尔记了一部战地日记，记录了这一时期在贝尔格莱德与铁托有关的一些狂热的运动——暂时的忍耐和紧张的活动时期互相交替。情报由通信员传递到司令部，或者另外通过例如把情报写在香烟盒背面的特殊方法传递；还要监听各无线电台，并每日编辑公报。人们整天忙忙碌碌，每天都收到抵抗运动成员被警察或盖世太保逮捕的不幸消息。“武拉安蒂奇在国民银行被捕。今天早上米特拉从多尔佐尔穿过最繁华的大街到戴丁耶去。我告诉她绝不能这么粗心，她会被抓的。”戴迪耶尔在他的日记中谈道。她果然被捕了。

铁托的指挥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一位富有而出名的人士符拉迪斯拉夫·里布尼卡尔家中，他是自由派报纸《政治报》的主办者，也是共产党的地下成员。在工程师奈纳多维奇家里，铁托也有一套房间，在浴室盥洗池后面的一个壁橱里，有一个秘密进口通到顶棚下的一个隐密的藏身处，一旦警察搜捕，铁托可以躲在这里。他在这儿放了两只手枪和一些手榴弹，以备不测。他依然在城里东奔西跑，后来，危险更大了，他才不再出去，每天大部分时间在里布尼卡尔的幽静的大花园里劳动。他还得尽量掌握一切的军事行动，并且安排调配缴获、购买或临时军火工厂或车间制造的武器弹药，还必须了解德军调动以及警察和盖世太保活动的情报。对于当地的密探或各式各样的德国和塞尔维亚伪政权的合作者的情报更为重要，因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往往正是这些人干的。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从一开始就是铁托的情报机构的中枢。他在这一工作上表现出特殊的专

业才干。

1941年7月末，兰科维奇毕生的事业差一点不幸夭折。他正在密谋破坏贝尔格莱德电台。一个密探密报给了盖世太保。当兰科维奇去会见一位伙伴时，盖世太保正在等着他。铁托很快知道关于他被捕的消息，立即下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设法解救。报告说他曾和警察打斗，被警察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开始连他关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盖世太保并不知道他们逮捕的是谁，他们把他带到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警察医院，先让他恢复知觉，再进行审讯。不出戴迪耶尔意料，米特拉·密特罗维奇也已被捕，关在同一医院里。她设法带出一张字条，一位医生还给他了一张医院的平面图，写出兰科维奇在严格监视下卧床就医的那间病房。警方当局料定，还得五天才能审讯兰科维奇。

7月29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四十名游击队员乔装，拿着左轮手枪和手榴弹，以三人为一组包围了医院。他们之中十个人经过警卫森严的大门进入医院，当中一人带着手铐，看起来象个犯人，其他则是押送者。走廊里一个警察上前查问，当场被杀死。他们闯进兰科维奇的房间，立刻和四名看守搏斗。兰科维奇从床上跳起来，被急忙拥出楼房，又越过一道围墙跳到街上，游击队员在混战中保护他撤退，却不见先前安排好来接他的那辆汽车，兰科维奇被迫到附近一座房子里躲避。他解下头上的绷带，脱下医院的病人服，人们给他一套衣服，对他那高大的身体来说，这套衣服太小了。他穿着瘦小的衣服到了另一所房屋，穿上一件勉强凑合的上衣和一顶帽子，乘一辆货车来到贝尔格莱德市郊一所安全的住宅卧床养病。参加这次行动的游击队员有几名受伤，但没有一人牺牲。这次事件很

铁托传

大程度提高了他们急需鼓舞的士气，也向铁托表明他坚持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危险性。兰科维奇一恢复健康便立刻离开贝尔格莱德。他化装成农民模样取道返回家乡，接着又到了设在塞尔维亚西部的游击队指挥部。

铁托于9月16日撤离贝尔格莱德。从此直到1944年10月德军撤退后他再没有到过这座城市。但当他又一次来时，已是拥有三十万男女战士的大军的当之无愧的将领，和苏联红军一起光荣入城。他这次离开贝尔格莱德，心情极其复杂，这正是他过去多次逃亡生涯的写照。有一次，被捕的危险的确很大，但和过去一样，勇气和巧妙的安排起了作用。他断定，最安全的办法是和确象是旅客的人一起同行。铁托于是仍以事业上微有成就的巴比奇工程师的身份，在里布尼卡尔家的午餐桌上结识了东正教一位神父米卢蒂诺维奇。他起先知道神父同情游击队，但是神父则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神父表示愿意为他提供旅行证件，并主动要求与他作伴。一个叫亚沙·雷特尔的共产党员，是德裔居民，拥有合法证件，因此让他也来陪伴。还有几个妇女也参加进来，因此使这一伙人在外观上显得极其平常。他们在火车站毫无危险地通过了检查，最后乘车到塞尔维亚中部。据说铁托的兴致特别高，他用德语与雷特尔开玩笑，使他的同伴都感到很开心。

火车快到克拉列沃时停下来，旅客得到的通知是由于共产党匪徒破坏了摩拉瓦河上的桥梁。这次旅行者不得不步行到恰恰克。在恰恰克，一位姑娘发觉了一个曾经认识她的密探，他们顺利地避开他，安全到达目的地——波热加小城镇，再没遇到什么危险。他们雇了一辆马车去找距离瓦列沃不远的游击队司令部的科谢里奇。马车夫告诫乘客路上有危险，因为森林

里尽是匪徒。“我想你们不会是加入游击队去的吧？”他狡猾地问道。“穿这样的衣服象是到游击队去的吗？”铁托回答说，他仍象往常那样衣冠楚楚。车夫急忙认错，但又补充说：“这个年头你很难看出一个人是干什么的。”终于，铁托见到了来迎接他的兰科维奇，于9月18日安全到达他的司令部。巴比奇工程师和这趟旅行一起结束，铁托最终实现了他意图，担负起他最满意的一个职务——战场上的军事统帅。

1941年夏季，铁托和他政治局中最亲密的搭档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和洛拉·李巴尔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作出了几项决定。可以看出，这些决定对整个斗争过程中的军事和政治进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实现作为铁托的长期目标的政权变革方面，这些决定也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尽管也包含着任何重大的政治决策中都无法避免的冒险成份，却也表现出对政治力量基本要素的深刻理解，这正是铁托伟大之处的最后证明。7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作出的关于把党的领导机构改组为军事总参谋部的决定更是重要。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是非常明确的，铁托原可以以党的领袖的身份直接指挥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斗争。

创建一支军队来开展游击斗争的想法是南斯拉夫很有特色的想法，并且确实是铁托本人想出来的。1941年7月初，南斯拉夫境内驻有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十八个陆军师，另外克罗地亚独立国还有地方武装五个师，其次还包括数千就地招募的无耻的伪警察部队。没有军队的铁托在这个时候却要建立一个总参谋部，未免荒唐可笑。由共产党领导的爱国者的三、五个人一群，或是十来人或五十人一群的小组，没有统一服装，装备极差，武器极其缺乏，而且广泛地分散在全

铁托传

国各地，即使最富于幻想的人也不能把他们组织为一支战斗部队。建立一个总参谋部的目的正是为了表明要创建一支军队。在南斯拉夫以外没有一个人，甚至在铁托周围的小圈子以外也没有一个人，尤其是没有一个俄国人愿意相信这有任何可能。但不到六个月，按总参谋部预计，所统率的部队人数已达八万左右，尽管缺乏新式武器，但在理论上讲算是武装起来了。“你不能把这些人叫做正规军”，后来铁托曾经说，“不实行征兵制便不可能有正规军。这些人全是志愿兵。”

第二个比较重要决定也是7月初作出的，同样应归功于铁托，尽管这也同样经过和他的副手们反复研究过。那就是他的武装力量的斗争目标应当是在国内肃清敌人，开辟解放区的作战基地。这是一种正规的军事策略，可能是从西班牙内战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但终于实现了铁托预定要取得的重要的政治目的。它意味着，只要游击队巩固了这种解放区，便可以在战时条件所允许的极有限的范围内把它当作一个小国家来治理——管理种种民政事务，向居民贯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并着手把他们的政治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尽管在战争期间解放区多次被迫放弃但后又失而复得。从战争开始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地方政府的体制。

1941年7月，铁托所作出的另一重大决定是，向全民公布武装抵抗的号召应以人民阵线为基础。这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相吻合的。共产党理应为抵抗运动提供领导干部，但应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极端主义做法，不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直接目标。铁托的游击斗争依靠人民阵线，依赖爱国思想，而最终则依托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主义。谁也不知道他是否一开始即觉悟到这种做法将会激发出多么大的力量。有一点是非常明

铁托传

显的：铁托仍然感到他所担负的职务乃是一个以苏联为首的
国际运动的一小部份。他忠心耿耿，把一切重大决定汇报给共产
国际，竭力贯彻执行转发回来的命令和指示。但就在这时，他
第一次感觉到：南斯拉夫是在独立斗争。“从1941年年初，
我就已觉悟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领袖。”他回顾说，“我感到自
己是完全独立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不会有人来援助我们，我
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

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独立的结果还得一段比较漫长的时期。
1941年，苏联正在为保卫莫斯科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它这时
对铁托在南斯拉夫所作所为无暇顾及，这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即便是当他们的处境并不那么危急之时，
他们还是低估铁托，忽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就。这也是
斯大林自共产国际早期以来对外国共产党的一贯作法。铁托这
时尚未清楚认识到他自己的政策的全部深远影响。他尚未正确
认识到独立、民族解放与全盘接受苏联指示，两者犹如水火互
不相容。铁托制订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革命的规划时固然高瞻远
瞩，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却仍未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即对于
那些在全球政治中控制着苏联战略的俄国政治家来说，他的共
产主义革命的策略相对来说无足轻重，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无
法接受的。

第十一章 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

拥有抵抗思想的人并不仅限于铁托和游击队员们。早在1941年4月15日或16日，战败的王国政府军队的少数军官和士兵，像他们的先辈经常做的那样，退却到塞尔维亚的森林继续斗争。不久，人们便依照传统的名称把他们称为“切特尼克”。米哈伊洛维奇后来说：“切特尼克这一称呼来自人民，不是我规定的。”它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是科斯塔·佩查纳茨，他是一个身体魁梧、头发花白、相貌堂堂的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在保加利亚战线的一支塞尔维亚游击队的领导者，威望很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的切特尼克游击队一直是一支塞尔维亚的准军事力量，用来应付克罗地亚人、共产党人或其他任何所谓国家的敌对势力。另外切特尼克还有几个领导人——留巴·诺瓦科维奇，身材高大，“头发灰白，一副杞人忧天的神态”；还有凯塞罗维奇，“冷酷、残忍、无情地反对任何对游击队宽缓的建议”；他们之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德拉戈留布·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当南斯拉夫战败溃逃时，他抵达波斯尼亚东部，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进入塞尔维亚西部森林茂密的舒马迪亚山区的腊夫纳戈拉。

米哈伊洛维奇生于1893年，曾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是塞尔维亚军队中一名年轻的中尉，曾跟随塞军从萨洛尼卡最后冲突敌人防线而攻入塞尔维亚。协约国的帮助使他们转

铁托传

败为胜，这些往事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个正规军官，没有什么突出成就。他曾在索非亚和布拉格出任过南斯拉夫的武官，但在军队中没有机会得到晋升。他和大多数军官一样，极端亲塞尔维亚而反克罗地亚。德军进攻时期，防御准备不足和克罗地亚人的背叛行为都使他深恶痛绝。

1941年夏季，他在腊夫纳戈拉的指挥部成为为抵抗运动中寻求领导人的塞尔维亚爱国人士的聚集中心。米哈伊洛维奇不同于他的许多部属，例如巨人约瓦诺维奇，“宽阔的胸脯，金黄色的胡子悬挂在半胸，大猩猩似的双肩上飘散着长发，红里透金，十足象个女人，只有开口说话时，女人味才完全消失，再一握手，几乎要把你骨头捏碎”，他却身材瘦小，往往使人误认为他性情温和，温顺可爱。“他给我的印象是态度和蔼，举止文雅，一个标准的正规军官”。这是那时期他给铁托的最初印象。有一位后来见到他的英国军官这样描述他，“稍微驼背，穿着英国式野战服装，没有佩带任何表明军阶的肩章和领章，深蓝色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颈部，不佩带领带，两条裤腿塞到厚厚的农式袜筒里，……浓密的黑灰色头发覆盖着塞尔维亚典型的农民的圆脑袋。从灰色的胡须下仍能分辨出面部轮廓分明，两颊深陷，高度的近视眼镜后面闪烁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带着使人误解的温情。”1942年，一位从克里特岛逃脱的英国新闻记者克里斯蒂·劳伦斯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知道他的年纪在四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但感觉起来却很苍老。他身材瘦小，头发灰白，一张瘦削、多皱的面孔，戴一副金丝眼镜。”

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表明米哈伊洛维奇性格复杂多样，

铁托传

但才能和眼光都有限。由于所受的旧式军事训练，以及出身于具有古风的农民家庭，他具有军官们的魅力和虚荣心。他狡黠而机智——这种性格使他常爱玩弄诡计，结果常常败于更加狡猾的对手或朋友手下，难免为流亡政府所利用，替他们卖命。他时常以军人自居，但他所谓的军人概念早已过时。“我是一个职业军人，”他在1946年受审时这样说，接着又说，“政治我从来不感兴趣。”可是，从他到达腊夫纳戈拉以后，他的所作所为几乎都与政治有关。对于他的勇气或是强烈的塞尔维亚爱国主义是无可否认的。不论战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他都希望恢复塞尔维亚的权利，而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对他的理想的一种威胁。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革命情绪背后隐藏的更为深刻的种种社会矛盾，看来他并未真正认识。

当米哈伊洛维奇开展那场起初称作“腊夫纳戈拉”，后来改称“切特尼克”的斗争时，追随他的约有三十名军官。6月，他已经和其他的“切特尼克”头子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不久，他的密使便分赴塞尔维亚农村建立起许多招兵站，并和一些头子商议，其目的是在乡村地区把所有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塞尔维亚男子全部动员起来，以十五至二十人为一个连队，整编成一支武装部队。三十至四十岁的从事破坏活动，年纪更大一些的则在村中维护治安。到1941年9月末，切特尼克已达五千名，但许多人并不严格服从米哈伊洛维奇指挥，还有一些例如科斯塔·佩查纳茨则不到夏末便叛变，投降了德军。

铁托的游击队也在乡村地区积极斗争，尤其是6月22日以后，他们宣传农民志愿参加游击队。到9月末，已拥有约一

万五千人的军队。因此，这两位领导人便为了争取塞尔维亚人的支持和拥护而相互较量起来。米哈伊洛维奇，伟大的塞尔维亚爱国者；铁托，号召开展一场全南斯拉夫的、激进的、彻底抗击德国的共产党人。这种竞争造成本就已趋复杂的南斯拉夫局势出现了一种内战的因素。1941年时尽管还无人能预见战争的开始或其后果，有一点却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双方都知道无论将来建立什么国家，他们的权力之争都将决定它的性质。至于目前，双方都还面临着德国的占领体制，尽管组织严密，却没料到要应付大规模的抵抗运动。

德国人占领塞尔维亚，把权力划分给三个主要部门。理论上，三者权力清晰——军事、政务和行政。1941年夏季，军事行动由巴德尔将军指挥，他隶属于驻防雅典的陆军元帅李斯特。塞尔维亚的军政府则由前党卫军旅长哈罗德·特纳博士全权负责。这一部门主要负责一般治安、政治和经济决策，设有一些重要部门分工榨取粮食、原料和劳动力以供应德国发动战争之需。地方行政则基本还是通过原来机构，并且通常由塞尔维亚战前的同一批官员来执行，从而由一个卖国的塞尔维亚政府为其效力。该政府完全由德国人操纵，部长则为塞尔维亚人。8月29日以后，由塞尔维亚人、前南斯拉夫陆军将领米兰·奈迪奇出任政府首脑。三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军队和治安机构，以及情报组织，又各以不同的方式镇压反抗运动，迫使这个国家顺从地、卖力地为德国服务。它们的活动经常互相重叠，互相冲突，而且不同的情报机构和反情报机构——卫戍司令部、安全局和包括盖世太保在内的治安警察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繁杂。南斯拉夫人要同占领当局接触和合作，告密者和间谍要成为双重间谍的机会随时都有。尽管有这一声势赫赫的权

铁托传

力机器，德军在塞尔维亚仍需要以重兵驻守主要交通线和一些战略据点。1941年夏，他们开始在当地招兵，组建塞尔维亚部队防守这个国家。

德军事先没有任何准备防范1941年夏季突然发生的塞尔维亚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由游击队指挥，还包括部分切特尼克分子，尽管米哈伊洛维奇曾下令其部下不要向德军开战。暴动范围如此之广，清晰地表明是一场大部分人民的自发武装起义。9月，德军在约三分之二的塞尔维亚农村地区丧失统治地位。维斯豪普特上尉在报告中说：“这不仅仅是个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要如何对付一场全面的民族运动问题。”不久，特纳博士写道：

游击队在森林里的那种防御阵地根本无法正面进攻。当前虽加紧宣传说布尔什维克战情不利，但毫无效应。我们获得的整体印象是：甚至传说苏联投降也不能使这帮匪徒投降和放弃斗争，他们像魔鬼似地很快恢复元气。此外，他们的组织是极其严密的，一个秘密组织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是楷模。

随着起义的进一步开展，游击队和切特尼克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互相合作，进攻德军阵地，公路、铁路、桥梁、村庄甚至城镇，极为成功。游击队控制了一些地区，同时切特尼克也控制部分地区。局势相当混乱。切特尼克的个别首领之间在各自利益和权力上时常发生矛盾；而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尽管屡次联合行动，但两者的目标、组织和作风大相径庭，因而也常常发生冲突。游击队纪律严明，严格服从命令；而另一方面，

切特尼克的形象却取决于他们地方头目的品行，这些人往往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每当占领那些能带来大量缴获战利品的较大城镇时，两个集团之间的敌对便进一步恶化。9月24日，游击队攻下了乌日策，这可是一块大肥肉，有一家银行，储存着大量的钱币，约五千五百万第纳尔；还有一个日产四百支步枪和大量弹药的军火工厂。游击队还占领了摩拉瓦河西部的波热加和恰恰克，而切特尼克则攻克了洛兹尼察并控制了一个铸造厂。

1941年的夏季，米哈伊洛维奇千方百计为他的切特尼克运动寻求援助——或者说保护。他不希望在他的计划实现之前，确切地说，在德军比他当时所了解的更加虚弱之前爆发一场毫无胜算的起义，从而丧失他的军队。他企图把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实力保存下来，以求保卫塞尔维亚，应付德军采取报复行动，大肆杀戮塞尔维亚人。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与流亡的王国政府和中东的英军保持联系。他曾多次设法取得联系。终于1941年6月19日获得首次成功，通信员把他开展游击斗争的消息带到了伊斯坦布尔。那里既有王国政府的成员，也有英国的特别执行局这个负责多项活动包括宣传、军事情报和实战的机构的人员。米哈伊洛维奇也收到一部无线电发报机的零件，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加紧修理，发报机开始使用。马耳他收到了从这里发出的电报。8月份，他已经和驻开罗的特执局实现了直接联系。他还设法通过驻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和土耳其大使馆给王国政府发送第一封电报，并且于20日后得到回复。

他送给塞尔维亚起义的报道，丝毫不提游击队的主要贡献，是盟国搜集的有关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地区游击队抗战的最详细的信息。在德军席卷西欧和东欧，入侵苏联，在中东的隆

铁托传

美尔大捷以及德国狂炸伦敦以来传来这样的消息，使同盟国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都欢欣鼓舞。西方的人们正被接二连三的战斗搞得灰心丧气，意志沮丧，英勇的塞尔维亚抵抗运动的事迹传来，振奋了他们的信心，鼓动着他们的激情。人们喜气洋洋地散播这个消息，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则迫不及待加以利用，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对于流亡政府中的塞尔维亚人来说，这一消息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这给了他们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进行内部斗争的武器，也给了他们一种有力的杠杆，这会为塞尔维亚人在战后的各种形式夺权斗争中发挥无以想象的极大作用的。因此，米哈伊洛维奇的游击斗争从一开始就变成政治阴谋的工具。没过多久，就弄得与本来目的背道而驰。米哈伊洛维奇成为焦点人物，而在许多方面则成为阴谋家的俘虏，最后更当了牺牲品。人们无法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想，但却可以肯定，这确实影响了他此后的所作所为。

米哈伊洛维奇和英国保持联系的同时，又一直和卖国贼奈迪奇的政府保持联系。他希望为他的运动寻求更多的支持，也希望为其搞到武器。这样，他就有能力粉碎共产党人，挫败这一对手；而奈迪奇这一方面也巴不得同一个塞尔维亚的爱国组织套近乎。德国人赞成这种接触，他们支持成立“合法”的切特尼克，以防止出现一个游击队——切特尼克。9月初，米哈伊洛维奇和奈迪奇双方全权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几次会晤。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没有参加。1946年米哈伊洛维奇在受审时说，这是由于他在军队期间有两年是在奈迪奇手下服役，而“他两次处分我，两次关了我三十天禁闭。我不尊敬他，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会谈结果是奈迪奇的军队停止进攻切特尼克，切特尼克则援助奈迪奇打游击队。可能还作出某些具体安

排，由贝尔格莱德国民银行援助米哈伊洛维奇。他的情报官员皮潘和奈迪奇政府的联络员马尔科·奥卢伊奇从贝尔格莱德赶往腊夫纳戈拉。在前往途中他们俩一起被游击队捕获，从他们携带的文件中游击队获悉会谈的全部内容。奥卢伊奇作为卖国贼被枪毙了。

同时，米哈伊洛维奇还进行着第三种谈判，那就是同游击队。尽管他十分憎恨共产党，把他们当作自己最有威胁的敌人，米哈伊洛维奇仍愿接见他们的代表并听听他们的意见——也许除了那种千方百计地发展和确保他自己的运动不至于失败的决心外，还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国际竭力建议建立战时的人民阵线，催促游击队举行会谈。8月，兰科维奇曾向党中央建议采取联合行动。经中间人进行安排后，8月14日至15日夜，游击队派出代表米洛什·米尼奇和德拉戈伊洛·杜迪奇抵达腊夫纳戈拉。他们见到米哈伊洛维奇和另外两个人，他们是德拉吉察·瓦西奇（一位作家，因其强烈排外的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观点著名），和（前陆军军官）德拉戈斯拉夫·帕沃洛维奇中校。游击队要求采取联合行动，米哈伊洛维奇的态度非常冷漠。他说德军的彻底失败似乎还需很长一段时间，目前没有必要加紧进攻，否则德军将会对塞尔维亚居民大肆报复。会谈没有取得结果。尽管摩擦越来越激烈，双方关系日趋恶化，但8月和9月初仍然交换了几次意见。铁托认为有必要尽快达成明确的协议。9月19日，即他从贝尔格莱德抵达游击队司令部的第二天，他亲自去迎接米哈伊洛维奇，由此可见他觉得事情多么紧迫。

会谈地点是腊夫纳戈拉地区斯特鲁加尼克村里的亚历山大·米西奇的居住地，此人半月前曾经是米哈伊洛维奇派住奈迪

铁托传

奇政府的密使之一。铁托骑马赶来，由两名副官米洛什·米尼奇和奥布拉德·斯蒂凡诺维奇陪同，十五名徒步的游击队员护卫。米哈伊洛维奇派出骑兵卫队前来迎接。握手和传统的饮宴之后，双方坐下来会谈。米哈伊洛维奇坐在首席，他的助手瓦西奇居右，铁托位于他的左侧，游击队员和切特尼克人员交错地站在四周，全副武装，以高度警惕的目光对视着。瓦西奇开口头一句话便问铁托是不是俄国人，显然可见，铁托关于自己是一个曾在苏联居住过一些时间的克罗地亚人和共产党员的简略自我介绍，对方并不满意，未必令人信服。后来铁托回顾这次会谈时说：“因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很长一段时期都把我误认为俄国人，他谈到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所有其他各民族时说话肆无忌惮。”会谈不久便表明，两位领导人观点大相径庭。铁托迫切要求开展联合行动，提议把自己的部队交给米哈伊洛维奇统一指挥。但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时机未到并提出警告，并过分夸大德军实力。他说，获得外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盟国军队距离遥远，无法指望。两位领导人全无诚意把手中的牌全亮出来——米哈伊洛维奇和英国，并且通过奈迪奇间接和德国人接触。铁托则与莫斯科保持联系。他们于晚上八点分手，没有达成协议。关系虽未完全破裂，但六周后第二次会谈时，事态的发展已使达成协议没有任何可能性。

这一年夏末，米哈伊洛维奇发到伊斯坦布尔的电报开始生效。8月25日，丘吉尔首相致函当时负责对敌秘密采取行动的经济战大臣休·多尔顿：

据西莫维奇将军电报称，南斯拉夫目前存在广泛的游击活动。他们需要合作着，需要从国外得到支援和指导。

铁托传

请尽快和这些组织取得联系，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开罗的特执局奉命派出一个代表团和“爱国组织”取得联系。被任命为团长的是 D·H·赫德森上尉后来晋升为上校。9月22日，他由流亡王国政府武装部队的两位少校奥斯托伊和莱拉托维奇护卫，乘潜艇在铁托部队所占领的门的内哥罗海岸登陆。一个年轻的游击队军官韦利科·米朱诺维奇引导他们通过游击队解放的地区抵达设在乌日策的铁托司令部。因此，赫德森得以从一开始就有机会了解铁托的抵抗运动的规模和战况。几天以后，游击队又带领他们到达腊夫纳戈拉的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

赫德森为他自己和米哈伊洛维奇带来了两套无线电发报机以及密码。电报只能发到马耳他。他到达时游击队和切特尼克之间多次发生冲突，他向开罗的第一条建议便是：在切特尼克处理他们与游击队的矛盾之前，不给予切特尼克任何援助。他还建议铁托也应派遣一个代表团去。第一项建议未被采纳；第二项则十八个月后才实现，因为有关的英国官方文件尚未能查阅，至今不明其缘由。但当时英国或开罗均无人相信，由一个毫无名气的人物（铁托的名字当时国外鲜为人知）所领导的一群共产党人竟能发动一场全面的抵抗运动，这一情况确实让人难以置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过早期塞尔维亚浪漫主义的渲染，加上南斯拉夫政府官员对切特尼克活动的积极的、大肆夸张的宣扬，以及与米哈伊洛维奇的直接接触足以使人们对切特尼克抵抗运动无以怀疑。铁托也坚信不疑任何对他有利的消息多半都会被开罗或伦敦的反共人士扣压下，仅仅只因为他的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为了加强王

铁托传

国政府，巩固米哈伊洛维奇的地位。

赫德森抵达之后，并将建议结束对游击队的敌对行动以及派代表团到铁托那里去谈判的信息通报以后，不久便失去了自己的发报机。有人认为是米哈伊洛维奇控制了它，也有人认为是被德国缴获了，因为德国人破译了他的密码。不管哪种情况，他与开罗的任何通讯联系在长达十二个月之久的时间内一律遭到切特尼克的检查，凡有利于游击队的消息均被扣压。米哈伊洛维奇的特使米洛斯·塞库利奇博士于9月25日离开贝尔格莱德。他们于10月10日到达伦敦，自我欣赏地报告了切特尼克的活动。于是，无论英国还是南斯拉夫都未能真正了解游击队的活动、组织和当前状况。与此同时德军却获得了对游击队的较为详细的情报。他们对米哈伊洛维奇的实力与政治目的也有更为全面了解。他们有一个专门小组监听他的无线电发报，而且破译了他的密码。

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档案证明，1941年10月为了给切特尼克搞到更多补给，曾在伦敦进行了非常紧张活动。国王彼得二世曾于13日与丘吉尔进行会谈，一周后，王国政府首相西莫维奇将军进一步提出一项备忘录，向丘吉尔请求为一万名伤员供给药品医药，并为八万至十万名敌后人员提供武器，这一数字只有在包括游击队的情况下才能是真实的。10月26日，丘吉尔复信同意给予援助，尽管地理及运输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在这期间，西莫维奇于10月20日接见了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23日会见了帝国参谋总长约翰·迪尔爵士。另一个南斯拉夫高级政府官员勃兰科·丘布里洛维奇则于28日会见艾默礼，29日会见休·多尔顿等两位大臣。28日他还会见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麦斯基，向他寻求援助。麦斯基对所需实物很感兴

趣，并询问空投的可能性。10月29日，迪尔将军在给西莫维奇的一封机密文件内称：数日内将给米哈伊洛维奇提供“三十门大炮、二十支自动步枪、九十支自动左轮手枪、一千副绷带和价值一万〔单位可能是英镑〕的黄金”，其他物资随后就到。信中还说英军驻中东司令已与“爱国者”建立联系并尽最大可能提供援助。伦敦磋商中的这种顺利情况都电告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维奇从10月6日至29日给王国政府发送了二十九封电报。在10月27日他和铁托第二次会晤以前，必将收到盟国的援助物资。

这次会晤还受到其他因素的阻拦，从而使它甚至比第一次更难达成协议。10月间，铁托已和他的参谋部作出关于扩大军事规模的重要决定。9月26日，在与塞尔维亚的斯托利采召开了一次会议。除马其顿以外的全国各地区的游击队领导人都出席的会议，会上决定在南斯拉夫各区建立军事司令部，由最高司令部统一统率。他们如今已为军队配备了骨干，制订了全国的战略总策划。还一致通过在完全肃清敌军的地区建立地方军政——民政行政机构。

9月16日，希特勒命令伯梅将军率领德军三个师，在空军援助下，对塞尔维亚的抵抗力量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参谋总长陆军元帅冯·凯特尔作出了一项关于在一切占领地区打击抵抗运动的指示：

尽可能把一切混乱状态扼杀于摇篮之中，一旦发现任何混乱迹象务必立即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必须牢记，在本指示所指之国家中，一个人的生命无足轻重，因之，惟有残酷手段始能收威慑之效，……一条德国士兵的性

铁托传

命，按惯例应以五十至一百名共产党人的生命来交换。行刑方式亦必须能够起到威吓和镇压之作用。

10月20日至21日，这一命令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付诸实施。这是为了报复两天前游击队的一次袭击。这些袭击中，德军死亡十人，二十人受伤。德军把全城十六岁至六十岁几乎全部的男子驱入市内的兵营，然后以每一百人一组押出枪毙。屠杀整整持续了一天，甚至于德军的行刑队都感到恶心，无法支持才停止。大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时，克拉克耶瓦茨屠杀事件列为控拆案。屠杀人数无法计算，一般认为接近五千人。其中许多是共产党的拥护者，因为该城是塞尔维亚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其余全为普通市民，还有许多儿童被从学校押出，集体枪杀。在米哈伊洛维奇看来，这次屠杀是他最害怕见到报复行动的最好例证，也是他关于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论调的最好证明。在铁托看来，这就要求开展广泛的暴动。

数天后，铁托和米哈伊洛维奇在10月27日至28日进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地点仍在切特尼克控制的腊夫纳戈拉附近布拉伊齐村一所大房子里。此次游击队乘坐两辆汽车赶来。铁托由副官米塔尔·巴基奇和前共产国际同事，现任参谋的斯雷滕·茹约维奇陪伴，还有八人卫队护卫，配备着冲锋枪。米哈伊洛维奇也由一个武装卫队和他的亲密战友德拉吉察·瓦西奇和帕沃洛维奇中校陪伴。双方隔着会议桌对面就座，其紧张气氛一如上次会议。铁托回忆说：“我的战士们年轻，脸刮得干干净净，少数人留着小胡子；德拉扎的人全是大胡子。”切特尼克“全副武装，交叉地背着子弹带”。气氛比上次更为紧

张，会谈则更缺乏合作诚意。双方都非常明白当时的处境，局势更为紧张，因为这时德军正长驱直入塞尔维亚。米哈伊洛维奇尽管知道自己将获得英国援助，但他并不知道数量多少，几时到达，甚至毫无把握。在铁托这方面，他电告共产国际要求苏联援助并未得到满意的回复。铁托希望把游击队的活动的消息传到伦敦，因此要求允许赫德森上尉出席会谈。米哈伊洛维奇不假思索地拒绝，赫德森只能留在隔壁房间里。但允许他参加晚餐聚会。席上米哈伊洛维奇狡诈地请铁托喝酒。铁托满饮一大口，才发觉是“舒马迪亚茶”，一种烈性梅子酒，也叫梅子白兰地。当铁托被这种烈性酒精呛得直咳嗽并狼狈不堪地拂拭军服上的“茶水”时，米哈伊洛维奇毫无顾忌地大笑。

但会谈本身并非玩笑。它是以铁托 10 月 20 日提交米哈伊洛维奇的一份十二点照会为基础进行会谈的。这些要点包括：开展联合军事行动；组建一个联合作战参谋部；装备及补给问题；平等分享战利品；地区的联合司令部；解决分歧的常设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战线为基础在各解放区设立管理民政的地方行政机构，建议中说这些机构应为游击队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实行志愿兵役制，废除征兵制；地方司令官不得私自行动，而应服从两个高级司令部指挥，为避免产生重大矛盾，两个高级司令部应异地办公；增强反第五纵队的工作；设立联合军事法庭，处理卖国贼，但特别指出对此类案件的制裁不得另行立法；采取联合行动以打击通敌的切特尼克组织如佩查纳茨部队，停止对游击队的袭击。终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同意停止发给“第五纵队与间谍分子”身份证。米哈伊洛维奇并未提出任何认真的反对建议，但无论如何，他此时似乎完全无意与游击队达成协议。对于米哈伊洛维奇来说，与德国军官以及卖

铁托传

国分子塞尔维亚人奈迪奇将军合作，或则与铁托这个自称为克罗地亚人和共产党人在军事上联合，它们之间利害分明，轻重悬殊，根本无所谓选择，一定是前者大大占了上风。而且，在他眼里，在他得到盟军援助之前，当德军胜利之际，把他的部队投入类似自杀的战争，不啻是为整个切特尼克运动寻找灾难。

正像可以预料到的那样，米哈伊洛维奇谢绝了铁托关于共同作战、建立一个共同作战参谋部以及关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等各项建议，因为那样一来，在已经解放了的地方，他势必被置于共产党控制的政权之下。他倡导征兵制，这能使他的切特尼克多于游击队的志愿兵。其他地方，有些达成了协议，例如分设司令部，设立联合法庭来解决争端。游击队一心渴望达成协议，这可以从一件事情上看出。他们自愿从乌日策军火工厂为米哈伊洛维奇提供弹药和一千二百支步枪——但由于关系破裂给了他们五百支。双方还一致赞成从乌日策银行获得的五千万第纳尔中各拿走五百万。

讨论过程中，游击队人员持着他们那种目前还不专业化的军队所特有的平等的同志关系的方式，开始发表意见，但游击队这一边主要是由茹约维奇发言，铁托特别沉默。切特尼克方面于是仿效起来。“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突然摘下眼镜，精神失常地捻着胡子，突然高声喝止他们：‘住嘴，我们不允许你们发言！’切特尼克们于是都不发言了。”会谈结束了，游击队在布拉伊奇过夜。铁托说：“我整夜都失眠了，把左轮枪放在枕头下面。”第二天又举行了一些讨论后，他们返回乌日策。中途，他们还和切特尼克发生了一次令人作呕的遭遇战，因为他们把他们必经的一座桥梁炸毁了。回顾起来，可以看出这次

铁托传

会谈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双方都不诚心达成协议，虽然铁托曾经认为，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无论什么样的军事上的盟友总比没有要强。几年以后铁托曾说，他要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与共产国际毫无关系。我们的想法、希望与目的是团结一切力量与侵略者斗争。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聪明的、野心勃勃的人。我提议由他掌握最高统帅权，但很明显他不愿接受。“如果接受了呢，”铁托说，他是不可能在其手下任职的，他要“干别的事情”。

第二次谈判之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之间的局势迅速恶化为内战，每一方都指责对方宣战。11月1日至2日的夜晚，切特尼克部队进攻乌日策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游击队据点，其中包括恰恰克和伊瓦尼察。尽管米哈伊洛维奇后来不承认对袭击乌日策应负责任，但同时发动的数次进攻都表明是出于统一的部署。米哈伊洛维奇当时的一位关系密切的同事拉夫斯拉夫·朱里奇少校后来谈起，他曾反对过这一布署。赫德森上尉，一位独立的观察家，肯定不是铁托的支持者，曾说过：“米哈伊洛维奇由于错误低估了游击队及其追随者的实力，袭击乌日策又失败了。”赫德森处在一个完全可以了解事实真相的地位，并曾想尽办法把双方拉到一块来，当时他自己正在乌日策。

游击队出动了所有的武装力量，包括兵工厂的工人，以反击切特尼克。11月3日，米哈伊洛维奇的参谋长帕沃洛维奇中校给当时在乌日策的铁托打电话，提出如果游击队让出波热加就可以停战，铁托俨然拒绝了。战斗仍然进行，切特尼克慢慢被击退。

米哈伊洛维奇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向伦敦发出紧急通报，

铁托传

要求马上提供援助。他 11 月 4 日的电报说：“形势危急，急需援助。”第二天，他又三次打电话说明紧急求援的原因：

不要相信塞尔维亚那个化名铁托的共产党领袖是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对德国宣战不过是一场骗局，……游击队从人民手中夺取武器，我不能做这种无耻的事。他们搞到了乌日策那个军火厂，从那里我们一点东西也得不到，而他们还竟然想要英国武器，如果他们真的拥有了英国武器，我们也就彻底的完蛋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一直发送着有关着陆地点的情报。11 月 9 日，他得到了他的第一批空投物资，并强烈要求盟国要莫斯科电台谴责游击队对切特尼克的所有抵抗行为。11 月 12 日，游击队基本上推进到距腊夫纳戈拉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但是切特尼克从波斯尼亚调来的增援部队仍没有音讯。为了阻止电台落入游击队之手，切特尼克已经不再发报。司令部也准备匆忙撤退，并毁掉所有文件，其中包括重要物资和档案。在一片恐慌与不安之中，瓦西奇哭了——他象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似地哭了起来，“你们能想象的到吗？”他哭着说，“如果结果是这样的话，德拉扎和我都要被判处死刑的。”

在这生死攸关的关头，米哈伊洛维奇只好向德国人求助，以对付游击队。他是通过在德军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军官豪普特曼·约瑟夫·马特尔与德军联系上的，此人过去曾经到过腊夫纳戈拉谈过判。11 月 11 日的深夜，在离瓦列沃不远的迪弗齐的一个旅馆里举行了会谈。这就足以说明在极度恐慌之际米哈伊洛维奇为什么没有在腊夫纳戈拉。他带了三名参谋人员骑着马整

铁托传

整跑了九个小时前去参加会议。三名高大槐梧的德国军官——驻塞尔维亚德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科格哈德上校，以及塞尔维亚德国军政司令部的哈罗德·特纳博士的代表乔治·基泽尔博士还有克劳斯博士，一位风度翩翩的盖世太保官员——乘汽车到达。米哈伊洛维奇主张要联合作战，一同歼灭共产党人，一俟共产党被清除后，德国军队迅速撤离战场，而由切特尼克接着掌管塞尔维亚。但他眼下最紧缺的却是武器。“我的主要目标”据马特尔回忆，米哈伊洛维奇向德国人宣布，“是拯救大多数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米哈伊洛维奇并不反对把切特尼克三百六十名的游击队俘虏交给德军。德国人正想利用米哈伊洛维奇，虽然他们不怎么信任他，因为他们认为就像德军情报部门报告的那样，希特勒也一再强调这一点，塞尔维亚人“从本质上讲是反德的”。德国人没有计划给他们武器，还要求他解除手下人员的武装。米哈伊洛维奇几乎在绝望中离开了会议室，他对马特尔说：“请转告你的同僚们，我还不全是在他们印象之中的那样一个英国人。”这次会谈后很短的时间里，一份德国人的报告说：

他从此不再有一大批忠实的‘仆人’孝忠于他，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应予以轻视，因为还有许多精明能干的塞尔维亚人同情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对我方尚无任何威胁，尤其是他开始与共产党合作，现在却已反目成仇，而且正与之大动干戈。但从长远观点看，他依然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性。

米哈伊洛维奇回到腊夫纳戈拉后才知道，他已被任命为

铁托传

“南斯拉夫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这是11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的。这项任命给他的从军生涯刻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他在军事上的凌云壮志屡次受挫，时至今日终于达到顶峰。于是，他不禁对自己和他的切特尼克运动的前景信心十足。他能获得流亡政府的支持，以及政府所能到手的同盟国的一切援助，如今大局已定。以上所有这些现状以及他的不可一世使德国人不得不对他保持中立，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他用不着和游击队合作，而他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

游击队对切特尼克司令部没有施以猛攻到底的战略。由此看来，铁托也许是受到俄国命令的约束，俄国外交长官直到此时还在敦促他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一致协议，甚至要他就联合指挥一事做出商讨。王国政府官员也为此积极采取相应活动。王国政府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于11月17日亲自会见了维辛斯基。第二天，又会见了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急切希望苏联协助，以使铁托接受米哈伊洛维奇的指挥。俄国人的命令以及德军以坦克和飞机为掩护屏障向塞尔维亚西部的进军，促使铁托别无选择，只有力求与米哈伊洛维奇达成协议。虽然这时他已获悉，切特尼克把三百六十五名被俘的游击队员移交德军执行死刑。米哈伊洛维奇在以后补充说，这些游击队员是按“每个人头多少钱”卖给德国人的。

就当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和德国人进行谈判时，他的下属军官朱里奇少校和莱拉托维奇少校也悄悄的会见了游击队代表兰科维奇、佩塔尔·斯塔姆博里奇和洛拉·李巴尔并与他们成功地达成了有关不再采取敌对行动的九点共识。11月18日、24日、26日和27日他们就相关条令又进一步举行了会谈，这时

铁托传

由铁托的军事专家科察·波波维奇取代政治问题专家兰科维奇。当这一系列会谈还没有划上完整的句号，德军已调来增援部队：从战场的东线开来的第一一三步兵师和七〇四师为一部，包围了恰恰克、波热加和乌日策三个城市。自然而然地，游击队已根本不可能在塞尔维亚坚持哪怕一分一秒。9月27日的会议正在进行之中时，铁托给谈判的代表们打来电话。接电话的是朱里奇少校，铁托要他一定要说服米哈伊洛维奇采取一致行动。朱里奇许诺要尽力而为之。会后当他转达这一要求后，米哈伊洛维奇答复说，共同指挥绝对毫无疑问，因为他本人是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惟一的人民信得过的领袖。

游击队早已撤军乌日策，那里的军火工厂也已于数日前被敌特炸毁。如今他们照顾着很多伤员。铁托肩挂一支冲锋枪，由赫德森上尉相扶左右，在德军到达只剩下二十分钟的时候才离开这座城市，和其他两位参谋人员失去联系数小时之久。11月28日，所有大部队仍在全面撤退中。铁托第二次给米哈伊洛维奇通电话，要求协助阻止德军的进一步推进。米哈伊洛维奇答复说，与德军面对面作战是不可能的，切特尼克和游击队应当分别撤至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是两位领导人最后一次个人通话。铁托为争取联合行动而进行的谈判彻底泡汤了。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下定决心按兵不动，而且即使投入部队和德意军队共同血战沙场，其根本目的也是要彻底消灭他的国内政敌——共产党。

铁托率领游击队穿过兹拉蒂波尔山的层层山脉，撤至塞尔维亚边境上荒凉的、人烟稀少的山区。米哈伊洛维奇的策略没有这么明确。某些切特尼克领导人仍继续打击游击队，而他所关心的却是如何保存实力，探索使切特尼克“合法化”的方针

铁托传

路线，避免意大利人，还有德国人以及奈迪奇部队对他突如其来的袭击。这几支部队眼下在塞尔维亚的攻势正如虎添翼，锐不可挡。更糟的是寒冬即将来临，游击队运动似将越来越难。从此时此刻起，各式各样的证据——激获的切特尼克文件、英军派遣的驻扎在切特尼克的联络军官们的报告，盟国在战争之中缴获的德国和意大利的许多文件——都明显的说明：许多切特尼克领导人从德、意和塞尔维亚的伪政权那里捞取了武器和经费。在意军对游击队发动的每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切特尼克都在幕后做了大量支援工作，有些切特尼克军人则与德军并肩作战。虽然确实有米哈伊洛维奇同西方盟国的敌人携手合作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实，但他还是不断的得到盟国的援助至少有十八个月的时间。

1941年年底，当在苏联和中东的德军还在不断进军的时候，米哈伊洛维奇做出了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同占领军协议达成共识，并且只对共产党人作战。德国人最终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有德、意军队的支援，游击队似乎一定可以被彻底歼灭；万一盟国获胜或在巴尔干登陆，米哈伊洛维奇在盟国阵营中仍占有绝对优势，届时他准备“转弯”，德国人也神机妙算地猜到了原以为很严密的计划。至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它无疑是米哈伊洛维奇推行这种政策的同党，它和英国政府及苏联政府向来都有着友好的关系，但在一段时间里它对它们隐瞒了南斯拉夫境内局势的真实面目。但他们同米哈伊洛维奇一样错误地轻视了对手的真正实力，错误地估计了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占领的民族主义的高昂气概，不可一世地以为德军天下无敌，也错误地估计了丘吉尔对待战争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们还盲目地认为即使英国人了解事实真相，对于切特尼克和英国的敌人

共同抗敌一事仍会保持原有的态度。

显然，依据赫德森的报告，应该是英国陆军情报机构的某些部门，在 1941 年年底以前便获悉游击队的行踪轨迹和米哈伊洛维奇的出卖国家的可耻行为。但英国最高层领导人对此却毫无所知，或有所怀疑但却打了折扣。苏联方面，由于铁托连续不断的发电，共产国际是知情的，因此，可以简单的联想到苏联高层权威人士一定详知其情。但铁托提供的证据即使在苏联也没有被完全接受。莫斯科电台就曾把游击队的战绩归功于切特尼克，使铁托感到简直难以置信，荒诞之极。当 1941 年 11 月 11 日，南斯拉夫电台从苏联境内开始广播时，对于游击队战况的报道，在西方仅仅被看做是一种宣传。

产生这种局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1941 年末和 1942 年初，南斯拉夫境内的状况对于英国和苏联来说只具有非常小的作用及影响，这两个国家的战士们在最初的几次德军的猛烈攻势的锐气面前已经偃旗息鼓。巴尔干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战区，应予优先考虑的自然也就不是这里。正因如此，两国对有关南斯拉夫境内事态发展的重大决策，都没有给予密切注意。对铁托来说，这一方面还并不那么明显，他看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有一个英国联络军官，切特尼克的的确确在帮助德国人，竟仍然能够拥有英国的援助。还有那件在他的眼中狡诈的事实，即切特尼克对乌日策的进攻竟然发生在英国军事代表团到达米哈伊洛维奇目的地不久以后。武器、食物、医药极其短缺。在铁托看来，只有游击队才是真正抗击德国人的武装力量，获得援助的理所当然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切特尼克。英国人没有像他想象的这样做，看来正是他们那种建立在反对共产主义基础上的背信弃义的阴谋诡计的典型例证，而这

铁托传

恰恰是长久以来，由于历史的教训，铁托所一直急切渴望从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的一种政策。这一观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深深影响了他对英国甚至英国人的态度。

第十二章 孤军奋战

1942年是大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对同盟国是这样，对铁托同样也是如此。这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一生来说，或许也是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水深火热的几个月里，铁托把起义变成一场全民性的自觉的战斗。起义依然由共产党领导，但不同的是，它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信赖。这一发展变化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铁托本人的人格及其策略、智谋和领导才能，理所当然至关紧要。尽管作战条件是那样的艰苦，时不时地打败仗，而且苏联援助和盟国承认化为乌有，但是，构成革命不可缺少的骨干力量这一大转变却已发生。

铁托于2月底在福查召开的一次参谋会议上，强调了在军队中通过人民解放委员会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展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说，游击队的领导人一定要尽自己所能赢得农民的信任与拥护，还说就算是切特尼克的同情分子，也是完全有可能被说服参加游击队的。但无法隐瞒的是，1942年冬天游击队里的生活困难到这种地步，也许只有那些为伟大的理想主义所激励的人们才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游击队和普通居民的受伤人员一天比一天多，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农村。许多人在敌人的进攻中身亡，还有许多人不堪饥饿与疾病的折磨而惨死。也有不计其数的南斯拉夫人死于内战，死于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分子的激战之中，死

铁托传

于坚决抵抗支持外国占领者的地方势力的战斗中。除了这些，还有许多人在民族的和宗教的敌对行动中丧生，这在南斯拉夫人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战斗的胜利者以及借战争机缘出现的其他势力，顺水推舟，利用这种冲突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桑贾克和南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分子肆无忌惮的屠杀伊斯兰教徒，其根本目的是想把被他们宣布为塞尔维亚故土的地区彻底变成统一的塞尔维亚居民区。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则有很多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因为自己的宗教而惨遭杀害。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执政者巴维利奇却厚无廉耻的自诩为反东正教维护天主教的卫道者。在克罗地亚，由特种部队组成的乌斯塔沙匪帮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男女老幼，其行为之残暴和毫无人性，如果不是已被证明这是事实，根本无法叫人想象。关于乌斯塔沙，有一个人们一直都传说的故事：他们到处寻找被害者的眼珠或身体的其他部份，借此炫耀自己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有位英国医生曾经写道，他亲眼看到过这种可怕的所谓的战利品。“我向前走去，拿起放在桌上的袋子，打开了它，开始我以为是蛤蜊肉，当我细看时，原来全是人眼珠。”像这样的故事很多，有些人被赶进教堂，然后锁上门，再放一把火，人被活活烧成灰；还有些人被割断咽喉或被扔进甚至能搬动大山的河流。有些人比较幸运，被逼接受改宗天主教，因而没有变成一个惨鬼。波斯尼亚的几乎所有穆斯林，由于巴维利奇认为他们是纯克罗地亚种族，幸免遭到这种厄运的袭击。

克罗地亚天主教大主教区斯特皮纳茨大主教以及天主教的所有成员，开始是支持巴维利奇政府的，后来对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或强迫改宗的政策也开始产生怀疑。大屠杀于1941年夏季开始，到冬末才结束。1942年初，游击队正准备从门的

铁托传

内哥罗向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转移时，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血泪史，几乎所有的村庄都已成为一片废墟，被洗劫一空。铁托怎能不竭尽自己的权威，使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为死去的乡亲报仇。游击队穷追乌斯塔沙分子，抓住就直接枪毙，但铁托禁止他们动用酷刑。“当乌斯塔沙分子被带去处决时”，戴迪耶尔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有一个农妇突然冲向他们又抓又打，气不吞声。游击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拉开……枪声响后，她又一次冲向了那里，在尸体和血泊中依然拼命的打。有人告诉我们，她所有深爱的儿子都被乌斯塔沙给一个个活活害死了。”

乌斯塔沙灭绝人性的屠杀，终于使巴维利奇政权遭到了应有的报应。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乡间村落，有成千上万的人告别了家乡加入了游击队，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姑娘成了铁托现在的妻子。1942年夏天，铁托部队进入克罗地亚时，所有留下来的人都来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游击队此时既未取得重大的或持久的胜利，从道理上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得到这样的爱戴与拥护的。他们参与给游击运动，大大地壮大了克罗地亚——包括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这些地方的力量。而在这之前，游击队的兵员在南方基本上都是塞尔维亚人，在北方则几乎都是斯洛文尼亚人。到了1942年底，铁托的运动已成熟地拓宽为全南斯拉夫整个国家全民性的运动，根据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入伍新兵数目远远地多于战斗减员数目。直到1943年11月，铁托的部队一直没有征过兵，而新入伍的都是志愿人员。但勿庸置疑，热爱祖国的一颗热心和讨伐敌寇的决心如此高昂，以致对游击队占领区的居民来说，除了加入，其他一切选择都是困难的。一旦加入，便必须尽职尽责

铁托传

责。谁要不站在运动的这一边，就会被视为运动的敌人。

整个 1942 年，铁托及其最高司令部依据正规军事路线的正式组织形式，全神贯注于缔造和训练一支严格强大的军队。在 1941 年夏季的起义中，农民是为了保卫自己曾在那里繁衍生息的家园而战斗的。铁托却需要一支灵活善辨的野战军。1941 年 12 月 22 日，铁托把从塞尔维亚出生入死与他一道转移出来的人员组建并命名为第一无产者旅。这支队伍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来自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部队的志愿兵，这支部队的第一任统帅是曾经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塞尔维亚英勇机智的共产党人科察·波波维奇。在这以后的六个月内先后组建了另外四个无产者旅，每旅都有大约一千人组成，而且基本上都来自一个地区。它们就是任务最艰巨的突击部队，可以调往任何形势的战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铁托的部队早已超过八十万，可以完整的组成四个军团，它们便是其骨干力量，它们也可以说是一个近卫团。

铁托认为对敌作战既是政治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与德、意的战斗过程中，他对无产者旅的使用一直是那么慷慨大方。1942 年 2、3 月份在军事公报中发布的军事条令是这样说的：必须实行铁的纪律，严厉惩罚违犯军纪的现象。官兵之间只能建立“同志关系”，在执行任务时必须严格遵纪守法。每旅都设有司令员和政委及其副手组成的指挥部，有先锋队、警卫连、炮兵、医疗队和摩托化连队。他们分别都有自己的红色军旗，中央是象征着游击队的五角星，右上角是镰刀和锤子。开始，除人员外，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书面上的计划，由于那时游击队的财产也只是他们在战争之中缴获的武器和运输车辆。

铁托传

铁托向世界宣布了这些无产者旅的共产主义性质，正是这些触怒了俄国人，他们反而建议把这一点隐藏起来。“为什么你偏偏要搞个什么无产者旅？”季米特洛夫在3月5日私下里给铁托拍了这样一封电报，“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反纳粹组织，打败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和平这总是毫无疑问的吧！”铁托将信将疑却带着几分气愤答复说，他正在做这两件事，并准备一直不断地做下去。游击队将尽全力，向部队和老百姓进行一视同仁的共产主义教育，办法是通过报纸、传单、书籍等等，而对于占比例比较大的文盲则通过尽量多的会议，无休无止的演讲、唱歌和朗诵诗来逐步感化。几乎生活中的所有侧面都成了传播思想感情的媒介。如同处于战争期间的社会一样，除官方的宣传外，你不会听到其他东西。但每当游击队被再次抢去“解放”区时，当地的居民便有机会亲眼目睹他们的敌人的行为举止，他们和游击队也就形成鲜明对比。

游击队的纪律一直以来就非常的严格，尤其是在部队如何对待老百姓——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的态度方面，以及男女之间比较敏感的两性关系上。大战即将结束时被派到游击队的所有盟军军官在谈论到他们这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时，没有谁不赞叹不已。即便是在1942年极端艰苦的战斗情况下，铁托也不想让他的运动为意志薄弱者从中做梗。对抢劫和偷盗的案件，即使情节极其轻微，均予立即审判，立即处决。据说曾经有几个游击队员，只因为犯了看来是一件毫无影响的罪过，偷了几个土豆，一双鞋或一双袜子，竟然会因此而丢掉性命。一对对破坏两性关系准则的男女都必须天各一方，据说有些坚持不改的人也立即被枪决。但就因为这些所铸成的

铁托传

纪律却形成了一个光荣传统，并且为以后的战斗带来了极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广大居民对游击队的爱戴和信赖，从而使铁托得到了坚贞不渝的支持和充足的供应，否则他本人也绝对不会有今天。

如果把游击队仅仅看成是军事组织那就大错特错了。铁托认识到他的队伍不可能永远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在解放区新增设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来处理人民生活中的琐事。到了1942年，地方政府管辖区已有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当中的不少都是专业小组。铁托司令部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特设机构来协调它们的工作，非常地重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保证它们工作中有成效，并且能保证与游击队运动的共产主义精神相一致。

必须建立密切的军民关系，使人民真正的体会到军民鱼水一家人……政府机关，哪怕是最小的单位，必须保证及时执行任务，这一切都是解放战争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这战场上的最大胜利与沙堆上的楼阁没有什么区别。

所有的乡、镇、较大的县区以及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的省份和国家的各级人民委员会都是按照共产党政府机构的样板而逐步设立的。凡支持游击队的人都可以照自己的意愿加入。但其中比较重要的职位通常由共产党员担任。与党内没有什么差别，有许多妇女和青年人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对老年人以及其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军的人亦有工作安排。人民委员会主要处理当地事务，比如看起来很简单却极

其重要的吃住问题。绝大多数解放区都有难民，因此不得不改进福利和社会工作。卫生保健必不可少。“勤洗衣、理发、灭蚤，你真的做到了便不会得伤寒病。”有许多这种口号刷在墙壁上。可是，当过分热情的同志不经人家允许就给别人理发时，兰科维奇便指责了他们。时时想着居民是赢得他们支持的基本条件。债务可延期偿还，但赋税却一定要按时征收。固定工资和物价，重新修建了交通运输设施，焚毁的村庄恢复昔日的景象，地方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地方委员会应该自筹资金，但因为紧急情况，则由最高统帅部的基金直接拨款。居民和部队的供养问题，要求全国各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当地指挥部多加联系，军队中专门为此特设了一个军粮部门主管这项工作。根本的任务与目的是从余粮地区调拨给养到缺粮地区，这就意味着要从农民那里买进粮，而且还需要经过长途发送，有时甚至要越过敌占区。有时游击队也不得不给农民打欠条，答应在战争结束一定付款。当时看来，这些简直就是一些空头支票，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却在1946—1948年间都给付清了。

对铁托来说，战争的几乎所有时间里都没有缺乏现金的问题，虽然现有的证据足以说明，1944年以前，游击队一直没有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任何财政支援。1943年3月中旬，铁托在给共产国际电报答复季米特洛夫关于游击队财政来源问题的询问时郑重其辞地说，他们掌握着许许多多在国内不同地区通用的各种各样的货币。他解释说，最高指挥部在乌日策战利品中的现金中还剩下八百万第纳尔和五十万马克。他又补充说，为了供应部队，我们只有征用相当一部分的粮食，同时也没收了那些“占领者代表人”的所有个人财产。

铁托传

人民解放委员会和部队工作的另一不可忽略的方面是教育，既有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即把所有的青年、老年分别编班读书写字，也有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以争取人民对铁托所领导的运动的当前和长远目标的信赖。1942年底左右，当铁托占领了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相当一部分解放区时，他发布了一项指示说明和验证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有这一大片属于我们的领土，而且我们的军事力量又主要分布在这里，这就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我们最好从政治上把这片根据地组织团结起来，以巩固我们的已取得的胜利，加深和扩大我们在支持我们的人民中的影响，并彻底清除敌人及其走狗的流毒。

游击队每逢不得不放弃一块地方时，战前的行政机关的文件和傀儡当局的档案，凡是能够找到的，统统都把它们销毁，使旧制度复辟不要那么轻松。如果能够的话，撤退时总要把自己的文件带走。这是一场在铁托监督下由于战时状况所决定的不得不采取的强有力的经验之举，并以军队为后盾的从基层系统逐步实施的一场革命，连微不足道之处都给予极大重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革命又和争取解放的、民族和平的南斯拉夫全民运动天衣无缝地捏合在一起。1942年，同盟国对他漠不关心，对此铁托可能会有点气愤，但是他完全抓住了这个时机为他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力量基础，不但没有被同盟各国（特别是俄国人）所觉察，而且丝毫没有受到干扰。

铁托传

1942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铁托对能够得到俄国援助充满信心。他给季米特洛夫发出非常详细的电报，转呈俄国领导人，这从来没有马虎过。电报的抬头千真万确是季米特洛夫，而铁托则用他在共产国际的名字瓦尔特签的名。这些电报一般都是他亲笔用俄文写成——基本上都是用铅笔，还非常谨慎地加上标点，一次次地修改。纸张则是从放在他背包里的一个普通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在它上面的详尽情报有：游击队的活动，其中有对战斗情况的定期全面汇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种重大决策；德国和意大利部队的所有调遣过程，切特尼克的活动及其残酷举动和通敌的全部过程及后幕。铁托小心谨慎地回答季米特洛夫提出的问题，向他提供那些由他委派在总参谋部起重要作用的，还有那些被德国和意大利扣押的共产党员的详情；他和马其顿的关系以及他同所有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联系情况。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有关在苏联境内重建的南斯拉夫电台情况以及其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许多关于切特尼克同南斯拉夫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暗中联系的情报。

铁托的电文中最重要的是他借助大量事实，详尽地向季米特洛夫汇报有关切特尼克同意大利、同德国勾结的所有具体的情况，甚至还有请求援助。早在1941年8月铁托便曾向季米特洛夫提出这样的援救；他的士兵非常急需武器。12月底，他找到了一个适合用降落伞空投的地点。1942年2月初，他得到第一个答复：“最近由我准备派人到你那里。盼告飞机空投的详情……”2月17日铁托答道：

我们非常需求医药用品，尤其是能够防止伤寒的血清

铁托传

……盼送来足药火药自动武器、皮靴和士兵军服……如若可行就在门的内哥罗杜尔米托尔旁边的扎勃利亚克为我们空投。现在这里已经下雪，机场降落相对比较困难，可以为飞机装上带有滑雪装置……不论你们送来什么，对我们都将是极大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与鼓舞。

就在同一天，铁托又发了第二份电报作为第一份电报的补充说：

我为你们准备的空投地点是完全解放了的，没有任何危险……为了日后能使巨型飞机能够安全着陆，请务必尽快援助一些尽可能多的各种自动武器、机关枪、信号传达器材、火箭、轻机枪以及弹药。

铁托又提供了地点所在的具体经纬度，提供了最容易辨认的标志，并说他们将从2月23日起拭目以待苏联飞机的到来。着陆场地一切准备早已就绪，莫沙·皮雅杰，一个五十二岁的忠实的共产党员被派往现场亲自安排，铁托一直最信任的他定能妥善地完成任务。皮雅杰后来答复道：

我于2月22日晚按预定时间到达扎勃利亚克。今天是飞机预定到达的前一天，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检查所有准备工作是否完善。云贾多尔村附近辽阔的高原积雪六英尺深，我们从2月23日和从那以后的三十七个夜晚就一直守候在那里。我们总是时常在扎勃利亚克村四英里外的一片荒凉凄冷的大雪覆盖着的高原上等飞机的降临，每天

铁托传

都是天黑前往，拂晓而回，徒步往返其间。

最后，他们只好建了一个小雪屋——简直就象是北极探险队的住处——以供人们在里面遮挡严寒。传令兵一动不动地守候一旁，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给在福查的铁托报信。

2月25日，铁托又一次给皮雅杰写信说，季米特洛夫曾主张要游击队最高领导人以南斯拉夫人民名义向欧洲人民求援。铁托几乎在同时刻作了回复，附了一篇琅琅上口、他认为会是令人高兴的声明草案。这篇声明时至今日也没有公布，而且从3月初开始季米特洛夫来电的口吻一天天趋于冷淡。铁托仍然从未间歇地发出情报并请求武器。铁托电告，英国飞机像空投求援物资似的空投了南斯拉夫军官和英国军官各两名，但他们都曾是德国人俘虏；萨格勒布的李巴尔家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赫尔塔·哈斯被捕。第二无产者旅从此开始成立，并从此与保加利亚共产党直接建立了无线电联系。3月5日，“老爷子”针对无产者旅一事发表声明：

通过仔细分析你们电告的所有情况，得出印象是英国和南斯拉夫政府确有某些成员不相信游击运动具有像他们宣传的那样的共产主义性质，其目的就是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除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怜悯者外，难道你们就不能团结其他所有有爱国热情的人共同进行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吗……我们慎重地要求你们重新审视你们的策略和行动。”

铁托在回电中为曾经实行的政策作了极其有力的辩解。他

铁托传

说：“游击队运动处于被第五纵队彻底击败的生死关头，无产者旅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并不是在为苏维埃化而拼搏，但却以其英雄般的举止给我国人民做出了表率……”铁托在3月9日的另一份电文中语气强硬地指出：“我们需要武器弹药，这才是创建民族解放阵线最好的途径。我们国家有大量人民，他们都渴望能与侵略者背水一战，但他们没有武器。”铁托一气之下采取攻势：为什么苏联电台不向世界说明切特尼克反游击活动的真实面目？季米特洛夫只好急忙慰藉铁托：

也许，你误解了我们的电报。我们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我们完全地、坚贞不渝地相信你同时也支持你。……鉴于苏联对外广播现时不提切特尼克，如果再提到斗争的主要矛头主要是指向切特尼克显然有些不合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动员世界舆论一齐携手反对侵略者，至于指名或揭穿切特尼克则是第二位的事情，……我们坚信它一定能坚定地紧握你那有胆略的手。

铁托还是没有平静下来，他对握手不感兴趣，除非这象征着援助。3月19日他发电说：“由于弹药的极其缺乏，我们的处境步履维艰。务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尽快送来武器和军事物资。盼告到底是否能送来东西及日期。”七天以后，他写信给依然坚守在杜尔米托尔山麓雪地里等待的皮雅杰说，他已经确定援助迟迟不来是由政治问题造成的。他写道：“妨碍我们取得援助的罪魁祸首是南斯拉夫政府，而不是我们的政策。”事情后来显而易见：2月底到3月初的这段时间，援助铁托的政策被否决了。关于这件事情，俄国人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发表

铁托传

自己的决定。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只能猜想大概是斯大林亲自撤销了起初要援助铁托的决议。这项决定到底是什么时候传达给季米特洛夫的，我们不得而知。3月19日，季米特洛夫才慢慢地婉转地透露不会送援助来了。“为了支援你们武器，我们一直在努力，但终究因为技术困难极大。唉，你们别再期盼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战胜它们了。切记尽力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最大可能地节约现有的军事物资吧。”对铁托来说，这简直就是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再加阐述的一番画蛇添足的昏话。恰如六年后铁托和斯大林关系彻底断决时所揭示出来的事实的真相那样，此事的整个历程创痛也许根本就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深刻”来形容。

1942年上半年，铁托和游击队员们为了最后仅有的生存机会而不懈地战斗。这是这场战争中生死攸关的阶段。运动还只是处于从地方性的起义向全国性的革命和解放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军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完全彻底博取人民的支持。有些难民参加了游击队，也有很多参加了切特尼克匪帮。英国援助切特尼克，这无疑对没有政治信仰思想觉悟的农民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德国和意大利从本国和当地的部队中挑选了一部分作为了援军。铁托仍然没有放弃施加压力以使俄国领导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的严重处境。他在一个接一个的电报中，把三件事情表达得很明白：切特尼克和德意暗中勾结；奉行援助盟国敌人政策的南斯拉夫政府的通敌活动；这些正是游击队在对德国人及其战略伙伴作战中所面临的极其危急的现实情况。5月24日铁托再次给“老爷子”发电报说：

自5月20日起，我一直坚守在门的内哥罗第一线。

铁托传

形势危急，战斗从未间歇，游击队员已疲劳过度……他们几乎用光了所有的弹药。全国人民都在诅咒流亡伦敦，出卖祖国人民的南斯拉夫政府，因为正是它通过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帮助侵略者打自己人。全国人民都在问为什苏联不来支援……难道果真对南斯拉夫政府的现有叛国政策束手无策吗？

过了几天，铁托强烈谴责了英国广播公司盲目报道的游击队和切特尼克对侵略者“并肩作战”的消息：

那简直是弥天大谎。请尽力嘲讽这种骇人听闻的背叛，并将其公诸于世……我们正准备在几天之内宣布一项反对切特尼克和南斯拉夫政府的声明。请不要忘记电告你们的意见。

铁托认认真真地答复了俄国人提出的所有问题，试图表明他领导的运动，恰如俄国人希望的那样，是立足于人民和全民族的，虽然他也丝毫不隐讳运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我们不明白苏联领导人怎么接到这类情报，也不知道他们接到了多少类似情报。一直等到1942年夏天才有了一些迹象，表明这种情报至少在苏联和王国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起了不少作用，当时流亡政府正在伦敦和古比雪夫不断地施加外交压力，其根本目的就是迫使铁托将其军队交给米哈伊洛维奇统率。季米特洛夫要求提供的那些情报，很明显是为了掌握情况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内阁大臣们进行谈判。1942年1月5日米哈伊洛维奇被任命为南斯拉夫内阁的国防大臣——陆海空三军

铁托传

最高指挥官。这一事实使局势变得更复杂了。8月，苏联政府领导人向南斯拉夫首相斯洛博丹·约克诺维奇教授转告了关于米哈伊洛维奇军队要支援意大利军队的报道的细枝末节。但俄国人仍然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惟恐得罪西方同盟国，于是决定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他们也仍然担心同盟国可能和德国达成协议转而支持一场联合对付苏联的反共十字军。援助铁托，乃至他的行动是否成功，比起这种危险来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9月14日季米特洛夫汇电给铁托，要求他立刻报告关于切特尼克通敌活动的真相，同时警告说，德国人毫无疑问要在南斯拉夫人中间挑拨离间，有些文件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伪造的。但是铁托掌握了大量文件，而且也可以确认它们确属真实。其中有不少现在已从德国和意大利官方档案中得到证实。俄国人当时正准备派出他们自己的专业侦察员到米哈伊洛维奇那里亲自执行任务。11月30日王国政府首相约瓦诺维奇秘密给米哈伊洛维奇发出了“绝密”电报：

俄国人正准备派遣高级军官到你的参谋部那里协助你的工作，以便同你取得联系，除此之外还要从俄国的由南斯拉夫人组成的连队中为你争取援助并策划组建联合广播。建议已被否定。我们坚持首先要立即停止电台和报纸上对你所领导的南斯拉夫军的攻击；第二点就是，坚决不允许游击队进攻我方部队；第三，游击队由你领导。只有在这几点都顺利通过之后，才能考虑进一步合作。

12月，还有其他几份电报也出现了同样傲慢的不可能实

铁托传

现的观点。但就在此时，同盟国方面已以充分事实证明了切特尼克同敌人的秘密勾通。据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官方报导说，英国军官彼得·博吉少校和王国战时内阁最高领导人物日·克奈热维茨少校会谈时说，米哈伊洛维奇和奈迪奇同样是一个不怕国人唾骂的家伙。虽然是这样，同盟国直到 1943 年年中仍给米哈伊洛维奇不断地运送军事援助而不给铁托任何支援。至于俄国，一直推脱到 1944 年才向铁托派出军事代表团，带去的援助也少得可怜。铁托最终还是赢得了这场斗争，取得了同盟国的信任和援助。但在他看来，这时数不清的最艰苦的战斗已经烟消云散，从此时开始再想阻止战争中最严重的打击和最惨痛的苦难已不再为时代所允许了。

1942 年夏，铁托下定决心把他的几乎所有军队从波斯尼亚东南部后退二百英里到克罗地亚，那里敌军不是很集中，并且有可能开辟解放区。游击队后来所说的“长征”从 6 月 24 日这一天开始的，毫无差错。调动这一支三千人的军队，足足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伤员依然形影不离地跟随大军。这是铁托的老规矩：伤员如不能安置在没有危险的地方，部队就不能抛弃他们。敌人不承认他们是战斗人员，一旦被俘，便要不留活口。有一次游击队从乌日策撤退时便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德国坦克在游击队伤员躺卧的田野上转来转去，把他们全部压死。

就当铁托准备把他的司令部逐步向前推进时——到库伦一瓦库弗，到普罗佐尔，经过格拉莫奇，到波斯尼亚佩特罗瓦茨，最终目的地便是波斯尼亚的一个不很大的城市比哈奇，他和很多个其他的正在全国各地获得一些胜利的游击队取得了联

系。11月12日铁托又一次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组成八个师，每个师都有三个整编旅，……现在我们正着手成立与政府一样的机构，并把它命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包括所有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代表和很多以前的党派的代表。

他接到一封措辞谨慎的复电，电报是这样的：

要真正想让委员会在人事和纲领方面都具有有一种各党各派联合的坚决反法西斯的性质，那就完全没有必要把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政府，而应该把它当做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机构。在当前情况下最好不要提出废除君主政体的问题，同时也不要提出任何能够体现共和性质的口号。政体的问题……可拭目以待德意联盟被击败的结局，国家首先要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后再考虑其他问题。

铁托因此着手筹备在比哈奇召开一次盛大的会议。这次大会计划在1942年11月26日至27日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游击队员及其忠实拥护者，军民都有，同时还有南斯拉夫战前的某些政党的代表。这个会就叫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没有任何政府的成立但是却选出了一个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也就是具有政府职能的机构。反法西斯委员会是在一所女修道院里召开的。会场里悬挂了各种旗帜和各同盟国国旗。还有很大的一条横幅标语，写的是游击队的

铁托传

口号：“消灭法西斯，还我们自由”。南斯拉夫的老政治家伊凡·李巴尔博士被任命为主席。这次大会激起了全民的关注，而且是争取国际国内舆论的一场同战场一样激烈的心理战。会议结束后，铁托电告季米特洛夫：

我们赞成你的意见……并将执行它，但我们必须预先通知你：当前所有国民都痛骂南斯拉夫政府是卖国政府。我们尽管没有把这个执行委员会看成一种政府机构，但它还是不得不料理国家事务和指导一切军事工作，所有人民解放委员会将会支持它。……在南斯拉夫，除了与这差不多的这些委员会和指导战争的军事当局之外，再无其他的当局了……它们在整个南斯拉夫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

这份电文显然更换了一种新的语调，里面有自豪、权威甚至还有挑衅。尽管这次胜利来去匆匆，比哈奇会议依然能够被看作是游击队运动的转折点。这次短暂的胜利向俄国人表明：铁托现在已不仅仅拥有军队，也已拥有一个国家。这标志着铁托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虽然他不断向俄国人提供周密的报告并就许多与主权无关的问题征求意见，但是，现在他已经享有一种新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位。如果 1942 年俄国人果真送来了援助，尤其是如果他们也真的派来了军事代表团，那就难以设想铁托怎样才能防止俄国在军事战略和政治上对他实行的种种监控与操纵，并进而把他从那毫无战略意义的领导地位上一脚踢开。果真如此的话，这几乎确定要制止游击队运动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运动，从根上也就会改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在战后的所有发展过程。

第十三章 同盟国家的承认

1943年同盟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军于北非严重受阻，俄国人在东线进入攻势，盟军已经进军意大利，在9月初意大利不得不无条件投降。由此德国的最后失败已在所难免。铁托所处的局势同样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就在当年年底以前，他得到了同盟国的援助和信任。他也担任起南斯拉夫临时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这个政府是对王国流亡政府出卖祖国可耻行径的挑战。

当盟军着手计划攻打意大利之时，一定要考虑巴尔干的军事形势。在这个如今非同小可的战略地位，德军只好把用于保卫交通线以防游击队袭击的师团不断地增多，相对地用于对抗盟军在意大利挺进的师团就一天天减少。这就意味着盟军首脑当前完全有必要下定决心弄清南斯拉夫起义的缘由。1941年夏至1942年6月，开罗特执政党曾连续八次试图把军事代表团派入南斯拉夫，其中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空降到萨拉热窝的山区地带被克罗地亚部队全部杀害；另一个代表团的部份成员乘轮船到达，在科尔丘拉岛也成了意军俘虏。

由特伦斯·艾瑟顿少校率领的代表团的遭遇至今仍然是个谜，也很自然的传出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猜想。1942年1月，特执局派艾瑟顿率领另外两名英国人和两名南斯拉夫人到那里去，顺利地在了门的内哥罗海岸登陆，据猜测他是奉命与米哈伊

铁托传

洛维奇会面的。他和控制着该地区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同时他们被送往波斯尼亚的福查铁托司令部所在地，他们于3月初到达。代表团受到铁托热情友好的款待，铁托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抵抗运动得到信赖和援助，一直希望能与英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艾瑟顿在来的路上丢失了他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就在此时，铁托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刚建立不久。浪费了不少时间才做出安排，使艾瑟顿得以继续前进。他在福查停留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与一个前南斯拉夫王国的将军留巴·诺瓦科维奇联系上了。艾瑟顿对这一带地方一点都不陌生，他早年曾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的假期。但也不能不让人想到他自愿承担这项任务另有人目的。显而易见他决定不等待游击队为他安全通过他们的解放区及各占领区去切特尼克司令部作好预计安排，而是在两名游击队的反对者南斯拉夫人斯帕索耶·达吉奇和拉多万·布拉戈耶维奇支援下秘密地进行着其它安排。诺瓦科维奇不反对只是在艾瑟顿给他一封函件写明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下，才肯参与这一有可能遭人唾骂行动。4月16日夜晚，艾瑟顿和小组的其他人员蹑手蹑脚地离开福查奔向米哈伊洛维奇。诺瓦科维奇引导他们走了一段很长的距离之后便把代表团交给了当地的向导，但自己依然陪伴着他们。当向导们得知到艾瑟顿携带着大批金钱，且基本上都是金币时，便设法把诺瓦科维奇赶出他们的视野，杀害了代表团的所有成员，抢走了金钱和及所有值钱物品。这一谋杀案的消息在西方传开，切特尼克分子便指控铁托是这件事的后幕，并以此破坏铁托的威信及其所领导的全民运动。铁托再也忍不住心中怒火下令查明和缉拿凶手。达吉奇不久后便成为东波斯尼亚的切特尼克一个司令官，第二年，在与游击队作的激战过程中被击毙。诺

瓦科维奇被捕关押，布拉戈耶维奇被处决。这起事件从未解除铁托对英国情报人员很长一段时间怀疑。

但到了 1943 年初，英国却毫无困难地把另外几批联络官派到切特尼克处。1942 年 12 月 25 日 S·W·贝利上校任授命为驻桑贾克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军事代表团团长。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其他的一些英国军官也曾视察了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切特尼克部队。贝利上校的报告加上英国从王国政府那里得到的情报都明明白白地展示了切特尼克的政策，也可以说是：在盟军挺进巴尔干，塞尔维亚人能够有机会和他们一同投入战斗之前，米哈伊洛维奇没有计划要动用他的切特尼克部队来攻击德国及其同盟者。他甚至坚决反对他的部队从事任何有危害性的活动。1943 年，同盟国当局得到准确情报说，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妨碍着米哈伊洛维奇计划的进展：他与德国和奈迪奇的官员有种种勾结，一部分切特尼克部队与意军积极合作。

1941 年 11 月至 1943 年 6 月在这接近两年的时间里，英国给米哈伊洛维奇运输了二十三吨军需用品，其中包括武器、黄金、无线电设备、衣服以及医药用品。他和王国政府首脑一面拒绝同盟国的要求，一面却接连不断地索取更多的支援与帮助。贝利上校在报导中这样说，米哈伊洛维奇竟指摘英国要求“战斗一定要坚持到哪怕只剩下一个塞尔维亚人”；英国人和南斯拉夫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

铁托的情况则相差甚远，到 1943 年，英国已经充分完全知道到他拥有一支刮目相看的部队，积极转战南斯拉夫许多其它地区。这时候他们已经了解铁托不是什么传说中的侠客，更不是一度谣传的那样是个什么女人。他们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

铁托传

共产党人，而且把他认为是南斯拉夫人而不是俄国人。但是他们没有再多的有关他的详尽的情报，甚至不知道他的司令部到底在哪里。他们没有援助过他。当贝利上校向切特尼克争取合作但没有成功时，在别无选择之时才于 1943 年初决定同游击队领导直接接触。这是依照特执局和中东武装力量司令部的意思所做出的军事上的方针政策，他不止遭到相当大的反对，因为它意味着可能要接受正与切特尼克打得你死我活的造反共产党分子，而切特尼克的总司令却是亡国政府的军机大臣。这一决定以及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都已转告了王国政府。

双方后来都讽刺英国的政策都只不过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权谋。切特尼克和王国政府自己佯言遭到背信弃义的投机家的诡计；游击队则一直相信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也就仅仅是在利用他们，实际支持的是米哈伊洛维奇，企图是让亲塞尔维亚集团在战后重走历史道路，恢复王朝之国。但是英国对战前南斯拉夫采取的政策看来仍然处在模糊之中。英国政府曾积极支持过 1941 年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变，这一事件加上支持从希特勒欧洲逃亡出来的各国政府的所有政策，所有的一切都迫使英国有责任支持王国政府及其军事首脑。如果米哈伊洛维奇真的同意同英国向南斯拉夫境内的德军和意军作战的话，那就很难想象情况会很有可能发展到英国援助铁托的地步。

依据丘吉尔及其顾问的意思，开罗特执局于 3 月 25 日受权与游击队正式取得联系。4 月 21 日，由两个分队组成的加拿大国籍的南斯拉夫人被“盲目地”空降到明明知道是游击队的所在地区。其中有一组官兵顺利着陆，乘汽车到达克罗地亚司令部；第二组却很不幸的降到游击队正在作战的东波斯尼

亚，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第三组由两个英国军官统帅，于5月19日完全空降到波斯尼亚。但就在48小时之前，铁托已和头一个军事代表团取得联系，并已电告开罗并不反对派一名英国联络官到他当时设在门的内哥罗的司令部工作。

同盟国对游击队比较有兴趣。当时铁托在军事上正处于又一个危急关头。因为1943年头六个月，德军接连两次发动进攻，企图是要歼灭铁托骨干部队，粉碎游击队运动，以便开通从希腊经南斯拉夫到意大利和中欧的德国交通线。在这个已经被德军命名为“魏斯”行动中，游击队则正成为“第四次攻势”的战役的目标。这个行动的第一阶段是包围铁托司令部所在地比哈奇地区的所有游击队主力，然后在第二阶段插入波斯尼亚游击队一直占领的领土并消灭几乎所有游击队军事力量。还有一个至今还没有实现的第三阶段：德军计划将切特尼克生擒，让他们担任辅助勤务。

在这次战斗中派遣了一万八千名以上的切特尼克分子。其中大概有一万二千人坚守在门的内哥罗，由斯塔尼希奇上校统一领导；黑塞哥维那那里则有意大利穆尔杰师在南部和东南部控制战区以切断游击队的逃跑之路。铁托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一致认为游击队必须从这个方向突围，首先由游击队突击队打开一道生路，掩护主力部队和大批的随行伤员、难民一面战斗一面后退。游击队主力足足花了三周时间才经过波斯尼亚中央高地撤向奈雷特瓦河。为了突破敌人计划周密的包围，只有过河。病号和伤员一开始就有二千人，而且同时也在不断增加。他们被分成能步行的，能骑马的和不得不用担架抬的三类。戴迪耶尔当时的任务是协助伤员的完全撤退，利用行军中无数次的停留时间写了日记：

铁托传

我去看望伤寒病号，……虽然面颊深陷，颧骨高高隆起，两眼圆睁，依然那么炯炯有神，……整个荒山到处都是担架，直达迪纳拉山脉，……什蒂潘尼齐足足有四百名伤员徒步跋涉于大山之间。

在这次激战开始后的第十天，铁托电告季米特洛夫：

不得不再次询问是否真的没有给予某种援助的可能。数十万难民濒于死亡的边境。已经历了二十个月英勇抗战，几乎是超人的难以置信的决战，难道真的没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来支援我们一下？……目前伤寒正在不断蔓延，而我们根本就没有药品。人们饥饿而死，如同苍蝇那么悲惨，……急切等待你们的援助。

十一天过后，1943年2月11日，他终于收到了盼望已久的季米特洛夫惯常的回答：

苏联全体人民及其领导们都会完全支持你们。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我本人曾经不止一次讨论如何援助你们的方式。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止，由于不能克服的技术困难，我们还没有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满意的答案，……什么时候条件具备，我们将竭尽全力采取一切能弥补的措施。难道你对此仍然持有怀疑态度吗？

铁托的评论只得藏在心底，但就在几周后，在就游击队同

德军和乌斯塔沙交换战俘问题而与季米特洛夫的来往的电报中，他让自己讲了句气愤的话。游击队争取能让一批人获得释放与自由，其中包括赫尔塔·哈斯。季米特洛夫并不完全支持这项谈判。铁托随即顶了回去：“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不准备支援我们，至少别给我们制造麻烦。”以两名乌斯塔沙的要人换回了三十名游击队员，其中一个是在斯洛文尼亚参与游击队的赫尔塔。

2月22日，第二师占领了亚布拉尼察，彻底打败了切特尼克的进攻，而第一、第三师则到达离孔日奇不远的奈雷特瓦河，巩固了他们的侧翼，阻止了敌人从萨拉热窝方面进攻。先锋部队从普伦伊山上的切特尼克队伍中杀出一条血路，歼灭了所有在那里的切特尼克部队。到3月15日，铁托得知主力部队已成功脱险，于是下令撤到门的内哥罗关键地带。他又派了三名匿名军官就停止战争问题同德军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保证伤员的转移以及有充足的时间安排交换战俘和抽空集中他的被打散了的部队，追击逃窜中的切特尼克分子。其最后结果是：切特尼克部队虽然那么多次集结，顽固地与德国军队合作，对游击队作战，直到战争之末，他们还是没有能召集足够力量，对游击队构成重大威胁。游击队此时处于劣势状态，而德军的攻势显然还将继续下去。

“魏斯”行动此时此刻已并入“史瓦西”行动，这是一个更厉害的更加危险的攻势，为此游击队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整编或选择有利的地势。铁托后来曾说，曾经是掩护他们的群山这次战役中却成为游击队的巨大障碍。他们的机动性受到很大的约束，以致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

参加过激战后来称为“第五次攻势”的游击队，不过仅仅

铁托传

是铁托的总兵力的一小部份。铁托的军事力量遍布于南斯拉夫各个不同地区，彼此用无线电通过地区司令部与最高司令部联络，但却常以微弱的力量进行着相当独立地战斗，同样能丰衣足食。他们在全国的总人数达十五万左右。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及其后相当长时期，游击队的人数都是不确定的。人数是由战地指挥官统计的，而他们任务繁多，根本不可能准确记录每天的人员变动情况。地形复杂的山地战中，伤亡数字也只是一个概数。敌人的战地兵力远远超过铁托，众寡悬殊情况很可能远远超过官方公报的六比一。

铁托原计划把他的主力部队朝向东南方转移到南塞尔维亚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接壤之处的科索沃—梅托希亚。在这一方面，他再次把政治和军事联系起来仔细思考，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一个完全新的地区里争取爱戴与拥护。他的代表从未间断的与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共产党以及马斯顿人保持联系。铁托以其惯常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大概早已在考虑怎样才能协调整个巴尔干南部的游击活动。然而他不同意建立巴尔干联合司令部的建议。但由于德国从东南方向的急快逼近，铁托不可能向这个方向撤退。

5月6日，正当这次战役在进行的中期，铁托又接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通知：考虑到共产国际已经过时，主张予以解散，急切要求南共政治局提供意见。铁托正全力应付当时危急的军事形势，加之全体政治局成员都在领导战争，没有很快回复。5月22、23日又重复来电，他终于在5月26日按来电的愿望给予了答复，表示赞同，但心里十分明白：他同意与否根本就不起作用。早在5月15日共产国际已被解散。这就是斯大林亦如今公布他的理由：它已经成了“反法西斯共同斗争

中的进步力量”同时也是创建统一战线的障碍，而且还由于它蛊惑人们，莫斯科通过各国共产党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是俄国人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进行政治交易、慰藉同盟国的舆论而采取的许多行动中的一个。

共产国际的结束，起初对于铁托同俄国的正式关系几乎没有一点影响，这无疑正是苏联领导人所期盼的结果。直到1943年底，他和过去一样从未间断地向季米特洛夫详尽汇报主要的军事和政治的进展状态，汇报为接受英国军事代表团而专门组织的谈判，关于他们送来的所有援助军用品，并就同他们的关系一事向他征求意见。从到今天为止所获得的凭证来看，他得到的答复也只是最普通的指示，因为俄国人总是愿意关注军事战役，只要铁托不做出企图疏远同盟国的事情，便暂时听任他在南斯拉夫的所做所为。

铁托以令人难以发现的方式，极其小心地巩固了自己自德国侵苏以来所获得的政治上的独立。在战争的那段苦难岁月里，他确实仍旧相信且先不提他对苏联援助一事是何等的失望，他要在南斯拉夫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需要俄国的支持。战后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要采取何种政策，看来他也没有胸有成竹的主张。

5月中，正在筹划英国派代表团如何顺利到达铁托司令部时，他的军事局势发生了巨变。德军从四面八方围攻而来，在马格里奇山坡占据了最有优势的阵地，从那里可以俯瞰苏捷斯卡河以及一条深谷，谷口则在苏哈；铁托的部队如果要由此自拔，就不得不由东向西横渡这个谷口。情况万分紧迫，但铁托为了联系上英国代表团，还是把撤离的时间推迟了一天半。这个代表团由六人组成，其中包括威廉·斯图尔特上尉和丘吉尔

铁托传

的朋友 F·W·D 迪金上尉。他们的降落伞冒着每小时四十英里的强风，摇摇荡荡于 1943 年 5 月 27 日至 28 日之间的夜里到达，而且还必须随铁托及其参谋部赶在德军攻打进来之前立即出发。如果再晚来整整一天的话，就连是否能够着陆都成问题。他们行军数天，并成功的渡过了狭窄的苏捷斯卡河。6 月 9 日，他们正翻越树木繁茂的对岸山坡时，天气突然间转晴，同时也被敌机发现，遭到轰炸。斯图尔特上尉和铁托的警卫员德尤罗·武约维奇不幸牺牲。铁托左臂崩进一块弹片，迪金的脚严重负伤。铁托的幸免，又一次全凭不可思议的运气。就在他纵身卧倒之时，他的爱犬卢克斯也紧贴着主人头部立即躺下，卢克斯被一块弹片打死，否则这块弹片就会要了他的生命。

到 6 月底，司令部所有成员和游击队主力的尚在部分都已突围，越过泽伦戈拉到达了福查—卡里诺维克公路，终于跨进东波斯尼亚没有危险的地带。这次突围的损失很惨重。铁托的主力部队此后再也没有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但事实证明德军自始至终一直是一支善于随机应变的部队，此后还有着许多场伤亡惨重的恶战。

铁托当时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物资和空中掩护，而英国军事代表团起初并没有以他所希望的数量和速度支援这些东西，使他大失所望。他始终没有抛却那种怀疑，即补给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克扣。给铁托输送的补给中，有一部份好像真是由于盟军指挥系统中某些个人所采取的拖延战术而未及时送到，但主要的原因却在于初级阶段负责输送补给的开罗特执局没有可供使用的飞机。游击队从未把这当真。直到丘吉尔详细了解到铁

托的积极作战方针，他才亲自问过这件事，催促尽快地提供补给。盟军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官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全力支持真正扩大给铁托提供补给的渠道”，并为此竭尽全力。

派驻铁托司令部的首批军事代表团到达目的地之后，同时也带来了六十五吨军需品。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用来摧毁德国横贯南斯拉夫南北交通线的炸药。当游击队用事实证明他们为此目的把这些物资分配得合理而又有效时，其他补给也接踵而至。6月23日丘吉尔决定，这些物资应以每月四百吨的速度送往前线。为了协助并观察这些行动，经铁托同意，全国游击队机构都配备了英国的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8月，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准将担任驻铁托司令部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接对丘吉尔汇报战地状况，所有英国联络官员均由他统帅。

铁托终于因获得补给而产生心安与慰藉和他对英国的空前无比的信任，但依然有不断的物资送给米哈伊洛维奇这一事实令他感到十分难过。1943年9月，派驻切特尼克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阿姆斯特朗同样被提升到和派驻铁托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相当的军衔，为此他也感到很不痛快。铁托还遭到进一步的其它的打击，这使他既愤怒又失望。他无意对英国军事代表团掩饰这种心情。同盟国没有把意大利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的情报按时告诉他。由于他错误地认为贝利上校曾把这一情报泄露给米哈伊洛维奇，因而怒火冲天。

就在意大利投降时，有十四个整编师和四个缺员师驻在南斯拉夫。解放他们的占领区，抢过他们的装备而不让德军或切特尼克抢先，对铁托是极其重要的事。他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军，占领达尔马提亚海岸和沿海岛屿，特别是斯普利特和希贝尼克这两个装卸港，坚决制止意军逃跑并接收那里分布最

铁托传

多的仓库。游击队成功地攻克了十个意大利师的武装，缴获了大量的军火和库存物资。他们还把自己的人员壮大到了大约八万多人，其中有很多是意大利俘虏，他们加入了游击队为他们重新组建的特别部队，也即加里波第师和加里波第·纳蒂索内师。

直到年底，铁托部队的男女士兵人数总共有二十九万人左右。这时，德国在南斯拉夫的部队已空前绝后地壮大——其中有二十万德国兵，还有十六万保加利亚兵以及克罗地亚傀儡和塞尔维亚兵以及其他的一小部分。他们还是担心盟军在达尔马提亚登陆，决不敢让铁托操纵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没几周的时间，他们就把游击队全部赶出了大多数海岸阵地，以及除距离意大利本土最近的维斯岛以外的所有其它岛屿。从1943年9月底起，整个出乎意料寒冷的严冬，他们仍然不断袭击散布于辽阔地带的、尤其是波斯尼亚的游击队。他们所采用的是新的、也是最有成效的流动的反游击战术，并调动空军配合，这正是游击队所害怕的。

铁托如今深深明白他有足够的人力抵抗德国人，但其条件是能继续在武器、食物、装备、空中支援和医药方面获得足够的补给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并可以派出自己的军事代表团飞往开罗盟军司令部进行商讨。洛拉·李巴尔受任被暂时委任为代表团团长。11月27日，当他正登上一架在战斗中俘获来的敌机，即将要飞往开罗时，却被一架突然入侵的德机炸死。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受命替代他的职务，于12月与麦克莱恩准将同机飞往开罗，麦克莱恩此次前往向与斯大林、罗斯福召开德黑兰会议后当时路经开罗的丘吉尔汇报。

铁托传

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表示“尽可能以最大的可能的规模向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物资和装备，并且派遣先锋部队给予坚决支持”。韦莱比特留下磋商具体计划，麦克莱恩带着丘吉尔写给铁托的一封令人心安的信件回到南斯拉夫，信是这样的：

通过朋友迪金少校我知道你们一切英勇的战斗。我最诚挚的愿望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海路供应、空中支援以及派遣突击部队给予你们一切可能的援助，充分配合你们的岛屿战。麦克莱恩准将是我朋友同时也是下院的同事。我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少校也是其中一个议员，不久以后我将同他一起在你们的司令部协助你们的工作。

我们现在最崇高的目标就是把纳粹的卑劣行径从欧洲土地上彻底地清刷干净。你可以放心，我们英国人绝对不会支配南斯拉夫未来的政府。同时，我们希望同志们能尽全力齐心协力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然后再根据人民的意愿决定政府的形式。

我已决定英国政府从今天开始不再给予米哈伊洛维奇哪怕一点的军事援助，把援助全给你。假设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从内阁中撤销米哈伊洛维奇的职务，我们将会为之而高兴。但是，国王彼得二世童年从摄政王保罗亲王的那么严密的控制下逃脱，今天作为南斯拉夫的代表而且作为一个处于无奈而逃亡之中的年轻王子投奔我们，大不列颠如果置他生死于不顾，那将是没有道义的或者说不体面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同他的祖国断绝现存的所有瓜葛。因此，我希望你们能给予理解。在最大限度给予你们军事援助的同时，我们无论怎样都不能断绝同他的正式友

铁托传

好关系。我希望你们双方就此停止论战，因为这种争执正好帮德国的忙。

你完全没有必要怀疑，我将一直和我的朋友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在工作中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热切地希望苏联政府会在很短时间内派驻你们司令部的军事代表团，并能够与麦克莱恩准将指挥统帅的英美军事代表团在工作中互相协调帮助。请通过麦克莱恩准将和我取得联系，让我及时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我绝对会竭尽全力。

就从那时开始给游击队的援助稳步增长。丘吉尔对铁托的援助就像他在巴尔干的政策，美国军政当局开始保持中立。他们不相信英国的目标在于干涉巴尔干，他们仅把它看成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或在东欧争取地位的一种尝试。他们不希望“卷入巴尔干”，而且就算是共产党真正对德军作战，他们在当时也不愿予以援助。他们原则上更趋向于支持现存的政府，而没有打算撤销对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将军的不断拥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自己也倾向亲塞尔维亚。由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大使福蒂奇管理的王国政府的院外集团在华盛顿已有着一定的势力，活动得非常积极。美国的这种态度只是在德黑兰会议以后才逐渐变化的。与此同时，他们和英国并肩合谋地中海的战略方针政策，看清了铁托游击队采取行动摧毁德国交通线的重要作用。到了1943年下半年，事实已很明显，彻底歼灭意大利境内的德军的战争进程将会被向后推延。他们希望自己能得到关于南斯拉夫近况的战略报告，于是在1943年和1944年间派来了很多美国军事代表团。1943年8月中旬，其中的一名美国军官沃尔特·曼斯菲尔德上尉在南

塞尔维亚切特尼克所属范围内空降，到达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接着在9月又派艾伯特·塞茨中校到那里。他就在阿姆斯特朗准将接任英国代表团团长的同一时间到达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这两位美国军官于1944年奉命转移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而由乔治·穆斯林中尉担任其职。他一直工作到这一年的5月，然后与阿姆斯特朗一起离开。虽然英国已在表面上表示切断同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联系，美国却于1944年8月又派遣麦克多维尔上校率领一个情报小组第二次到米哈伊洛维奇处。派遣这个代表团的真正目的没有弄清，但游击队一直认为是想设法安排德国人届时向米哈伊洛维奇而不向游击队投降。而现在也已被证明麦克多维尔也确实和米哈伊洛维奇手下的军官一起拜访过德国人。有这样一种说法，麦克多维尔的任务是为美国空军安排地面勤务，但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因为这属于以尼古拉斯·莱里奇上校为首的其它代表团的任務，同时此人来到了这里。后来丘吉尔向罗斯福提起麦克多维尔代表团引起的不很友好情绪，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和铁托元帅的曾经密切的关系，对此表示反对，该团遂于1944年11月返回国土。

就在这时，美国人也向游击队派遣了军事代表团，分散在铁托司令部和战区的不同指挥部。首先到达铁托司令部的美国军官是梅尔文·奥·本森上尉，他与美国遣向米哈伊洛维奇处的第一名军官只相差几天空降着陆。三十天过后又派来了里恩·法里什少校。截止1944年4月，他在铁托处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中间曾几度返回意大利。他曾经写了一份高度评价游击队活动的报告，据认为影响所及，成功的促成了德黑兰会议制定了援助铁托的决定。1944年夏季，铁托把司令部调转维斯岛时，同时也派来了埃勒里·G·亨廷顿上校率领的又一个美国军

铁托传

事代表团。每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都捎来了物资——虽然不是很多。战争就要结束时，美国人并曾从意大利组织医疗、空运和空中掩护等众多支援，积极协助铁托部队作战。

援助游击队应该是英国的责任，由于他们分布在地中海战区。俄国人的援助则仅仅是象征性的：派出一组只有六架“达科塔”式飞机，归巴里的盟军最高首脑。直至大战即将结束时，当游击部队从游击战转为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时，俄国人的早已没有意义的援助才逐步到来。按照苏联方面的统计，这些援助中共有二万零五百二十八支步枪，六万八千八百一十九支机枪，轻机枪以及自动武器，三千七百九十七支反坦克来复枪，三千三百六十四门迫击炮，还有一百七十门反坦克炮，八百九十八门各种各样的大炮，总计有四百九十一架飞机，六十五辆坦克，一千三百二十九部电台，七所提供医疗的医院，四所战地前线外科医院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各类物资。如若完全准确统计西方的援助甚难，因为英国记录迄今还没有全部公开以供查核，而游击队的记录一定不可能完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没有被记录下来。补给大多数以降落伞空投到南斯拉夫地区，也用飞机以及不少小型船只运送。开始时差不多有十二个或十二个以上的英国三军特种部队进行运输。为了完全配合这些活动，1944年6月成立了以空军少将艾略特领导的新的司令部：巴尔干空军，司令部当时设立在意大利东海岸的巴里。有很多特种部队的古怪特色到现在依然有，对于补给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或集中的记录。1944年期间“大约”有九千吨支援物资被空投给南斯拉夫游击队，其中大约有十万支步枪，五万支重型机关枪，一千四百门迫击炮，以及一百万发迫击炮

弹、手榴弹和一亿发轻武器子弹。而这些都不包括海路运来的支援品，其中有食品、药品、运输工具、大量燃料以及一百零七辆坦克，三百六十四架飞机，除此还有若干登陆艇和小型船只。除了上面的那些，英国皇家空军还专门为南斯拉夫游击队培训了两中队飞行员。同盟国给铁托的援助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此表示无限的感激，他们把游击队的伤病员撤至意大利并在英国建立的特设医院里进行治疗。仅仅是在1944年就有大约一万一千八百四十二名伤员这样撤离，总数远远地超过数万人。英国并曾派出内外科医师到南斯拉夫游击队前线医院工作。

不论所得到的援助总数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也总满足不了游击队的需要和要求。他们一面从心底感激，一面却总是有其他许多想法，按照他们的盘算，总量本应该更多一些，而且如果早一点给他们，而不是向米哈伊洛维奇提供援助，就可以摆脱很多令人寒心的原本不应该有的损失。对同盟国在全球战争中的补给问题，几乎所有的游击队员都未觉察到，铁托本人在1944年以前同样如此。悲惨的经历和消息闭塞使他们缺乏远见，只关注了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也是自己的宣传方针的受害者：只在乎向本国人民报道苏军的损失，以及赫赫战功，而对于英国为在中东阻止和击退轴心国军队却只能进行的苦战，却基本上一个字也没有提。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斗争以及苏联的斗争如果没有英美在西方奋战的话，很可能全都会白费，很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铁托和同盟国军事代表团中某些代表的关系很不错。这是他能够有机会很好的了解第一批英国人，他同时也发现有可能以相互尊重和共同使命为前提与他们交朋友。铁托和英国军事

铁托传

代表团团长在个人关系上一直很友善。许多英国军官都能感觉到铁托是一位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招人称赞，高度机敏而通情达理的人物，他们比他的追随者更能客观地评价他。曾有完全足够的机会观察作为领袖的铁托的麦克莱恩准将写道：“铁托的同伴们望尘莫及。”

他为了进行反对德国的战争带来了……自己的指挥、勇气、现实主义、斩钉截铁，以及专心致志、智谋、见机行事和普通常识。什么地方有重要选择需要决定，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军事问题，他都一如既往，……沉着而冷静，不论形势如何险恶，……每逢游击队行军，他从来没有不和他们一起行动，骑马或徒步，长途跋涉，……他的信条是，只要有一点希望，事必躬亲。一旦把那些必须由他处理的紧急问题安排妥当，他就会同司令部人员一齐坐下来，快快乐乐的吃一顿丰盛晚餐，下一局棋或干脆席地而卧进入梦乡。他有一种天赋：只要想去做，便能把一切烦恼抛至九霄云外，完完全全地休息。这时他就会谈笑风生，好象世界上全没有任何事情使他费心劳神。

林赛·罗杰斯医生在日记中写到铁托留给他的最初印象时说：

我仔细观察了他那饱经风霜、刚毅果断的面容，但这却与我走遍全国所有村庄所有的画像迥然不同。这不同平常的面容既充满了力量而又蕴藏着善良。他每说一句话，那双有神的蓝眼睛总直直地注视着你。

铁托传

中东盟军司令部空军司令官约翰·斯莱塞爵士，在铁托于德尔瓦遭遇一段巨大挫折之后到达巴里时第一次与他会面：

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那以后我总是有充分的理由确信我当时对他形成的看法是绝对赞同的。他不仅仅是一位游击队的领袖——而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一位有真正实力非同寻常的政治家……他形貌英俊，特别地机智。虽然他有很多下级人员固执不通情达理，常常使人气愤难忍，但通过和铁托直接谈话，总是从他那里得出某种合乎常识的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所有瓜葛。

在战地盟军代表团和游击队员之间，特别是和某些满腹狐疑、经过专门学习的政治委员之间，总是会产生一些误会和困难。但也不能老指责一方，因为代表团的某些成员觉得游击队的几乎残忍的生活条件及其狭隘的政治灌输无法忍受。盟军军事代表团丰衣足食，装备得好，穿得好，从开始攻入南斯拉夫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便显得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对极端艰苦、时时都有可能丧命的生活习以为常的游击队员之中：

不管是这里的一块咸肉油，还是那里的一片面包皮，他们都会欢迎，……光着脚，没有袜子，没有维生素，风餐露宿，弹药少的可怜，枪支已无法再使用，……但是不管哪里都充满了如此高昂的热情，如此热烈的信心：总有一天自由会来临，……每根绷带都几乎不能再用了，因为

铁托传

至少洗了十次抑或二十次，直到一动便成为布渣子。

“虽然必须在污秽中生活，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动摇游击队员的信条：如有条件则一定讲究卫生，……生活最基本的要求和任务是排除身上必然带着的昆虫群体。在这一方面只要对游击队的习惯给予应有的重视便能轻松解决，亦即躲入林中脱光上身，……除了每天亲自动手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办法预防虱子的祸患。

虽然条件如此艰苦，所有盟军军官都高度赞扬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急切高昂的情绪和永远流传的古老民歌歌唱着游击队的成就或颂扬铁托的顽强精神。而盟军人员也由于他们熟练的技术、勇敢以及对种种生疏环境的顽强的适应能力而博得人们的赞美。总之一句话，盟军军事代表团和游击队之间关系是紧密的，也可以说是友好的，尤其是奋战在边境地区的部队，在那里由于人们对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处于蒙昧状态之中，他们的感情就越深。

第四部分 革命成功

铁托传

第十四章 驶向和平

1943年11月29日至30日，铁托再次在亚伊策召开了类似战时议会的反法西斯会议。从政治策略上来说，这次会议举行得恰到好处，甚至远远地将比哈奇会议抛在后面，为的是在战后南斯拉夫政府一事仍有缓冲之机之前先确定和加强铁托的统率。回顾起来，这可以被认为是这场政治革命中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开端。这一着占了先。铁托当时并没有得知这些，1943年8月，在魁北克的旨在为次年入侵诺曼底的“太上皇行动”制定完善的作战计划的盟国会议已经达成一致共识，将以有限的空投和海运以及人数不多的突击兵力援助“巴尔干游击队”，但他明白英国对他的活动已经换了另外一种态度。他期望盟军能够在巴尔干半岛登陆，并急切希望能够与它们联合行动，但不愿让它们取而代之。他早已得知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政策一直是毫无动静，坐待战争即将结束时参加盟军作战，从而得以重新上台。他可不希望在国际领域的斗智中输掉，以致完全丢弃他的运动已在南斯拉夫赢得的荣誉。

铁托获悉盟国领导人正积极筹备举行会议，便以最快的速度电请季米特洛夫通知苏联政府，游击队运动既不信奉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国王。“我们坚决反对他们到南斯拉夫来，因为那将预兆着内战。”他宣布现时代表人民的惟一合法政权机构是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是亚伊策会议计划准备作出

铁托传

的基本决定。关于正在拟定的各项决议的具体内容，这件事之前既未通知季米特洛夫，也没有请求俄国人赞同，虽然他还是十分小心地就有关组织的问题征求了意见。他想让西方盟国，同时也让俄国人直接接受着一桩“既成事实”。这并不难，因为双方当时都将精力放在了与亚伊策会议差不多同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的筹备上。

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是铁托一生事业中最顺荡的时刻之一。会上充满着成就斐然和胜利在望的欢快，一片欢欣气氛，而且进行得相当顺利，既未受到盟国干预也没有发生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由于亚伊策在那时是正式属于克罗地亚这个卫星国的一个地区，会议使人有一种对德国人肆意地进行挑战的感觉。铁托带着一大批人员在这里足足花了六十天的时间为这次会议作如此完善的准备。他的司令部设在一个小木房里，不远的地方筑有地下室，以备德国人发觉会议的准备工作而加大空袭力度时用作防空掩蔽部。那时他已经五十一岁，两年来从未间断的奔波，极其艰苦，加以长时间缺乏食物，使他异常消瘦。由于日晒风吹，饱经风霜，常常又在防空洞或临时掩蔽部内长时间办公，他面色腊黄，脸皮紧紧的贴在颧骨上。但他精力一直就是那么极其充沛，工作起来几乎比任何下属人员都更有耐力，小睡片刻便又精神焕发——这种本领他一直保持到两鬓发白。在他的追随者眼中，他已经成为一位神话中的人物，而构成这种传说是为了鼓舞人们去战斗，并把这当作是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哪里有游击队组织，哪里就会在行军歌曲或称赞伟人事迹的民谣里听到对他的颂扬。这也是基于事实和拼搏的成就。他是毋庸置疑的领袖，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英雄。

铁托传

除马其顿外，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员和他们的拥护者都委派或推选了代表团前去参加会议。其中一些代表团，例如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代表团，其中有赫尔塔·哈斯，即铁托次子的生母，徒步走了好几百里，历时好几周，到达亚伊策时会议已经开始。各代表团在这里相遇，战争一开始便分离的人在今天又重聚一堂，其中有很多自从在西班牙并肩战斗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面。代表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有的也不是，但所有代表都与游击队的抵抗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联系。男女游击队员穿着形形色色的临时制服，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平民打扮的人。这次会议没有忽略持有各自独立的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天主教、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代表参加。

在亚伊策镇剧院的舞台上，铁托向成千上万的狂热听众发表了演讲。这不仅是讲给他们听，而且还讲给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地区的全体人民听，另外一个目的也为了引起聚集在德黑兰的盟国领导人以及流亡的王国政府的重视。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重申游击战争旨在解放南斯拉夫的所有领土，并宣告一个全国性的临时政府从今天开始成立。这个政府要拥有全权的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它宣布自己就是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以取代国王和王国政府，他们原先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合法权利已经失去原有效力。这些决定均纳入一项决议，全体一致赞成。反法西斯会议行使政府权力，其成员由民众选出。铁托当选为主席兼国防部长，同时被授予元帅衔。他于是具备了他认为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与军事领袖进行对等谈判所应具备的荣耀。但他不得不使这些决定为盟国领导人所接受。

11月30日，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当时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正开始谈判。铁托就在同一天向莫斯科发

铁托传

出电报，详述了所做出的每一项决定。这遭到莫斯科出乎他意料的反对。马努伊尔斯基对设在苏联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南斯拉夫掌管人弗拉霍维奇说，“老爷子大发雷霆。他说这是在苏联和德黑兰会议之间暗中捅了一刀”，同时也不允许弗拉霍维奇广播反法西斯会议各项决议的各项具体内容。斯大林害怕因此惹恼盟国，阻碍他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在德黑兰会议就要结束时，他却发现盟国坚决支持铁托并给以援助，赞同铁托所做出的各项决定。他们期望着这将有助于推行其政策，即说服铁托也支持与一个经过改革、基础较为牢固的王国政府合作。看来他们对斯大林恼羞成怒也可能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反而深信铁托所采取的行动是受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支持的。他们正忙于为诺曼底登陆做积极的准备，美国还在一心一意地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做出战略安排。为此，英美两国都急于同俄国人保持友好往来关系。西方盟国和苏联都不希望在赢得主要胜利前在次要区域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这就使铁托在一段时期内从中受益匪浅。他的绝对优势更由于盟国之间少了了解而加强。在此阶段，这不是有意使双方相争以坐收渔利的结果。但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即使在当时也早已表露出来，特别是在有关援助和后备方面。

虽然非正式的苏联使者也许会在 1943 年 9 月即已空投到铁托的司令部，正式的苏联代表团直到五个月后的 1944 年 2 月才到达。显而易见，它并不准备派一大批具有巨大权力的军事或政治使团来取代铁托的领导。这个代表团以前是以集团军参谋长科尔涅夫中将为首，关于此人斯大林曾侮辱性地说过：“这个可怜虫并不愚蠢，但却是个酒鬼，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这一点完全可以由这批俄国人空运来的大量烈酒证

实。由于严寒的逼近，俄国代表团乘坐装有雪橇的滑翔机到达此地，为此修筑了特殊的简易机场，确定遭不到德国人袭击，但不得不扫除厚厚的积雪。代表团先到阿尔及尔，随后到意大利的巴里，最后才到波斯尼亚。

对红军赫赫战功的歌颂，加上这些年来对作为共产主义革命之乡的俄国的崇拜，使游击队员们把苏联代表团的来到看作是一个极其庄严的时刻，他们拿出他们最热烈的欢迎。然而他们如痴若狂的热情却未得到应该有的回报。科尔涅夫将军走下飞机，“一个有点肥胖的、容貌可亲的中年绅士”，沉甸甸的绣金肩章加上许多勋章绶带，使原本就崭新的红军制服分外夺目，长统马靴擦得雪亮，没有一点灰尘。铁托则一身战地士兵的最最普通的土灰色制服，一个勋章也没有。科尔涅夫由八个军衔不低于是少校的军官陪同，其中包括副团长戈尔什科夫将军，一位俄国游击战术家——他很快就觉察到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与俄国的相差很远。这一行人中还有一名军队医生，数名政治情报军官以及若干技术人员和参谋。他们一到专门准备的住处休息就抱怨盥洗设备的落后，最后只好按他们的具体要求重新装修。

在以后几个月里德国人袭击德尔瓦尔的短暂期间以外，俄国代表团很少与其他代表团往来，偶尔有这样一次也只是在一些正式场合。这是按照来自莫斯科的官方命令办事，而铁托在前几年就已接到这些指令。与英美代表团基本上相同，俄国人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游击队司令部分别驻有代表，但却基本上未派军事人员到战地去。他们担任铁托与莫斯之间的联络任务，苏联对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搞不明白，这一点可以是肯定的。这种极不了解也促使铁托在采取行动时带有更

铁托传

大的独立性。英国军官们早已经有了这样的印象：俄国人把南斯拉夫人视为文化上完全落后于自己的次等斯拉夫民族。从5月起，俄国人的飞机，由盟国依照租借法供给的“达科塔”式飞机，从离巴里很近的英国空军基地起飞，为代表团专程送来给养，也为游击队员提供了某些支援，但这种援助从没有超过西方盟国此时所提供的援助的数量——铁托与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每周例会时，没有表情地提到了这一事实。

俄国人到达后不长时间，铁托也把自己的军事代表团遣往到莫斯科去，目的是请求给与援助，尤其希望给予一笔二十万美元的贷款，以解决游击队驻伦敦代表以及铁托正准备派往西方的一些代表团所必需的经费。他的最终目的则是，求得苏联支持他所提出的要求：与新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拟议中的盟国用于战后重建的援助，应该属于他的官员而不由王国政府或盟国军管政府给确定好的人员支配。这个代表团也担负着党的政治任务，即与苏共官员重新取得联系，南共认为，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已冷落了这种联系。

铁托最信任的同事中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密洛凡·德热拉斯，被指派为代表团团长，计划与季米特洛夫接洽。据德热拉斯所说，他那时也希望苏联领导人对游击队所立的战功，还有南共深信的自己已为共产主义历史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肯定与称赞。虽然德热拉斯没有能够博取苏联对南斯拉夫战绩的充分赏识，尽管他已觉察到对方在这次会谈中的重要目的是警告铁托不要暴露他在南斯拉夫建立共产党统治的真正目的，省的“吓坏”英国人，他对苏俄的狂热感情没有丝毫减退。斯大林告诉德热拉斯游击队员无须在军帽上佩戴红星，反复警告德热拉斯要注意丘吉尔的表里不一，说他是“那种只要你稍微有一

铁托传

点不注意就会把哪怕是一个戈比也从你衣袋里扒走的人。”罗斯福也被说成一丘之貉。他警告德热拉斯不得不小心英国情报组织以及英国人大概会刺杀铁托。他说：“就是他们在机舱里杀害了西科斯基将军，然后又不留痕迹地把飞机击落——既无物证，又无人证。”他坚持铁托一定要与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妥协，对德热拉斯说，“你应该同舒巴希奇谈一谈，看看能否有和解的希望。”德热拉斯带着这种因出自斯大林本人之口因而份量显得格外沉重的规劝，于6月初回到了不长时间在维斯岛于建立的游击队司令部。

德热拉斯外出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事件，充分地说明了游击队员需要其他的援助，特别是空军支援。这就是1944年5月25日上午德国空降部队对设在波斯尼亚的德尔瓦尔的铁托司令部的又一次打击性的袭击。或许是因为1943年9月空降部队毫无困难地劫走墨索里尼的经验，德国人极其秘密地筹划了这一以“跳马”为密码代号的军事行动。其骨干力量是由五百名党卫军所组成的空降营。他们都曾犯过军法，这次被批准参与特别危险的战斗队以立功赎罪。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铁托的照片，奉令尽可能活捉他。为了确保这次行动能有成效，袭击的具体地点和时间连军官们都没有事先说明。事实上游击队员们早在1943年11月就曾接到萨格勒布一个特工人员的密函：德国人正在积极筹派空降部队清除他们设在亚伊策的司令部。但是，该城除受到几次一般空袭外，还从未发生过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其他事件。1944年，铁托的司令部迁往波斯尼亚的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小镇德尔瓦尔。

德尔瓦尔有一座纤维素工厂，就座落于铁路沿线。它是游

铁托传

击队最初的根据地，看来作为司令部的新驻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它坐落在一个地形无比优越的山谷之中，北有亚塞诺瓦茨山脉峻峭陡立，南为巍巍群山，层层茂密的树林。游击队的部队分布在德尔瓦尔周围的群山之中，驻地与该地均有一定距离。城内还设有一所军官训练学校。游击队的青年运动准备在5月23日召开一次会议，准备请铁托在会上致开幕词。

因为与盟国之间的新的军事、政治形式问题，铁托的司令部工作量大增，规模也随之在过去一年中不断扩大。此时早已建立了一套兼任临时政府首脑所必需的繁忙而近乎复杂的组织机构。英国首相之子伦道夫·丘吉尔派来任职的英国代表团驻于城外不远处的一家农舍。附近是单独设立的美国代表团，当中包括好几个气象专家。但这两个代表团的团长当时正在外忙碌。俄国代表团则住在离这里更远的一个小村里。那时也有许多其他来访者，其中有盟国军官、英美记者、萨格勒布芭蕾舞剧团的好几位舞蹈演员，以及来此与铁托商谈国事的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城内正忙碌着5月25日铁托的五十二岁寿辰，到处一派欢乐热闹的气氛。铁托在两天之前还托往克罗地亚送邮件的交通员把一张明信片送给他的故乡库姆罗维茨，信心十足地向那里的人们问候。这个村庄当时还在巴维利奇伪政权的统治之下。

铁托本人的住所就在刚一出城的地方，四周全都是警卫，几乎坚不可摧。出入通道是一条小径，沿着乌纳茨河，一边群山遮掩，一边悬崖绝壁。循岩石上一处天然裂口内的三段木制阶梯拾级而上，继续往前豁然开朗而进入一天然洞穴，洞内修筑了很多房间，前面有的还带有一个阳台，从这里可以俯瞰山谷内外，美景尽收眼底。建筑结构以巨大木梁直接撑起，铁托

办公室内四壁贴了一层隔板，再往外一层都挂着用降落伞绸料改装的窗帘；办公桌后，墙上又格外显眼的覆盖着一大张英国人绘制的军用南斯拉夫地图。已经可以觉察到，德国人的侦察机接连好几天徘徊在这一地区。5月23日，一架单机在山谷中上下盘旋了老半天，显然是在拍摄照片。英国人警告铁托，德国人即将袭击。尽管如此，游击队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防御措施，人们很自然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司令部的所有官员，包括铁托本人在内，对于自身对付德国人威胁的能力过于自信了。

5月25日清晨大约六时三十五分，铁托刚睁开双眼就看到窗外飞来德国人的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它们几乎是在同时轰炸镇内的目标，很多地方都燃起了大火。七时又飞来四十架“容克—52”巨型飞机空投下伞兵部队，他们着陆后便集合起来冲向预先指定目标。十分钟后又来了大批滑翔机群，机身刚一着地面，机关枪手就蜂拥而出。九时德国人已攻克包括无线电中心在内的一多半个城，但在乌纳茨河右岸，由于最高司令部警卫部队与军官训练学校师生置生命于不顾，他们却没有能够建立起阵地。向有希望能赶到的四个游击师分别派出通讯员或发电紧急支援。英国代表团竭尽全力向巴里发出电报要求空军支援，飞机于第二天派来。驻地最近的游击部队第六利卡无产者师也驻扎在十二公里以外，他们几乎全是一路跑步前进，于九时左右赶到。其他游击队部队也在夜幕降临前先后到来。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德国人投下了空降增援部队，激烈的战斗一直到夜幕降临仍未结束，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直到次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战局才基本上结束：德国人已不可能实现其目的。

铁托传

铁托及其司令部所有重要官员都已逃出。他在刚过正午不久就经由一条周密策划的路线而摆脱袭击，即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打了个洞，沿着绳子到下面的河床，沿河往前三十码便可涉渡而遁入彼岸的果园。铁托身边的人员基本上都逃脱，其中卡德尔因德国人掠过时与他藏匿之处相距太近，险些没能脱险。铁托的女秘书兹登卡和奥尔加走在前面，他和警卫员及其爱犬虎子跟随其后。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森林中觅路前往波多齐，游击队在那里有几间不易发现的在树丛中的小屋，从那里得以搭乘火车沿一条短短的铁路穿过森林。游击队全部重要领导人都化险为夷；来访的外国人也大都没有被捕，但有一名美国摄影记者和一名英国新闻记者被德国人俘获。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代表团与铁托聚集到一起，他们好几个晚上不停地转移，全力让开德国人从班亚—卢卡、亚伊策、利失诺、克宁集中起来的摩托化部队，敌人正在空军支援下查找这个地区。从5月25日起的整整七天中，从意大利起飞的为援助游击队员出动的盟国战斗机和轰炸机群远超过一千架次。铁托极其镇定地亲自指挥了好几场死里逃生的战斗。这一行人食物和弹药都严重缺乏，但他们还是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次空投中获得了补给。

在此之前有段时间，曾一度研究过铁托在维斯岛建立永久性司令部的问题，由于那里有盟国的空军掩护和陆军支援，他完全可以安定下来，也不会被袭击。这个问题此时却变的那么现实起来，因为这一行人随时都有被俘获的可能性。苏联代表团正逼着铁托逃往意大利。他最后还是同意了，虽然他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极不愿意离开本国，哪怕是几天。6月3日至4日之间的那晚，铁托从姆利尼什特附近的新建的简易机场飞往

铁托传

意大利的巴里，同行的有司令部的几个人员、从未离开过他的爱犬虎子、一个英国军官以及苏联代表团。他们乘坐的是苏联的一架“达科塔”式飞机，驾驶飞机的是俄国人，飞行由英国人从巴里统一指挥。其余的人则分别乘坐英国飞机撤离。

铁托在巴里城郊区的一座别墅逗留了两天——在这两天里他足够与英国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塞爵士就所需供应进行商讨。尽管早已累得无法再坚持，且又稍感沮丧——偶然的一次，他还是能从新近的经历吸取教训：德国空军在南斯拉夫的天空简直可以为所欲为；游击队如果能够协助盟军在意大利作战，就不能没有强有力的空军支援。三天后，他又在一个黑夜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猎人级驱逐舰“布莱克默”号渡海驶往维斯岛。舰上军官室里的宴会，热闹一片。铁托死里逃生，既没有当战俘，但毕竟也不再是避难者，深感宽慰；而重返南斯拉夫，即将再度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这一切都让他十分高兴。因此，晚宴结束时，他乘兴操着一口并不流利的英语，朗诵了一首《猫头鹰和猫咪》，听众没有谁不啧啧赞美。

1944年夏，英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开始转向于试图说服王国政府与铁托的临时政府达成和平共处协议。英国希望从现在起结束内战，加强铁托的军队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力量，把德国军队限定在巴尔干，直至俄国人来到。英国还依然认为只要能真正达成协议，就将是走向奠定战后南斯拉夫由所有政党组成的民主政府的基础的第一步，并有助于预防丘吉尔所宣布的“巴尔干共产主义化”。这种政策获得一些流亡的南斯拉夫政治家，尤其是前克罗地亚巴昂伊凡·舒巴希奇博士的赞同。5月间，铁托委派一直在开罗的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博士为自己

铁托传

的代表，去伦敦将谈判的最起码的条件转告英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其条件是：承认反法西斯会议政府及其已经通过的各项目标；放弃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所有支援。国王回国的问题，则留待以后再考虑研究。

那个时候的整个形势给王国政府带来了深重而持续的困难与负担，但首相博日达尔·普里奇最终宣布辞职，从而为英国和斯大林所一直希望的和解创造了前提基础。舒巴希奇于6月初赴维斯岛；6月16日，签署了铁托—舒巴希奇协议。这个协议中记载了铁托的所有的基本要求。双方同意：在由“进步民主分子”所组成的新王国政府建立后，其当前主要任务是为铁托的军队提供尽可能的援助和军需品；战后国家形式与国王回国的问题，只有留待南斯拉夫人民作出最后决定。双方一致赞同，应由新王国政府和铁托的人民委员会各派代表，首先组成一个过渡政府。随后，舒巴希奇被任命为这个新政府的总理；米哈伊洛维奇被解除了军事大臣的职务；国王彼得向南斯拉夫全民宣读了一封信，谴责他与德寇的卑劣行径，并鼓励对铁托和人民委员会给予支持。

回想过去，这可以说是铁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他取得了王国政府对他领导的游击队的全力支持，并使之也承认了这一运动的合法性。但是，铁托对此却感到将信将疑，他说：“这是盟国作为承认南斯拉夫国内新事态的条件，我们必须表示同意，……因为盟国固执不化地坚持这一点。”他同时也害怕英国人会设计骗他，尤其怕他们会以什么方法派遣军队图谋使国王在南斯拉夫复辟。他这时正一天天涉足国际关系领域，而他在这方面却没有一点经验。

记得在1944年较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曾多次建议铁托亲

铁托传

自去意大利与盟国领导人谈一谈。铁托和他的同事们对待这些建议一直极为审慎，甚至抱有若干怀疑，尤其是他的同事中那些极端分子。德热拉斯还从莫斯科捎来了斯大林的警告。就在德国人突然袭击德尔瓦尔后，铁托从英国人那里所得到的支援，以及他与舒巴希奇所进行的富有历史意义的谈判，都完全有理由驱散这种猜疑气氛。1944年8月初，他从维斯岛乘机前往设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与他一同前往的人员有他的副总司令茹约维奇、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和军事情报、医务、军需等部门的掌管者。他的警卫员和爱犬虎子一直都与他形影不离。铁托的个人随从中还有他的长子扎尔科·布罗兹，不长时间才从俄国回到南斯拉夫。他参加红军作战时被炸去一臂，仍在慢慢恢复健康。

铁托一如既往地注意衣着，他还是穿着一套崭新的、紧紧绷在身上的灰色军服，裤子点缀着一些深红色条纹，军服上还饰以金黄色穗带以及代表元帅军衔的标志。丘吉尔以后就叫他为“金边紧衣”。铁托再也不希望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把他看成是不过来自深山莽林的游击队领袖，而表现出屈尊的样子，决心要使他的游击队运动的地位和成就不再被蔑视。他希望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数量比以前大大增加的援助。他的一些参谋人员对盟国的供应状况不是很了解，一味设想只要自己需要，就理应得到一定数量的飞机和坦克。

盟军控制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官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决心尽一切办法使这次访问得以顺利进行。8月6日他与铁托举行了第一次会晤；第二天，铁托又与驻意大利盟军的最高首脑亚历山大将军进行会谈。研究援助数量、参观军需仓库及意大利的英军战地状况花费了整整一周的时间，这使铁托更好地

铁托传

熟悉盟国的作战成果，也使双方得以互相做出猜度，彼此都很清楚。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即将亲自到意大利来与铁托会晤。

8月12日，在能够俯视那不勒斯湾的威尔逊将军的别墅中，丘吉尔与铁托正式会晤。铁托穿上他那套具有特殊意义的军礼服，丘吉尔则穿着一身白色工人装莅会。但地位和仪表很快就都与谈话无关了，这两个人尽管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不同，却一见便成知交。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两人都曾亲身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境遇相差甚远。他们都具有一种热忱而感情丰富的性格，都有很多生活中的乐趣和职务上的权势，又都是注重实效的伟人，坚信他们正运用自己的地位作为一种动力，进行一场善良抵抗邪恶的战争。他们之间的谈话通过铁托的翻译人员奥尔加·宁契奇才得以进行，但两人却设法取得了互相的了解，会谈的特色是双方都坦开心扉，言辞坦率。谈话是愉快的，从盟军新近登陆后的诺曼底军事情况，一直谈到意大利战线向前推进的状况。他们还仔细分析了德国人在巴尔干的情况，以及铁托的军队所发挥的作用。丘吉尔问铁托，假设盟军在伊斯的利亚建立桥头堡，通过南斯拉夫北部向卢布尔雅那山口方向进攻中欧的话，他的军队能否还会积极配合。铁托肯定地回答说：“能，我们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驻扎着军队，他们一定会出击协助。”两位领导人都明白，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提法，因为铁托也担心一旦盟军在南斯拉夫登陆，这部分军队就可能被派遣阻挠他接管政权，或遏制他对的里雅斯特和他的腹地，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人占领的伊斯的利亚与其它地区的领土要求。

谈话随后转到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上。丘吉尔向铁托问起

铁托传

切特尼克与游击队员之间的战斗，铁托说：“的确有战斗，很激烈的战斗。”丘吉尔回答：“我们真希望看到我们的子弹用来杀德国人。”他继而补充说，他的联络军官迪金和麦克莱恩所打回的报告，使他最后终于明白英国必须撤回对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援；丘吉尔说：“我希望看到，南斯拉夫人之间最好没有战斗。”对此，铁托回答说：“我们向来反对内战，始终认为德国人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只是在别无选择时才对切特尼克作战。倘若我们把米哈伊洛维奇当作主要敌人的话，游击队根本不会在国内得到人民这样的拥戴。”

丘吉尔之后又把话题转向塞尔维亚的老百姓，暗示他们不愿看到在战后引进共产主义制度，还讨论到了斯大林通过农业集体化所强加于俄国农民的各种各样的灾难。铁托回答说，南斯拉夫的情况与苏联并不完全相同，他说：“我们也不希望把任何这样的制度强加于人民，这一点是我经常会公之于众的。”接着又解释说，他的运动认定南斯拉夫只存在两个阶级——爱国者与卖国贼；驻南斯拉夫的俄国代表团从来没有想过要将共产主义制度引进南斯拉夫施加过任何压力。会谈快结束时，铁托说丘吉尔为南斯拉夫人同时也为游击队的事业做了不少事情，丘吉尔趁此又把话题拉回到内战上，铁托说：“这也说不准会在南斯拉夫发生。”接着又斩钉截铁地指出，“它实际上取决于盟国给予他们到底什么样的支持。”丘吉尔问铁托战争结束了在南斯拉夫是否允许有个人自由，铁托回答：“我们所要追求的基本原则自始至终都是民主和个人自由。”他对丘吉尔问及是否许可工人罢工的回答是：“只要战争还没有结束，就不许可。”在谈论了老长一段时间有关战争在南斯拉夫所造成的惨重影响之后，丘吉尔问铁托是否还想说些其它的东西。铁

铁托传

托回答说，他对那些关于战后南斯拉夫要引进共产主义的议论十分重视。他强调南斯拉夫以后会实行民主制度——但并没有指明是哪一种民主制度，他也拒绝了丘吉尔让他就共产主义问题向大众声明的要求。他说南斯拉夫能从苏联的曾经走过的路中获得益处，但我们依然希望从盟国得到帮助，盟国与苏联之间是否能够保持良好关系对南斯拉夫十分重要。双方直率而坦诚地交换了意见，但显而易见，两位领导人所使用的政治语言不尽相同，对“民主”一词也各有不同理解。丘吉尔在英国两党制政体下长期从事议会活动，而铁托则在共产主义的国家里经历过种种不同的事情，因此他们对“民主”的阐述是不一样的。由于丘吉尔曾暗示盟军有可能在伊斯的利亚登陆，并表明了他对南斯拉夫未来政局发展的建议，这次会谈并不能使铁托完全地把心放下来。

人们对会谈成果，在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有过各种各样的议论。两人都赞赏对方人格中的伟大之处，但他们的基本政治观念却没有发生变化。铁托在会见后对盟国为战争所做的努力有了更多的了解，英美两国各个级别官员之间无拘无束的友好合作使他深有感触，尤其是丘吉尔给了他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曾说，这次会谈使他祛除了对某些英国政策的怀疑和担心：

我在 1944 年会见丘吉尔时，与他进行了非常忠诚坦率的讨论。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英国人备尝艰辛，也是从那时起才认识到他们想要调动所有盟国的力量来阻止这次战争。我同丘吉尔彼此都得到了很好的了解。但有一点：丘吉尔一直认为塞尔维亚人民拥护国王，而我说塞尔维亚

铁托传

人民对国王出逃一事深恶痛绝，就连他们也不拥护君主制了。

铁托与丘吉尔会见后返回不长时间，就为他与斯大林的见面会谈做出了安排，这也不好说是一种巧合。斯大林早就暗示他决心不让铁托与英国人的关系转为友好，也不希望使铁托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丝毫的减弱。安排铁托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这一点。1944年9月18日至19日之间的深夜，在特别秘密的情况下，他与科尔涅夫将军一同坐一架俄国飞机飞往罗马尼亚的红军司令部，四十八小时后又转向飞往莫斯科。要乘夜间从维斯岛英军控制下的机场飞离，躲开机场安全警卫人员而不让英方发觉，事先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密谋策划，这种事情竟然会在铁托在意大利受到热情接待后不久就神秘地发生，无论怎么样也说不过去。丘吉尔恼羞成怒，说铁托“潜逃”了。莫洛托夫事后把这种秘密行动告诉铁托说：“对于一个巴尔干农民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然而，这一事件却带有斯大林那种在同盟者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毒辣阴险手法的明显印记。

铁托对斯大林的第一次访问，标志着他与这位俄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已达到最高点。他仍然毋庸置疑地承认苏联有权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深感觉到受斯大林接见的的光荣与无比的自豪。他对自己有责任向莫斯科汇报并不猜疑。就在同时，他也为自己和他的政党的辉煌战绩极感自豪，深信“南共出色地接受了风雨的洗礼，而且是史无前例地做到了。”他期望因为这受到赞扬。斯大林接见他时热情洋溢，使劲地把他搂在怀里，可以肯定使他双脚高高地离开了地。铁托在很长一段时间

铁托传

以后说：“我当时的印象是这样的：斯大林对我们的战绩深表赏识，”接着他又深有感触似地说，“大概这仅仅是表面上的，而不是真正的。”

从那之后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面中，铁托谈吐之间表现了他十足的自信，明显地表现出新近所获得的荣耀与权力。其它领导人有点讨厌他这种表现。但是，他却使斯大林真正认识到：他的兵力有足够的力量承担在南斯拉夫的占领任务；这支军队理所当然应继续由他指挥领导；苏军进入南斯拉夫仅仅受限于它通过中欧进军所必需的那些有限军事行动；而且南斯拉夫军队应同时协助作战，并与红军联合向贝尔格莱德挺进。双方也达成了共识，苏军在南斯拉夫没有任何权力过问行政或民政事务。铁托早已肯定地认识到，为了有可能在战后实现政权的革命过渡，要求苏方做出如上所述的一点牺牲至关重要。他自信即使没有红军的援助同样也能取得胜利，不愿表现出一副感激求援的模样。苏联领导人与抵抗运动之间达成的像这样的协议，这是其中惟一的一个例子。

斯大林尽管不是这么轻易地就同意做出这些让步，但他根本没有像铁托一样把这些看得那么严重。他一直把铁托看成是又一个傀儡，既可加以利用，又可在不俯首听命时予以摒弃。由于红军逼近柏林，美国人正准备在远东增派兵力，有比南斯拉夫更为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而且斯大林也信心十足，只要他高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南斯拉夫。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在战争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虽然他看到了铁托的所有电报，以及苏联代表团的一切种种估价。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不觉得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具有多大的重要性，他们正像

莫洛托夫的话所暗示的那样——把铁托当成一个巴尔干的老百姓，与三十年代在莫斯科的那个瓦尔特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一贯看不起铁托所做的所有汇报，对南斯拉夫的情况缺乏了解得让人吃惊，这一点后来在 1948 年就相反地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对南斯拉夫的这种缺乏了解和不怀好意，铁托在同斯大林谈论战后南斯拉夫的格局情况时就感知到一点点。斯大林劝告铁托与王国政府的政治家们，以至于同国王合作，这表明了他的性格特点。他说：“你不需要让他永远复位。暂且先把他弄回来。然后，你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悄悄地给他背后来一刀。”铁托对英国人抱有疑虑，斯大林也就此煽风点火，在会谈的时候告诉他，有家通讯社报道过英军在达尔马提亚登陆。铁托没被迷惑，反而解释说英军曾允诺要在这个地方给他炮火支援，斯大林便问铁托，如果英国人真计划在南斯拉夫登陆，他将抵抗还是撤退？铁托回答：“我们将坚决予以抗击。”按当初情况来说，斯大林得到这样的答复也就心满意足。这次访问剩下的其它时间便以斯大林款待客人所特有的野蛮方式度过，大摆筵席，无休止地干杯，痛饮葡萄酒与伏特加。

对铁托来说，这次访问获得了一定的成效，虽没有受到希望得到的奉承，却得到了他要求的各项现实的安排。对斯大林来说，铁托的访问的重要性比他要小的多，但也是一种成功。他做的仅仅是一些很方便的让步，他也确实成功的做到使铁托与英国人继续互相猜疑和敌视。铁托于 10 月 5 日返回南斯拉夫，当经过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时停留数日，会见了保加利亚游击队的一些代表。随后他又飞往巴纳特的弗尔吵茨，当时英军和游击部队正在猛烈向贝尔格莱德发起攻势，他等了几天

铁托传

后，于1944年10月27日飞往贝尔格莱德市的效区机场，换乘汽车到达了这座城市。

铁托离开莫斯科的很短时间，斯大林约定10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与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丘吉尔以及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就是在这次会谈中与会的各位代表研究分析了东欧的发展前途，斯大林对丘吉尔的主张表示同意，也就是南斯拉夫应在对半平分的原则上分属大不列颠和苏联的控制范围。这是作为召开和会之前所采取的当前措施，在这之前曾与仍对丘吉尔的巴尔干政策抱有疑虑的美国领导人进行了研究。这就引起了疑问：斯大林几天前与铁托会晤时是否即已对这一妥协有过思考分析。此事对铁托未来的全部政策非常的重要，但斯大林不但没有同他讨论，也未向他暗示过有此可能。妥协达成后，斯大林又没有告诉铁托，而丘吉尔却在会后不长的时间里便通过麦克莱恩把这一消息通知了他。这一个对半平分的协议曾使一些南斯拉夫人错误理解，但南斯拉夫在战后世界中不应属于两大政治阵营中任何一方这种想法，铁托终究还是没有拒绝，并转而使之为南斯拉夫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战争结束前铁托与英国人关系恶化的原因经过证明并不完全是由于斯大林的单方因素。开始时是由于双方在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答谢分管给意大利的萨拉、阜姆、伊斯的利亚等地区的控制问题上的意见相背所引起。铁托在他的意大利的访问中就已通知英国人，南斯拉夫将对这些不论从种族上还是历史上来说都属于自己的领土的地区提出正义主权要求。丘吉尔则告诉他，这一问题要听从合作会的决定。两位领导人都明白，夺取这些地区并对此实行军事控

铁托传

制，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强自己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要求的强烈程度。铁托与亚历山大将军在意大利和贝尔格莱德分别举行的各次会议中，已就军事合作问题互相统一，决定双方一起对南斯拉夫北部和威尼斯——朱利亚区的德军主力驻扎地发起攻击。当盟军第八军顽强通过意大利北部时，铁托的第四军应从扎达尔以北沿亚得里亚海岸向内陆地区的德军打响进攻的第一枪。在这两部分军队的夹攻下，德国人至死不屈，希望能打败英国。到 1945 年 4 月的最后的七天，两军均已进入对的里雅斯特的攻击范围之内。4 月 27 日，丘吉尔给杜鲁门总统打电报说：“当前最迫切是在铁托的游击队攻下该地之前到达。”铁托则发出命令一定要以最快速度“解放”的里雅斯特。南斯拉夫第九军团放弃了攻占德军第九十七军团防御阵地的计划，迂回绕过德国人的侧翼，日夜不停地赶往的里雅斯特，于 4 月 30 日攻入该城，并于第二天以强大的兵力绝对地优势占领。与英军第八军一起作战的第二新西兰师所属部队，于 5 月 2 日从该城的另一端发起进攻，并于 5 月 3 日添加了那里的兵力。于是该城在一段时间内为双方军队共同占领。亚历山大将军坚持说铁托逾越了双方协议所规定的原则。铁托则肯定的认为盟军正在采取步骤以求有效地制止南斯拉夫实现其主权要求。双方剑拔弩张，怒目以待达数周之久。

最后，尽管斯大林曾为铁托努力争得面子，铁托却未能获得苏联支持而被迫从的里雅斯特把军队撤退到所谓摩根分界线以外，这条线将此争议地区划分为 A、B 两区：A 区中的里雅斯特归英、美军队管辖；而原则上由南斯拉夫人占领的 B 区，却连伊斯的利亚的一部分和斯洛文尼亚的滨海地区也不在范围内。俄国人不得不仔细想好，如果他们赞同铁托对的里雅斯特

铁托传

的主权要求，不仅有可能引起意大利共产党人的敌视，还会破坏他们与盟国的关系。铁托坚定的认为他受到大国强权政治的欺骗，因而丧失了他的国家要求的大片地区的合法权利。他此时已知道了那个对半平分的协议，认为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恶果。他在卢布尔雅那的一次演说中爆发出他心中怒气说：“我们坚决反对在国际交易中被当作找头来使用。”在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表现为一个驯服的卫星国，对俄国领导人要他把苏联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期望，当时他已不放在心上。他所表现的那种英勇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他赢得许多并非共产党员的南斯拉夫人的爱戴与信赖。莫斯科怀着满腔的怒气，已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十五章 国际政治家

1945年，铁托为自己领导的运动取得了政权。南斯拉夫再一次统一，成为一个共产党掌权的联邦共和国。铁托很快又碰上了建立新国家及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维护他的尊严的种种不好解决的问题。这两项任务是互相辅助的。为了把他在整个战争时期从未改变的长远目标的革命变革续继发展下去，他需要和平与稳定。而为了维护南斯拉夫在国外的影响，他也不得不使国内稳定。这两个目标他最终都达到了。将近三十年来，他都是国家元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内他成为深受崇敬的和平和稳定的象征，他也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

他管治着所有的国家事务，一直都是与多年来其成员时有变动的一个班子里的同事一道工作；在外交方面，他的品质和影响非常出众。他所表现的政治家的智慧，为南斯拉夫赢得了自从这个国家成立那天起前所未有的威望，也为他本人在全世界赢得了尊敬和有时是出于无奈的荣耀。1945年时，他在更为广泛的外交事务的领域里还是个新手，他的经验被约束于战争时期的体会。他还是支持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通过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却可以发现，他在战争时期即已开始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外交关系。然而，毋庸置疑，铁托一就任重新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总理，便认为他与苏联领

铁托传

导人的友好联系已经发展到一个不同阶段，认为他有权采取自己想的行动，这在他仅仅是一个与共产国际或苏联共产党官员交往中的共产党领导人时是没曾想到的。

起初，这种局面中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南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欧洲第一个凭自己的能力夺得政权的共产党。其领导人自然要求教于苏联，要把这作为榜样。按照南斯拉夫的请求，大批苏联专家开始走进这个国家，担任军事顾问，建立合股运输公司，以及在诸如重建工业等技术工作上提供帮助。铁托在老长时间以后说过：“1947年以前我们对苏联从未有过疑心，因为我们把苏联人当作自己学习的模范，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成立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外交事务方面情况却不尽相同，因为直到现在尚无适合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先例，人们也从未想到南斯拉夫会与苏联在民族利益上出现矛盾。铁托及其同事只好寻求一种能保护南斯拉夫利益的政策。就在同一时间，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应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因为游击队员在战争时期取得了赫赫战功。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金字塔式的等级观念，认为自己的地位自然而然地仅次于苏联，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总的方针计划，他们则是乐意接受的。

冷战从现在起在东西方之间逐渐展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也在其中，以他们自己独具的魄力投入了这场气势汹汹的斗争。他们同以前的西方各国从此不再往来，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尤其是与美国。至少在1947年以前，也可以说是更晚些，他们都深恐盟国会企图帮助王国政府复辟。关于当时的英国官方文件只是现今才逐渐宣布，我们基本上不很了解英国当时的应变计划是什么，但在英美两国确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只要

铁托传

当时有这样的机会，就绝对地向政府施加压力而干涉南斯拉夫。美国军用飞机经常从意大利和奥地利境内的基地起飞进入南斯拉夫领空挑衅，这些使铁托怒不可遏。当外交上的抗议不发挥任何作用时，南斯拉夫防空部队接受命令用火力截击入侵飞机。1946年8月9日，一天之内有两架被击落，其中一架全体机组人员在劫难逃。莫洛托夫得知这个消息，“几乎拥抱了”南斯拉夫的外交部长卡德尔——哪怕是此举表明了南斯拉夫的不容侵犯；但他警告卡德尔不要再犯同样错误。

1945年4月11日铁托为签署一项友好同盟条约而专程拜访苏联时，受到了非常隆重接待。在庆祝宴会上，他的席次就在斯大林的左侧。但从斯大林对铁托的冷嘲热讽中，却可看出苏联的真正态度的蛛丝马迹。他说保加利亚的军队并不弱于南斯拉夫，又说南斯拉夫的士兵直到现在还是些游击队员，“并不能进行重大的前线作战”。他还详述了上一年冬季德国人一个团就打败游击队一个师的情景。考虑到保加利亚军队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一直抢占着南斯拉夫的部分领土，而保加利亚的游击队直到拥有了铁托的部队支援后才活跃起来，这些话几乎是天大的侮辱。铁托对最初的一些话还强忍着不露声色，但终于怒不可遏而忿然叫嚷说，南斯拉夫军队很快就会消除自己的弱点。当时他还没有达到能用以牙还牙的话语回敬或反驳斯大林的程度。这件事暂时还可以勉勉强强一笑了之。1946年春铁托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他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依旧保持亲切友好。

因为斯大林扶持东欧各国共产党接二连三地执政，南斯拉夫便依据苏联的模式，与这些国家一一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1947年美国向在战争中有巨大损失的国家推行马歇尔计划时，

铁托传

南斯拉夫反对接受，虽然本国的人民仍没有摆脱战后极其困厄艰难的境况。铁托怕资本主义美国会利用这些援助实现颠覆他的目的。在这之后二十年，他还在考虑为这一决策辩护。他说：“反对接受马歇尔计划是我们个人主张，这是没有错误的，这样做就使我们得以不受美国的影响。”他一直相信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种种决策都是独立做出的。他说：“我们拒绝苏联的影响或指导，这一政策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没有人要我们那么做。”

利害关系上的基本相仿，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政策的真相未能发觉。1945年和1946年，斯大林忙于解决更为棘手的问题，还不准备干预铁托的活动，但是条件是这些活动不背离苏联总的路线。斯大林战后主要把精力投入在安全问题上，他的意图是建立一个由他操纵的由东欧共产党傀儡国家组成的保护地带。他并不准备服从于各卫星国的领导人执行独立的政策路线——他想把南斯拉夫也引进这一模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本人也在其中，还没有完全放开战前那种教条主义的信念，以及战争的过程中关于共产主义兄弟情谊和团结的空想，所以根本没有希望认识苏联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这一悲哀的现实。真情实况到底怎样，他们原已有大量证据，但却对此装作看不见，这是由于他们总是毫无思虑地对苏联的友谊寄予信赖，由于他们过分自信，可能也是由于战时的显著成就，他们产生了一种看起来有点幼稚的乐观情绪。

斯大林主张各共产党国家服从已经解散的共产国际的类似路线，成立新的国际组织，铁托对此表示支持，这好像有希望使南斯拉夫在东欧发挥了共产党语言中所谓的“领导作用”。铁托在以后的日子里说：“起初我们曾对这并不反对。有一个

可供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商谈的组织，看来是个很不错的主意，所以我们在华沙会议上赞成这样做。一俟我们看清了这个组织的企图及目标，我们便转而拒绝它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按照俄国人的建议，已计划将其的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似乎是对南斯拉夫人的一种奉承，但实际上斯大林却意在凭这来操纵铁托，并从而获得更多有关铁托一举一动的情报。

这一时间内发生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南斯拉夫人与俄国人在这些事件中有了冲突矛盾。其中之一是德热拉斯所说的苏联军官途经南斯拉夫时行凶、强奸和酗酒，说话的鲁莽，它表明英国军官行为还算规范而未“耽于此类暴行”。虽然这场风波后来平静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对他始终没能心安理得。铁托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所表现的独立性（以及他在卢布尔雅那演说时的直言不讳）也使斯大林感到不满。铁托曾访问过东欧的几乎所有国家，到处被作为英雄受到热烈欢迎，但他为在东欧取得统帅地位的最危险的一着，或许是缘于他对巴尔干联邦的假想与希望。这是共产主义世界中早就存在的一种想法，并不是来自铁托，所以如果他认为俄国能接受这种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战争的整个过程中，铁托曾在苏联的同意下，与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有过亲密的联系；战争结束以后，阿尔巴尼亚实际上被南斯拉夫当作是附属国来对待。当这一做法后来受到批评时，南斯拉夫领导人表示，他们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款待要比他们自己从苏联得到的慷慨得多，哪怕这种援助所遵循的路线是没有什么区别。德热拉斯1948年初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声称他对成立南—阿联邦并不反对。斯大林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其他好处，我们赞成南斯拉

铁托传

夫攻克阿尔巴尼亚”，他边说边做手势，把手指靠近嘴巴。德热拉斯对这种超乎寻常的坦率感到非常吃惊，连忙抗辩说：“这不是什么吞掉，只是进一步的合作！”莫洛托夫突然插话：“也许就是吞并。”

斯大林却有点关心有关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建立联邦的问题，尽管他的政策经过很长时间才明确起来。早在1944年，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就在苏联同意的情况下讨论这件事，但没有达成共识。1947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最后还是获得斯大林允许而返回保加利亚，又与铁托研究这一问题。同年7月，季米特洛夫到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与铁托会面，这两人是老朋友，彼此都很了解；即便是这样，把两个国家建成联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非同小可——季米特洛夫很想建立联邦，但又不希望使保加利亚仅仅成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共和国，与原先组成这个国家的那六个地位相同。他也曾经仔细想过建立一个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联邦的希望。双方在保属马其顿应该怎样并入南属马其顿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虽然季米特洛夫准备终究赞成这样做。而仍属于反共的希腊政府统治下的那部分马其顿也同样是一个麻烦。两位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建立联邦最好等一等，但双方可以很快在贸易和文化事务上互帮互助。斯大林对这种独立自主的表现颇为愤怒，以最快的速度召两位领导人前往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奉令前往，铁托则派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前往。

虽然斯大林曾经催促过成立联邦，这时却变了主意，他先对季米特洛夫恫吓一番，接着开玩笑似地对卡德尔说：“同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事先等一等，你认为如何？或许在这期间苏联也有可能支持并加入南斯拉夫联邦呢？”这是一个居心叵测

的提法。难以肯定斯大林此话是真还是假，但卡德尔知道，斯大林从前曾考察过把东欧国家分别联合起来而与苏联建立联邦的可能。他的设想是把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放到一组之中；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合成第二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白俄罗斯则分到第三组；但这一想法从来没有达到形成详细提议的地步。卡德尔返回南斯拉夫之前必须签署一项文件，要求南斯拉夫将在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务上同苏联进行研究。铁托此时已在外交政策的另外一些事情上惹恼了俄国人——他把南斯拉夫军队派遣到阿尔巴尼亚以便增强阿希边境的防务，当时希腊的内战还没有停止。南斯拉夫人自愿地开始向希腊共产党叛乱分子提供一大批充足的援助。这一行动使斯大林感到尴尬，因为他已与丘吉尔达成共识，希腊应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他此时不想背弃这一协议，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与西方盟国对抗。尽管情况的确是这样，西方却没有人相信，南斯拉夫支持希腊叛乱分子是铁托一个人提出的政策。斯大林于是决定，该是整整铁托的时候了。

1948年6月28日，一家捷克报纸刊登了一则有关南斯拉夫被共产党情报局罢免的简讯，把铁托与斯大林的决裂向全民宣布，使全世界都为之一震，叫人难以相信。俄国人接着从他们与南共高级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来信中摘选了一部份加以发表。作为回敬，铁托将这份关系决裂之前的双方信件，除两封信以外，其他的全发表了。外界在这之前对南、苏领导人间嫌隙之深一无所知，这些信件便成了人们所关注的读物。因为这都是些私人信函，本来就不是为发表而写，它们就更能够清楚地刻划出苏联领导人对待卫星国所持有的态度，也使人们在无意之中洞悉了铁托的性格和信仰。双方在3月20日到5月

铁托传

22日这段时间里的通信，开始于俄国人突然从南斯拉夫撤回所有军事和非军事专家，宣布他们“被敌对情绪所围绕”。从此展开了滔滔不绝的彼此抱怨和互相斥责，双方久沉心底的不满一泄无遗。它开始于战争年代，从1945年起又显而易见地越积越多。事无巨细，不分轻重，均在争辩之列。信件字里行间，敌对情绪一天比一天浓重。苏联领导人指责南斯拉夫人先是请求派遣很多军事专家，之后却借口开销过多而又请求缩减其人数。俄国人在信中毫不留情面地说，南斯拉夫人把苏联军事专家形容得无地自容，把他们的规章制度说成是循规蹈矩，死搬教条，根本无益于南斯拉夫军队。南斯拉夫人再也不会向苏联经济专家提供情报资料，并以秘密警察紧紧的跟踪他们。“南斯拉夫的领导同志”从前说：“大国沙文主义在苏联已无法再忍受……共产党情报局是苏联共产党用以操纵其它共产党的工具。”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还被指责为宣称南斯拉夫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惟一代表。这封苏联信件中讽刺地说：“对苏联的种种评说和看法，竟然出自德拉热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以及另外一批认识肤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听来自然让人觉得可笑。”另一封信则非常强烈地表明卡德尔始终趋向于使南斯拉夫与苏联结成联邦，并想凭这在南斯拉夫领导人之间（特别是在联合签署南斯拉夫信件的铁托与卡德尔之间）扬言惑众。俄国人说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指责“既卑鄙而又不真实，又出于伪善。”他们把南斯拉夫领导人看成托洛茨基——这在苏联的词汇中代表了最大的侮辱。他们还对南共进行了名目繁多的反驳，说南共不民主，暗中搞阴谋，使自己混合于名为人民阵线的更宽阔的政治运动之中；又说南共二十年以来从没有召开党

的代表大会，脱离群众，对农民漠不关心，处于兰科维奇的秘密警察操纵之下。

这一书信往来原本应该是两个共产党之间的一种亲情般的往来。铁托与卡德尔代表南共作答之前，曾先在政治局，接着又在整个中央委员经过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其中的一位成员斯雷滕·茹约维奇，坚决反对给俄国人复信时采用过于强硬的手段。南斯拉夫的复信，从中可以看出卡德尔和铁托两人的手笔，说俄国人所获得的情报与事实情况大相径庭，造谣生事，立场偏激，都是来自“反党分子和满怀愤怒的人”。在回复的信中还作了这样的说明：“不管我们每个人是如何的热爱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丝毫减弱，因为祖国同样是在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不仅说明从现在起成为铁托政治信条的精粹会永久流传于世界。它不同于铁托在年青的时候曾一度毫不拒绝地接纳的那种排斥民族性的国际共产主义，而俄国人此时则想再把这些施加于南斯拉夫。

铁托和卡德尔抓住俄国人的每一种嘲讽，逐一加以反驳与辩护，为他们那些受到攻击的在统一战线上的同志们辩护。他们说：

这些人“都为苏联在南斯拉夫取得人们信任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都在解放战争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人们对苏联的热爱并不是毫无理由产生的，它是新南斯拉夫的现领导人坚持对广大党员和所有广大群众孜孜不倦的教导的结果，而来信中所责备的却正是这些领导官员中的重要人物。

铁托传

他们激烈地驳斥了对南共的各种各样的污蔑，觉得指责南斯拉夫存在资本主义是完全与事实背道而驰：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象南斯拉夫所进行的如此坚定、神圣的社会改革，……我们党考虑到自己所取得的种种成就，不但在我国，也在全世界赢得了不可轻视的声望，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南斯拉夫在社会改造方面的许多独到之处，对其他国家的革命指导与发展都有益而无害，并在不断的为其所用，……我们向苏联的制度学习并把它作为模范，但我们正以稍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夸耀我们所走的道路比苏联更适合社会，……而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决定我们必须这么做。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所有这一切也仅仅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铁托及其同事最反感的地方——他们在复信中指责他过于野心勃勃，它在南共党内造成了一种鸡犬不宁的形势，并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被战功冲昏了头脑”。俄国人为了对自己的胜利而自豪的南斯拉夫攻击，就说东欧的其它全部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都与南斯拉夫的成就相差无几，但他们却并没有那么骄傲，“不象南斯拉夫领导人那样一味夸耀其成就，不知天高地厚，无止无休，把人们的耳膜都震破了”。苏联领导人邀请南斯拉夫去参加一次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此时该组织早已转移到了布加勒斯特，其所有成员都接到了俄国人的书信和指控的复制文件。南斯拉夫坚决拒绝出席，理由是争论的问题未经审议通过就已做出裁决。事实证明情况真的是这样，共产党情报

局全部都同意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把苏联信件中的指控详细加以引证。决议结束时要求南斯拉夫领导人必须当众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彻底放弃民族主义，回到国际主义道路上来；从不同的方面巩固反帝统一战线。”如果他们完不成这一任务，决议号召南共应撤换他们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能够坚持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

斯大林信心十足地对他的一些比较亲密朋友说：“我只需要动一个指头，铁托就得完蛋。”在他的命令之下，各卫星国抓紧时间启动宣传机器，铁托被痛斥为英国情报机构雇用的代理人，总是小看人的“侏儒”，“华尔街的行吟诗人”；他们派遣特务偷偷混进南斯拉夫制造暴乱，设计谋杀铁托。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对南斯拉夫实行了严格的经济制裁，其目的就是想造成南斯拉夫经济瘫痪，使人民群起来反抗当前政权；苏联军队集中分布于南斯拉夫边境，准备南斯拉夫一发生民众暴动就执行任务。所有这一切通通失败。铁托在党内得到了几乎所有党员的支持，他们中有除茹约维奇、赫布朗和铁托的前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以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俄国人事先没有考虑到南共党员和南斯拉夫非党群众对铁托竟然会提供这么大的支持。支持来自拥护他的政府的人，同时也来自那些宁愿要这个政府也不愿要那些由苏联领导的、形式比这还偏激的共产主义的人，他们就怕后者成为他们所必须的抉择。这就进一步证明，铁托完全有资格成为全体南斯拉夫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在世时，这一决裂始终没能获得弥合。铁托后来说：

斯大林在战后把我们设想为他的所属国，这种可能性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但在 1948 年他没有挑战我们还是

铁托传

够聪明的，当时他看出了战争的后果，也看清楚了我们准备应战。他使尽一切借口以求挑起战争，并在我们的边境屯集重兵，一到机会就动手。但是，他还是认清我们国内的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对铁托本人，正像他的许多党内同事一样，与苏联的决裂同样都是猛然一击，这使政治诺言从此撕毁无遗。铁托在现实生活中的动力，一直是为使他的同胞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工作这种殷切的愿望。他曾经也始终深信，这同时也是苏联领导人的目标。年复一年，他对与此背道而驰的迹象往往给以合理化的阐述，使之符合共产主义教条的原则和理论。1948年，他再也不能忍受这些而不得不正视的现实。他像季米特洛夫一样，自始至终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革命家”。他那种能迅速恢复精力和敢作敢为的秉性以及必胜的坚强意志拯救了他。他善于识人，机敏精明，富有经验；他也在生活中学会认真地估量现实处境。当他终于能够凭借这些本领对苏联领导人及其政策做出判断时，事实真相却使人骇然，但是，他仍然有孤军奋战取胜的希望。如果没有他的同事们的爱戴与拥护——他们拒不同意他提出辞呈，如果不是他坚信南斯拉夫人民支持他，他根本不会坚持下去。自1948年以来，他一直奔波于苏联统治下的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其它国家，依据适合南斯拉夫需要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主义。

战争刚刚结束，南斯拉夫就不得不正视南苏关系，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幸运，因为俄国人此时自觉尚未有实力足以挑起一场与西方盟国之间的冲突。南斯拉夫处于西方通往地中海和意

大利的战略的第一线，这也是一种幸运。美国和英国决不能看着这么有战略意义的地方落入俄国之手而按兵不动，这一点在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的平均划分的临时性协议中即已得到肯定。南斯拉夫对这个协议咬牙切齿，此时却证明它对铁托政权倒提供了一个屏障。

铁托以其独一无二的精力和注重实效的一贯作风来应付他的新处境。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保证南斯拉夫能够吃饱穿暖，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因苏联撤消援助以及切断了与东欧的贸易而停止不前。他别无选择而只能与西方建立关系，因而只好按捺住自尊心，迅即又重新开始了贸易交谈。由于南斯拉夫的铜、铁等富饶矿藏再也不用苏联支配，他就有了可以做买卖的物资。迫切需要的是面包和工业用煤。为了满足这些费用需要贷款，为了购置工厂和矿山的机器设备同样要得到贷款。

英国从1949年秋后开始与铁托商讨，它认为若是铁托被推翻，苏联的影响一定会占有优势而给西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那里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仍没有衰弱。美国一开始就有警戒之心，不少人士仍然以为所有的共产党情报局事件是南、苏为世界共产主义博取财政援助的一个诡计，但最终还是改变看法，认为有必要提供援助，“使铁托免遭全军覆灭”。值得庆幸的是，即使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铁托也从来没有丢弃自尊而卑躬屈膝，委屈求全。他十分明确地声明，如果援助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概不接受。为了着重表明他绝对不是俄国所经常宣传描绘的那种资本主义的走狗，他还是那么倨傲而冷淡，他的官员们也同样不易对付。俄国人嘲讽说收买南斯拉夫只需一亿美元，作为对这句话的驳斥，铁托宣称：“谁也收买不了我们！”但南斯拉夫最终还是成功的通过各种各样

铁托传

的方式获得了规模相当大的西方援助。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中，铁托获得了价值差不多二十四亿美元的援助——其形式有贷款、工业购置重型机械设备的信贷、农民种地所需要的肥料、牲畜和种子，美国的剩余小麦和面粉，医药用品、军事装备、战斗机、军舰以及商船，还有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很多其他重要物资。一个新的特点是美国、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自愿为南斯拉夫的发展培养各种专家。大部分援助计划项目来自美国，英国也做了相当大贡献，法国提供的支援则只是象征性的。西方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保持一支常备不懈的防御力量以对付苏联侵略的最省劲最精妙的办法。南斯拉夫接连好几年都有为数三十万以上的士兵处于戒备状态，国民收入中有百分之二十三用于国防力量。铁托深深明白接受帮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坚决声明西方援助总额仅仅占南斯拉夫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但他同时又说：“如果我们对处境最困难时所获得的这一援助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也矢口否认的话，那将是我们这方面所采取的一种不恰当的、愚蠢的一次错误行动。”

除接受援助外，铁托也逐渐认识到南斯拉夫需要寻找朋友和同盟者以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同时也需要把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所抱的极端怠慢态度来一个重大转变。雄心勃勃地策划在东南欧把共产党国家组合起来的时代从此已成为过往云烟。建立巴尔干联邦的问题遇到障碍，一直到今天再没有被提出。如果说过去铁托因没有机会而无法实现这一雄心壮志感到失望的话，他却从来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悔恨上。他具有一种超然的心理状态，能够在必要时忘却往事而毫不动摇。1949年，南斯拉夫切断了对于希腊叛乱分子的支援，仅凭这些维持的叛乱于是开始崩溃。他于是开始努力改善与希腊、土耳其两国政府的

铁托传

关系，才能够在 1954 年同希、土签订了巴尔干公约，这一公约虽然没有发展成为与两国深厚的友谊，但为南斯拉夫南部边境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基础。

他随后把注意力转向令人不满的北部边境局势，一旦苏联从匈牙利发起进攻，那里就是突破口。他经仔细考虑后决定，继续与奥地利保持敌对态度是不大可能的，南斯拉夫必须接受和约的决定，将其在卡林西亚所获得的全部领土让给奥地利。此后两国关系逐渐改善，同时贸易也有所增长，铁托并于 1965 年亲自对奥地利进行国事访问。在 1968 年奥地利总统访问南斯拉夫时，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与意大利的关系发生变化，是因为的里雅斯特和 A、B 两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52 年和 1953 年，盟国军管政府没有经铁托允许即开始将 A 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转给意大利人接管，如此一来，铁托几乎丧失就他在这一地区的主权要求进行谈判的可能。南斯拉夫虽然不是那么强大，铁托却威胁说，假设没有经他同意就让意大利人私自地接管这一争议地区，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武力。他终于成功地使有关各方面接受了他的观点：这个问题本来就应由提出要求的双方来解决。最后，事情终于被解决，南斯拉夫没有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提出要求，然而这样却使 B 区的边界稍向 A 区推移，并获得了其所要求的哥利西亚的部份土地。这大概是南斯拉夫所能得到的最适合的解决方法——铁托采取强硬措施进行现实谈判的一个胜利。此后，虽然双方进行交换的地区在居民互迁上有过一些矛盾冲突，与意大利的关系很快改善，终于让他成了南斯拉夫最有力的贸易伙伴之一。

随着这些问题的一一解决以及与西方的联系越来越频繁，

铁托传

战前和战争结束的几年里那种较为生硬的反资本主义态度逐渐淡化。就铁托本人来说，由于他在战争期间的种种经历，采取这种态度决非十分自然，虽然他敢肯定，那些走极端和还不是很有成熟的同事对他施加了不少的压力。铁托一点都不希望让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妨碍合作和共处原则的推行，他明白这一政策对南斯拉夫的稳定和繁荣昌盛都起着重要作用。他努力改善同英、美两国的关系，于1953年访问英国，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共进午餐。他在此行中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语气丝毫无强硬之意地说：“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好些，同样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的制度好些。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得不留待未来做出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地判断到底哪种制度在实践中会更具有优越性，我们至今还没有理论能够证实。”当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应邀访问南斯拉夫时，铁托很高兴也很成功地借首次正式接见的机会把他已再次结婚的消息公之于众。

铁托在他同美国的关系中始终持不很在乎的态度。美国到战争结束时还一直与米哈伊洛维奇联系，战后头几年又不断对他的政权持有敌对情绪，他对此非常愤怒。直到1960年他才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会谈，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他在这个庄严的场合表现得比赫鲁晓夫更让人值得尊敬，也更具有政治家领袖的风度，后者在同一届大会上讲到某点时，竟拿起鞋子敲击讲台以表示其内心的愤怒。

1955年，即斯大林与世长辞二年后，南斯拉夫终于同俄国达成一致意见，这是由苏联领导人主动促成的。赫鲁晓夫在国内当时遭到拒绝，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又面临着中国的毛泽东的威胁，他需要铁托的支持以巩固他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的地

位。为了这些他也只好做出让步，并错误地以为争取铁托回心转意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那时的南斯拉夫人已经走上复兴之路，并已真正的体会到独立所带来的种种利益。铁托根本不想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当苏联总理尼·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5月末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时，他们受到的是毫无热情的接待。铁托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笑容，表情严峻，听着赫鲁晓夫向他热情问候并为苏联曾经的错误道歉，然后并不礼貌地一挥手，让俄国人坐上等候了很久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赫鲁晓夫不服气对他的敷衍应付，在举行的公开招待会上，又是举杯祝酒，又是插科打诨，手舞足蹈，活蹦乱跳，无休止地大肆表演，想给人以闹哄哄地庆祝两国兄弟般深厚情谊的印象。幕后的谈判却一点都不省劲，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铁托提出的基本条件。

在访问结束时公布的联合公报中，俄国人答应：“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每个国家自己的事情。”铁托一直认为这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而不是两个共产党员私人之间的谈判。他还坚持，为了表明这一点，在公报上签字的应该是作为总理的布尔加宁，而不是仅仅代表党的书记的赫鲁晓夫。这是铁托一生中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不仅使苏联肯定了南斯拉夫的独立权利，而且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内所有的国家都是完全独立的这一原则。这好像从此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之上并拥有最高权威这一理论已不再成立。然而，一年之后苏联对匈牙利的侵略，同时也表明独立对属于南斯拉夫以外的国家来说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十三年以后，俄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又重新上演历史，继

铁托传

而又推行否认共产党小国独立主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都示意了同样惨痛的教训。

尽管这样，如果铁托在 1955 年不曾为南斯拉夫的这一胜利欢欣鼓舞，那反倒是不合情理了，但因此而沾沾自喜却决非他的天性。他的反应和从前一样，还是实际的，力图凭借所处的地位去争得最大的好处。他要求从此撤消共产党情报局，这在翌年 4 月 17 日变成了现实；他要求与苏联及他的所属国实行经济合作，这也同样实现了。他还获得了许多其它国家不易觉察的让步，诸如遣返 1948 年以来一直没有允许离开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偿还从前没有支付的债款等等。但他所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准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斯大林化”。这使他再次巧遇良机在当时把他的影响扩展到南斯拉夫以外的共产主义世界。

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很知足地看到赫鲁晓夫为他的思想所影响。赫鲁晓夫这时正努力通过其它方法把铁托拉拢到他这一边来。1955 年和 1956 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好像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1956 年 4 月，铁托访问俄国——整整十年来的第一次，赫鲁晓夫以非常庄严的礼遇接待了他。甚至还有这样的评说，是铁托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他那篇揭露斯大林生平罪恶的演说的。东欧国家的斯大林分子被开始慢慢废黜，取而代之以比较自由化的共产党人。但在有些共产党国家内，尤其是匈牙利，对“独立共产主义”这种思想的反对依旧是那么强烈，虽然铁托要求顽固而可恨的斯大林分子、匈牙利的领导人拉科西下台。1956 年夏，铁托几乎一直在与苏联领导人研究匈牙利问题。7 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与米高扬亲自莅临亚得里亚海滨布里俄尼岛上铁托的

夏季官邸访问他。同年 10 月，铁托到黑海之滨赫鲁晓夫的度假地索契回访。双方在那里达成共识，拉科西应由格罗代替，而铁托还是嫌他过于右倾，不会满足匈牙利变革的要求。刚回南斯拉夫铁托就听说匈牙利暴乱已经开始。10 月 24 日，苏联军队挺进匈牙利，铁托谴责此举过于严重，没有理由原谅——这是苏联以残暴武力侵犯一个共产党小国的明证，也正是他整个夏季不断努力警惕的那种情况。但在苏联第一次入侵后，匈牙利暴动却又愈加强烈，直至整个共产主义领域都受到了威胁，于是苏联于 11 月 4 日第二次入侵匈牙利，铁托此时也只好装作同意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共产主义在匈牙利被推翻，他自己在南斯拉夫领导的革命，以及东欧所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就都可能处于危险境界中。

苏联的莫洛托夫等人，从开始就不赞成铁托的自由式共产主义，并以赤裸裸的带有敌意的眼光注视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的变革，匈牙利暴乱碰巧为他们提供了弹药。这一事件意味着铁托对苏联政策直接施加影响的结束。南苏关系曾经非常紧张，从那时开始，他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一直在冷淡与有分寸的友好之间摇摆。铁托所宣传的独立共产主义对所有其它共产党国家及共产党所产生的影响，是俄国领导人所决不能忽视的，但到底应该采用何种方法抵消这一影响，这些领导人却一直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虽然自 1956 年以后铁托已不能起到直接领导共产主义东欧的作用，他却一直在竭力保证要其它共产党国家都了解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一切，并能从中吸取教训，得出经验。这是对俄国人的继续挑战。他反对被拉回到苏联阵营之中；他也不愿意派正式代表参加赫鲁晓夫于 1957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的

铁托传

国家会议。卡德尔仅仅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不是受到毛泽东的一定影响，后者竭尽全力劝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回到信徒的行列中，说中国吃斯大林的苦头几乎比南斯拉夫还要多，但还是没有拒绝接受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铁托根本就没有参加华沙条约这一苏联防御体系。虽然南斯拉夫已增进了与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合作，他却顶住了把南斯拉夫拉入经互会这一苏联操纵下的经济共同体的种种尝试。

1958年，南共在卢布尔雅那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抓住这一时机公开宣布了选择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意项，以及南斯拉夫正在采取的各种现实做法。兰科维奇的挑战性讲话进行了一半时，苏联以及除波兰以外的其它所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观察员退出会场以表示坚决的反对。

既坚决反对苏联的领导，又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无法与美国控制下的西方建立友好往来关系，铁托只好寻找摆脱孤立地位的其它出路。他的解决方案是重新组建一个不结盟组织，其目的在于取得所有不履行条约义务的国家（无论它是大国、小国，还是强国、弱国）以及所有拒绝参加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的国家的赞同。不结盟运动是铁托自己呕心沥血的创造，他为了争取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的支持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早在1956年以前他就已逐渐在国外游访结友。1958年到1968年的十年的时间里，他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起初他乘坐私人游艇“海鸥”号出访，后来访问的国家一个比一个远，范围也日益广泛，于是他干脆摒弃了自己对空中飞行的讨厌而改乘飞机出访。夫人与铁托偕行，到处受到庄严荣耀的隆重礼遇。所到之国为他们举行极其丰盛的宴会，披戴花环，从城市到乡村都受

铁托传

到热烈欢迎，还邀请他们骑乘大象。他们接受了许多来自异国情调的礼品，在这以后有的被送往南斯拉夫各博物馆，有的则用来装饰铁托的官邸。布里俄尼岛铁托别墅旁边的一个私人动物园，那里的大部分动物都来自其它各国的赠送。

频繁的旅游也许实现了铁托与其它国家互相联系的愿望，但却使他感到异常的劳累。铁托年逾八旬，仍在为不结盟运动而东奔西走。他的出访使南斯拉夫赢得了世界上一些以前对他根本毫无所知的地区的了解与尊敬。外出的拜访也为商业开辟了新的市场。南斯拉夫派出一批批专家援助其它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在叙利亚帮助修筑港口，在印度建设水电站，在阿根廷兴办工厂。作为对铁托的答谢，一些外国领导人也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同时也参观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世界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威望和地位。铁托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国家领导了一场涉及半个世界的国际运动。几次举行不结盟会议——第一次于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总计有二十三个国家参加；但俄国人就在召开会议的第二天爆炸了一颗核弹，严重干扰了这次会议的开幕式。第二次于1964年在开罗召开，有四十七个国家参加，但在说服某些成员国暂时摒弃本国的政策坚守不结盟宗旨上用了相当大的工夫。铁托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获得了一个世界讲坛，宣传其外交原则的基本思想——和平、共处、不结盟、裁军，所有这些都通过联合国机构进行监督和调解。南斯拉夫在联合国已经成为小国中的一个领袖，从投票结果中充分体现了一种既不为苏联，也不为美国所希望的完整的独立性。

虽然不结盟运动一直没有成为一种足以向大国宣战抑或在他们之间起协调作用的强大的世界力量，但是它却使南斯拉夫

铁托传

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地位，使铁托作为国际政治家而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威望。作为对铁托出访美、英两国的答复，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对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英国菲利普亲王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于1972年分别访问了他。然而，尽管他拥有如此之高的地位，他却从未能在任何干扰世界和平的重大冲突中能够顺利地起到调停者的作用。1967年以色列——阿拉伯战争结束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和平策略。他在敌对行动开始时就断绝与以色列外交关系，使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形势。没有同他的政府官员进行商讨就采取行动，这在他的生平事业中是很稀罕的一次。他与纳赛尔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密切联系使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越来越亲密。这使他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作为调停者的可能，但他还是成功的运用他的影响使纳赛尔采取克制态度。纳赛尔与世长辞后，尽管他访问了埃及，但他的影响却显著减弱，部分是因为他与纳赛尔的关系是以个人之间的友谊为基础的，他却并没有能够与纳赛尔的下一代领导人建立起同样的关系，另一个方面就是由于苏联对埃及事务的影响增强了。对南斯拉夫来说，苏联的势力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出现，较之至今还没有解决的中东危机更为严重。这对所有巴尔干国家普遍造成战略上的紧迫感，单靠铁托自己的力量是根本不能与之抗衡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促使铁托既在后几年中进一步改善南斯拉夫与巴尔干邻国的关系，同时也接受了勃列日涅夫1971年访问贝尔格莱德时所提出的加强南苏关系的建议。他支持改进关系，加强经济合作并接受苏联的巨额贷款，但必须以苏联同意南斯拉夫在完全有权独立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社会主义政体为条件。

铁托在外交政策上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是他对苏联在所有

铁托传

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权威的成功挑战，以及他对各共产党国家拥有独立和自治权利这一原则的坚决拥护。他揭露了隐藏在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糖衣背后的赤裸裸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这也为东欧所有的共产党都要求更大的自由提供了条件。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既表明上述发展正是苏联带来的各种危机，也表明俄国要为捍卫其民族利益准备付出多少。这同时也揭露了，当面临一个世界强国的彻底威胁时，铁托以及一切弱小国家的真正软弱性。

铁托在1949年就曾经预言过：“很显然，任何一种军事占领，即便是由红军占领，也一样包含着固有的非社会主义方面，从而使民族压迫和奴役不可避免，一切平等全部灰飞烟灭，只好别无选择地屈从于占领者。更大的讽刺则在于现在竟然会有人把这种占领称作是援助。”

铁托所以能保卫南斯拉夫免遭这种命运，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更是因为他赢得了全部认同他为民族领袖的南斯拉夫人的巨大支持。但他不得不有点担心地承认，说白了，最关紧要的还是这样一种认识，即南斯拉夫人要用武力来保卫属于他们的自由。他在1951年说：“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我们辛勤的汗水。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毅然决定再次用鲜血来浸透它，因为它原本就属于我们。南斯拉夫决不会低头屈服，除非她的全国人民都已战死在疆场上。”在似乎就要发生俄国入侵的那些困难危机的日子里，铁托一直持这种信念。1968年，他强烈谴责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据说他曾告诉苏联大使，南斯拉夫如遭进攻，我们定会奋起反抗。这是一个哪怕是最有成就的小国领袖所能做出的最后的正

铁托传

义决定。南斯拉夫与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直到 1973 年才恢复正常关系。此时，南斯拉夫本身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已受到世界事务中的“缓和”的影响，这种“缓和”是随着越南战争的平息，美国同苏联以及同中国的关系的进一步改进而出现的。曾经一直能够灵活利用这种处于冷战中间地带地位的南斯拉夫，回旋余地于是被大大缩小。铁托为解决这种形势所采取的对策是，确保南苏关系发展到一个更为友好和密切的程度。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友好往来关系，不仅有利于帮助对付美国的冷淡态度，也能使南斯拉夫摆脱苏联干涉。

铁托既已年愈八旬，他的政权当前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使他所创立的独立形式的共产主义得以持续和巩固。国际领域内惟一的威胁最有可能来自苏联。许多人都很简单的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的政权组织继续保持其独立，自成一宗，置身于苏联组建的所构成的国家经互惠集团之外，苏联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只要铁托依然在世并继续能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他的革命保持独立而不受苏联干涉很有可能还有保证，但多年以后到底如何，却是一个一直质问着人们的问题。因为，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的革命将如何继续发展，苏联或美国对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新局势的反应又将如何，谁也不敢妄下断言。

第十六章 国家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铁托完全有机会以他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时所推崇的信念为基础创建一个国家，一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就连内容也是崭新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获得的机会，而像铁托那样能够睁着眼睛看到由自己亲手创建的国家发展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人就更是稀罕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列宁具有同样的权力和机会，但是从那以后他只活了几年，而且一生中都没有获得像铁托在战争结束时的那种个人声望和不同寻常的拥戴，也未获得铁托由于丰功伟绩直到晚年依然享有的那种特殊的权威和崇敬。

战争结束时，铁托面临着非常沉重的问题，但这对他一点都不新鲜。他过去向来都是能够经历困难而最终取胜，深信此次也能够如此。国家在瞬间化为一片废墟，不计其数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房屋只剩下断壁颓垣，道路已残缺不全，全国几乎找不到一座桥梁。死亡了九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很多人死于南斯拉夫的内战中。往后的岁月中，那些经历了战争及亲眼目睹其后果的人，发觉简直无法向年青一代交代，战争结束时的那种悲哀、恐惧、希望和胜利的喜悦交织在一起的感情，怎样才能使他们深深激动；然而这一切对年青一代来说，这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段插曲。

铁托传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时期的种种问题都是战争年代困难的延续，铁托的领导便被人们自然而然、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领导者能够像铁托那样得到所有国内外南斯拉夫人的拥护。但这对战前的政党来说已经过时，与现实已相差甚远了，就连在国外度过战争年代的政治家，在几乎所有南斯拉夫人心目中，国王也包括在内，都已名声扫地，因为他们没有和自己的祖国亲人一起经历国家在困难中艰苦奋斗的过程。铁托决心不让别的任何政治集团摘取共产党用心血换来的果实。到1945年革命已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不容许任何敌对群体干扰，使之功败垂成。在这方面他毫不留情。他后来曾愤怒地说，1944年在西方盟国的强大压力下，他接纳三名王国政府代表舒巴希奇、格罗尔和舒特伊参加临时政府。他们坚决认为能加入某种统一战线并得到人民拥护，甚至可以把王国政府的卷宗流传至贝尔格莱德。但是，他们太大小看了铁托这个对手。“谁胜谁负，他们对此都有着狂妄的幻想，但我们没有这种幻想。我们知道全部事情的结局将如何——那就是不利于我们的对手。”“我们都很明白同舒巴希奇、格罗尔和舒特伊的合作一定不会长久，因为我们不得不沿着我们明确规定的道路努力前进。”在竞选运动中禁止王国政府代表组织自己的竞选活动。他们发现自己都已毫无办法，于是在选举前全都宣布辞职。

虽然共产党人深信游击队运动将在普选中取得广泛的支持，但仍害怕外来的反对干涉他们。在得到毫无争辩的合法授权以前，神经一直紧张，觉得依然有危险。他们严密控制全国的政府机构。游击队员每个人的手中都持有冲锋枪，动辄开枪，他们把每个陌生人都看作是潜在的敌对分子，他们时时警

惕所有的政府机关，劲头十足地在城乡巡逻。人们所熟悉的通敌者被搜寻出来，多人受审，其中一部分被处决。甚至那些从未支持过游击队运动的人，或者像是反对新国家的人也受到了恐吓、监禁和惩处。一些人失踪了，在这几个月内清算了好多好多的旧仇宿怨。

1945年11月27日普选时，总共就有一张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的名单，赞成与否，选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几乎没有几个人愿意对那个赢得了战争并权力如此之多的政党投反对票；而胆敢直接投反对票的人就更微乎其微了。铁托得到了总票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弃权或废票很少。虽然曾竭尽全力动员人民投共产党人的票，当然毫不怀疑，如果反对党参加竞选，共产党人的得票就会有所减少，但铁托及其游击队那时还居于鼎盛时期，他们无论如何都能赢得大多数，这一点不容置疑。现在铁托赢得了合法的权力和服务于他的政体的议会，它仿照苏联的做法，不允许倡议区别自由的行动，一切由一些决议决定。这些决议先由铁托主持下的政治局提出，然后由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决讨论通过。

11月29日君主制被消除，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强制实行工业、银行以及所有商业企业国有化，无偿地接收，只剩下以雇佣形式为主的独营的手工业者，他们变成私营工业的惟一残余。只有土地仍是私有制，但私人占有被大大的削减。据此已国有化的土地或没收卖国者和外籍人的土地，分配给曾配合过游击队的无地农民。被分给了土地的大多数人必须加入合作社。房产只相当于自住房屋，由于住房紧张，征用很多房屋。这些史无前例的改革都写进了1947年1月31日通过的以1936年的苏联宪法为蓝本的宪法。让许多在这个新国

铁托传

家里毫无人权的人的权利得到保证，例如，人们的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召开群众大会讨论自由。这些也都是形式而已。事实是这个新共和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共产党是实际上惟一的执政党，党权也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操纵，而铁托是绝对的权威者。铁托及其党内领导班子认为，他们执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他们的，他们代表着全体人民。他们将铸造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个南斯拉夫，为此人民将感谢他们，拥护他们。战争年代的辉煌成就，使铁托及其政府中的领导人具有一种心境：勤奋劳动和刻苦生活的南斯拉夫人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有一桩大事迫在眉睫，必须解决。否则，铁托必须为他的革命能否成功担心，这就是关于米哈伊洛维奇。他在战后逃进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相邻的山区。铁托发誓要生擒他并公开审讯，目的是将他的战时叛国行为和亲塞尔维亚政策公诸于世以便使整个切特尼克运动彻底失败。米哈伊洛维奇在 1945 年有很多次机会能够逃离南斯拉夫。但是，他没有。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塞尔维亚爱国者，他仍然抱有在战争时期使他归于失败的幻想——有朝一日他将能东山再起，消除共产主义，并再次建立塞尔维亚政权。他逃亡十几个月，风餐露宿，亲众离散，追随者也没有几个，终于在 1946 年 3 月初被捕。铁托在第二次去俄国访问的途中接到了兰科维奇发来的一封简要的电报——“计划圆满。”米哈伊洛维奇的公开审判于 6 月 10 日开始，经历了一个月。他声称在狱中受到很好的待遇，这已由与外界无关的证人证明确实如此。审讯将如何结局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他的叛国活动罪证如山，他也供认不讳。他在法庭上非常镇定，他为自己辩护做出的最后长达四小时的演说，对他

的战时处境和使他无可奈何的“时局的旋涡”做了极其详细且精辟的分析。关于他自己的动机，则说得很含糊。他认为他是同盟国的政策和“残酷命运”的牺牲品。“我有远大的理想，我开头也搞得惊天动地”，他最后说，“然而，世界的狂风把我和我的事业吞噬了。”1947年7月17日他同其他切特尼克分子一起被处决。

战争刚刚打响时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一万二千名党员，但能够活下来的不过三千。这些老党员不得不在战后和战时参加共产党的大约三十万男女党员的协助下处理烦重的政府工作，在这个新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想要在此刻成为地方政府的头头或政府各部的部长、各大企业的领导人、国家计划的制定人、土地改革、住房或生活食品管理人员的，便是战斗打响前那些善于散发和编印非法小册子的共产党人，那无疑会给人造成错觉。大部分身怀本领的共产党人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已获得了管理和计划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的经验。然而，事实证明，和平时期管理国家的十分烦琐工作以及为一个稳定的未来制定一个详尽的计划，则完全不同于以往。共产党人自己把战前那些在行政或政治、技术方面有一定的基础但却未曾参加过游击运动的人们的帮助全部排斥在外。这样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因为从定义上划分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一部份，是新国家的敌人。

对于那时候领导人如何做出政治决定以及如何制定决策的细节，我们并不了解。就如同俄国人在1948年轻蔑地指出的，南共保留了战前的秘密活动性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习惯，还有一些是要掩饰其实际政权的毫不坚固的基础。证据充分表明，少数几个人共同作出决定，而铁托本人则继续存留了与他

铁托传

在战前和战时别无异处的权威和个人权力。铁托的大部分亲朋好友经历战争仍然活在世上，但是伊凡·米鲁丁诺维奇于1945年乘船时，在多瑙河上被雷电打死了。最大的损失还是伊沃·洛拉·李巴尔的去世。此人十分精明，同铁托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他仍健在，不出意外也许会成为铁托的副手和接班人。

在称为政治局的最具有实力的决策集团中，同铁托关系最亲近的人是由四、五个人组成的小组，其成员观点各异，但核心人物中有塞尔维亚人莫沙·皮雅杰、斯洛文尼亚人爱德华·卡德华和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还有门的内哥罗人密洛凡·德热拉斯。接近这个重要集团的还包括克罗地亚人弗拉吉米尔·巴卡里奇、斯洛文尼亚人博里斯·基德里奇以及马其顿善于思考的专家门的内哥罗人伏克曼诺维奇。他们都是战前经验丰富的老共产党员。他们代表了国内各民族间的大致平衡。更深层次的平衡则维持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党中央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商讨政策，就大量次要问题提出建议，然而在这个时期总是把铁托的核心小组的重大决定作为最终决策。人人皆知，有关建立政府和编制计划的方法的讨论是最紧张的，争论得很激烈。尤其是关于制定计划和继续保留私有土地的问题意见不一。铁托总是倡导人们讨论，但是决定一经作出，反对就没有任何意义。领导人已有实行这种共同工作方法的丰富经验。很多革命变革的基本原则，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得到定论，其中很多项早在1943年的亚伊策反法西斯会议前就已做出决定。领导人只要就战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就得先研究，然后就战术问题作出决定，为此一周要开多次会议。他们是一个团结紧密的班子。铁托作为首脑享有特殊的权威和特殊的地位。这在最支持他的同事和范围更大的政府官员中都得到一致的认

同。政府官员都是受严格纪律约束的共产党员。那些坚持否定这种权威的人，一定是把对党的领导才能的怀疑隐藏在内心深处，因为怀疑与背叛等价。

铁托同这个班子的每个成员都有特殊关系。很难看出这些关系中哪一些称得上真正的友谊。铁托比他所有亲朋好友都年长二十来岁，惟莫沙·皮雅杰除外，铁托同他早已成为挚友。但是别人都把铁托看作是非同凡人。他们对铁托充满敬意的描绘充分表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自己也认为如此。这一点并不影响他同他们一起开玩笑、消遣、下棋、打猎和从事其它娱乐活动。年事虽高而外表依旧充满青春，这是他的优点。也许是由于身心健康，精力旺盛，他总是喜欢同年青人一同讨论，对他的两个最有活力的同事基德里奇和德热拉斯有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两人都是精力过人、足智多谋、才华出众、雄辩健谈，都完全不像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德热拉斯生于门的内哥罗一个贫寒然而非最贫苦的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南斯拉夫王国军队的陆军中尉，然而在密洛凡童年时代就已离开人世。他的家史，正如德热拉斯后来所讲到的，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门的内哥罗家史小说，每一代都有谋杀、宿仇和暴行。而德热拉斯对这部小说也发出了自己的一份真挚之情。“我父亲的祖父，我祖父的祖父和外祖父，我叔叔和我父亲都被杀害，就如同遭到了可怕的诅咒似的。……我觉得好像我生时双眼就沾染了鲜血。鲜血是我最先见到的东西。这足以证明德热拉斯性格中的一些方面，说明他为什么毫无怀疑地信奉共产主义，后来又强烈地反对它，这都说明他的奔放不羁和多情善感的理想主义。博里斯·基德里奇则完全不同。他是卢布尔雅那一个教授的儿子。还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被

铁托传

关在监狱，后来出国到布拉格、巴黎和维也纳为党工作，但他还是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斯洛文尼亚从事地下工作，而不喜欢在三十年代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受训。

1945年，战时掌握最高权力的最高参谋部转化为在新的国家管理政府的领导班子，这种转变并不需要多少调整，因为人员并未大规模变动，党组织没有变动，政治局继续保持了权力。政治局的每个委员如同战时那样各负责一方面。莫沙·皮雅杰继续制定宪法，即国家的理论和法律基础的工作。这是他从1943年起就开始着手的任务。兰科维奇继续掌管重中之重的安全工作。他组织和管理各种情报机构，反间谍机构和使人害怕的秘密警察，为了保卫新的革命国家和铁托，以无情残酷而威名远扬。时光流逝，他搜集国内一切重要人物的秘密情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最终被看做十分危险的个人王国。德热拉斯成为在宣传和文学方面担任重任的副主席。卡德尔专门负责他战时就已着手搞的对外关系工作，处理日常外事，偶尔担任特殊出访使命。铁托本人则负责处理国际关系。作为总理他协调整个班子的运作。但显然他没有办法处理在许多领域内同时进行的工作的具体实施细节。国内事务的琐事，只得交由他人负责。

铁托除了一心一意处理对外事务，还有相当复杂的公开活动——接见外宾，主持会议，在国内各地的纪念性质的集会或在需要时给人民鼓干劲，向他们保证情况将会有所转变的时候发表演说。人们看到他身穿元帅服，胸前佩带的战争勋章和金色穗带灿烂夺目，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以满足铁托在衣着方面的自豪感。战争年代已经远离，除了在正式军事场合，制服似乎已与时代不相称，铁托于是更经常地穿着设计精美的便服

露面。

领导者们所需解决的最严重的紧迫问题之一就是保证人民有饭吃。铁托最终还是接受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但以由他自己的人取代由西方盟国来负责分配为条件。援助的主要项目是提供种子、粮食、农具和牲口，鼓励和资助农民重新把土地耕种起来。对农民施加了过分的压力，迫使他们最大限度生产粮食，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他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那种刺激。土地占有受到了限制，政府强求农民以严格控制的低价出售所有余粮。黑市买卖受到严厉制裁。农民则报之以消极抵抗，拒绝生产超出他们自己所需的粮食。罚款、宣传、监禁都没有制服他们，于是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为了改组采取国有化后的国家经济，制定了一个豪情满怀的五年计划。它把苏联的样板作为基础，目的在于开发本国工业的潜力。这个计划很能吸引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因为它将给他们带来新建工厂生产的商品，更高的生活水平，给工人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从理论上讲，它将为未来的共产党的精华输送一批干部同志。这反映了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游击队观点，即认为虽然缺乏足够的资金，只凭英勇奋斗、因陋就简和南斯拉夫式的共产主义就足以取得成功。就连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中间对这个计划的态度也有很大分歧。最后博里斯·基德里奇接受命令负责这项任务。为了使这个计划成功，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未能持之以恒达到成功。他于1953年患白血病去世，他的同事们却把他的死因归于操劳过度。

五年计划内为年度计划、月计划、周计划，以至日计划。

铁托传

为每个国家、每个工厂、每个部门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工厂被告知生产何种产品，去哪里销售和销售价格。据说，仅年度计划一项用纸就重达三千三百磅左右。联邦和各共和国的二百七十七名部长向数以百计的企业负责人——一下达命令，后者再向下属传达命令，而企业负责人自己每年就要发回约六百至八百份报告。可悲的是，计划虽然在理论上看来非常完美，包罗万象，而在实践上得到的却是让人恐惧的结局。计划人员忽略了许多诸如针、梳子、别针一类的必需品，致使这类商品的黑市价格狂涨。对某些商品需要的估计则明显高了很多。因为只强调增加生产的产品，超额者得到额外的报酬，数量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劣等货充斥商店无人问津。尤其重要的是，国家自己不能支付计划中规定的重工业所需的主要资金。

战后的年代，人人都努力劳动，往往二十四小时内干两种不同的工作，目的是收支两抵，获得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食物、衣服、燃料和住房，或者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当人民逐渐地认识到只能获得很少的物质报酬时，他们的情绪就转为低潮。他们倦于过度疲劳、困顿、肮脏，讨厌听那种用未来情形会更好的谎言来动员人们付出更大代价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们从来到南斯拉夫的外国人那里看到那里的人在战争期间并没有遭受如此多的痛苦，如今却穿得更好，吃得更好，拥有先进的药物，更多的奢侈品，活的更自在。南斯拉夫人再也不愿再承认，这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经历了四年全面战争的长时间没有发展的国家。同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对于设计一个还是假设性的美好憧憬的种种理论失掉了兴趣。他们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领导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幻想破灭了。但是这种话他们只能秘密地说出来，因为兰科维奇的警察

当局的密探无处不在，批评社会主义就是破坏活动，谁说这种话就得坐监狱。对劳累至极的居民来说，一个警察国家与共产党人希望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公平和富裕的幸福美梦之间相距又岂只是万里。

虽然铁托自己专心致志于别的方面，但没有理由觉察不到南斯拉夫人民的反应。他阅读报纸，但新闻查得十分严格，报纸上见不到批评意见。他在许多集会上的讲话，但对象总是情绪激动的听众，他们欢呼他是英雄。办公室、商店或旅馆都悬挂着他的像，他几乎也已被神化。他被与公众舆论隔绝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然而，政治上的直觉一直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这必将继续发挥作用。铁托在他经历中的这个阶段陷入了政治困境。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规定的实践路线必定是准确无误的。确实，苏联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的计划经济表示不满。——“你们要工业干什么？”一个苏联代表曾经问道，“我们乌拉尔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还对南斯拉夫组建自己的队伍，容许农民私有土地，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其它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但是，如果接受这种批评，就标志着把南斯拉夫的经济、武装力量并入苏联的经济和武装力量。土地的集体化将引起同农民之间的一场浴血奋战和大规模的饥谨，就象苏联三十年代发生过的那场灾难一样悲惨。铁托从未准备把南斯拉夫交给苏联，也不愿意同曾经大力支持过游击队运动的顽强的南斯拉夫农民拼个你死我活。

尽管 1948 年初他亲自看到了俄国领导人的信件中的那些话，但是他仍旧深信自己是个好的、合格的、称职的共产党人，他作为一个党员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任务，真正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神，而结果又如何呢？南斯拉夫人民和苏联领导人

铁托传

对他都不是很满意。必须检查一下记录。彻底搞清楚错误出在什么地方。同俄国人的矛盾就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关头，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清出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断定，铁托独立自主太过分了，过于野心勃勃，过于南斯拉夫式，特别是过于成功了，没有希望充当他在南斯拉夫要求的那种顺从的卫星国领导人。一定要把铁托除掉，而代之一一个因靠俄国人上台而心存感激甘愿服从的人。斯大林认为铁托并不会很难推翻，这一点充分说明他缺乏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普通南斯拉夫人实际情况的了解。我们不知道斯大林到底准备让谁来代替铁托，然而人们都能猜测到俄国人一直在培养克罗地亚人安德里亚·赫布朗扮演这一角色。这种说法之所以可信是因为，俄国人有一封关于五年计划的信是写给赫布朗和铁托的。另一个几乎可以完全确定的同苏联领导人作过某种秘密谋划的南斯拉夫高级共产党人是铁托的前一任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很明显约瓦诺维奇的人丝毫不会对他站在俄国人一边感到惊讶或是莫名其妙。他是一个深沉却也狂热的门的内哥罗人，前王国陆军军官，只是在起义结束时才成为共产党员。他一直都是那么如痴如狂地仇恨西方。1944年他陪同铁托访问意大利并与丘吉尔会见，每次同英国人接触，他都显得疑忌、暴躁、倔强、不肯妥协。看来他曾企图把南斯拉夫军队带到苏联一边，反对铁托。但他从来没有此种机会。他在共产党情报局争论的开始就被枪杀，按官方说法，当时他正在准备越境逃往匈牙利。

对铁托本人来说，俄国人所采取的反对他的行动是一种可怕的威胁，直接触动他心灵深处。尽管他为共产主义东奔西跑多年，他还是被抛弃了，这种打击对他更具有毁灭性。根本起

因到底在哪，他起初并未清醒地觉察到。他在此后的生涯中从来没有不感到委屈。多年以后他说：“对我来说，这是十分伤脑筋的。尤其是我从早先同斯大林的谈话中对他产生的那种印象，他赞赏我的正直。”然而，他在那个时候却表现出他特有的在打击下迅速恢复正常的的能力。他也很清楚他毕生的工作，几乎连他的生命都取决于能否获得并保持他的同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大多数党员对他的信任——而训练这些人去赞扬苏联领导人的却只有他自己。他们必须在他与苏联领导人之间作出准确的断定。这似乎是从来都没有希望的事。

如他早年奋斗中遭遇危急情况时那样，铁托的反应是目标明确的活动。“生活教会了我在这种危急关头最危险的事情是没有自己的一种立场，犹豫不定。遇到此种局势，反应必须大胆而坚定。”几乎在6月份正式宣布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之前，铁托就把苏联的批评这一全部问题提交给4月13日召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全会同意政治局采取的政策，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除外，他们在会后的不长时间里就被捕。在这种时候，意见一致是最关键的。公开支持俄国非常危险，以致不得被视为叛国行为。然后把这一矛盾以及领导人的反应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直至最基层单位。党员们听说他们一直被教育值得尊敬的苏联领导人竟然批评了铁托，并撤回了对南斯拉夫的援助时所感到的那种从未有过的震惊，至今记忆犹新。刚开始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员要彻底改变自己对俄国的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想到要独立挑战未来，没有苏联的援助，没有其它国家共产党的友好情谊，这似乎意味着必然的灾难。

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后的第十一个月，是对铁托作为一个领导人的人格及品质的最严峻的考验。在这段时间之内，时

铁托传

刻都存在苏联入侵的威胁——铁托认为如果国内形势不堪重负，给苏联提供了机会的话，这种入侵将必不可少。此外，国内还存在着很多危机。存在少数人的反革命活动的威胁，这些人仍旧认为应该服从于苏联领导人，或认为南斯拉夫革命如果失去了苏联的支持便不可能持续发展。约一万二千人因支持共产党情报局而被囚进监狱，同时也有很多人由于保持沉默而躲避了逮捕。但是在四十万名党员中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它人都团结在铁托的左右，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不敢妄想。有朝一日得到领导人、党内的多数成员和广大人民的支持，铁托坚信他已完全有可能去进行斗争并夺取胜利。而且从他的行动可以明显看出，在一段时间内他还不能相信斯大林方面完全失去和解的余地。

让人觉得有趣的是，在起初的十八个月内，南斯拉夫领导人还努力在接受他们认为苏联提得那些有根据的批评，俄国人指责南斯拉夫党过于秘密化，二十年之内竟然不曾召开过一次党的代表大会。7月21日，被开除还不到三十天，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五次党代会。铁托的正式报告详尽的解释了自1928年上届党代会以来党的发展历程。这个报告有匆匆拟就的痕迹，讲了足足有好几个小时。铁托不顾俄国人贬低游击队那些骄傲的言论，在报告中用了大部分时间讲述了游击队的悲惨的经历和胜利，这正是大部分党员最爱听的东西，因为除一小部分人外，大家都是通过参加游击队之后而加入党的，而铁托正是由于他在战争中的领导才得到人们的追随和拥护的。战争既是历史，又是神话，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的重要原因。低估这种史实和经历将会伤害南斯拉夫人民胜利自豪感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根基。这种事情就算是有斯大林的命令，铁托也决

不会服从，尽管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懂得俄国政策的真实企图是要彻底的摧毁他的革命。铁托讲话以后，党的各组织领导人就党的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出了充分的汇报及对前途的预想。兰科维奇、德热拉斯、卡德尔和基德里奇分别报告了组织、宣传、外交和经济策略上的工作。谁也没有当众向苏联挑战。大家都肯定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纯正。他们依旧坚信只要他们证明自己是好共产党人，他们还有希望争取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六个月后他们还在依照这种路线行事。到1949年，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步骤来答复苏联对继续存在土地私人占有一事的批评。建立了一个组织来强迫农民把他们占有的耕地全部并入合作社，从而消除了土地私有。为达到此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了野蛮的高压手段。共产党员组成的小组到全国各地游说，极力宣传合作农场的好处及优越性。反抗激烈的农民被投入监狱。合作社的数目也迅速从1948年的一千三百十八个变成了1950年的六千零七十五个，占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强。可是，这种政策却没有获得成功，俄国人丝毫没有动作，却使南斯拉夫经济濒于毁灭。农民们敢怒而不敢言，用消极劳作的办法进行了反抗，并产生了意想中的效果，只要够自己生活需要，他们就拒绝多干哪怕是一点点活。土地变成草坪，牲畜被屠宰吃掉，粮食收成大打折扣，而恶劣的气候使这场灾难更加深重。国家面临着饥荒的危险。

这几个月里，兰科维奇高度警惕的保安机关全力以赴，百般努力，这才平定了从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阿尔巴尼亚渗入的苏联间谍。有过企图暗杀铁托的传说，但具体情况从未披露过。各卫星国撕毁了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条约，中止了贸易，停付赔款，并不断地掀起对南斯拉夫的恶毒谩骂

铁托传

式的破坏性的宣传运动，还对被认为曾经支持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滥加冤枉，交付审判。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还有另外一些人都因为这种罪名被处决，后来又承认纯属诬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铁托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他想重新让斯大林对他产生好感已无希望，必须另觅一条生路。同样令他为难的是，他面前还摆着另一个进退两难的难题，一个虽然他当时并没有觉察到但今后却必须终身面对的难题：怎样才能既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而又不使他的共产主义立场受到损害，如何既能够脱离共产主义集团其它国家，而又能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在处理各种危急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成功地、步步维艰地为南斯拉夫找到了出路。1948年以后的三年，他一心一意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争取生存——争取他的革命以及南斯拉夫的独立得以继续发展。他自己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是否生存的问题只不过凑巧同这些重大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非常明显，他的成败将取决于他所创建的制度的存与亡。当前，考虑一些实际问题重于一切；到底怎样在政治理论上作出解释，是以后的事。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国家由于饥谨而崩溃。为此，铁托不得不改变他原先作出的不接受资本主义西方的援助、不同他们进行经济合作的决定。他怀疑西方国家有反革命意图，他也知道俄国怀有同样的目的，因此对两者必须进行非常谨慎的权衡。很明显，西方的危险性相比之下小一些。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他同西方缔结了贸易协定，接受了西方的食物、军备以及为一项被改过的工业化计划提供的贷款以及给与赠款。

改弦易辙与非共产党世界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条路线是缓慢地执行的，使铁托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之间均有足够时间

铁托传

来消除相互的猜疑。毋庸置疑，这种政策得到大多数南斯拉夫人的竭诚拥护。不仅仅是由于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了食物与工作，还带来商店里的商品，同时也因为这种政策使他们与让他们感到有着共同文化和传统的西方世界恢复了正常友好关系。南斯拉夫几乎没有人对苏联怀有强烈的好感，这种人大多数都是传统上长期同俄国交往的门的内哥罗人。战争时期对苏联的支持是那样的热烈，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大力宣传人为造成的。幻想破灭所带来的最初的震惊一旦灰飞烟灭，这种拥护就像捅破了的气球那样在瞬间就崩溃了。而铁托建立在现实成就上的个人地位和威望却完美无缺的保持了下来，同时也由于他政策的改变而大为提高。他精神抖擞地周游全国，发表演说，接见各国代表团，鼓舞南斯拉夫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来挽救自己。他一如既往，看起来体魄健壮，衣着整洁，以坚定的信念鼓舞着他们。他们勒紧裤腰带，响应了他的号召。南斯拉夫的再次站起来是人民与领导者共同奋斗的结果，但是这些都离不开铁托的领导。

同苏联的决裂和同西方关系的恢复，引起了对南斯拉夫新国家的根本性质的再次审查。这种事迟早都要发生，正如过了很久以后在东欧另外一些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斯大林的残酷的敌意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有可能甚至完全有必要放手审查1945年以来按苏联的授意在南斯拉夫所采取的那些做法。如果他们还不离开苏联卫星国的轨道，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次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性质的严峻的考验——究竟是为南斯拉夫人民谋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的一种手段呢；还是其本身就有它的企图？铁托及其同事们作出了民族的、更合乎人道主

铁托传

义的抉择。中央集权的强制性国家和强加于人的合作社已引起了强烈不满和经济灾难。这些做法只好全被摒弃。1953年合作社准许解散。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去领回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尽管他们将负担很重的税务，并长时期得不到适当的发展，但还是没有禁止他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国家中的私有企业的一个重要成份存在下去。

解散强制性的国家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而且开始还认为这也为共产党继续执政所必需。1949年以后，党的理论家陆续开始考虑采取何种方法在保证共产党继续掌权的情况下实现政府体制民主化，而同时又能够与马克思列宁的教义不相违背。人们此时已坦白这种教义对南斯拉夫的现状的进一步完善没有提供任何详尽的指导。提出来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在工厂中建立工人自己的管理体系，1950年以一项法律实施其效力。要选举工人委员会，参与有关工厂管理的所有决定，包括该怎样处理利润。工人委员会起初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工人根本不可能有效地参加管理。依据政治信仰和资历得到任命的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全部要职。但是工人自治机构随即被写入其后的几部宪法，成为铁托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七十年代，原有的体系中又发生了许多改革，工人也慢慢开始担负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工作。这种做法在实践上究竟有多大成效，南斯拉夫国内外的意见都产生了分歧。但是作为一种机构，看来早已根深蒂固，其他资本家和共产党国家都把这个做法作为解决劳工与管理部门之间问题的一种途径而加以仔细分析。

从1950年至1969年之间，南斯拉夫依靠本国的努力和西方援助，在国内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全国上下都受到影响，

虽然南部不很发达的地区不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还有贝尔格莱德一带的塞尔维亚发展那样迅速和顺利。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也正缓慢地、步履维艰地走向人民所意想不到的繁荣。南斯拉夫从西欧战后的经济发展中看出了希望，也为自己找到了前车之鉴。要是继续留在共产党国家集团内，就得受到苏联的发展、防务和工业计划提出的要求的限制，这是做不到的。为穷国的大众谋利益，是铁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法斗争时期亲自撰写的许多小册子中所曾经提出的一个朴素的口号，这一点如今已即将成为现实。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一天比一天清楚：这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具备的基础，而且如果铁托和共产党要继续保持政权的话，这也是一项根本需要。这样，经济发展就成为政治革命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为了鼓励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不得不抛弃许多事先早已策划好了的共产主义理论。采用了新的制定计划的方法，撤除了老的中央集权；经济计划的权力分散，特别指出了赢利以及资金积累的再投资，以求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发展，这成为一种顺应民意的做法。经济上的分权致使政治上的分权的产生，因此，六十年代后期，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已由联邦的六个共和国取而代之，只把协调全局的权力以及其它的部分职能留给中央政府。非常注意维护区域性的独立，地方爱国主义显然比南斯拉夫主义的任何感情都更加强烈，甚至在很多共产党员中间情况也是这样，尽管大家都赞成共和国南斯拉夫不可能离开联邦而“孤军奋战”。地方利益和经济需要，尤其是落后地区的要求和比较发达地区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危机的发生。

铁托传

这些事态的不断进展，与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的共产党继续存在以及依然由他操纵所有权力，两者之间特别不易调和。党本身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新一代党员的成长而进一步完善。在他们的眼中，战前的非法活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党史中的故事，只是用来培养他们成长的一种传奇，但对他们本身一点都没有意义。这种传奇早晚会成为一种恼人的障碍，妨碍了从1945年到六十年代一直担任重要职务的老一代党员和在战后南斯拉夫慢慢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党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年青党员开始强烈要求革新那个对他们来说已在老模子中僵化了的党，使之现代化。铁托几乎所有的同事都在十分年轻时就掌了权，这个事实使情况变的更加复杂。1962年铁托七十岁时，他大部分年龄最大的同事才五十多岁，除此之外，有许多人更年轻，他们尚无放弃权力或隐退的打算。这种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加上铁托年事已高，总有一天免不了要长辞人间，从而留下由谁接班的一个必须确定解决的问题。这一无可讳避的事实，使原已矛盾纷繁的党内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战后的头几年，人们一致认为共产党员应在新国家中组成一个统治阶级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是受信赖的人员，担负着全部责高任重的岗位，对党的最高统治阶层总是绝对服从。作为报酬，他们获得高薪和特权，从而把他们同社会的其他成员截然分开，不只让人产生妒嫉心理，有时甚至使人恨之入骨。就是这些触目惊心的不平等和与之相联系的属于警察国家的某些情况，在五十年代刚开始就引起了德热拉斯的强烈指责——尽管他自己也参与了这方面的行动并从特权中得到很多利益。这使他不得不写一篇粗鲁的短篇文章，讽刺一些党员及他们的妻

子的自私和腐败的社会风气。

这次直接的嘲讽是他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尽管他同铁托共事这么长时间，两人之间虽然有过一段友谊，德热拉斯竟藐视铁托的权威，在报上当众表明了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痛斥。如果他只私下谈谈，大概还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意见而不致受到惩罚。但这是一种对铁托个人的公开的背叛行为，铁托决不宽恕。废黜和监禁使他更加愤激；两年后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更加深刻地对共产党统治的南斯拉夫社会进行批判，公开反对他自己这么多年以来狂热信仰的共产主义，而支持宣传西方式的民主多党制。因为他过去是个极端主义者，他的攻击是空前绝后的凶狠。他并未指出到底如何能使这种主张在南斯拉夫行之有效。德热拉斯对原来的理想主义感到了厌恶。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也不想接受妥协或等着看看国内事态的发展将是怎样。当他下定决心起来反对他原先的同事并因此成为牺牲者的时候，南斯拉夫正好实行了自由化的改革，而他后来却是支持这种改革的。这就是他的悲剧。改革一旦开始，就缓慢地接着愈来愈快地不断发展了。

1952年，德热拉斯起初攻击南斯拉夫的共产党社会时，斯大林还在世，南斯拉夫的地位在摇摇欲坠。斯大林告别人世，赫鲁晓夫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和解访问后，南斯拉夫无论如何都有数年的时间继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毫无必要担心苏联的干涉。警察国家放弃了，许多政治犯因此获得解放，共产党人的特权受到了限制。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和新兴工业的扩大，同西方联系合作的发展，共产党人不再是这个国家内仅有的领取高薪的阶层了。在1958年召开的党的第

铁托传

七次代表会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式将其名改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示其作用的改变——不再是紧握大权的高贵集团，而将从内部对社会产生影响。另外一个阶级同时也替代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这是些专家治国论者，专门受过教育的人员和专家们，他们凭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而赢得高薪和特权。他们可能是党员，但这并不是必须条件。社会上最富有的人也许是手艺人、重工业工人或从事外贸的人。到六十年代后几年，任何人只要想成为党员便可以很轻松的成为党员，但是一旦入了党，他就必须接受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并许诺负责的工作只能分配给那些资历差不多的人。

伴随着这些变化，地域性的情绪也在南斯拉夫蔓延，而从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可以看出：联盟的成员之间在拨给各自的共和国的投资基金，各种语言地位的高低，以及其它文化经济等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共产党人自己在自由化和权力分散对党有利还是有害这个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联盟面临分裂为两个派别的危险——一部分人支持改革以及不同观点的公开讨论，包括让反对派以某种形式发表其各人看法；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样一种改革本身就会毁灭这个政权。在这些事态的发展过程中，铁托本人置身于冲突之外，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统帅地位，不时参与调合，抑制过火的改革，总是责备以容许其它政党这一形式使反对派制度化的要求，但同时又同意在某种限度内的自由化。铁托的声明常常并不是那么公开，然而众所周知，他的权威及声望如此之高，若不是经过他的许可，上述种种重大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966年夏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危机，铁托只好同他年龄最高的最值得信任的同事之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从此各奔东

西。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战后创建国家，以及同共产党情报局决裂后，斯大林一直处在这个国家的最艰苦岁月里，此人一直担任安全机构的首脑。所有这些年代里兰科维奇在党的每一届委员会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除铁托外，党的负责人员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很少，而他是其中之一。他隐身暗处，神秘莫测，担负着以无情的高效率铲除共产主义敌人这一最不易取得人民信赖的任务，给自己搏得了一个大不很值得人羡慕的名声。五十年代自由化那段日子里，他正式更换了职务，在公众中的形象也逐渐被人重视起来，以致人们早已把他排在卡德尔后边而成为如果铁托告别人世后便最有希望能够继承权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到了六十年代，人们认为他已远远的强于卡德尔，而成为铁托的直接继承人。但人们都很清楚他与铁托不同，他并不赞成自由化改革和权力分散。1966年6月28日，铁托突然召集所有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在机密和紧急状态下到布里俄尼岛召开会议。中央委员们被一批批用飞机从贝尔格莱德送往目的地，军队从当前的驻地出动。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审议对兰科维奇的强烈控告。他被控这些年来对党所进行的改革并在遍布各地的国家安全系统中保持他个人的声望与地位。这使他有可能控制全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所有决策，上至地区政府，下至公社和甚至工厂一级的地方政府。调查揭露兰科维奇操纵着一个强权王国，这个王国私自设立了国内所有英雄人物的秘密档案——他以从不销毁任何文件而举世得知。他的下属甚至窃听铁托的电话。兰科维奇承认他曾经试图利用他的权力反对由权威代表一致决定的改革。他从其他党员，从他自己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得到多少支持至今还没有查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有能力向铁托的权威挑战，也无法使他摆脱蒙受耻

铁托传

辱。这次危机同德热拉斯事件基本相同，但造成的损失没有前者严重，因为兰科维奇还未达到反对革命的地步。这对铁托是一次非常悲惨的打击。但是铁托不同意把他的老同事囚进监牢。兰科维奇被撤职却没有被开除出党。他从此进入了完全而驯服的隐退，站在远处静观局势的发展。

兰科维奇虽然已经被革职，但他和他的同事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现实问题是南共联盟怎样才能保持权力和威望，而同时又满足党内公众的扩大民主自由的要求？又怎样能既做到扩大了民主，而又一点都不有损于这个社会主义战后国家的整个基础？要求进行种种改革的压力将铁托置于步履维艰的境界，而在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尚未找到的时候，1968年夏，苏联竟突如其来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自由化改革；这种改革比铁托计划容许在南斯拉夫进行的改革还要先进，也更为利落。铁托坚决不赞成入侵，但对南斯拉夫来说，不管是否是共产党员，教训都是显而易见的。苏联没打算听任中欧的共产党政府丧失政权，而南斯拉夫正处于险境，除非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执政。这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参照南斯拉夫的地位和苏联对东欧的共产主义改革所持有的态度，铁托的自由化政策是英明和现实的。

1969年3月，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成员出席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党为了对1958年至今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革策划更合谐相配的方案，在会前曾进行了许多改革。甚至曾有人提出把容许发表个人意见定为一项党内规定。大会最后还是定下了几项规模比较大的改革。1945年以来，一直垄断党和国家大权的很多前辈游击队战士从此失去了党内领导职务。战后以来，代表大会第一次交给了

新一代。大会的所有项目都是公开的，出现了大量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经济和民族问题上。此外，还改革了党的机构，以便进一步巩固在国家系统内早已完成的民主化和权力分散。会议决定，以后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共和国和联邦级的党的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同时宣布了包含上述决定的新党纲，党纲规定从今天开始党员有权对已作出的决定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必须能够让多数人都能接受。作为把自治纳入政治生活的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设计的种种改革，得到了铁托的支持。然而他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一样，同时也担心这些改革可能会导致过分的权力分散，并削弱南斯拉夫党的民族性质和权威。考虑到外来的威胁，和不同共和国各民族内部的离心趋势，不少人都认为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会破坏国家的统一。铁托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妥善的答案，展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大会开幕的那天，他宣布创设一个新的组织机构——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局。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委员会，由每个共和国各出代表二名，伏伊伏丁那和科斯梅特分别派出一名代表，加上担任联邦国家总统的铁托自己组成。这是一个进行统一和联合的机构，即一切决定都必须经过这里，所有共和国一律平等。而今南斯拉夫既已发展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国度，人们希望这个代表各地区、各民族的委员会的成员能就怎样处理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达成共识。意见一致是未来的稳定所必不可少的，由于铁托年事已高，这一点就尤其困难。这些希望未能如人民所愿，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不同的共和国和地区的代表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争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各共和国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则是当南斯拉夫变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之际，到底应该保留何种形式

铁托传

的共产党政府。这两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被解决，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存在经济上和宪法上的矛盾，这个历史问题从远古一直延续到今天，曾经是分裂战前南斯拉夫国家的那些分歧的重要因素。1965年以后，这些冲突都一齐戏剧性地表面化了。

1948年，与共产党情报局断裂关系后，铁托本人曾经赞同自由共产主义的发展。正如上面所曾暗示的那样，这一点终于导致接受市场经济，导致工业和其它领域的自由管辖，导致政府的以及某些程度上共产党组织的权力的不集中。成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后，党自己放弃了一些中央集权，并决定在社会和政府中发挥“指导”作用，而不是“统帅”作用。正是这些改革没有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才导致了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南斯拉夫的危机。当时南斯拉夫同其它国家没有什么区别，正进入一个经济困难与日俱增的阶段，这个事实使几年来的问题愈演愈烈。

某些共和国，尤其是克罗地亚，长期以来的积怨变为公开辩论的问题。在各共和国的宪法地位，以及每个民族的文化独立，包括本族语言的权力或共同语的形式，特别在各共和国的经济地位等问题上，人们都提出了强烈的不满与忿懣。关于经济地位一事，在投资数额以及各共和国所得外币到底是应该保留还是分配以供自用的数额问题上，人们的分歧异常显著。而这一切争论中都包含着地区民族主义的强烈因素，这就算是在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中间也非常清晰。这种情况存在于每个共和国，只是程度不同，而以克罗地亚最为激烈。1971年11月下旬，危机终于在那里爆发。当时，萨格勒布的学生在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怂恿之下，上街游行示威，赞成把所得外

铁托传

币留在他们自己共和国的偏激的要求。同时，一些非共产党极端分子，虽然人数很少但能量很大，把事情搞得雪上加霜。他们要求克罗地亚享有所有主权，其中包括独立的外交政策，独立的驻联合国代表权，由自己自由分配管辖的国防部队，而克罗地亚只向南斯拉夫联邦国家提供“自愿”的财政损献。尽管这些要求只发自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中一些疯狂的极端分子，但是整个局势已显得这么严重，不只是威胁党的统一，并且还严重威胁铁托自战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和国家的统一。在如此危急的时刻，铁托以他特有的果断采取了行动。他试图调解但没能如愿以偿，转而诉诸那种早年更为强硬的办法，竭尽全力控制猖獗一时的民族主义以便恢复党与人民的团结，维持联邦国家的合平统一。1971年12月1日，他在塞尔维亚的卡拉卓尔杰沃会晤了克罗地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分析研究他后来称之为“反革命”的活动。这次以召开地点命名的会议，后来被认为是铁托式共产主义前进过程中的分水岭。卡拉卓尔杰沃会议没有开除任何人，但是铁托明确声明不支持克罗地亚事件的民族主义的分裂倾向，并对怂恿这种倾向的领导人慢慢不敢信任甚至厌恶。12月1日和2日铁托在全党的主席团会议上仔细解释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把这些观点一次又一次的向全国广播。全国各地不仅在党的会议上，而且是所有人都分析了这种局势，因为每个人都很明白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已发展到足以影响全国的危险规模。铁托发挥了个人权威，号召全党和全国的赞同——他如愿以偿；与此相结合，他也使用了隐藏在深处的那种威胁，也就是他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作为后盾。

局势逐渐稳定下来。危机主要发生在克罗地亚，但其它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意见相背者从中获得了教训。克罗地亚一

铁托传

些领导人承认他们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辞去了自己的职务；接着其它的共和国也有几个相继辞职。少数人因为进行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性活动被捕。人们都慢慢感到，国家已从一种无可挽留的局势的边缘退了回来。组成南斯拉夫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尚未处理的冲突曾加速了战前国家的破灭。如果 1971 年时竟然会让这些争端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则外来干涉就如同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无法避免。

这次危机导致对 1945 年以来没有禁止发展的自由共产主义不得不进行若干重大的修改。解职或强制性的辞职持续了一段时间。继克罗地亚之后，塞尔维亚的变动特别的多，那里党的领导被控告没有阻止大型金融及银行合作企业的垄断性活动，这些企业是与南斯拉夫专家治国制度的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兴起的。这是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持相反意见者抱怨他们的共和国没有能够得到经济发展利润中属于自己的一份的一个答复。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共和国和联邦国家之间到底该怎样分配利润、投资基金和财政来源。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联邦国家内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的自治权的新定义和宪法保障问题。第三个极其重要的政府的问题是，如何能够重新在铁托强有力的支持下发挥“领导”作用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统一和权威。

所有上述问题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此时已年过八十年代的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政权将面临的问题。没有指定的政权转让者，没有人能象铁托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内做出这么大的成就，掌握大权或搏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与信任。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分裂因素已经存在，但危机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团结的因素也是锐不可挡的。事到紧要关

头，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组成南斯拉夫的共和国中几乎没有谁能强大到足以自立，单独立国的地步——这一点对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和一些非常落后的共和国来说都是一样的。倘若哪个共和国坚持要求独立，那么它就算是不被别国接管，肯定也难免被干涉。对所有南斯拉夫人，包括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来说，学会共存自然都是两弊之中能让人接受的一个。能够于铁托在世之日产生若干各民族都能赞同，通过实践证明可行的宪法条款，是以确保南斯拉夫能拥有一个在他的领导下创建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同时也因为这而能够继续独立发展下去，这不仅仅是铁托一个人的愿望。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修改宪法的商讨花费了很长时间。这个过程致使 1974 年宣布新宪法，但是经过了困难的谈判。

然而，虽然有这些困难，虽然年青一代缺乏耐心，未来变化莫测，铁托可以怀着对成就可以理解的知足和自豪，回顾他担任公职的日日夜夜。南斯拉夫走进了现代化，已发展到按其增长率足以不再称为不发达国家的程度。虽然还存在极不发达的地区、贫穷、失业和不平等现象，南斯拉夫人民对铁托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满意的。现代化的楼房公寓和扩大了的城市居住面积、新修的公路、拥挤的轿车乃至交通阻塞、电视、洗衣机、支付逆差、通货膨胀，所有眼前的这一切，都表明南斯拉夫跟上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当代进展。虽然有政治活动和发表个人言论方面的限制，南斯拉夫人都认识到在铁托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他们享受着所有其它的共产党国家从来未曾有过的那种自由。铁托也为这种成就感到自豪并希望它能够流传下去。

第十七章 有关铁托

当铁托从成年走向老年时，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他的心理又是如何承受了一场最大的考验——这么长时间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呢？1945年，他五十三岁时，被任命为南斯拉夫总理；五十六岁时，他被斯大林不明不白地开除；当赫鲁晓夫向他要求和解时，他六十二岁；他几乎来不及仔细观察一下南斯拉夫的国内情形，并发现他一心为普通人民争取的物质条件有些早已实现，就已差不多七十了。七十六岁时，他不得不正视苏联对南斯拉夫独立的新威胁；年逾八十，他依然是南斯拉夫国家的领袖，是全部南斯拉夫人公认的独一无二的英雄人物。与他同时代的几乎所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都已与世长辞，惟他依然这么矍铄有神，而且还是当时能够亲眼目睹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仍在世的最后几个人物之一；他同时还是那些在本世纪的早期成长起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掌权并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的最后一人。无论从民族的还是国际的角度来看，他也是俄国之外的其它欧洲共产主义所培养出来的头一位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

在他晚年时，无论是在危机的战乱时期还是处于相对平静的岁月，他的基本性格仍然和他早年一样坚定不移。在有些方面，他变得更加高雅、老练；与青年时代相比，他的政治态度确实增添了宽大容忍这一独特的性格，减少了青年时的天真和

铁托传

浪漫气息。他的经历都让他更加明白，人的天性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会发生变化，共产主义理想可以任意渴望追求，但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就像他自己所曾说过的那样：“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苏联尤其不存在”，在一个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在任何地方共产主义都不大可能实现。本着他那从未泯灭的、随年龄俱增并曾使他哪怕仅取得很小的成就也不沮丧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他内心最深处的理想主义作出了让步。在战后刚开始的年代里，因为南斯拉夫在战争中的贡献未获应有的赞扬，铁托曾怒气冲冲；但到了七十年代，他得到了所有他所希望的承认和赞赏。他接受了那些看来确实与他期望着的职务相称的所有荣誉，但并没有表现出这一切荣誉都只应该属于自己。他显然也很崇拜自己身为南斯拉夫总统，但他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要求，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辛勤的工作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的个性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从未陶醉于权力。他虽然欣赏权力，但从来没有被它腐蚀。他的举止既不浮夸傲慢、不可一世又不妄自尊大。他是无情的，但只有当事情发展到生死存亡之时才这样做。同时，他从不肆意暴虐，从不耽迷于清洗。他之所以这么做，谁也不能说得明明白白，但他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却体现了很多前后一贯的特色，这些有利于说明他的性格。尽管他树敌众多，但却是一个召人喜欢的人，即使不是每个人，但至少有很多人诸如他的家庭成员，各行各业的不同的共事者，一些妇女以及各种年龄的男人都喜爱他。他喜欢荣耀，但从不玷污品德，哗众取宠。他具有一种夺取成功的无限激情，这使他不论遇到怎样的机缘总能够有分寸地把握。他基本上从未有悲观情绪，这给了他一种应付危险的

铁托传

高度发达的本能，他就曾凭这多次化险为夷。也许换作别人，可能早已一命呜呼。不论童年还是成年，他总是谨慎小心地面对环境，及至胸有成竹，他便以高度的自信行事；一些南斯拉夫人往往出于刚愎自用而危及生命，铁托向来都是适度的自信。他既具有这些品德，便用不着拜占廷式的浮华排场。他接受了与他那近于帝王的地位和名望相称的一切——但从不得过分。他拥有许多完全属于自己的豪华房舍、大马力的汽车、游艇，也有飞机，但所有这些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大多数国家元首所拥有的，大概它们比其他共产党国家主席所能获得的更奢侈些。倘若有一个南斯拉夫人对此提出批评，就必有另一个人赞同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总统是应得的。

成为国家元首之后，铁托的工作态度和过去没有什么分别。他喜欢和同事们共同工作。尽管他一向严格自处，却喜欢与善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人谈论一切问题。他与人共事心情通常是好的，对笨蛋却不太忍受，而一旦由于愚蠢或缺乏效率引发事故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但一会儿就会平息。他自己效率既高又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在老年，他的工作日程仍然排满了，把四至五个助手及其附属的工作班子忙得不开交。铁托每日早晨六点钟起床，通常是自己烧咖啡，在工作人员上班之前读当天报纸。他在午夜或以后方睡觉，这足足十八个小时的工作日被分成三、四段繁忙工作的时间，工作间息有散步或休息。他具有充足休息的能力，一放下工作即能转入消遣，或要睡便能睡着，如有特殊，立刻便醒来，精神抖擞。

铁托在战后设法建立了正常的家庭，这是他从二十年代早期和第一个妻子波尔卡共同生活以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天伦之乐。他和曾是一个游击队员的约万卡·布迪萨夫列维奇发展了

铁托传

幸福而长久的关系。她比他年轻约三十岁，是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姑娘，1952年4月成为铁托的夫人。铁托年岁虽大，但看似年轻，而且生命力异常地旺盛，所以这种年龄上的距离问题不大。作为南斯拉夫总统的迷人的夫人和铁托本人的优秀的助手，约万卡·布罗兹的优点非常合适。她出身贫贱，由于战争错过了原本就不可能获得的高等教育，她和铁托早年的遭遇有许多相似之处。像铁托一样，她也天资聪明伶俐，充分利用她后来所得到的机会挖掘其接受高等教育的潜力。她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文学学位，教授们注意到，根本不必顾虑她的显著地位而在这点上对她加以任何关照。不论以什么标准来权衡，她的学业都是无可挑剔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她追随丈夫多次出国，自学了多种外语，并对他们所出使的历史和风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她从各方面表现出是一个受人爱戴并对访问饶有兴趣的人。她养成一种受她丈夫喜欢的淳朴的高贵仪态，她那慈祥的笑容和温柔的性格，被全世界公认是南斯拉夫形象的珍稀财富。

妻子终归是妻子，除了作为形象以外，基本上只以自身身份出现而不起任何直接影响，这是典型的铁托风范。不管这是否属于对待妇女的家长式态度片面的反映，这总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把他的私生活抛在政治之外——他一直是这样表示的，这使他在因胜利而变得高不可攀的年代中，以及在他同辈人大多数先后逝去的日子，得以感受友谊和温暖和睦的家庭生活。他在工作和休息时从不缺少伙伴，但他超脱于政治争端之上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可能获得密切纯真的友谊，因为这将引起纠纷和怀疑。约万卡未为他生儿育女，但他辅助铁托培养了已于战后改嫁的赫尔塔·哈斯遗留的儿子，以及铁托的孙子。

铁托传

托尔科和妻子离婚后，铁托便把孙儿孙女都领来教养。铁托把他的家庭始终放在不明显的位置，用他的威望使他们不为公众涉及，而让他们到社会上去奋勇拼搏。他一直悉心照料着他的亲属，但既不让他们特别富有，也不让他们掌权，这儿根本不存在什么布罗兹王朝。而且，无论情况如何，不劳而获地继承权势和财产的观念都是与铁托所恪守的信仰格格不入的。

铁托担任国家元首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他接见过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许多卓越人物。几乎所有人，他们都谈论过他的吸引人的英姿，坦诚的态度和他的聪明才智。他善于依靠他那多重性格的各种特征，或者利用他的广泛兴趣的某些丰富的知识与种种个性极其不同的人进行交际，就象他在战时赢得了譬如丘吉尔、亚历山大、麦克莱恩、林赛·罗杰斯等等许多其他人的仰慕和钦佩一样，他也向战后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中付出了同样的感情，这些人中不仅有纳赛尔、尼赫鲁、海尔·塞拉西、埃莉诺·罗斯福、艾夫里尔·哈里曼、安奈林·比万而且有一些英国皇室成员。在不同的场地，他既能严厉又能幽默——甚至是说些脏话。当激怒时，他也会态度狂野，恶言相向。他富于人的感情，喜怒哀乐常常表现在外，又乐于与人交往，年事虽然已高，这种能力看来并未退化。他对户外生活和活动的喜爱也至死不渝。

他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布里俄尼岛上会见了许多官方和私人的贵宾，在他的若干官邸中，这个地方是他的最爱。这座方圆大约七十英亩的优美的亚热带海岛成为一所特别的庄园。除了他自己的别墅外，还有为官员和来访者预设的别墅和宾馆。他自己的别墅相当简陋：屋内点缀着游击战争时的照片，他生活中其它时期的有价值的物品，以及从南斯拉夫和世界各地收

到的赠品。由于他对国事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事业持有这样一种永不懈怠的兴趣，由于他一贯坚持自己有责任接见大量的形形色色的人，他自己就剩下多少时间了。为了争取一个连布里俄尼也不能供养的私寓，他在布里俄尼对面的小岛万加岛上筑造了另外一幢房子，那儿有他娱乐用的各种设备。他是个狂热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这里设有一个供他自己冲洗访问中拍摄的照片的黑房。他有一个车间，可以在这里进行金属加工，以使他在很早以前学来的手艺不致荒废。他也开辟了一个小园子，在丝柏与棕榈中间随坡度向下通往蔚蓝色的海面。他的物质资源已超过了童年时代的理想。他获得想得到的、适合在各种场合、由顶级的裁缝设计的一切漂亮服装。他一直爱好服装，把它看成成功的外在标志，而又笑自己竟能纵容这样一种弱点。他竟然戴着在 1940 年用他编译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挣得的钱买的那只钻石戒指。这是成功的记号呢，还是对恶运的驱鬼符呢，还是展现其它生活中保存下来的纪念品呢？

而 1928 年在萨格勒布法庭上对社会呼吸挑战的那个勇猛而血性的年青共产党员又怎样了呢？跨过了四十年的共产党人生活和一场胜利的革命之后，他身上究竟还有多少当年的东西遗留下来？回首这一特定经历时，铁托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虽然当时他的行为可能看来有些呆板——连许多共产党员也承认这一看法，虽然这样是有失防备，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风格不相一致，但却触发了相关联的事件，促使他承担起他的事业，终于使他达于顶峰。经历这次劳教之后，铁托就全身心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虽然他一生中对共产主义的概念的理解有过不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个默默无闻的共产主义者，“从一

铁托传

开始我就是个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铁托在年逾古稀时说过，“但我总是设法抚平意见分歧，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彻底改变。即使在今天，我依然是个守纪律的共产党人。”

讲这番话时，他依据纪律听闻俄国对于共产主义的阐述的时代早已消失。1941年铁托的纪律和服从是对自己的共产主义准绳和行为准则的配合。到这时，铁托借助他人的大量帮助，注重成效地宣传了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全世界称之为铁托主义。铁托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荣誉。他在南斯拉夫所鼎力发展的政治制度，长期是由南斯拉夫特定的因素决定的。铁托明白这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他情愿称之为社会主义，因而突出强调这是向共产主义靠近的一个阶段，而共产主义，他认为则是属于未来的理想。他大概还感到共产主义终究只能是个梦想而已。他没有这样说，但当埃莉诺·罗斯福让他清晰地谈谈个人的政治哲学时，他的观点和这点极其近似，他答复说：“我认为可以把自己叫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于南斯拉夫国家的铁托主义的思想指导，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少方面都是真实的写照。南斯拉夫已经发展为如今这样一个国家：国有化和私有财产、强大的中央集中权力和地方分权、工人管理和政府控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合为一体，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当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铁托主义便发挥他的一种灵活性，或调整各种成分的比例，而不为预先策划好的教条般的概念所束缚。当教条自己都失去效力时，也可以重新考虑。

铁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28年时禁止他在法庭上作出这一解释，这一点足以说明他青年时代亲眼目睹的大多数都是人民的悲惨境遇。他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他试图尽力去改变这种状况，而为了这些，他欣然接受了一个革命者生

涯中所必须经历的那些艰苦和危险。在晚年时他所得到的物质上的酬报是他怎么也不会预见到的，而对他的政治抱负也从来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一旦得到这些酬报，他便安然享受，但在铁托的大半生中，这种理想却是前进的动力；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便足以说明他在政治上实实在在的活着。今日的南斯拉夫在繁荣、平等和受到外人尊重等方面来说，都远远地将铁托年青时代的南斯拉夫落在了后面，这是所有人都相信的。

这一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历史的必然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铁托的干预，不可能做出肯定判别。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个人在领导共产主义和南斯拉夫的这些发展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甚至在想，倘若没有铁托南斯拉夫的革命也能成功吗？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没有了铁托，目前的南斯拉夫国家是否依然能继续存在下去？使之永远安宁，保障它的独立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性质完美无缺，这一直是铁托晚年所面对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他知道也许永远见不到答案的问题。

铁托掌握政权，使革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和新国家赖以统治的工具是共产党。尽管它更换了名称、组织和作用，铁托一直这么认为，它继续掌握毫无争议的权力，是他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建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铁托决非是那种相信它应当一成不变的人。他明白，要生存下去必须变革。他赞同自由化政策，取消了党的机械控制。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多党制政府的建议，相信这些想法将使政治生活走向地区性和宗派性的纷争，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这就不仅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毁掉整个国家。这很可能会招致西方式的民主或俄国的干涉，把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蛮横加

铁托传

于南斯拉夫。他认为这两者中不管哪一个都是一场灾难。这些想法，尤其是对俄国的担心，说明铁托为什么在南斯拉夫得到如此强烈的拥护。他一直是战斗、稳定的领导班子和清醒的政治头脑的象征，是一个赢得和保持了人民信任的人，是一个可以向他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困难，并深知他定能尽力找到一个妥善的和公平的处理办法的人。

铁托是否也曾仔细想过他的革命的代价，这一点他从未表现出来。他是非常现实的，他懂得，每一场革命都必须以死亡、监禁和不公正作为代价。他感到他已竭尽全力限制了革命中的损失与牺牲，若不是由于他的努力，某些同志必然更会走极端。虽然，当面临生存问题时，他会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铁托本人基本上仍然是个很通人情的人，是个在许多方面极为寻常的正常人。

同时，他又不同寻常，因为他既具有伟人所必要的品德，又有让人羡慕的极好的命运。他自己却不承认他能从斯大林的清洗中逃生完全是偶然，说这是由于他自己了解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懂得应采取的躲避办法。他多次逃脱看起来虽属侥幸，而其实都应该归功于他的才能；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确实也是非常幸运。同时，他具有一种超乎凡人的能力，善于洞察时代的特点，并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他总是那么有先见之明，而且一直相信只有预先对形势作出充分的估量，才能够做出相应的准备以便掌握主动权。为了实现长远的目标，他总是喜欢把慎重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与抓住时机赢得更大的成功有机的结合起来。失败往往使他激怒发奋，而不是妄自菲薄。但他却从来没有为胜利所陶醉。而对危机，他一直是那么英勇果断。这些品质在战时就发挥了其特有的作用，及至战后，为了

铁托传

能够用这来抵抗俄国人，他不得不痛苦地，不得不勉强地抛掉他对俄国领导人惟命是从的习惯。但一经丢弃了这种习惯，他便把他的才干用于造福南斯拉夫。他革命，同时也是那么保守。1963年，当出现了不得不变革的时代要求时，他说：“总的说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现代化，但我反对那些有损于我们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的现代化，无论在文学方面还是在其它各个方面都是这样。”最为重要的是，即使年岁已迈，他依然体现着他有学习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能力，既不仓惶，同时也不从根本上改变意志。

这位历经沧桑，迥然异于常人的英雄人物，在有生之年便已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作为一个活着的神话般的人物也许有他自己不利的地方，使铁托的形象高大威严，居高临下，但却形孤影单。但这一处境也自然有他应得的报偿，他的成就一定让他自己深深感到满足。当被问及如果能再一次获得生命，他是否将会有其它计划时，他答道：“我想，我将会选择同样的道路。但不同的是也许我会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些。我只能这样说，我遗憾没有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当被问及他喜欢人们纪念他的哪些方面时，他答道：“那就不是属于我的事了。历史将会公正的宣布哪些是我生活中的积极方面，而人民也将会因为这而怀念我。历史也将指出我的缺点。就我而言，我一生尽力为人民和国家造福，只要我还能够，我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下去。”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心中，在共产主义和他这个时代的历史上，将占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位置，这早已被历史证明了。